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9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WEALTH WAR & WISDOM

## 二战股市风云录

[美] 巴顿·比格斯◎著 张韧◎译

《对冲基金风云录》作者巴顿·比格斯全新力作

- 《 二战中的重大转折点与股市大波动有什么联系？
- 《 新世纪的投资者如何规避不确定的风险，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 拥有超群的股市智慧，在最混乱的时局中你也能胜出！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 二战股市风云录

[美] 巴顿·比格斯◎著 张韧◎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战股市风云录 / (美) 比格斯著; 张韧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Wealth, War, and Wisdom

ISBN 978-7-5086-2731-1

I. 二… II. ①比… ②张… III. 股票市场—经济史—研究—世界—1939~1945 IV. 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7535 号

Wealth, War, and Wisdom

Copyright © 2008 by Barton M. Bigg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New Jerse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二战股市风云录

ERZHAN GUSHI FENGYUNLU

著 者: [美] 巴顿·比格斯

译 者: 张 韧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6061

书 号: ISBN 978-7-5086-2731-1/F·2287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前言

**连**续30年来，巴顿·比格斯在他定期交给摩根士丹利的《投资展望》的报告中，写下了金融界最优美，也最发人深省的文字。巴顿·比格斯懂写作，部分原因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他在耶鲁大学所受到的训练。巴顿·比格斯了解市场，部分原因来自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及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费尔菲尔德基金一起所进行的投资活动；部分来自于20世纪70~90年代他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经历；也有部分来自于他在21世纪与Traxis合伙对冲基金所进行的投资活动。那些既关心市场问题，又热爱阅读的读者，对他能够从目前在Traxis合伙对冲基金从事的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写作本书，将心怀感激。

巴顿·比格斯用事实得出结论。他用近乎苛刻的理性，将他的分析建立在强大的基础性研究之上。那些熟悉比格斯在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或者他的著作《对冲基金风云录》的读者都已经知道，出现在书中的任何话题就像是一次跋山涉水的远征，因为它将会是市盈率或者市净率的推算。然而，比格斯的精彩故事在启迪心智和娱乐大众方面从来都没有失过手。研究的深度和经验的广度非同寻常的结合，为本书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平台。



在他的书里，巴顿·比格斯延伸了我们对市场效率的概念。我在耶鲁大学的本科金融课上，我的教授伯顿·马尔基尔经过时间验证的对市场效率的三段式描述，包括了弱、半强和强的形式。弱市场效率的形式只是说明过去的股票价格不包含对未来股票价格的预测性信息。换句话说，趋势战略没有意义。半强的形式说明投资者不可能使用公开的信息来战胜市场，获得利益。也就是说，证券分析没有意义。强市场效率的形式说明投资人既不能从公开的信息，也不能从私人的信息中获益。换句话说，内幕交易也没有意义。请注意，所有这些定义都关注具体证券层面的市场效率。有关市场效率的学术争论都关注有效市场假说的半强形式，也就是投资者是否能从那些高明的证券分析中获益。

经济学家花在对整体股票市场的预测能力方面的研究时间很少。在被范围广得吓人的影响股票指数的变量吓住之后，金融学教授一般都会引用保罗·萨缪尔森那句有关股票市场预测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的名言，聪明地解决了股票市场的先验问题。巴顿·比格斯作为一名不留情面的竞争者，毅然决然地认同了市场能力的问题，击败了那些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归纳为“笼罩着我们未来的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

在本书中，比格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人物和关键战役引人入胜的叙述，与盟国和轴心国中主要大国的股票市场的变化路径很好地交织在一起。在这部作品中，比格斯给出了很多实际的例子，说明市场对那些正好代表战争进程的重要转折点的情况作出了反应。比格斯得出的惊人结论是，在很多情况下，市场预测了交战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完全躲开了那个时代观察家的注意力。巴顿·比格斯激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由股票价格水平反映出的大众智慧，甚至超越了那些对当时在现场的最精明的观察家的智慧。

尽管比格斯引述了大量在股票市场变动与战争中重要转折点之间的关联情况，但他还是承认，他的证据在某些情况下显得不够充分。比格斯注意到，尤其与美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相反，法国的股票投资者顶多算是一群乌合之众。

比格斯在我们的知识储备中加入了有关证券市场长期回报的内容。在我



耶鲁大学的工作中，在我的课堂上，在我的著作里，同时也在我的演讲里，我都引用市场回报的历史数据来支持股票在长期投资组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观点。罗杰·伊博森那些超过80年的数据，出现在他的《股票、债券、票据与通货膨胀》一书中，主要关注美国的股票市场，这个市场从其初期，基本上就在持续运转。杰里米·西格尔那些超过2个世纪的数据，出现在他的《为长期投资》一书中，这些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多地关注美国以外的市场，但是这本著作的核心部分仍然是讲美国市场。总的说来，最为广泛使用的有关市场回报的文章中，对那些遭遇了极端混乱市场的更困难的历史，几乎都没有涉及。

比格斯提醒我们注意，很多市场并不具有美国市场交易相对没有太多断点的特点。他通过对时断时续交易市场上的股票、证券和现金回报的仔细检视，给通常情况下对市场回报时间段所进行的那种太过于粗犷的检视增加了很有价值的内容。比格斯在20世纪有关幸免于难的“战胜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回报情况的结论，对于那些学习市场的严谨的人来说并不意外。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股票收益要好于债券和票据，是所有资产类别中最好的抗通货膨胀品种。相反，比格斯有关“战败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的结论则让读者深思。20世纪资产的平均回报在所有项目中，赢家都超过了输家，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战败国的资产类别回报表现出类似的形态，股票优于债券，债券优于票据。甚至更引人关注的是，在那些战败国中，只有股票才能对付通货膨胀，而债券和票据两者平均来看，给出的都是负回报。按照比格斯的分析，甚至在那些最极端的风险形式常见的国家里，风险资产类别的股票也产生了较高的回报，而安全资产类别的债券和票据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比格斯得到了一个现在已经很常规的资产配置结论，认为股票在投资组合中享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他获得这个结论的渠道却是非常规的。

对于市场时机和证券选择，以及资产配置所代表的每个投资者工具包中的三个必备工具，比格斯明确地给出了某些出乎人们意料的建议。尽管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首先在费尔菲尔德基金，随后在摩根士丹利，最后在Traxis合伙对冲基金公司——所从事的都是实际投资组合管理的工作，比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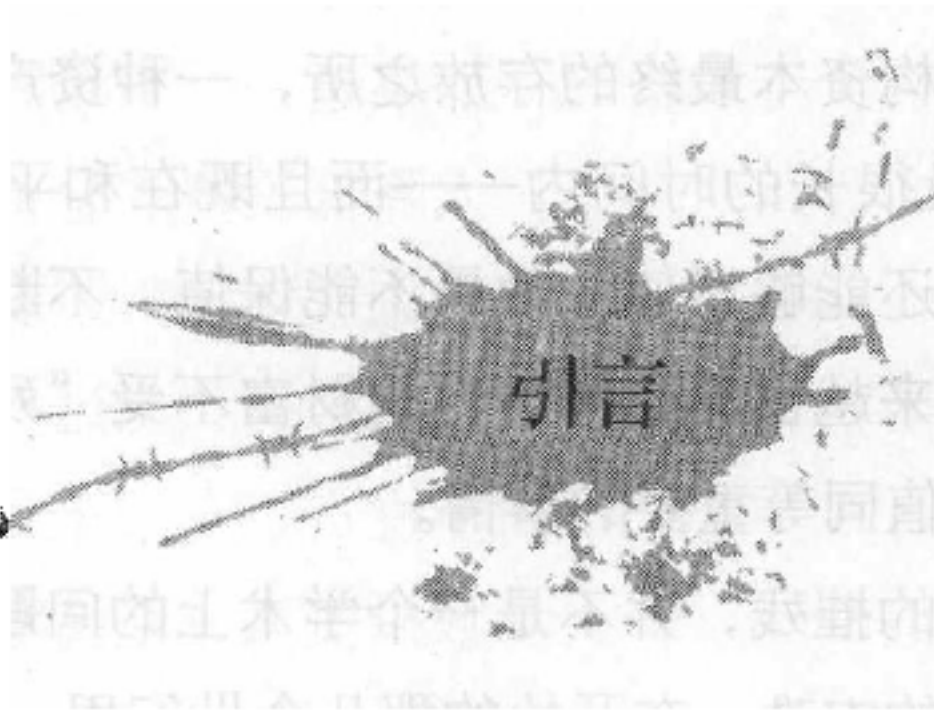
斯建议投资人不要理会市场时机，并且避开证券选择。他作出如此建议的理由来自这样一个认知：投资人只有在持有股票的前提下，才能够从股票市场上的长期回报中获得收益。维持股票市场的存在，需要具有面对极端逆境的情况时持有（甚至增加）头寸的勇气。如果是一个市场时机把握的决策，无论考虑得多么周详，都会导致一个投资人降低股票的仓位，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退回到定息债券市场，投资人的组合或许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另外，要想获得市场回报，需要持有证券的投资组合。如果进行了一系列的证券抵押，无论有多么周全的考虑，都会给一个投资组合带来很大打击，投资人的组合或许永远都不会翻身。对于绝大多数投资人，坚持稳定、以股权投资为主、基于指数的组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略。

巴顿·比格斯在本书中呈现给我们一个栩栩如生的战争故事，以及一个证券市场发展史的全景。他以股票市场展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先知先觉的观点来挑战我们的常识。在贯穿他一生的精彩的职业生涯中，巴顿·比格斯在我们的知识宝库中加入了他那优美、精彩的文字。

戴维·F·斯文森

耶鲁捐赠基金投资总监





## 引言

我放眼望去，看到了一匹灰白色的马：骑在它背上那个人的名字叫死亡，而紧跟其后的是地狱。他们被授予了统治这片土地第四区的权力，用剑、用饥饿、用死亡去杀戮……

《启示录》第6页第8行

有两件事情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第一，从短期来看，股票市场是随机的、非理性的，而且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对主要拐点以及长期的衰退和事件连动的判断，真的只能凭直觉，而且这样做还很明智，不是吗？或者说，股票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反映大众愚蠢的从众心理吗？

第二，每个世纪至少会重演一次，当《启示录》中的四位骑士——疾病、战争、饥荒和死亡的铁蹄踏来时，就会出现一次巨大的财富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匹载着死亡而来、地狱紧随其后，使整个世界为之颤抖的灰白马最近的一次到来。

当四位骑士大开杀戒的时候，你怎样保护好你的财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和平时期，股权是财富的强化剂，但是，当一国民众的“家园”即



将被外国势力击败并占领的时候，股票还能继续充当财富保护者吗？如果不是，那拥有财富的人应该怎么办？按照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购买力条件来看，公共股权的绩效到底有多好呢？

要作为家庭或者机构资本最终的存放之所，一种资产类别、一个投资的载体必须要能够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而且既在和平时期，也在动荡时期——不仅能够保值，还能够增值。如果不能保值，不断累积财富的价值就会消亡。随着你变得越来越富有，保护你的财富不受“残暴命运的鞭挞和蹂躏”至少成为与让它增值同等重要的事情。

保护财富不受时间的摧残，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这个世界总是会出现那种摧毁巨额财富的灾难。在开始的那几个世纪里，有战争、自然灾害、饥荒和瘟疫。18~19世纪，面临的是没收财富和人口的革命。最近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或许是有史以来最灾难深重的一个世纪，相继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度通货膨胀、大萧条，随后是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所达到的高潮，所有事件中最令人发指的当属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战争，回想起来，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文明是否能够持续的命悬一线的时刻。

长期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最痴迷的事件。它为生命、政治、金融市场、财富，以及最为重要的生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教训。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是作为一个业余而非专业性的研究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是世纪之战，或许是千年之战，因为它控制、蹂躏、折磨了几乎整个世界。它对被征服的，而且随后被占领的国家，以及后来的战败国无所不用其极，使它成为现代公共股权或者任何其他资产是否能够在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而且全球性的灾难中保持财富购买力的终极试验。它也是一场史诗性的战斗，首先是轴心国占上风，随后是同盟国占尽了一边倒的优势。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时光。一直要到被实实在在的事件的各种资讯所淹没，你才会真正意识到情况有多么残酷、世界离新的黑暗年代有多近。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花了大量的篇幅交代战争的起起伏伏，以及交战双方领导人的特点和管理模式。我认为，我在希特勒、丘吉尔、墨索里尼，以及其他人身发现并且得出了一些



非同寻常的真知灼见。本书主要关注发生于1938年和1943年之间的那些事件，而不是同盟国的最后胜利，因为那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战争的转折点。

投资人（以及就此而言，全体的人民）必须应对逆境和艰难的时光。本书讲述了战败有多么悲惨，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面临多么严重的困难，还有首脑们——具体来说是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麦克阿瑟和山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怎么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专业人士必须习惯并且忍受危机的控制，这是投资人为什么要读历史和传记的另外一个原因。

用今天求全责备的眼光和观点去看当时的情况，我们能够鉴别出那些成为伟大转折点的胜利。然而，在当时，身陷战争迷雾之中，很难清楚地看到潮流已经逆转。具有大众“黑暗中穿过玻璃”的这种独特智慧的股票市场，能够感觉到这些时刻吗？我认为，事实是他们感觉到了，而媒体和所谓的专家评论员，以及战略家们大多数都没有感觉到，因此，我们应该对股票市场的群众智慧充满敬仰之情。这就意味着要通过市场的行为来倾听市场在说什么（第一章里提供了更多有关市场智慧的感悟）。

我第一次对市场智慧这个问题着迷是因为我很偶然地发现，英国股票市场在1940年夏季跌到了有史以来的低点，这个时点正好在不列颠战役之前；美国市场在1942年5月末出现了永久性的反转，这个时间大致在史诗性的中途岛战役前后；而德国市场在德国进攻苏联的鼎盛时期，正好在德国的前锋真正看到莫斯科教堂的尖顶，此时在1941年12月初达到了顶峰。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伟大时刻——尽管在当时，除了股票市场之外还没有人这样认识它们。对于我来说，这确实证明了异乎寻常的（而且是还没有被认识到的）市场的群众智慧。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是逆向思维的人。所有人都知道群体思维的危险性，以及群众的疯狂。但是，在投资者群体的那种没有任何关联的起起伏伏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吗？我认为是存在的。“市场先生”是一个聪明、狡黠的老精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常常——不是总是，而是常常——会在精英们还没有领悟的时候，就意识到那些重要的关键时点。股票市场的起伏，反映的是投资者



的群体意见，而在本书中，我坚持认为市场拥有伟大的智慧。投资人在极度危险的时候忽略了他们本来已经说好的东西。

本书另外一个主要的主题是，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财富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一个富有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险措施，以保护他（她）的财富不受《启示录》中类似“黑天鹅”现身情况的影响。我也研究了不同的时间段内，股票和债券是否能够保值增值的问题，所涉及的时间段不仅包括了1930~1945年这段极端黑暗的年代，同时也覆盖了整个世纪的跨度。如果没有伦敦商学院的埃洛伊·迪姆森、保罗·马什，以及迈克·斯汤顿等人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我也不可能得出这些结论。我发现，股权总的说来确实保护了财富——在整个世纪的这个时间跨度内，尤其当你在正确的国家持有了正确的股票时（第九章和第十五章对这个说法给予了特别说明）。然而，如果所居住的国家处于战胜国一方，股票（以及相应情况下的债券）会获得惊人的高额回报。如果你的祖国战败而且遭到占领，那么公共股权在战争期间以及占领期间就没有什么表现，而债券的情况则更糟糕。另外，在法国和德国，20世纪前50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股权是亏损的。政府债券更是一个灾难。

资产多元化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诸如土地、房产、黄金或者一家企业这样的真实资产在某种程度上看要好于股票，但是，还远远不能说完美。一座在经营中的农场，同时保护了你的财富和生命。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将你的资金存放到国外的一个安全天堂，但是，这当然无法帮助你在那个时代把身体和心灵都放到一起。

据我所知，大多数的市场数据还从来没有以这种形式组合在一起，过去也没有发表过。本书同时也讲到了其他财富，比如债券、土地、黄金、珠宝，以及房产，在那些年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主要出现在第九章和第十五章）。任何拥有财富的人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一切。如果做不到财产保值、增值，那么你穷尽毕生精力去积累财富，就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一个有钱人，应该怎样把他的财富传给生活在一个不确定世界中的后代，本书给出了一个明确说法，尽管我得承认，下一次的大灾难可能与过去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还发现，对这场史诗般战争的历史也是众说纷纭，因为它涉及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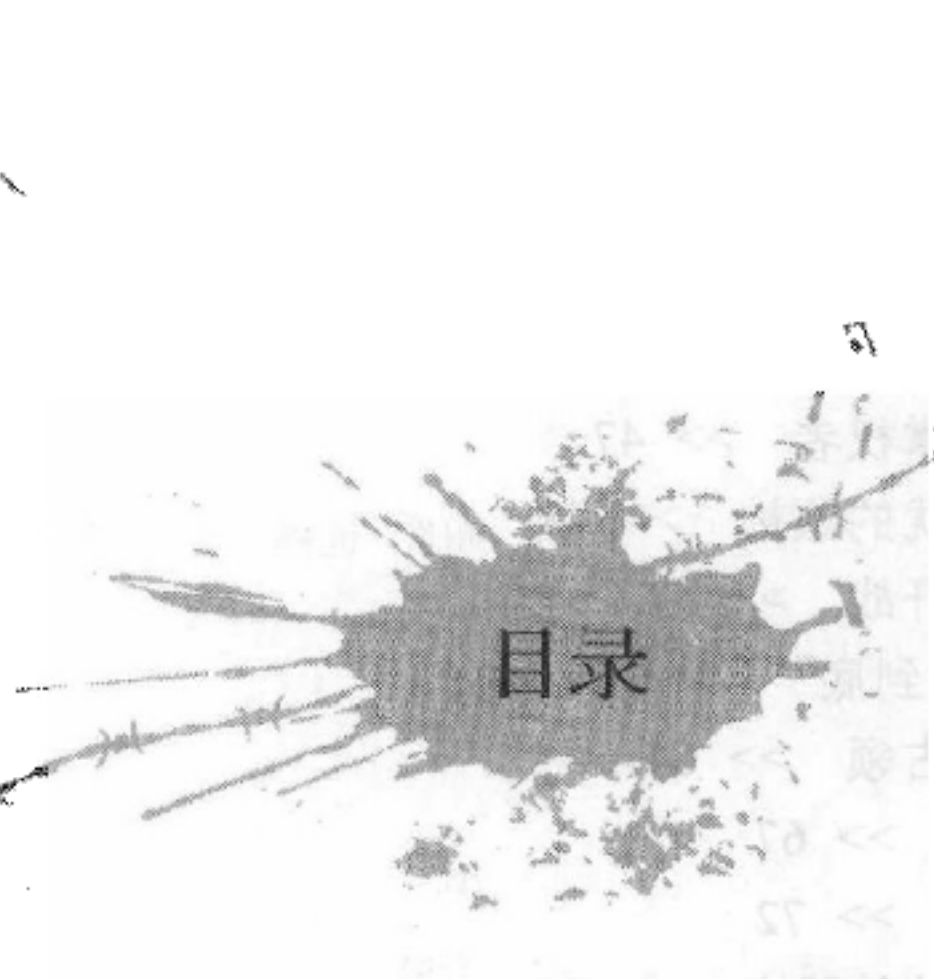
众多的人物，而且是这样一个无休止地尔虞我诈的、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夺人眼球的大事件。有人可能会对我的这一判断产生质疑，不同意我对领袖人物，以及其行为的解读，也不同意我对各时间段内形势的看法。

投资人与交易员和投机者截然不同，必须对经济体内以及整个世界事件的进程作出长远的、日臻完善的判断。他们知道而且了解的历史越多，这些着眼于长远的决策也就越好。一名投资人自然应该知道一点历史，同时还应该是一名统计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一名有天分的直觉主义者。

然而，我当然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历史学家。本书也不是一本真正的历史书——既不是关于股票市场历史的，也不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我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任何第一手研究，但是我认真研读了很多本书。我有些厚颜无耻地从那些撰写鸿篇巨制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和“战士”那里借用了他们的思想、真知灼见和他们对往事的回忆。然而，尽管我进行了颇为广泛的阅读，我也没有发现有关在战争年代，金融市场和财富发生了什么变化的信息来源。确实有一些市场数据，但是几乎没有背景资料。为了寻找我呈现在本书中的社会信息，我阅读了旧时的报纸，并且采访了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本书中包含了很多带有事件索引的市场图表。我用印象派的手法写就了一篇对于那些年代的阐述性的文字，我希望能够对今天的情况有所借鉴。

巴顿·M·比格斯





## 目录

前言 >> VII

引言 >> XI

**【第一章】 金融市场的理性声音 >> 1**

专家预测不可靠 >> 3

金融市场对战争的预测 >> 5

金融市场与专家的博弈 >> 6

大众智慧的实验 >> 8

股票市场的理性 >> 9

**【第二章】 恐惧笼罩的世界 >> 13**

德国占领欧洲 >> 14

日本征服亚洲 >> 19

欧洲惨遭蹂躏 >> 19

美国股市的崩溃 >> 21

美国参战 >> 23

美国的孤立主义 >> 25

**【第三章】 股票市场的挣扎 >> 27**

伦敦股市 Vs. 英国经济 >> 28

1929~1937年的美国经济 >> 30

1934~1939年的美国经济 >> 31



全球股市再创新低 >> 34  
美英股市对同盟建立的反应 >> 38  
股票市场再探谷底 >> 42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 >> 45**

黑暗时刻的掌权者 >> 47  
深受经济困扰的领袖 >> 48  
向残暴统治开战 >> 57  
“我们要血战到底” >> 64  
轻而易举的占领 >> 64  
不列颠战役 >> 67  
伦敦大轰炸 >> 72  
一片生机的伦敦股市 >> 74  
大西洋战役 >> 76  
英国的使命感 >> 77

**【第五章】 英国的黑暗岁月 >> 79**

狂热的疯子 >> 82  
“鬼影子”隆美尔 >> 84  
股市的前瞻性 >> 85  
谁来影响股市？ >> 86  
美英结盟激起新希望 >> 89  
战争对股市的影响 >> 91  
英国海军损失惨重 >> 92

**【第六章】 巴巴罗萨行动 >> 95**

推翻希特勒 >> 96  
计划进攻苏联 >> 98  
“没有苏联战俘” >> 99  
血战到底 >> 100  
战争仍将继续 >> 101  
夺取莫斯科 >> 103  
苏联的冬天 >> 105  
苟延残喘的德国军队 >> 106  
柏林股市的感知 >> 107

**【第七章】 珊瑚海与中途岛的奇迹 >> 111**

日本侵略史 >> 113  
避免与美国开战 >> 114



|               |                   |                     |
|---------------|-------------------|---------------------|
|               | 东南亚战略             | >> 115              |
|               | 日本军事胜利对股市的影响      | >> 118              |
|               | 美国反击              | >> 118              |
|               | 控制太平洋             | >> 119              |
|               | 珊瑚海战役             | >> 120              |
|               | 中途岛的奇迹            | >> 121              |
|               | 惊人的逆转             | >> 127              |
|               | 战争的疑问             | >> 129              |
| <b>【第八章】</b>  | <b>股市对战争的精确判断</b> | <b>&gt;&gt; 133</b> |
|               | 最有效的投资            | >> 134              |
|               | 股市探底              | >> 138              |
|               | 战后美国市场的蓝筹股        | >> 138              |
|               | 日本股市              | >> 139              |
|               | 改革日本经济            | >> 141              |
|               | 创造性破坏的日本          | >> 143              |
|               | 日本的“不可战胜”         | >> 144              |
|               | 日本股市的长期繁荣         | >> 146              |
| <b>【第九章】</b>  | <b>命运多舛的财富</b>    | <b>&gt;&gt; 149</b> |
|               | 20 世纪的全球股市        | >> 150              |
|               | 至关重要的投资多样化        | >> 154              |
|               | 德国的剥削             | >> 155              |
|               | 食品是最好的流通货币        | >> 157              |
|               | 股市渡过危机            | >> 160              |
| <b>【第十章】</b>  | <b>衰败的法国经济</b>    | <b>&gt;&gt; 161</b> |
|               | 混乱中的法国            | >> 163              |
|               | 没收法国犹太人的财富        | >> 166              |
|               | 获利的军火协议           | >> 168              |
|               | 通货膨胀下的法国          | >> 169              |
|               | 战后的法国经济           | >> 171              |
|               | 财富保值              | >> 172              |
| <b>【第十一章】</b> | <b>如何保住财富</b>     | <b>&gt;&gt; 175</b> |
|               | 墨索里尼“左右”意大利股市     | >> 177              |
|               | 德国的财富保值之道         | >> 180              |
|               | 德国战前经济史           | >> 182              |
|               | 艺术品价值             | >> 187              |



一个家族财富的丧失 >> 190

犹太人的财富厄运 >> 191

犹太公司的接管 >> 196

保存财富的最好出路 >> 199

## 【第十二章】世纪之役 >> 201

再次投入战斗 >> 202

凶猛的抵抗 >> 203

争夺伏尔加格勒 >> 204

缩小包围圈 >> 205

德国败退 >> 207

伏尔加格勒战役 Vs. 德国经济 >> 209

经济的毁灭 >> 212

## 【第十三章】变幻莫测的股市 >> 215

新加坡陷落 >> 218

日军对缅甸和印度的威胁 >> 219

盟军的败局 >> 221

丧失信心 >> 222

战争的转折 >> 228

盟军大进攻 >> 229

是谁左右伦敦股市？ >> 231

## 【第十四章】战乱保住财富 >> 235

土地的掠夺 >> 236

在匈牙利掠夺土地 >> 237

财产的窃取 >> 238

财产保值的最佳手段 >> 239

当心“长期持股” >> 240

黄金、艺术品和债券也不值得信任 >> 243

财产保存多样化 >> 244

## 【第十五章】战争是财富致命的灾难 >> 247

关注“黑天鹅” >> 250

后记 >> 259



## 第一章 金融市场的理性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损害严重的全球性灾难。它对人类物质财富造成了怎样的创痛，正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本书要集中讨论证券问题，看一看它们是否真能起到财富保值与提高购买力的作用。本书还要论及有钱人究竟需有何种“多样化理财方案”的水平，才能切实保护他们所拥有财富的购买力。

在探讨上述问题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证券市场的几个主要竞争者（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以出人意表的洞察力，分别揭示了战争中具有里程碑，甚至史诗意义的转折点。

今天，人们普遍持有这样的看法：一般大众，特别是股票市场中的大众是缺乏理性的动物。但是，如果你学一下历史，研究一下社会心理学，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自有大众的大智慧，证券市场恰恰就是大众智慧的



一个缩影，我们对其发出的信息必须认真研究。当大众发出的信息隐含其意愿时，这种研究就尤为重要。

对所谓“大众疯狂”的贬斥之论可谓汗牛充栋，不一而足。事实上，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蔚然成风。然而，这种观点却遭到了詹姆斯·索罗维基的驳斥。在其创意独到、见解深刻的著作《群众的智慧》一书中，索罗维基指出：我们需要尊重的，恰恰就是这种大众的集体判断力，以及大众直觉。

查尔斯·麦基有一本名著，题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每一位投资家都将此书奉为金科玉律。该书最著名的一段语录当然就是这样几句：“人们都说人类是集体思考的动物。我们将会看到，人类一凑到一块儿就会精神错乱，除非他们单独待着，才会一个接一个地慢慢恢复理性。”弗里德里希·尼采也说：“作为个人，罕有精神失常者；作为群体，罕有理智健全者。”

大众行为学的另一经典著作，当属古斯塔夫·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出版于1896年）。假如真有“高贵独裁者”这号人的话，勒庞可以算做一个。勒庞相信，大众难免要胡乱决断，鲁莽行事。勒庞这样写道：“群众永远都不会做出需要高智商才能做成的事情。比起独立个体，他们永远逊一筹。”勒庞所谓的大众在本书中是广义的，包括任何可以作出决定的团体。

对大众理性的轻蔑可谓根深蒂固。有一句查无出处的俗语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还算清醒，人越多越糊涂。”此外，还有那位自称是投资天才的伯纳德·巴鲁克也跟着起哄，引用德国诗人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是独自一人，他就聪明又理智，可是一旦成了群众中的一分子，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大笨蛋。”还有，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也说：“我可不相信无视个性的、所谓的集体智慧。”

大众一旦变得扰乱秩序、充满暴力、粗鲁狂躁，它就堕落为暴民了。“暴民”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obile vulgus”。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一群群众，特别是一群暴民，极易为人所利用，转而追求某种危险甚至邪恶的事业。群众或团体得此恶名并非全无根据，但是那些所谓专家却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当我们要求大众进行独立而理性的判断时，其结果是令人意外的。换句话说，勒庞之流的冷嘲热讽、毁损贬低大多是不正确的。



在今天的投资领域，只要一提“大众”一词就带上强烈贬义。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因为大众永远是错的。在基金行业里有一句格言：“绝不要跟风交易。”投资家、策划师、经济师这些专业人士打从心里不相信大众智慧，有时媒体也是这样。

相反，人们更乐于进行逆市交易，也就是说，大众做什么，我就反着来，因为大众愚不可及，往往作出错误的决定。如果大家都在做多头，那我就要做空头，反之亦然。投资家们殚精竭虑，感情用事，以期达到特立独行的效果。策划师和经济师们经常在其报告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观点如何与众不同，好像只要能标新立异，什么分析不分析就不那么重要了。针对这种日渐流行的逆市交易论，当代世界最棒的投资家之一乔治·索罗斯有一回这样说道：我自己可是个“反逆市交易者”。

不言而喻，人类总容易模仿他人，总容易受喜怒哀乐的情绪影响。投资家和投机商们贪婪不已，惊惧不安，在股市中蜂拥而上，盲目竞价，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最终会导致价位虚高，产生泡沫。然而，我们随后要在本书中明确地指出，并认真讨论，这种情况并不能否认投资大众具有超于常人的直觉，特别是对于长期投资有过人感知力，因而其判断力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同。

## 专家预测不可靠

换个角度说，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你只听信专家的观点，那你非输不可。菲利普·泰洛克在其新作《专家政治判断力是否管用？》一书中总结道：在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生意场诸多专家的观点完全是信口开河，不应理会，因为在预测未来形势方面，非专家预测甚至比专家预测还要准。泰洛克分析了一个时间段里284位专家所作出的82 361项预测，它们烦琐而枯燥无味！不管怎么说，他发现这些所谓的专家，那些预测真是让人脸红，因为他们预测的准确率还不到1/2，甚至比一只猴子乱扔飞镖击中靶子的概率还要差。就像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的那样：“作出预言太难了，特别是预测未来，就更难上加难。”



泰洛克分析完自己的实验数据之后，得出结论：虽然你要熟悉课题，了解相关情况才方便作出有关事件或经济方面的预测，然而，在博学饱闻，成了专家、智者，或权威之后，人们往往反而当不成一个好的预言家了。作为专家，你所知道得越多，越是博学广闻，就越有可能在作出预测时拘泥于理论，囿于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不能自拔。泰洛克相信专家在预言时经常输给非专家，就是源于此。事实是，头脑简单，方法直白，可能作出更好预测。泰洛克报告说那些知识渊博、声名显著、过于自信、威名远播的专家们（或者可以说是“学术权威”）更有可能判断错误。

我们之所以说那些权威人士的话不可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脸，关心的只是如何大出风头。换句话说，他们一心想显得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妙语连珠、独出心裁、耸人听闻的预测，才能吸引最多的眼球。他们在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知名电视节目上夸夸其谈，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饭碗，当然也为了高额的回报。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预测是否准确，因为每天有无数电视节目在播出，有无数专家在预测，谁能想起来谁预测了什么呢？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表演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也许他们对此不会承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表演欲扰乱了他们的思考，破坏了他们的专业性。

泰洛克研究完专家的记录之后，还得出另外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当专家们的预测落空之后，他们很少有人承认失算。第二，如果这时出现新的情况，这个情况又与专家早先的预测不符，专家们就会对这种新情况视而不见。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美国布什政府就患有这种“心病”。第三，虽然令人失望，但是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新情况不利于他们的预测，专家们会严批狠打；如果新情况有利于他们的预测，专家们就会大开绿灯。

最后，泰洛克借用以赛亚·伯林关于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把专家们分为两种类型。刺猬型专家对某种大问题所知甚多，喜欢在此范围内分析复杂问题。在较小的专业圈内，他们被视为杰出人物。狐狸型专家则不一样。用泰洛克的说法，“这一类型的思想家对小事小情颇多知识……对宏大方案心存疑虑，认为解释也好，预测也罢，都不过……是可变通的一些演算练习，这种



练习需要综合各方不同信息。这类专家对自己的预测能力本身也看法不一。”泰洛克发现，狐狸型专家比刺猬型专家要胜出一大截。因为狐狸型专家认知多样，视角广阔，更有利于分析复杂问题。

例如，在投资领域有许许多多的高学历、高智商、善于量化分析的刺猬型专家，他们带着博士光环，配有超级电脑。曾几何时，他们发明的投资模型也能产生非凡的投资绩效。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大批的同类模型，不管那些天才前辈开发出何种评估异常现象图，后面马上就跟来一大堆定性分析的模仿，结果那些模型很快就变得毫无用处了。这是投资场上最新版的“创意毁灭记”。

泰洛克的数据胜于雄辩。不过怀疑论者也许会这样回答：如果把专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泰洛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比如技术与科学的范畴里，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听取的。至于政治或股市方面的预测专家意见，则大多可以不予理睬。问题是，有的人一时预测正确，并不能说他会继续正确下去。事实上，许多投资专家再往下走，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不管怎样，听一听那些字正腔圆、博学广闻的预测家们说话还是挺有意思，有时甚至是挺刺激的。只是你对一群专家的长期记录不要抱任何幻想。对预测师和策划师的痛批，写起来并不轻松，因为作者本人也曾经身受其害。

## 金融市场对战争的预测

直觉、本能和常识在进行预测时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权威的预测不可信，市场本身的智慧才值得重视，因为那是许多个体独立见解的集合，这样的判断我们才更应关心。早在1940年夏天，伦敦股市就推断出英国不会被征服，虽说那时还未发生不列颠战役，许多英国人感到完全悲观绝望。股票经过长期低迷，在6月初抄底返升，虽然直到10月份形势才明朗，可以肯定德国人在1940年不会入侵。直到18个月之后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人们才相信英国最终会获胜。

与此相似，德国股票市场虽然处于“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之中，人们也能理解1941年10月德国的征服已达顶点。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察



力。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看上去是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从未被敌人击退过。当时，谁也没有感觉进攻苏联会从胜利走向失败。事实上，12月初一架德国巡航机已经瞥见了莫斯科的屋顶，与此同时，德国控制的欧洲领土已经超过神圣的罗马帝国时代，谁也没想到所有这些最终会化为泡影。

纽约股市认识到1942年5~6月的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所取得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春天，证券市场正在走出低迷，不过我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军事专家的评论，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对失败与投降的连篇报道引发人们对战争决策者，以及战地指挥官的激烈批评。聪明的媒体人忙着写他们所谓的新闻，根本没有注意到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的重要性，事实上，那是日本庞大帝国建设及其攻击美国计划的衰落点。

事实上，美国媒体从战争一开始就接连犯错。《纽约时报》根据美国作战部所提供的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大肆夸耀盟军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对太平洋舰队的损失则有意少报道。例如，珍珠港事件发生的5天后，即1941年12月12日，该报打出通栏标题：“美国对日全面开战，击沉两艘巡洋舰，重创一艘战列舰”。报道说，被炮击的那三艘舰里有一艘是战列舰。这纯粹是胡编乱造，其实只有一艘小型日本驱逐舰被击沉。

## 金融市场与专家的博弈

然而，在回到大众理论议题时，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于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当时流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学说。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央计划经济无法作为价格杠杆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将一个庞大人口所发生的零零碎碎、各不相同的信息资料汇总起来，不管是人还是电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好的”经济决策只能由价格杠杆来完成。市场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主观偏好）都要通过价格机制来汇总，进入单一市场评价系统，这一系统虽非尽善尽美，但还是比任何人脑或电脑编程出的数字更有作用。



将信息来源进行分解相当重要，因为它是哈耶克所谓的“隐性知识”——一个决定性的生成因素。隐性知识乃是个人凭直觉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在某一特定地点、职业或生活方式中获取。正因为它带有明显的直觉性，因而很不容易对其进行总结，用来交流，事实上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掌握了隐性知识。然而，这种知识非常有用，因为它反映了全球各色人物极其深刻的生活经验。

这种洞察力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但它只是一种观察，并非一种结论。正如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亨利·曼尼最近指出的那样，它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理论：如此之巨的海量信息是怎么有效地归纳，汇为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他这样问：“加权平均数是怎么得来的？”他又说：“有效市场假说几乎完全基于经验观察，从未提出过任何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如此有效。”曼尼的回答看来可以这么理解：大众智慧的结果。

索罗维基在其《群众的智慧》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群体在作出决定时往往要比天才专家更正确。换句话说，“多数比少数要聪明”。他指出，那些专家充满偏见，视觉有盲点，另外专家在进行预测时，其自信度往往带来不可信度。虽然不能保证，但是一组个性特异、观点独立、动机不同的人群可信性要比某一个人，甚至一群专家更大，更能帮你作出最好的决定。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指出：如果你向一大群人提出问题请其决断，结果你得到的平均答案要远优于一群专家所给出的答案，不管那些专家如何德高望重、认真研究、博闻强记。不管是人群，还是大众，或是市场，都需要具有多样性，广大投资家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取信息，并在各种环境中进行调整。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汇总系统。这种集合判断系统如果碰到个人怀有某种正确激励时，就最为有效。股票市场中的投资家总和就是社会学者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正如市场策划师迈克尔·莫布森在其优秀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复杂适应系统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不能把个别加到一块，就以为得到了全部，全部要大于个别之和。

许多人以为只要跟专家或其他老道的投资商交流一下就可以了解市场，但问题是如果市场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那些个别的经纪人就可能提供不了什么好的建议帮你在股市中摸爬滚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一定要倾听



市场呼声的原因，换句话说，紧要关头，你要观察市场做什么，别理专家或股评家在那里信口开河。

## 大众智慧的实验

索罗维基还举了一个例子，以说明复杂适应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在英国一个著名乡村集市上进行实验，让人们猜一猜一头牛的重量。共有800人参加了这项实验，其中有些是经验老到的农场主，但大多数人都毫无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果是，大多数人答案的平均数值为1 197磅，非常接近实际重量（那头牛实重1 198磅），而且，这一答案远比那几位畜产专家给出的估数要精确得多。他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拿出一个罐子，里面装有糖豆，让那些学生猜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颗糖豆。这一组学生给出的得数平均值为871颗，非常接近实际数850颗。只有一个学生的答案差得远一些。

索罗维基做了一系列类似实验。他有时走到纽约时代广场，随机在大街上问过往的路人，让他们猜一猜那个罐子里有多少颗糖豆，或者猜一猜他的体重是多少。那些人肯定以为他是神经病。还有一回，他向一群听众简单地描述了一下自己的书房，然后让他们猜里面到底有多少本书。当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数目。结果是：众人答案的平均值又一次优于个别人给出的答案。他认为，个体判断失误，即令他们出局，结果最后只剩下群体结果。顺便说一句，一个团体的规模越大，它越具有离散性（如前所述），它所作出的决定也就越可靠。显然，股票市场是相当大又相当离散的一个群体。

曼尼接着指出：有关“预言”或“实存”市场的文献证明，在竞猜比赛中参加者越多，对情况了解越透，他们就越有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索洛维基举出了爱荷华电子市场的投注竞猜为例。该市场中的投机商们从事猜测选举结果的工作。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总是相当成功。这些投机商作出的“预言”要比政治权威或民意调查机构给出的答案好得多。市场中的竞猜者没有预测自己的行为，而是预测整个国家会如何投票。每次预选结果一出来，市场赌价就能反映出预测结果。预测10次，他们能猜对7.5次，比一般民调预测要准得多。



在过去的5次美国总统选举中，爱荷华电子市场所预报的投票比率，都要比专家预测的绝对误差小30%。在2004年的澳大利亚总理选举中，选举专家们认为两位候选人之间竞争激烈，难分伯仲。然而，澳大利亚的中央投注公司（相当于爱荷华电子市场的选举竞猜市场）却预言约翰·霍华德将轻松当选。他果然赢得极为轻松。爱荷华电子市场和中央投注这类市场作出的正确预测，同时也证明这样一点：如果预测者进行预测的动机是为了投注赢钱，预测的效果可能最好。

## 股票市场的理性

曼尼与索洛维基都强调，竞猜的参与者必须多样化，他们的判断必须是自我判断，与别人毫不相干。同时，参赛者必须“关注”要猜的问题。在竞猜中，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他们不能胡猜，也不能坐在一起交换看法，思考正确答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他们的判断就是“群体思维”了，那是恶名昭著，毫不可取的一种思维。群体思维所作出的决断，总是要比个体集合所得出的结论差得多。只要适当核对总结，我们就能看出大众思维的效果完全相反。

詹姆斯·莫尼特对行为金融学有精深研究，并写了大量论著。他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正确，但要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莫尼特认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不受他人决定的影响；第二，答案正确的概率，要与所有其他人的答案正确概率无关；第三，参赛者必须不受自己投票倾向的影响。我得补充一句：要想作出好的团体决定，则团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不知道，也不关心团体中其他人对这一问题会怎么想。换句话说，大众天生具有一种集体智慧，它有先见之明，但你必须小心挖掘才会发现。在做长线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向就是一种高效的集体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否就是全民选举时所体现的最基本的民主要义呢？民主之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百姓所作出的决定要优于统治精英。股票市场实际上就是投票机器。我觉得这类群体直觉的智慧经常会反映在股市对人类历史事件反应的波动上，在重要历



史关头尤甚。正如索洛维基所说：“我们说大众有智慧，并不是说一个团体总是给你提供正确答案，而是说以平均来算，大众总是要给出较好的答案，好过任何个人所给出的答案。”日本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极佳，而法国证券交易所却在1941年预言德国占领法国后，经济会走向繁荣，结果是大错特错。

要研究大众是否有智慧，股票市场实为优良范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指那种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股市中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一些重要证券市场中至少都有数万股民。由于众多投资者的多样性，由于这一离散团体的组成五花八门、看法各异，因而在进行决断时这一团体就会运用多种直觉。此外，大众团体比较有知识，信息掌握得也比较充分。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是火箭专家，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傻瓜。他们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单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会依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判断，作出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一群股市大众完全达到了动机标准的要求，因为它在进行决断时动用的是自己的钱。这是一群狐狸，并非一群刺猬。

结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了深谋远虑的老家伙。有时在最紧张的时刻，它会惊慌失措、举止疯狂，有时它还会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一大堆泡沫。个体投资者或一小帮投资者可能失去理智，但是从长线来看，整个股市基本上是理性的。正如莫洛辛所说：“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理智，就推断说整个股市都失去了理智。”

事实上，正是投资者怀有的极度恐惧与贪婪才造成股市的繁荣，越走越高。但是，在改变生活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投资狂热，比如19世纪人们对铁路的投资热，到20世纪衰退时期对科技的疯狂追逐。回首当年，即使在2000年的非理性时期，股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当时科技股与网络股虚高不下，而一些过气产品的股价则被杀低到可笑的程度。对于个股而言，我认为大众并非最佳的评价者。

然而，如果我们抹去战争硝烟，挥开统计数字的迷雾，就会发现股票市场具有一个灵敏的大鼻子，它的直觉可谓惊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情况悲观，坏消息不断时，有些股市老狐狸就会这样说：“股市反响不错”，或者是：“股

市反响不佳。”最经典个案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那场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发生时，世界主要股市对轴心国兴亡的反应。

我认为股票市场具有独立、多样和离散的特点，它所作出的判断是以金钱利害为动机的，其最后决定是建立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体。这当然不是说股市总是聪明非凡，从不出错，也不是说在短线上它从不判断失误。我是说，股市一般而言是决断正确的，我们应对其决断认真关注。对这一论点的最好测试，看它是否可以当做财富保值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充满惊慌与恐惧的时代。在下一章里，我要论述一下当时世界是怎样被恐惧笼罩，不安情绪是如何使股市陷入低迷的。







## 第二章 恐惧笼罩的世界

如果想理解1934~1940年股市的紧张与低迷到了何种程度，就得先对当时世界所处的悲惨情形作一个全面了解。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和大萧条。一系列金融举措失当加重了危机，而资本主义制度看来又拿不出治病良方。财富一夜之间蒸发殆尽，证券实值在全球各地都一落千丈，创纪录地达到了最低点。然而，到1936年，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得到了部分恢复，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又一次进入低谷。不过，当时的投资商之所以心灰意冷，还另有原因。

从1940年春一直到1943年春，欧美残存的民主国家及其传统的犹太教都有自己的思想，处在空前绝后的危险之中，有多股势力要将之毁灭：主要有民族主义和邪恶势力来自阿道夫·希特勒，那是一股根植于德国和



意大利的思想倾向，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侵入东欧各国。邪恶势力当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能源的野心使日本人极富侵略性。所有这两股势力都向全世界散播恐怖，并切实实行。

## 德国占领欧洲

1939年，西班牙落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之手，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欺凌，而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追逐帝国之梦的政策指导下，出动飞机对埃塞俄比亚部落村民喷洒芥子气。这位自鸣得意的意大利人发出慨叹：“啊，他这回可让火车准点出发了。”

到1940年，法西斯或轴心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附属国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已向人们展示出他们的力量至少要整整统治世界一个时代，结果也险些成真。金融市场作为大众情感的敏感显示表，在20世纪40年代初经历了震荡与大跌。到1942年，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你就会看到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其霸权魔爪已经从北海伸至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城门口。日本这时在亚洲的扩张也达到顶峰，控制了全球1/10的领土，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珍贵的自然资源。

自从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各国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战胜德国国防军，当时的德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正如约翰·卢卡克斯在其所著《决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到1940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西欧领土，人员和装备的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泥沼和战壕中推进区区几英里所蒙受的损失。欧洲小国对德军进攻的抵抗只能持续几天，而法国虽然有庞大的军队和不可穿越的马其诺防线，也很快在德军的闪电战之下全线溃败。英国远征军自敦刻尔克大撤退，险些全军覆没。英国皇家海军在北非和挪威遭受重创。英国虽然在自己的海岛家园孤军奋战，但它日复一日地被德国U型潜艇所蚕食。不管英军如何风度翩翩，一旦面对技术高超、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德军，就一败涂地了。

也许更可怕的魔鬼是纳粹信条及其精力充沛、神经错乱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那可怕的最后解决方案正在消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



而最高种族的观念既可怕又貌似正义，因为当时几乎很少有人能站出来反驳此类观点。“千年帝国”的设想一提出来就让最勇敢的智者噤若寒蝉。

1940年年初，希特勒带着他那狂暴与磁石般的超人魅力，让全世界都感到了这一邪恶天才的力量。他只手遮天，通过武力、恫吓，也许还有点儿理念，拯救德国于失业、饥荒，也许还有战争的水火之中。在现代世界史中，还从没有一个人把数百万人民一举迷惑得如此干脆而彻底。希特勒是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演说家，可以轻易地将他的听众带入狂热。作为演说家， he 可以与自己的听众进行难以言喻的微妙情感交流。他充分地了解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价值。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深知广播宣传的力量。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上等兵，曾两次受伤，并因其卓越表现而荣获两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要知道，当时普通士兵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荣誉的。

尼采曾用学者的口吻赞美过“超人”。作为一线信息传递者，希特勒看来是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一生。他完成战场任务荣归故里，要知道那场战争很少有像他那样的幸存者。他并不是胡打乱冲的笨蛋，而是天生英勇，每次穿越敌人占领区，都要认真研究地形，作好充分准备。在战壕的间歇时间，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普鲁士战士，于1790年年末至1800年年初服役，后来成为颇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家）的著作。希特勒认为克劳塞维茨地位独特，堪称智谋大师，他对德国男女的超强吸引力，有一部分就来自这种勇敢、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许多人看来，他简直就穿上了德国超人的斗篷。

希特勒身材中等，身高1.77米，体重150磅。他长相一般，有一只大宽鼻子。他穿着简单随意，却干净整洁，他的手形很好看，留着优雅的长指甲，在演说或者平常与人交谈的时候，他就不停地挥动这双手。然而，他的那双眼睛十分特别，使那张看似平凡的脸熠熠生辉。那双眼睛盯着你，让你感受到一种催眠般的穿透灵魂的力量。那双眼睛是淡蓝色的，看上去似乎深不见底。

威廉·L·夏伊勒性格沉静，待人毫无成见，当时他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联合新闻社的驻外记者，在看到希特勒之后，他说从未见到任何人有那样一双眼睛。夏伊勒这样写道：“它们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见过的美杜



莎画像，那双眼睛简直要把我变成石头，让我顿感虚弱无力。”女人对希特勒的眼睛完全着迷，可是男人一碰到那目光就噤若寒蝉。有人说，希特勒的眼睛可以看透未来。当你面对他时，那双眼睛所特有的犀利会将你吸入无底深渊。

跟当时许多德国人一样，希特勒相信自己的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本国领袖从背后捅了一刀。他告诉德国人民，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和政治混乱都是德国领导人叛国的结果。他本人的生活贫困不堪，饥寒交迫。有好多年，甚至在他登上权力宝座之后，他都对自己的外甥女深深迷恋。她本可以是他生活中的真爱，然而两人的血缘关系，却使这段感情痛苦不堪，最终成了一种无望的政治关系。她后来因某些神秘情况而自杀，希特勒的一位密友后来告诉记者夏伊勒，自那以后，希特勒再没有跟女人发生真正的性爱关系。显然，他的情妇艾娃·布劳恩不过是一个好看的摆设。希特勒的军事与政治直觉是独创性的，非常规的，而且1935~1943年几乎从未失算过。他正确地计算出自己敌人的弱点，深深地了解他们不愿打仗的心理。他每次作出的战略决断和大胆赌博都取得胜利，让德国总参谋部的将军们瞠目结舌。他对人性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解力，对自己的敌人有什么弱点又有一种超人的洞察力。阿兰·克拉克深入研究了德国人发动的进攻苏联的闪电式，并写出一本史诗般的著作《巴巴罗萨计划》。在书中，他这样写道：“魔鬼之手指导着希特勒行事，正如后来救了他的命一样。他的把握细节的操控力、他的历史感、他的不可思议的记忆力，以及他的战略眼光，所有这些可能存在缺陷，但是，当你以完全客观的军事史目光看待这些时，就会承认他的这些能力简直超凡入圣。”

这时，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伟大诗篇《梦魇重现》正被人们广为传诵，因为它以优雅无比的风格，捕捉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那充溢世界的绝望感，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党正野心勃勃，要征服欧洲。

雄鹰在空中盘旋，  
越飞越远，终于不见。  
它再不能听到放鹰人的呼唤。  
天地分崩离析，中心岂能独善，

世界只剩下专治政权，  
血流成河，天昏地暗，  
唯见无辜生命在血泊中呐喊。  
最优秀者无人信服，  
最可恨者却一步登天。

W·H·奥登用另一种方式在自己的诗篇中表达了同样的感情。那首诗的题目是《1939年9月1日》

我坐在一间酒吧里，  
朝第52号大街张望，  
心神不宁，惊惧不安，  
因为前途一片渺茫。  
这悲伤凄惨的时代啊，  
充满了愤怒与恐慌，  
惊恐之浪跃过头顶，  
把整个地球照得暗淡无光。  
它使人生了无情趣，  
用臭不可闻的死亡之息，  
败坏了这九月之夜的冥想。

无辜又无助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举止粗鲁、身材魁梧的黑衫队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鹅卵石大街，口中狂呼法西斯口号，不管谁挡他们的路，都要挥拳相向。

不仅如此，大部分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历了堑壕战之后，已对战争完全厌倦，在那场战争中，人们疯狂地自相残杀，成千上万名年轻战士像动物一样死去，只为了争夺100码的泥泞小道，而用不到第二天，这条小道就会被敌人夺回。维尔浮莱德·欧文在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中，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名言：为你的祖国牺牲，真是甜蜜又正确。欧文诗



的题目是《陈旧的谎言》。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再也不想为“国王和祖国”而打仗。在19世纪，战争曾充满动人的爱国情调，辉煌荣耀照四方，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诗人对这种情况悲愤已极。路易斯·辛普森写道：

不管在凡尔登还是在巴斯通，  
一场大溃败正在进行，  
鲜血染红枯骨，  
机枪把你送到地狱中，  
晦暗使人忘记死亡，  
英雄不过是干了傻事一桩。

在诗中，作者用了“溃败”一词，它真实地反映了枪的后坐力给作者造成的感觉，他在这里暗示使用武器者最终要伤到自己。但是，也许史蒂芬·克莱恩对此描述得更为到位。在其诗作《战争是仁慈的·外一首》中，他这样写道：

军团的战争震天动地，  
小小的灵魂渴望出击，  
这些人生来就是当炮灰的料，  
他们头上飘着无限荣光。  
战场之神伟大啊，国王伟大啊，  
看吧，上千具尸体横卧竖躺。  
亲爱的，不要哭吧，  
因为战争是仁慈的，  
因为你的父亲躲在黄色坑道中，  
义愤填膺，呼吸不畅，  
就在那里见了阎王。  
不要哭吧，  
战争是仁慈的。

## 日本征服亚洲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以其强大的陆、海军力量，正在改变亚洲的版图。1937年年初，日本侵略中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中国人蒙受羞辱，最终酿成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平民惨遭杀害。在美国的“中国游说团”极为震惊，义愤填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把日本人比做纳粹。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就已大肆向南扩张，到1942年夏，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南亚最富庶的几个国家（在本书第七章将对此进行详述）。日本争夺亚洲广大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自然资源是战争的命脉。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打击西方殖民统治，羞辱白人殖民地政权，一劳永逸地终结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使炮舰外交彻底破产，打破了白人至上的神话。广大东南亚地区成为所谓共荣圈，当地人对日本人作出积极反应，在许多地方日军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欢迎，他们认为是日本人使他们摆脱了殖民统治。

但时间一长，日本人的残暴占领和对资源的冷酷掠夺激怒了当地人民，最终使他们倍感愤怒。只是在1942年，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另外，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以及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那个地方，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尤其是印度，当地人民奋争不息，渴望独立。帝国统治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美国在珍珠港遭受重创，失去了它在亚洲的全部地盘，只剩下太平洋中心的中途岛，岛上有美国的重要基地。美国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必然结果。1942年春，菲律宾陷落，65 000人在克里吉多被俘。盟国海军在新加坡海峡、印度洋以及在爪哇海战中，都遭受失败，损失惨重。马来西亚被全面占领，新加坡的坚固要塞没有挡住日本人，最后新加坡人不得不投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时处于亡国的危险中，两国总理向丘吉尔猛倒苦水。

## 欧洲惨遭蹂躏

20世纪4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前途深感绝望，哀鸿遍野。德国占



领军把当地大部分食物运回国内，剩下的食物就当成了自己的军饷，整个欧洲农业生产力完全崩溃，因为被占领国家人口中大多是女性。例如法国，在战争中士兵伤亡惨重，又有2 600 000名男人作为战俘被运到德国，去做苦工。大部分欧洲人相信德国人会进行长久统治，于是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与德国人合作。不管怎样，如果进行抵抗，将会被这些侵略者施以酷刑，直至枪毙。到1942年春，“卖国贼”这个绰号已经广为流行，成为合作者与叛国者的代名词。有人不断失踪，实际是被送进了集中营。侵略者在整个欧洲激起了恐慌。

当时，许多头脑聪明，讲究实际的男女认为盟国在欧洲和亚洲都已被打败，德国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有资格打赢。他们对未来提出疑问，谈论着“新黑暗时代的无底深渊”。对此，丘吉尔警告说这种情绪“会带来更多的罪恶感，这种邪恶科学的思想之光会把人们带入歧途”。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已经失败，德国和日本的极端主义招牌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总之，大部分西方世界经济已经陷入泥沼之中，处在萧条、通货紧缩、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乱的恶性循环中。对此，资本主义看来已经无能为力。悲观主义者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无效又无能的政体，它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效率，而且没有民族社会主义的新鲜感。

大英帝国正在分崩离析。它桂冠上的明珠——印度——开始反叛，骚动不安，要求“午夜自由”。甘地威胁要跟日本人谈判，为日军提供一条穿过印度的安全通道，使之与希特勒达到战略协调，从而换取印度的独立。丘吉尔对日本人入侵印度深感焦虑，甚至在美国，许多人对大英帝国也不再同情。1942年年初，《生活周刊》（当时为美国著名杂志）发表了一封致英国人民的信，信中警告说：“有一点你们要记住，我们绝不会为大英帝国的完整而战。”

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衰弱不堪，装备很差，指挥无方，与技术高超、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德日大军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欧洲，德国人用豹式坦克武装自己的军团，使步兵达到全机械化，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所有抵抗。在波兰，当地人用骑兵与德国坦克苦战。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所有战场都迅速建立了空中优势。日本人首先认识到海战中舰炮对舰炮的战法已经过时，航空母舰现在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还认识到舰载飞机可以击沉最为凶猛的



战列舰。1941年年末，日本飞机在新加坡近海炸沉了皇家海军的“骄傲驱逐”号和“威尔士王子”号，自己只损失了几架鱼雷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德日战略家也了解突然袭击、装甲战车及集团作战的巨大优势，他们是思想现代、富有创意、英勇无畏的战术专家，而盟国及苏联的军队则由一群思想保守、衰老不堪的败将统领着。

大西洋两岸都有许多悲观主义者。甚至丘吉尔都承认如果一对一开战，德国人永远是胜利者。20世纪30年代末，阿道夫·希特勒建成了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体。德国的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失业率几乎消失。那不过是一个外表的虚假繁荣，靠的是军费开支的大量赤字来维持，然而，在当时人们几乎看不出这一点。希特勒已经在中欧地区吸引住了盟军，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后来的芬兰。日本人已向世人证明他们是精力无穷、残忍无情的敌人，善于进行突然袭击和外科手术式征服。墨索里尼好像也激活了意大利的经济。自由的力量，现在还能取得胜利吗？

## 美国股市的崩溃

处在这片水深火热地带中间的是美国，这时看上去仿佛能置身事外、自得其乐。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认为美国地处偏远，太软弱，无力战斗。1937年，美国经济又一次崩溃，失业率在1938年从14%跃升到19%。联合汽车工会举行大罢工，关闭了通用汽车公司，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1937年10月1日，后人把它命为“黑色星期二”，那天股市与期货市场同时陷入恐慌之中。投资银行手中握有大批联保式贝斯勒姆钢铁公司债券以及一份标尔石油公司发行的优先股权，这种情况使有关政府开始考虑关闭股票市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0年后，1987年10月19日星期二，纽约股市再一次崩盘。

那位日本杰出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驻美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他评价说美国海军不过是“一个高尔夫球员及桥牌爱好者的俱乐部”。他们怎么会让自己的战列舰在珍珠港那样排列？简直像一群坐等挨打的大笨鸭。他很怀疑美国海军在远海作战时能否与日本人对决。山本



五十六对美国的工业实力评价甚高，但对美国专业军官队伍的素质颇为轻视。日本战争谋划者认为日军没有任何潜艇战威胁，“因为美国人天生就没有那样的体格和心理素质，无法适应潜艇战的紧张压力”。

驻守在亚洲的美军也没有得到好评。它不过是一支老旧不堪的军队，整天打打马球、玩玩高尔夫球，弄到国内廉价的军需品，在陆海军俱乐部玩玩决斗，追追女人。詹姆斯·琼斯在长篇小说《从这里到永远》描写了这种百无聊赖的军营生活。在入侵菲律宾的战役中，美军完全不是经过战火洗礼、装备精良的日军的对手。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长相英俊，飞扬跋扈（你要是叫他的小名麦克，那你就死定了）。他把自己精心雕塑成一个美国大英雄的形象。

其他人却不这么看。哈里·杜鲁门（此人我们将在以后评述）对他并不感兴趣，曾这样评论说：“从来没有谁敢碰他，他的参谋部里全是谄媚者，谁要是不奉承他，那就别想进他的门。”德威特·艾森豪威尔曾这样评论：“我在他的指教下研究戏剧学，在华盛顿研究了5年，在菲律宾研究了4年。”

麦克阿瑟算得上一个能力超群的领导人。他傲慢自负，宣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他有勇有谋，后来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他以冷酷无情的“跳岛”战术向日军进攻，一雪菲律宾溃败之前耻。后来在韩国仁川他也故伎重演。然而他也是一个喜爱炫耀、爱慕虚荣、易动感情的人，不管到哪儿都手持一根马鞭。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成绩全班第一，虽说他的母亲让他极为难堪，因为一心控制儿子的母亲在西点军校附近一家旅馆住下来，时不时插手他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一名将军和南北战争的英雄，荣获过勋章。麦克阿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表现英勇，两次获得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指挥着一个旅。他政治嗅觉敏锐，野心勃勃，在战后陆军中提升极快。

被派往菲律宾之后，他在马尼拉已经成了一个皇帝。1941年年初，他向华盛顿保证自己可以用很多当地人组成的大军保卫菲律宾。他的牛皮吹破了。菲律宾战士手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枪投入战斗，他们从未打过枪，装备差得一塌糊涂，事实上，许多人没有钢盔，打着赤脚。“这些



家伙不知道向谁敬礼，更不知道如何开枪。”一名美军中士厌恶地说。麦克阿瑟命令他的部队穿过贝坦，向克里吉多撤退，这命令说得好听是无法实现，说得难听就是自杀。海军陆战队员管他叫“防空洞·道格”，因为他每次来到前线，都要士兵给他挖个防空洞。在战争的头几天里，专横跋扈的参谋长不让别人与他联系，结果他的空军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也没有积极布防或分散保护，相反，当日本舰队逼近时，那些飞机还呆呆地停在跑道上，翅膀对着翅膀，结果轻而易举地被日本人完全击毁，时间刚好是在珍珠港事件24个小时之后。

1941年，菲律宾政府授予麦克阿瑟战地元帅军衔，还送给他一根纯金手杖，而他不顾所有法规军纪的限制，竟欣然接受了。更令人咋舌的是，1942年他从贝坦逃往澳大利亚时，居然接受了菲律宾政府送来的一大笔钱，那实际上是一笔贿赂。他逃到澳大利亚之后，美国总统觉得美国需要一位英雄，就授给他一枚荣誉勋章，令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又惊又怒，那些人还留在克里吉多的山洞和怪石中浴血苦战，认为麦克阿瑟已经抛弃了他们。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位复杂人物的超凡个性，请读一下詹姆斯·韦伯的历史小说《皇帝的将军》。

## 美国参战

在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地区其他灾难之后，美国媒体开始报道太平洋美军的无能，报道国内组织战争生产的困苦挫折。这时，人们用一个词“繁文缛节”来形象地批评官僚无能等种种令人苦恼的情形。然而，丘吉尔一直相信美国一旦崛起，将成为压倒一切的战争霸主。1940年年初，他对美国潜能的评价比许多人都高，但是正如他在《命运的锁链》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愚蠢的人真是多啊，不仅在敌国那里才有。他们会让美国的力量大打折扣。有人说他们软弱无力，还有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团结起来。他们会躲到一边胡闹，他们永远不会跟人打架，他们永远受不了看人流血。



他们的民主和周期选举制度会让所有战争准备都泡汤。他们到底是敌是友几乎都难以分清。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看看这个庞大、遥远、有钱、夸夸其谈的民族到底有什么弱点了。

我们真是很想知道，当年丘吉尔到底听到了哪些美国人对他说说话，刺激了他的耳膜，以至于他们认为美国是“夸夸其谈的民族”。不管怎样，在其卷帙浩繁的六大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丘吉尔虽然嘴巴很硬，但仍时不时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有一次，他描写自己很沮丧，就好像有一条“沮丧的黑狗”找上门来，那条狗终其一生一直对他纠缠不休。那只强壮、多毛、通体怪味的畜生会突然出现，重重地坐在他的胸脯上，狗嘴中喷出的腐败、垂死的气味将他完全击倒。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克尔威尔在《权力的边缘：唐宁街10号日记》记述了1940~1941年的一些逸事，当时首相深感沮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1942年1月，丘吉尔抱怨说：“对我们这些身处不列颠小岛上的人来说，所有的情况都越来越糟。”他刚在下议院经受信任投票的折磨，虽然他赢了，可遭受到了下议院对他的羞辱，这事显然让他身心疲惫。1942年，他谈到了：“失败与毁灭的无情浪潮正在将我们的命运投入深谷。”他不停地责骂自己的军事指挥官，斥责他们无能、胆小如鼠。1942年10月31日，一名英国战地指挥将军从沙漠给他发来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电报：“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同德国装甲部队进行任何决战都不可能取胜，因为就我们装甲部队的装备、组织能力及领导力量来说，敌我双方优势对比都是敌二我一。”1942年3月5日，在给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这样写道：

当我回顾自己长期以来企盼着美国加入的这场战争时，我发现已经很难说自从12月7日的战事之后，英国的战争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在新加坡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还有其他种种不幸如黑云压顶般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

接下来，他详细讲述了在马耳他、锡兰和印度所面临的灭顶之灾，谈到



了隆美尔在非洲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更为危险的是，德国U型潜艇对商船的攻击正在扼杀英国的生命线。后来人们才知道，1942年上半年的时间里，被击沉的美英舰船总数等于1941年全年之和，超过了盟国造船能力的300万吨。皇家海军在印度洋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显然陈旧的英国水面舰队已经无法与现代化的日本重型战列舰相匹敌。4月1日，丘吉尔这位始终如一、忍辱负重的乐观主义者在给美国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下如下的结尾：“我本人身体极好，尽管从回来以后我感到战争的压力远甚从前。”换句话说，那只“黑狗”又在骚扰他了。

## 美国的孤立主义

对美国的悲观、失望是有很多理由的。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许多神经兮兮的人已经大谈世界命运的问题，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中立，而日本由于需要能源，应该夺取英国与荷兰在远东的地盘，只是不要激怒美国。与此同时，德国U型潜艇会逐渐扼杀英国，要想活命只能求和。然后，美国和加拿大就得单独面对轴心国了，不过即使英国已经衰败，美国凭借浩瀚大洋的天险，仍然可以安然无恙，喜乐升平。最终，这个“软弱”和“夸夸其谈”的民族就可以与德国和日本达成一个临时解决方案。

事实上，当时一股强烈的孤立主义浪潮正席卷美国，当然，卡内基礼堂举办的一场“英国战争救援”音乐会十分感人，但它压不过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声势更大的“美国第一”群众集会。孤立主义的声音激昂响亮。查尔斯·林白，这位美国的飞行英雄，正滔滔不绝地争辩说：欧洲战事不过是欧洲列强之间老一套的搏杀，并且问道，为什么我们美国的小伙子们要去牺牲，就为了保存大英帝国吗？他在1938年访问德国之后，这样说：“英国和法国在空中太弱了，无法保护他们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英国是一个由一大堆反应迟钝、傻乎乎、冷漠无情的人所组成的国家，那里只有区区几个天才人物。”他的妻子，那位美丽而富有诗意，同时又多愁善感的安妮·莫罗·林白写了一本畅销书，在书中她把这场战争描写为“在过去力量（同盟国）”与“未来力量（德国）”之间进行的一场拼斗。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



集团的重要合伙人，这时也声称：“同盟国不可能对付得了德国人，在那里魔鬼太多，德国人太好勇斗狠了。”

美国国会里，有许多人要求通过一项更严格的中立法案。直到1941年春末，要求进行强制性军训的法案才以一票之差在美国国会通过。如果此法案未获通过，美国军队可能就被解散了。200万人应征入伍，但是有1/2的人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不适于服役而被遣返。孤立主义者声嘶力竭地指责华尔街和大企业如何渴望战争，就是因为他们要大发战争国难财。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托马斯·欧莫里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最有钱人家的子女首先要当兵。他说：“在下一场战争里，你会看到大兵福特、大兵洛克菲勒和大兵摩根。”

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举国一片震惊，军队在菲律宾惨败也让全体美国人陷入恐慌。到1942年春，谣言四起，有时报纸也在那里登载新闻，宣传敌国间谍、奸细破坏，甚至日本人将要入侵西海岸。许多人编出故事描写敌人在长岛午夜登陆，还有什么小潜艇潜入了纽约港。更有甚者，《纽约时报》资深评论员瓦尔特·利普曼预报说，敌人正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破坏。1942年4月19日，美国开始执行一项丢人现眼的法案：将全体日裔美国人圈禁起来。为节省汽油，美国的行车时速被降到每小时35英里，还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最高税后收入定为2 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 000美元，那是一个情绪低落、神经错乱的时代，因此投资者当时要陷入那样的消沉境地，也就不奇怪了。



## 第三章 股票市场的挣扎

战争一爆发，真理就是第一个阵亡者。

阿瑟·庞森比

20世纪30年代末，全球的经济与股市都已从早期大萧条的低谷中稍有恢复。然而，经济复苏是脆弱的，大多数股市升值虽然很快，但是在开盘暴涨之后又会剧烈震荡。以美国为例，到1937年年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比1932年的底盘涨了近4倍，但是，仍然比1929年的高位低60%。全球的投资者仍然在舔血疗伤，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市值这时已比萧条时代高出5~8倍，按面值打折，最终所得仍远远高出债券。唯一的例外就是德国经济，按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那里是一片繁荣，柏林股市表现强劲。

但是总体而言，股市大崩盘之后的大萧条所造成的创痛如一大片乌云笼



罩在投资者的头上。当时的“股神”沃伦·巴菲特有一个有学问的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老师，名叫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教科书《证券分析》。格雷厄姆教导说：“当你买股票或债券时，你要努力运用金融分析法，得出安全底线，因为大熊市已经告诉我们，此时入市风险极高。”格雷厄姆认为企业资产负债表同企业财务报表同样重要，股票必须比债券分红要高，因为股票风险更大。信用等级比什么都重要。财务债券被定为5A级。在大萧条、通货紧缩和真正熊市的时代，它是一部杰出的金融分析杰作。

## 伦敦股市 Vs. 英国经济

伦敦股票市场多少有些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末，它远没有达到纽约那样的过度投机，主要是因为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一直低迷，企业利率不尽如人意。根据《金融时报》的说法，虽然大崩盘造成了“全城一片沮丧和恐慌”，但是人们多少也“暗自庆幸”，因为英国的投资商数年来一直有被人丢在一旁、没赶上派对的心理。他们趁此机会说“我早就跟你讲过”投机的风险，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大捞好处。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大多数勇于进取的英国投资者一直在纽约炒股，这时也损失惨重。受伤最重的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老狐狸”法尔克所管理的保值基金。他们将这笔基金分为两部分进行管理，以期获得更多关注。1928年法尔克在纽约转为空头，随后不理凯恩斯的劝告，1929年夏又回头去投资美国政府证券，几乎完全被掏空。他负责的那部分基金，全年缩水63%。

凯恩斯负责的那部分只下跌了15%，而数年来他一直在自己的户头上进行期货投机，成绩傲人，到1928年年末，他已经成为一名富翁。然而，在1929年年初，他正投资着长线橡胶、玉米、棉花和锡矿，没想到期货价格突然大跌。期货的损失迫使他卖掉股票以补亏空，所以到1929年年末，他只剩下了一堆垃圾股，以及奥斯汀汽车厂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该公司股票的市值也从每股21元跌到了每股5元。为他作传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说：到1929年年底，凯恩斯的净资产从1928年的高位一下子缩水了7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对纽约股市的过度投机一直头脑清醒，然而，最终还是没



有逃过这一劫，这也说明要想跟一个阴险邪恶的熊市斗法是多么困难，不管你如何高瞻远瞩，都有可能被它扑倒。所有的东西都在跌价，而流动资产是最气人的胆小鬼——它一见势头不妙就第一个掉头逃跑。

股市大崩盘之后，伦敦市场得到了一点好处，因为投资者对美国银行的破产深感担忧，认为英国货币才更保险，于是纷纷从纽约撤资，然而，到1930年秋，英国经济也像美国一样深陷泥沼，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生产一塌糊涂，外贸被保护主义死死困住。一夜之间，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就出现了领救济粮的队伍，大部分英国人都成了穷光蛋。人们开始节衣缩食了。20世纪30年代初，如果英国首相要出门，他得自己走出唐宁街10号去叫出租车。英国的经济和股市到1932年已经看到谷底，不过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与股市已经有了开始复苏的迹象。到1936年年末，《金融时报》颁布的指数翻了一番，创有史以来新高。比如，凯恩斯在这个新一轮的熊市里又赚了大钱，再一次成了大富翁。接着，1937年经济复苏归于流产，股价再次狂跌，英美两国都陷入再一次衰退。此外，随着德国越来越富有侵略性，欧洲市场变得更加脆弱，极易受到国际事态发展的影响，坐“过山车”的投资者非常紧张，那位凯恩斯早已在股市里投入全部资产，现在完全被套住，损失如此惨重，引发了忧郁症（他自己的“黑狗”也缠住了他）和严重的失眠症。

此时的英国首相是内维尔·张伯伦，那是一个厚道又天真的人。他在历史上作出了一个最错误的判断，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高雅而诚实的兄弟”，相信那位“元首”告诉他的话：在得到了苏德坦之后，他就再没有领土野心了。1938年9月28日，在一个极具戏剧化的时刻，张伯伦告诉下议院：希特勒已经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提议，愿意商讨日耳曼人的问题，那不过是连接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块德国领地。下议院全体议员起立，报以热烈掌声和幸福的欢呼声，张伯伦则谦虚地嘀咕道：“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那一天，英镑兑美元升值了13美分，伦敦股市一路飙升。在这种情况下，股市正像英国下议院一样，被暂时愚弄了。可是相比之下，丘吉尔却完全不吃那一套。他认为那是一种绥靖，所以他没有鼓掌欢呼，也没有向张伯伦道喜，他说：“这个政府在丢脸与战争之间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了丢脸，而他们会



得到战争。”

这时，伦敦的编辑和股评家们对丘吉尔都不屑一顾，带着谨慎的乐观心情看待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投资者和大众读者一般从报纸和图书中获取信息，人人都在捧读《我的奋斗》，在那本书里，希特勒赞美了英国种族主义的战斗精神，夸奖了它对印度的坚定有序的帝国式管理。他希望那完全可以与一个东欧帝国相媲美。在接见记者时，他多次谈到北欧联盟，英国在联盟里可以独霸海洋及远东地区，而德国作为平等伙伴可以称雄欧洲。希特勒的助手们写过日记，说希特勒确实渴望过这样的规划能实现。

## 1929~1937年的美国经济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9年达到380点，跌至谷底，53年以后，该指数又暴跌了89%。市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的反应是担心他思想太自由了。许多投资者都认为罗斯福是本阶层的叛徒，对从政毫无经验。可是，这位新总统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他这样表示：“我们所害怕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害怕本身。”然后，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应对银行危机，这危机造成了美国大批银行倒闭。1933年3月13日和3月15日，大批银行重新开业，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在3月3日关张，这时也重新开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飙升15%，成交量放大，是证交所历史上成交量最大的一天。不管怎样，投资者感觉到了他们先前讨厌并蔑视的这位新总统还真有一些高招来复苏经济，他举措坚决，而且大谈“新政”。1932年的股市暴跌，已经探到熊市谷底，此后再未发生，即使在1942年的大跌中也未到达那个深度。

1935年这次复活已经演变为强力复苏，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初期还有些迟缓，然而很快就一片生机。在193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经济复苏稍稍放缓，紧接着就开始了快速发展，通货紧缩也消失了。1937年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市值已经从197亿美元的低股值跃升到625亿美元。想象一下吧，1932年的美国股票总市值差不多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

如图3-1所示，即使在复苏的顶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然只有1929年峰值的1/2。国家经济仍在困苦中挣扎。98%的美国家庭一年的生活



费都不足5 000美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房。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缴纳所得税，1937年向美国国税局报税最高的是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斯·B·梅耶，他缴纳税金为1 161 735美元，还有IBM公司的托马斯·约翰·沃森，他上缴税金为419 398美元，此外，有个叫乔治·华盛顿·希尔的人上缴380 976美元。

1937年，股票市场的复苏失去了动力，股价急转直下，这是因为罗斯福试图干涉最高法院的组成，令投资者深感不安，于是，经济又陷入了衰退。不仅如此，政府平衡预算的日程安排被凯恩斯学派看做失效经济的措施，而这时美国经济还处在低迷之中。到年底，蓝筹股急跌，如图3-2所示。还请注意在年底账面股息收入都接近天文数字。克莱斯勒公司股息超过20%，通用汽车和贝斯莱姆钢铁公司股息收入约为10%。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怀疑股息要被大砍猛杀。果然不错！第二年，克莱斯勒每股就只派发两美元，通用电气公司是每股股息为0.96美元，而通用汽车每股股息为1.50美元。

表 3-1 1937年主要企业的亏损问题

| 股票和股息    |      | 价格（美元） |     |     |  | 年度变化率（%） |
|----------|------|--------|-----|-----|--|----------|
|          |      | 高点     | 低点  | 收盘  |  |          |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9    | 187    | 140 | 144 |  | -40      |
| 伯利恒钢铁公司  | 5    | 106    | 41  | 58  |  | -17      |
| 克莱斯勒     | 10   | 135    | 46  | 47  |  | -68      |
| 通用电气公司   | 2.20 | 65     | 34  | 41  |  | -14      |
| 通用汽车     | 3.75 | 70     | 28  | 30  |  | -34      |
| 合众钢铁公司   | 1    | 126    | 49  | 54  |  | -20      |

资料来源：《大盘》，罗伯特·索贝尔著，《纽约时报》

1934~1939年的美国经济

20世纪30年代末期对投资者来说是消沉无望的时期，他们对大崩盘仍然心有余悸，仍能感到那股冲击波。此时，对股票和债券的研究也停留在表面，没人关注季度收入报告，却只是盯着做得漂亮的资产平衡表。20世纪20年代



曾操纵股市的庄家们，这时连个人影都不见了。投资生意臭不可闻，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再无吸引力。不管是华尔街、股票经纪人、投资银行，还是理财专家，这时都声名狼藉。

不过，这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学派从一片废墟中兴起了。一派以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为代表，1934年他们传授账面净值、获利能力的理念，希望人们永远在买股票与债券时留出足够的保险系数。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T·罗威·普莱思，他到1937年为止，一直在《巴伦周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公司生命周期的问题。他建议，决定购买股票的决定因素，不是看当前市值和获利水平，而是看那家公司是否有能力真正赚钱并按股分红。要尽可能不要购买“正走下坡路的企业……它们的赚钱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点”。两种投资学派本来可以如日中天，谁想到后面还有更艰难的日子。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及1949年年初，纽约股票交易所仍在大萧条的泥沼中苦苦挣扎。所谓“金融区”不过是一片垃圾场，里面拥挤着半空的大楼，破烂的饭馆，人们在那里打发着半死不活的日子。投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每天的交易额还不到100万手，从1936和1937年的150万手降了下来，因为这期间出了好几桩股交丑闻，吓坏了投资者。交易活动是如此呆滞不堪，1940年8月19日那天只有129 650手成交。股票经纪与投资银行正在慢慢衰落，战争风云的到来使股市复兴更加不能确定，进而造成税收更高、法规更严，即使运气转好也无利可图。

一些曾经有钱、出身高贵的人，比如“蓝血贵族”出身的理查德·怀特尼这时涉嫌贷款欺诈和挪用公款。威严无比的J·P·摩根则饱受双重羞辱，一个来自调查华尔街弊案的参议院委员会，一个来自一个侏儒，在听证会议室，那个小个子居然盘腿坐到了摩根的大腿上。要了解当时纽约和长岛地区的那种忧郁气氛，可以读一读欧勒克劳斯那本挺棒的小说《挪用公款的人》，书中对理查德·怀特尼的沉浮作了生动的记述。罗斯福那富有平等主义的“新政”及要求改革的呼吁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财富金字塔的上层建筑，在1939年，61 000个股东要分掉美国股息的1/2。纽约股票交易所仍然是贵族式的、“绅士们”的俱乐部，光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就垄断了全部认购股的23%。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以颤抖的声



音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经历了三天的小幅多头单边行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20点，达7%。成交量是两年来的最高，因为投资者预计国防订货将会促进经济起飞。然而，1939年行将结束，市场越来越对战争不利的情况反应敏感，虽然军用订单确实有助于振兴经济，增加就业。那一年的市场复苏很快流产，因为人们对欧洲的局势越来越忧虑。从1940年起，战争新闻就主导着市场行为。一开始，人们以为希特勒很快会被阻止，欧洲会在胜利中走向牛市。接着，他们又开始害怕旷日持久的战争会破坏贸易，引起新一轮的萧条。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股市停滞了下来。军舰、装备和弹药的订单推动了经济，然而，市场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波兰和相邻的东欧国家而深感不安。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希特勒——这个怪诞可笑的上士，这个奥地利的农夫——已经将一个解除武装、混乱不堪、接近破产的德国完全转变，从一个最弱的大国变为欧洲最强大的霸王，而且几乎是以零伤亡的代价做到了这一点。他为德国人设计的千年帝国吓坏了许多人，同时，犹太难民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大屠杀和集中营故事。意大利与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是骇人听闻的。世界这时看来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前途未卜的世界，充满了仇恨与愤怒。在1939年的纽约股市，并没有任何持久的主题来推进发展。交易活动半死不活，自1923年以来，平均交易量头一次跌到了每日100万手以下（参看表3-2，并将这些股价与图3-1相比较，那是两年前的价格）。

表3-2 1939年价格改变的选择问题

| 股票和股息    |      | 价格（美元） |     |     |          |
|----------|------|--------|-----|-----|----------|
|          |      | 高点     | 低点  | 收盘  | 年度变化率（%） |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9    | 171    | 148 | 171 | +21      |
| 伯利恒钢铁公司  | 1.5  | 100    | 50  | 81  | +2       |
| 克莱斯勒     | 10   | 95     | 54  | 90  | +7       |
| 通用电气公司   | 1.40 | 45     | 31  | 41  | -3       |
| 通用汽车     | 3.75 | 57     | 36  | 55  | +5       |
| 合众钢铁公司   | 1    | 83     | 42  | 66  | -3       |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40年1月4日





图3-1 道·琼斯工业指数, 1929~1940

资料来源：道琼斯商业新闻集团

## 全球股市再创新低

1939~1940年的整个冬季，欧洲的军队都被困在一场僵持战里，有人称其为“虚假战争”，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德国人正在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实力。当德军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策划和训练时，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的官兵们却请假回家过圣诞节去了。在那几个月里，伦敦和纽约两市都放量缓升，如图3-1所示。1940年3月9日，希特勒发动了所谓的“低地国家闪电战”，3月10日，英镑创下历史新低。第二天，丘吉尔代替内维尔·张伯伦，成了英国首相。没有人感到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丘吉尔是一个失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战略参谋，结果遭到了惨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和比利时军队都全面崩溃，4天之后荷兰投降，英国远征军显然已经被德国豹

式坦克分割包围。到5月27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50点下降到了114点，6月初再降到112点，造成了令人咋舌的25%的大跳水（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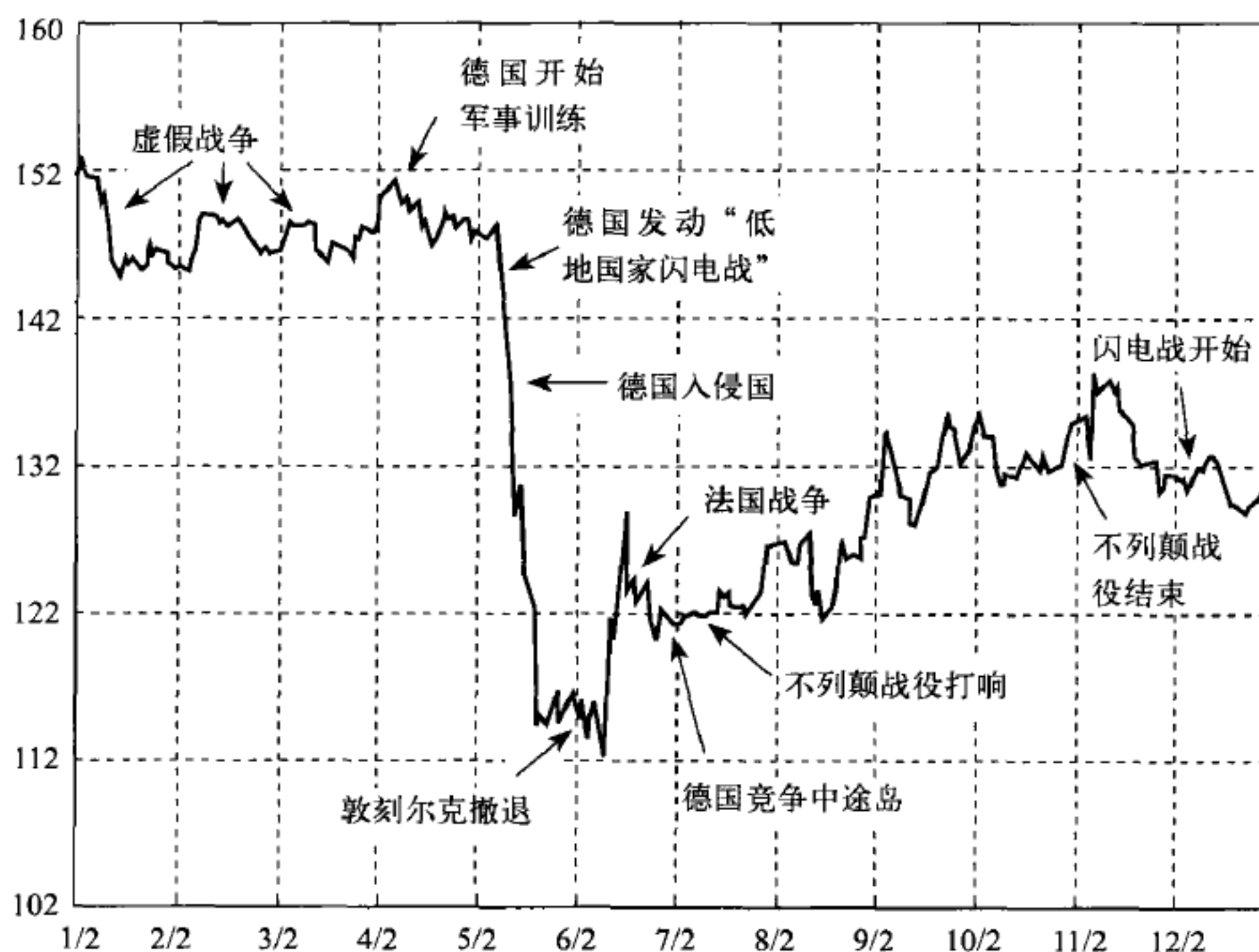


图3-2 道·琼斯工业指数，1940

资料来源：道琼斯商业新闻集团

然而，5月份从法国传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下子将美国股市击到谷底。英国远征军随后完成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又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疾升，收复了40%的失地。尽管如此，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报纸对英国的命运都不抱希望。人们觉得对英国的跨海峡入侵随时都会发生，专家也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阻挡德国人的进攻。《纽约时报》的汉森·鲍德温是当时权威的军事评论家，他认为德国空军不论在飞机性能还是在驾驶员技术上，都一再证明他们优于英国皇家空军。他注意到皇家空军缩短飞行员培训时间，更无法与大批经验老到的德国飞行员相匹敌。他一再指出（正如《纽约时报》社论一再强调的那样）训练极差的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前景是多么悲惨，美国的绝大部分飞机、坦克和军舰不过是一堆破烂的古董。



巴黎陷落、法国投降之后，美国股市陷入疲软。当德国攫得了英吉利海峡上的几个小岛后，对英国要遭入侵的担心更加强烈了。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联合新闻社的驻外记者威廉·夏伊勒发出警告，要人们重视纳粹军事机器的超级强力，还有希特勒本人那种出神入化的军事智慧。他写道：“希特勒也许是继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之后，最后一位具有如此神威的冒险征服者。一位怀着同样信念的新闻人是广播评论员爱德华·R·默罗。他每晚都随着大本钟的钟鸣声，开始戏剧性的播音：“这里是伦敦……”

面对这些坏消息和绝望的前景，纽约夏季股价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其实在空战发生之前，全世界都预测英国皇家空军会打破德国空军的空中优势，要知道，德国想渡过海峡夺取英国，就必须获得这种优势。当可怕的德国跨海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减小之后，纽约和伦敦的股价双双反弹。丘吉尔在谈到喷火式战斗机飞行员的英雄事迹时，这样说道：“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么多的人，对这么少的几个人欠着那么大的情。”

在1940年年末，随着战争消息越来越糟，英国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纽约股市又一次陷入低迷。一个像伦敦那样的大都市能受得了整夜的轰炸吗？要知道，那样的轰炸毁掉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同时也让市民们无法入眠。尽管美国经济此时增长强劲，制造业就业率取得显著提高，但是市场对这些征象的反应仍然不佳，持续下跌。这一年，就业率增长10%，工资提高16%。一成不变的是，战争对期货市场价格是利好消息，光是9月份，原材料的价格就飙升25%。194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公司利润仍然分别低于1929年的104 400亿美元和96亿美元，但是，证券市值仅有1929年的2/3。日均成交额跌得更惨，只到751 000手。在1940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2%。

英国的股市作出了类似的反应。1940年春夏之季，正当德国大军在欧洲纵横驰骋、高歌猛进之时，在一切都表明某个无月而潮闷之夜，德国海空大军就要一举进攻和拿下英国之时，股价狂跌到了1932年的熊市低谷。伦敦股市只比1929年的高位下跌了43%，远远不如纽约跌得惨。而且，伦敦在1936年年末还创出了一个新高。随后，当英国真正面临亡国危难之际，股市从高位暴跌了56%，在1940年春达到了新低。当时，人们对英国是否能从敦刻尔



克全身而退都提出了疑问。请参看一下图3-2，在图中你看不到双底线。那可是最后一个慌乱的时刻，正是大量建仓的百年良机。

另外，英国投资者的自尊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还经受了另一番打击，当然也算是当了一回不大情愿的爱国者。当时，英国正大量从美国政府和公司那里购买战争物资，中央银行的头寸极紧，极需美元现金。当时还没有《租借法案》，一切交易都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进行。为满足资金急需，英国财政大臣命令所有拥有美国证券的英国公民都要向英国中央银行报告，银行再把收得的证券汇总，偷偷卖给摩根士丹利，得到的美元都用于购买军火。售卖证券者得到的是英镑借条，算是卖股票或债券所得到的收入。

这是一笔相当敏感的交易，任何泄露都会引起纽约股市的价格急跌。当然，采取这次行动是必需的，不过它却绝对侵犯了英国投资者的权利。当时如果有谁对此抱屈，那肯定是不爱国的表现，但有些人还是在报告持股情况时说得不尽实。这件事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当处于全民危难之时，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资本自由也会处于危险之中。1940年，大批德国军离英吉利海峡不到20英里了，如果你是一个英国富人，你当然想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美国去。

我们注意到，英国在法军的军队刚一遭到溃败，伦敦股市就跌到了谷底。因为那场溃败似乎是有史以来英国面临的重大民族灾难（参见图3-3）。丘吉尔警告说，敦刻尔克是一次大撤退，并不是什么胜利之举。然而，投资者却感到这一事件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英军的主力被保存下来，现在可以在英国领土上保卫国家了。此外还可以看到，早在英格兰之战开始取胜前几个月，股市就开始反弹了。当时，德国随时都有可能跨海入侵英国领土。

在10月份之前，人们一直无法断定德国不可能取得空中优势。但是，市场却早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知道德国人不可能在没有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大举入侵。那是多么令人忧心难挨的漫漫夏日，头顶上进行着激烈空战，而且，连丘吉尔都害怕英国皇家空军要完蛋了。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进一步论述。





图3-3 英国股价，1928~1940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

## 美英股市对同盟建立的反应

1941年年初，尽管英国股市在利空消息频传之时仍在低位震荡，然而，它已经从1940年年中的底位开始艰难攀升，虽然震荡不断，却再没有跌到1932年和1940年那样的低位（参见图3-4）。在1941年，伦敦股市似乎本能地感到了英美之间正在形成，并逐步加深的同盟关系，并对这种同盟关系产生反应。股市甚至比丘吉尔更相信美国要参战。当然，此时还没有什么好的战争消息来庆祝，因为英国遭受的是一个失败接着另一个失败。后面对这方面的情况还要详细叙述。但是，作为对比，美国股市这时却并未探底，直到一年以后中途岛海战爆发才有所改变。那场战事相当于不列颠战役。

正如图3-4所示，股市又一次证明，合乎定义的熊市谷底就是最低的熊市低点，从那一点起，股市再不需要什么利好消息了，只要消息来得不比那

些已经造成股价跌停的更差，就可以了。（1940的战事以及伦敦股市在这危难之年的恶化情况，将在第四章进行专述。）



图3-4 英国股价，1935~1945

资料来源：花旗集团

这时，当1941年这一决定命运的年头开始时，丘吉尔正处在烦恼之中，因为罗斯福与那群“美国第一”的主张者正进行着政治斗争，担心美国孤立主义的动向。丘吉尔渴望美国参战，帮助英国，但他害怕日本人太聪明、太理性，不会去激怒美国人。尽管他从未承认，但是丘吉尔一定怀疑大英帝国不可能独立支撑，即使撑得下来，也会残缺不全。U型潜艇给这个岛国的海上生命线以可怕的致命打击，同时，也非常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英国无法顺利遭到入侵，他也不得不在饥饿与轰炸之下投降。下面就是丘吉尔在《伟大的联盟》一书中所记下来的自己当时的想法：

看上去，日本人不可能冒着被毁灭的危险与英美开战。日本向我们宣战简直是丧失理性，我当时肯定，日本人如果甘冒天险，肯定要走向



毁灭，毁掉整整一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政府也好，人民也好，并不总是理性地作出决定。有时候，他们会作出疯狂的决定……我毫不迟疑地写下自己的这个信念，那就是日本人不会发疯。

在这本书中，丘吉尔记下了1941年12月7日那天晚上，当他听说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之后，他“上了床，带着得救与感激的心情睡了一个好觉”。他知道英国还要忍受许多意外失败，还要遭受巨大损失，有些损失和失败就要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但是随着美国的参战，他再也不怀疑英国最终会幸存下来了。

我们有必要列数一下当时同盟国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面对着何种生死存亡的危险：

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

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已经加入了轴心国集团。

1941年春，经过艰苦卓绝的抵抗，希腊终于被意大利人攻陷，不过是在德国派出部分军队去援助墨索里尼军团之后才陷落的。

结果，德国原定的进犯苏联计划及巴巴罗萨行动，延后了至关重要的三个星期，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三个星期有可能使整个人类历史完全改写。（第六章对这次入侵要进行更详尽的阐述。）

另外，隆美尔发起的闪电攻击将英军逼退到埃及的亚力山大港75英里。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告诉罗斯福，隆美尔三周之后就会占领苏伊士运河。

尽管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已经打破了德国的空中优势，那是入侵英国必备的优势，然而，英国此时仍然处在极度危险中。英军遭受重创，已成强弩之末。德国对伦敦，及其他城市的轰炸，即所谓“空中闪电战”，总是黄昏开始进行，黎明时分离去，留下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随着U型潜艇的疯狂进攻，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同盟国在一周之内就被德国潜

艇在大西洋击沉了40艘商船。与此同时，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正遭受毁灭性的损失。

到1941年12月，德国装甲军和风暴突击旅已经深入苏联500英里，看来只是严冬突降才使得他们没能攫取莫斯科。事实上，在1941年12月初，德国巡航机已经瞥见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屋顶。我们在第四章还要进一步论述，德国人并没有发放冬装，他们的坦克和大炮也没有进行防寒处理，只有这样，苏联坦克大炮才能够发动强有力的反击，迫使德军后退。不管怎样，在6个月时间里上百万苏军战士被杀，另有100万人被俘，这是世界史上最叹为观止的军事战役。希特勒的军事判断力再一次被证明是无比精准的，只是他的战地元帅们冥顽不灵，拒不受命，才使希特勒的天才归于无用，本来只要“最后一击”，就能全部拿下苏联。

事实上，希特勒的军事直觉和政治嗅觉从1935~1943年一直百试不爽，富有创意，不落俗套。他正确地估算了对手的弱点和不愿打仗的心态，他的大胆赌博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不管在伦敦还是纽约，有许多杰出人物私下里不得不对希特勒叹服有加，对他为德国所做的一切表示赞美，对他进攻苏联表示惊叹。他们许多人曾亲眼见过希特勒，被希特勒的个性所迷惑。他们看来对希特勒的大屠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界上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都被希特勒的凶残手段惊呆了，他焚书毁思，他充满刻毒的种族仇恨，以及他操纵德国人灵魂的魔力，都令世人骇然失色。W·H·奥登用诗歌表达了这种观念。林茨是希特勒出生的城市。“以血还血真悲惨”那一句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战胜国向德国索要赔款，正是巨额赔款造成了可怕的通货膨胀，希特勒正是趁此上台的。

老师学问真高深，  
帮咱走进历史门，  
自从路德到如今，  
疯狂文化吓死人。  
放眼去看小林茨，  
产出婴孩赛鬼魂，



莫非上帝得了病，  
要此邪神胜正神。  
咄尔小子听我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血还血真悲惨，  
以牙还牙实可恨。

## 股票市场再探谷底

华尔街可没有什么心情去做诗，图3-5展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1941年的行情。珍珠港事件引发了大量出仓，但那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恐慌。1941年12月5日~12月9日股市下跌了5.7%，但是从夏末以来股市一直持续走低。报纸报道说，美军失败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发动偷袭，于是到年末，市场又产生了一次强劲复苏。投资者认识到美国这两年一直是一个“交战中立国”，但是，人人都知道战争对股市并不是什么好事。在1941年全年，股票成交量都遭受了全面打击，如表3-3所示，而我们随后还要看到，日本人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更在1942年年初加深了市场低迷。

表3-3 1939年价格改变的选择问题

| 股票和股息    |      | 价格（美元） |     |     |          |
|----------|------|--------|-----|-----|----------|
|          |      | 高点     | 低点  | 收盘  | 年度变化率（%） |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 9    | 169    | 115 | 129 | -39      |
| 波音飞机     | -    | 25     | 12  | 20  | +2       |
| 伯利恒钢铁公司  | 6    | 90     | 51  | 65  | -21      |
| 杜邦公司     | 7    | 164    | 126 | 143 | -21      |
| 通用电气公司   | 1.40 | 35     | 25  | 26  | -7       |
| 通用汽车     | 3.75 | 49     | 23  | 31  | -17      |
| 合众钢铁公司   | 1    | 71     | 47  | 53  | -16      |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42年1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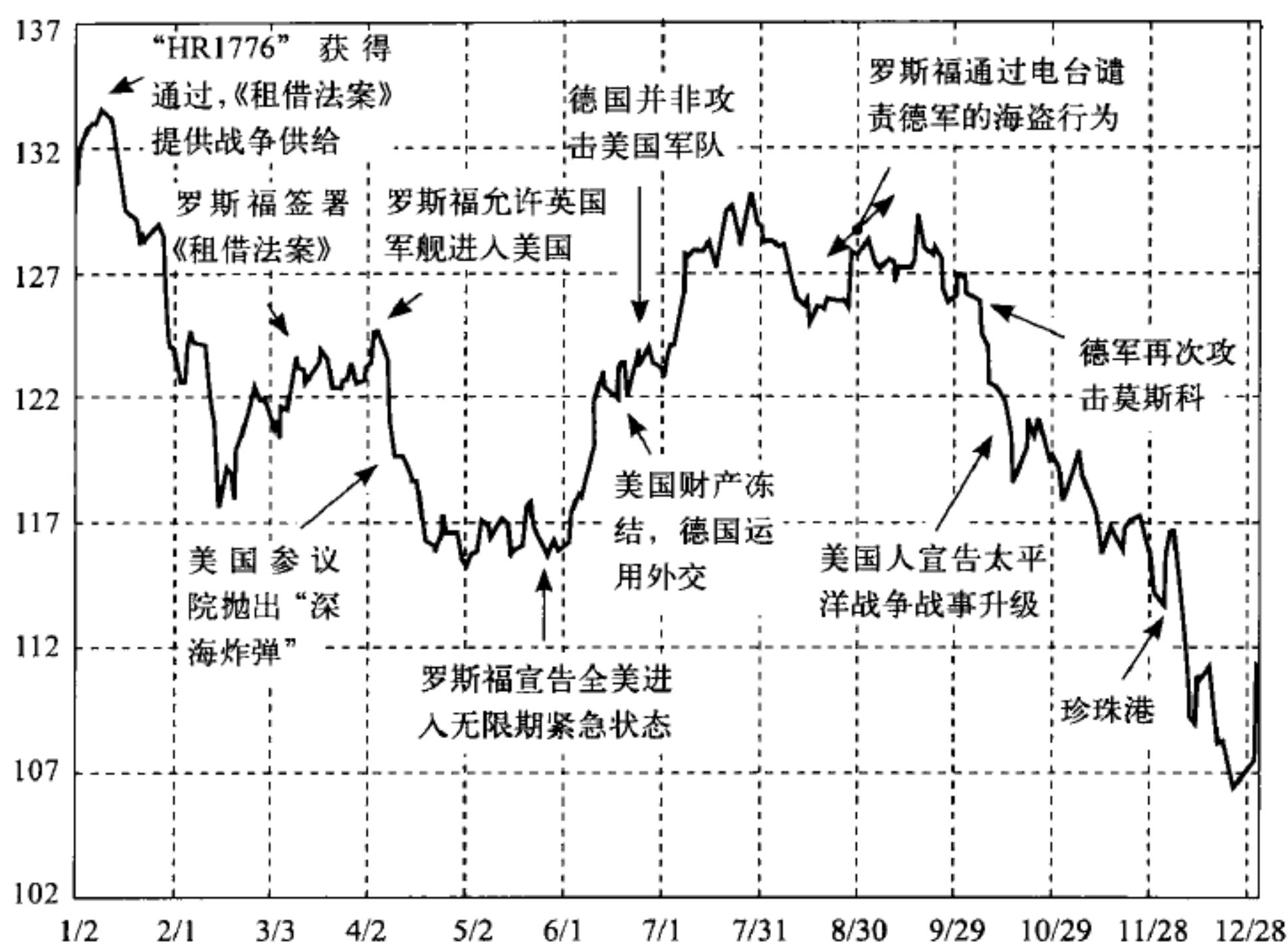


图3-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41

资料来源：道琼斯商业新闻集团

1941年以同盟国的战事不利结束（股票市场也遭同样命运），但至少敌我双方的战线现在是清楚的。今天如果有谁读一读美英两国的报刊，就会吃惊地发现当时的社会精英与媒体编辑们是如何灰心沮丧，在英美两国，人们都不敢相信盟国有能力挡住轴心国的进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只是说他们不敢相信最终会取胜，更不知道这一情况要持续多久。

然而这一年里打响了两次大战，一次是太平洋上的中途岛战役，另一次是伏尔加格勒战役，虽然罗伯特·索贝尔（他写过一本名为《大盘》的书，是关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本重要的历史书）并没有提到上述两次战役对股票的影响，当时的金融评论家也没有提到这种影响，事实上同盟国的这两个辉煌胜利阻止了轴心国的进攻，改变了战争的形势。在欧洲，纳粹正忙着进入防御阶段，因为他们的一路大军已经在伏尔加格勒投降。而中途岛正变成日出之国的正午。在图3-6中戏剧性地展示了美国股市本能地了解中途岛战



役的重要性，远比专家或普通大众明白其重要性的时间要早许多。

事实上，美国股市于1942年第二季度所探到的谷底，是大熊市的真正终结，那次熊市从1929年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牛市在那一年的春天已经产生，它要持续20年之久，要把美国股市带入战后让人无法想象的极度繁荣。当然，这中间还有几次小规模熊市，但是只有那巨大、蠢笨、迟缓的股票市场才面色沉郁地了解到长时间的熊市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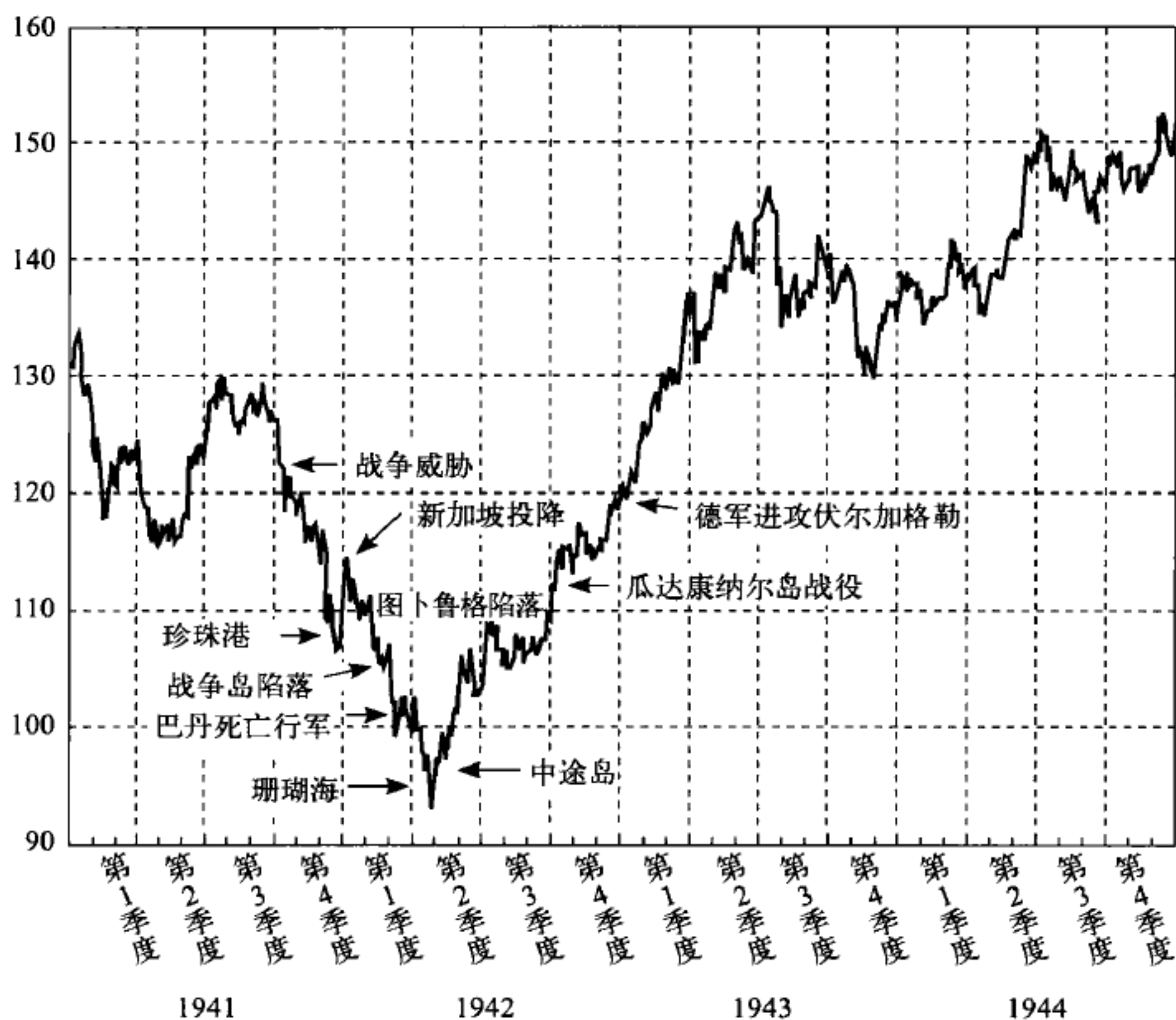


图3-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41~1944

资料来源：道琼斯商业新闻公司



## 第四章 伦敦股市与战争

**正**如丘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1940年，是我们漫长的英吉利及不列颠历史中最为壮怀激烈的一年。”这是英国所经历的最危险时期。虽然英国所遭受的最大惨败主要发生在1942年上半年，但是1940年，英国却在独自苦撑，面对入侵，孤单单地以一国之力抵挡着轴心国的全部进攻压力。它是否还能继续存在都成了一个问号。但英国人民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大英帝国可以存续千年之久，人们仍然会这样说：‘现在才是英国历史上最棒的时期。’英联邦的巍峨金堡是坚不可摧的。”

回顾历史，卢卡奇以更精准的眼光写出了《大决战》一书。在书中，他生动地阐述了纳粹与英国之间的最关键一刻，双方战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1940年5月10日~7月31日。这是德国和英国生死存亡的决胜点。希特勒知道他必须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建立空中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延伸到英国南部



海岸线，从而确保入侵计划的成功。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决斗，是两个杰出男人之间的搏杀，一个是丘吉尔，另一个是希特勒。到最后，是希特勒先眨了一下眼睛。我们看一看《金融时报》所登载的1929~1945年长线趋势图（见图4-1），就可以看出伦敦股市是多么奇妙，它对整个战局完全了如指掌。1940年春末，它急转直下，因为此时德军闪电战摧毁了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盟军。荷兰、比利时和丹麦数日之内就举旗投降，德军装甲部队和斯图卡轰炸机击溃并解除了法军的武装。英国远征军是由英军精英旅团所组成，这时几乎陷入绝境，只差一点就要被包围歼灭了。谁也没想到奇迹会发生：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使远征军免于灭亡。



图4-1 1930~1945年长线趋势图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

6月，当英国军队自法国退回国内时，英国远征力量又拼凑到了一块，整个英国开始为反击入侵作准备，股市再次跌到1942年大萧条黑暗时期所创的最低值，用术语来说就是划出了一条粗大完美的双底线。接下来，随着不列颠之战在夏日夜空响起隆隆炮声，德军开始大规模集结作入侵准备，股市

却稳定下来。到了1945年八九月，股价随着空战进行略有回升，根本不管这时皇家空军处境多么艰难。也许这是英国投资者受到了丘吉尔演说的鼓舞，也许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英国反正不会失败，肯定不会被征服，结果，股价就在震荡中攀升。

那个夏天和秋天出现的英国牛市，当然不能算是合情合理。许多伦敦和美国的股评大师都深感失望，但是市场明白道理何在。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1940年夏天，在被占领的欧洲，有许多人带着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希特勒要永远统治欧洲，所以，他们以此信念为根据进行炒股。

请再看一看图4-1，就是伦敦股市的走势圖，我们会非常有趣地看到股价在1941年秋，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又上涨了，但是，不久又随着盟军在1942年年初的失败与损失而大跌。毋庸讳言，1942年也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年，但是也正是那一年，美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争，英国再没有亡国的担心了。问题是到底有多长时间，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市场这时表现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反击轴心国的斗争在全球展开，而战争本身也打开了大英帝国的巨大裂痕。而且还要指出，赢得这场斗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到了战争末期，英国已经变得一贫如洗，实际上已经破产。

## 黑暗时刻的掌权者

1939~1940年沉闷的冬天刚过，还有那“假装的战争”结束之后，德军于1940年春全力发起进攻，攻破所谓“低地国家”和法国的防线，以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当选英国首相，同日英镑创下了新低。这个好勇斗狠、有点儿浪漫气质，同时还有点先知先觉的英国人，打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警告人们，纳粹德国有多么危险。多少年来，他坐在英国下议院，仿佛就是英格兰的良心，犹如议长头上挂着的那只大钟，滴答滴答地告诉人们他们在浪费着多么宝贵的分分秒秒。奥登捕捉到了当时忧愤沉郁的气氛：



在幽幽黑夜的噩梦之中，  
欧洲所有的狗都在暗暗而鸣，  
所有的残存之国都屏息而待，  
看那恶犬的仇怨会销断谁魂。

然而，丘吉尔所警告的大难临头，说德国人一心复仇，所以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英国人对荣耀的热爱，对爱国主义的激赏，早已消失在佛兰德斯那潮湿的、血淋淋的战壕中。有时候，丘吉尔在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担心时，会遭到众人的诘难。早在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举行过专场辩论会题为：“决心已定：我们再不会为国王与国家而战。”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赞美帝国征服的国歌是丘吉尔最喜欢唱的，现在却无法再感动其他人的心灵：

年轻人，是女王的士兵，  
他们也曾年轻，他们也曾看到年轻人，  
为英格兰的荣誉而战，年轻人，  
是她那普照世界的荣光让我们欢喜歌唱！

## 深受经济困扰的领袖

这时候，丘吉尔已经因能言善辩而闻名，但是他那刻毒的舌头和妙语连珠也得罪了许多人，有一回，当他参加晚宴时，与美丽而思想开放的阿斯特夫人激辩政治问题，气得那位夫人这样对他说：“丘吉尔，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就要在你的咖啡里下砒霜。”他回答说：“阿斯特，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宁可喝了它。”他的机智就是这样的尖酸刻薄。还有一次，在晚宴上，身材肥胖的工党议员贝茜·布拉多克与丘吉尔碰面，丘吉尔不喜欢她，她也曾多次向丘吉尔发难，这时她大声叫道：“温斯顿，你看你又喝醉了，你一喝醉就显得更讨厌了。”丘吉尔打量着她，回答道：“而我必须这样说，布拉多克夫人，那就是您长得真丑，明天我会酒醒的，而您却还是长得丑。”

还有一次是跟安奈林·贝文发生的事。贝文是工党领袖，同时也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某天，他在下议院议员专用的男卫生间里，这时丘吉尔进来了，离他很远。贝文问道：“我们俩今天是不是有点冷战状态啊，温斯顿？”“不，”丘吉尔回答道，“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管看见什么东西，都一心要把它收归国有。”

贝文接受不了丘吉尔式的幽默。他曾这样说过：“他是青春期类型的……活泼好动、爱摆样子的思想家。他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十七八岁大男孩的价值观，只不过他用自己的成熟口才将它们表现得好像是成年人的判断。”另一位工党对手克莱门特·阿特利（丘吉尔曾形容其为“披着羊皮的羊”，还有“一个谦虚的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谦虚”）曾这样说过：“温斯顿身上有50%的基因是天才，50%的基因是大傻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丘吉尔不得不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挣钱。他讨厌那种没完没了的招待会，有时连一口鸡尾酒都喝不下去了。有一次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件事，忙完了一天之后，他跟一帮人漫无边际地聊天，其中有一位趾高气扬、口若悬河的主教。这时，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侍者朝他们走来，端着一盘雪莉酒。丘吉尔拿起了一杯，然后她把另一杯递给主教，主教顿时惊得瞪大眼睛，愤怒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年轻的女士，我宁可去通奸，也不会喝一杯酒精饮料。”一听此言，据说丘吉尔马上就朝那个女孩招手：“请回来，小姐，我刚才不知道我还可以选择呢。”当然了，他是开玩笑的，不过这个故事马上就流传开来。

不管机智也罢，幽默也罢，丘吉尔此时深受严重财务危机的困扰，这一点威廉·曼彻斯特在他写的传记《最后的雄狮》一书中有过详尽论述，丘吉尔的生活方式奢华讲究，从不在意金钱，到了1938年，他的演讲费和稿费已经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尽管他曾经当过英国财政大臣，然而在股市的丛林中，他完全是个小毛头。1937年年末，他被股市复苏所蒙骗，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入美国股市。在前往美国演讲的旅途中，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极为天真可笑的信：



最近，我的经济情况有点不好。在我来此之前，哈里·哥文勋爵问我是否可以在机会来到时，不用打招呼就用我的账户买股票。我回答说，我永远可以找到2 000~3 000英镑。我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的投资极限，可以全部拿去炒股。他显然把这些当成了我要投机去赚取更多利润的底线。于是，他购进了我限额10倍以上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们几周之内多少收回了一点损失，也算一小笔财产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把一件烦心事丢到了我的脑后，也丢到了你们的脑后。

到了1938年3月，随着纽约股市暴跌，丘吉尔不但赔个精光，而且还欠了维高达证券公司18 000英镑，在当时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情急之下，丘吉尔差一点儿辞去国会职务，不过最终他还是改了主意，想变卖自己在查特威尔镇那幢心爱的房子，还有80英亩的土地，希望能换到25 000英镑。英国一家恶名昭著的小报恶意地把这事捅了出来，宣称丘吉尔总是批评政府，没有能力平衡预算，现在他自己连家里的预算都平衡不了，眼看就要破产了。

最终，丘吉尔的天赋使他免于破产。正如W·H·奥登描写的那样，他是“富婆的牧师”。不过他的健康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佳，已经每况愈下。几位有钱的朋友向他贷款，以他的财产作为抵押，查特威尔的房子得救了。他的新书《英国国家史略》也得到一大笔稿费，使他偿清债务，但也只是刚够使用而已。丘吉尔从这本书的销售中得到20 000英镑（约等于现在的200万美元）。10年以后，他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的六卷本著作，使他挣到了更多的钱，相当于今天的4 000万美元，也使他成为历史上因写书挣钱最多的作者。这个记录现在还保持着。克林顿总统写的回忆录挣了1 200万美元，艾伦·格林斯潘拿到了850万美元预付稿酬。

### 个性鲜明的丘吉尔

丘吉尔接任首相并没有受到广泛欢迎，他的诙谐幽默和尖刻笔锋得罪了许多有权势的国会议员。有时候他对自己的妙语连珠沾沾自喜，浑不在意那些尖酸刻薄的话所伤害的人有多么痛苦。比如，同样出身保守党的斯坦利·鲍德温也曾担任过首相，丘吉尔却这样评论道：“他时不时在真理上绊



一个大跟头，却马上站起来，装得像个没事儿人一样。”还有一回在英国国会里，一位议员正发表着冗长枯燥的演说，丘吉尔的反应是把身子深埋在座位中，阖上眼睛。那位议员注意到他在打盹，就问道：“请问那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在我说话时，您必须睡觉吗？”丘吉尔睁开眼睛回答道：“不，这完全是自愿的。”

当时还有其他的首相人选，比如有名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得到国王的宠信，许多人认为在这样的生死存亡时刻，他更合适当首相。哈利法克斯得到提名，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自认无力成为上议院的有能力的首相。彼得·德鲁克这样写道：在1940年，丘吉尔不过是一个“有可能的人，一个马上就要年过70岁的衰弱不堪的老头，一个让他的听众深感厌烦的卡桑德拉，也许正因为他演说时激情洋溢，才让人厌烦。他曾两次竞选失败，不管作为反对党多么出色，还是证明自己无法胜任这一职务。”威廉·曼彻斯特曾提到他自己的保守党议员感到前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辩论中饱受戏谑，当时议会里讽刺挖苦，人身攻击如霰弹一般朝他射去。最后，张伯伦走出下议院时，已经身心疲惫，精神垮掉了。

公众和媒体想起了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海军大臣时曾多次作出错误决定，导致许多败绩，特别是达尔达尼耶之战的惨败。时至今日，许许多多苏格兰、英格兰的家庭还为儿子的无谓牺牲而痛悼。英国外交大臣R·A·巴特勒把他称为“半个美国人，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跟他同一类型的迟钝而善言的种族。”在上流社会的盛宴上，有时人们会议论他不过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失败者，能喝大量的白兰地。事实上，罗斯福的好友萨莫尔·威尔士，在1940年曾对美国总统进言，说丘吉尔“情绪不稳，喝酒太多”。

丘吉尔确实很能喝。他每天上午就开始喝酒了，一直要喝到晚上。早晨是雪莉酒，中午是威士忌，晚上是红牌，夜里还有香槟和白兰地。酒精看来没有让他反应迟钝，也没有让他精力不济。而且，他从没有喝醉过。事实上，他特别看不起喝醉的人。他一旦抽起雪茄，酒量就更大。他平均每天要抽10支雪茄，当然，有些只抽几口而已。有时候，他只是在那里干叼着。他从来不把烟吸进肺里。后来，他的专用医师莫兰勋爵这样说：“温斯顿·丘吉尔



今天就满80岁了，对一个像他那样生活习惯的人，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对常识的不屑一顾，成就了他在人间的福寿。”

丘吉尔并非你我心目中那种平常的、有贵族气质的英国人。首先，他对反犹笑话从来也不跟着笑。其次，他的夫人克莱门蒂娜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有时简直就是一个激进分子。丘吉尔本人从不是一个真正保守的托利党，所以，有时党内成员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感到不安。

虽然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一再声言他们相亲相爱，但是，他们两口子从未单独一块吃饭，从未睡在同一间卧室里，也从未一起外出度假。克莱门蒂娜喜欢观赏风景，到博物馆悠闲参观，而这两项活动丘吉尔都深恶痛绝。她年龄越大，越爱旅游，所花的时间也就越长。其中一次旅行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她一走就是5个月，到达南太平洋时，遇上了一位意气相投者，那人名叫特伦斯·菲利普，是一个英俊而富有的艺术商，比她要年轻许多。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恋爱中。回到伦敦后，他们显然还保持着这种关系。克莱门蒂娜对丘吉尔说，她还想再出去旅行。丘吉尔坚决地回答：“不行。”后来，这段恋情才渐渐淡了下去。据丘吉尔的伟大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说，丘吉尔是“性冷淡”。有一回在国会开会时，一位议员悄声告诫他的鸡窝门开了。丘吉尔回答说：“没关系，反正那只小死鸡也不会跑出鸡窝的。”

许多人都相信希特勒性趣不高。卢卡克斯引用了许多逸闻，说许多漂亮女子崇拜着希特勒，渴望着与他“同床共枕”，然而，却从未有人如愿以偿。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两位20世纪最为精力充沛的领袖完全不是“好色之徒”。

再说克莱门蒂娜吧，她除了那一次的风流事之外，再没有对丘吉尔不忠。她相信丘吉尔天生要干大事业。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在战争岁月里她不顾一切地保护着他，尽最大努力不让他为自己不走正路，不因令人难堪的儿女们感觉痛苦。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总是用昵称称呼对方，他叫“哈巴狗”，她叫“小猫咪”。然而，丘吉尔这个放荡不羁的夜猫子可不是容易相处的。克莱门蒂娜曾向莫兰勋爵这样一针见血、不无贬义地描写过她的丈夫：

温斯顿总是戴上眼罩看清事物的本质。他的眼睛总是集中在他决心



要弄到手的东两上。在光柱之外的事，他完全视而不见……他对普通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从未坐过公交车，只有一回乘过地铁。温斯顿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是有意如此，实在是生来如此。我想他是唯我主义者吧，就像拿破仑一样。你看得出来，他总是有那种能力和力量，过一种完完全全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战争期间，按照丘吉尔回忆录里的说法，他的每日日程是：早上8点左右醒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就躺在床上或浴盆里看文件，口授电文。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极为自信的人，所以他们会极为舒坦、自然地在床边接见手下，或者从洗澡间“红光满面”地出来下发指令。如有可能，丘吉尔会在午后睡个小觉，更愿一直穿着睡衣工作到晚上，直到后半夜，经常要早晨两三点钟睡觉。像希特勒一样，丘吉尔经常把会见高级顾问的时间定在深夜，这搅乱了他们的新陈代谢，打乱了他们的睡眠，弄乱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在战争后期，当首相要向“种族”（他自豪地以此称呼英国人民）发表动员演讲时，要坐一辆专用列车，去巡视“他的海岛”。车上备有办公室、（电话）接线总机、餐厅、卧室，还有一个大浴盆，足以满足这个爱洗澡的人。

丘吉尔喜欢穿奇装异服、军装，戴各式帽子。这个形象一露面立刻引起轰动，他颇为喜欢。克莱门蒂娜开玩笑地说，他的帽子比她自己的还要多。有时，他仍然是当年那个小顽童。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过，有一次他在早上见首相，发现他正在床上，靠着枕头，身穿东方风格的睡袍，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身边放着早餐盘，里面都是吃剩下的早点，床上乱七八糟地丢着文件和电报。“那睡袍上绣的红金龙图案，真值得你跑上几公里路来欣赏一番，也只有温斯顿会穿这样的东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中国清朝的大官。他不停地按铃，叫着他的秘书、打字员、速记员，还有他那忠实的仆人索伊尔斯。

作为首相，丘吉尔事必躬亲，什么都得抓。几乎每天他都得留出10~20分钟“个人的时间”去接见不同的大臣、将军和政府官员，那些人都要求指令，或得到相关信息。无一例外，他们总是开口就说“请告诉我为什么”，



闭口就讲“这事今天就得办”（后来人们就把这帮人叫“丘吉尔的请愿者”），由此可以看出，丘吉尔那强有力的个性，他对权力的掌控力，对英国政府的构成及人事如此了解，可以毫不费力地主导战争行动，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他早在童年时期就认识了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因为英国仍然是一个封闭的财阀统治的社会），那时他还是一个紧张不安、心情不佳的男孩，在哈罗以及后来的桑德伯斯特备受其他小孩的欺负。他事无巨细，锱铢必较，不停地催促、干涉、激励他的下属认真工作。

我们读他在1941~1942年的工作备忘录，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细节。当时，战争正进行到最艰难的阶段，他还要面对国会的信任投票。那位倒霉的海军大臣看来受到了难以忍受的责骂。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7月6日

（抄送劳工与计划大臣）

1. 骑士广场不是海军部的财产，所以你应该先得到内阁的批准，然后才可以将自己的那个占空间过大的自行车遮阳伞撑起来。
2. 关于你想要得到的用于建筑海军部防空堡垒的几座建筑物，你应该请求劳工与计划大臣先提出方案，拿到战时内阁来讨论研究。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1月27日

真有必要在发信号时，每次都把“特里皮茨”称为“海军元帅冯·特里皮茨吗”？这完全是浪费信号员、密码员和打字员的时间。用“特里皮茨”去称呼那个人足矣。

首相致财政大臣

1941年8月28日

我们在这个岛上到底留有多少黄金？在南非，我们能控制的黄金量又有多少？别害怕，我不是跟你要钱。

首相致农业和渔业大臣

1943年1月12日

请给我制订一个计划，生产出更多的鸡蛋来。我听说英国农场生产的上百万吨燕麦和大麦中，将67 000吨拿出来，就足以恢复所有农场母鸡的比例，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增加鸡蛋数量。你在其他方面干得那么棒，要是在这方面失败就太可惜了。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2年12月27日

给潜艇起这些名字要比编号好多了。请看一看我提出的几个名字。我相信只要多动脑筋，再查一查字典，你就可以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所进步。

现在，请马上行动起来吧，在两周之内一定要给它们起好名字。

## 希特勒 Vs. 丘吉尔

把丘吉尔和希特勒的统治作风进行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两人都全面彻底地主导了本国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在英国首都伦敦进行指挥调度，过着一种英国式贵族的生活，身边有众多的仆人和助手。正如约翰·基根在其《军事四巨头传记》一书中评论的那样，丘吉尔早餐必有山鹑和野鸡，一顿饭所含的蛋白质超过了一名英国中小學生一周的摄入量。

基根注意到希特勒的风格完全不同。希特勒不是那种可以轻易赢得大众认可的外向的人，他曾苦苦研究，用心学习，才成为一个天才的、有号召力的演说家。他总是目标坚定，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表现得相当和蔼可亲，喜欢交际。他极乐于跟政治同事、自己的助理，还经常包括将军们一同进餐，所处的环境跟一个高级军官乱七八糟的住所差不多。在1939~1940年间的战役进行时，他在军队中巡视，亲自给英雄授勋，还经常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在席上话匣子大开，缅怀往事。

他的情妇艾娃·布劳恩迷上了当时颇为新奇的摄影机。最近，人们还发



现了一些希特勒的家庭生活影片。大多数影片都是专业摄影师拍的（因为取光良好），背景是在看台上，当时希特勒是在轻松度周末，所以完全没有装腔作势之举。希特勒总是穿一件质地高档的休闲运动夹克，下身是一条灯笼裤，戴着一顶帽子。画面上，他正在抚弄自己的爱犬，跟自己下属的小孩子们玩耍，时不时地会见助手，边喝饮料边与他们亲切地聊天。还有一些艾娃的生活片断，比如与其他女人一块做日光浴，穿着小号游泳衣，在湖边做健美操，还抓着一棵小树荡来荡去。

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所以有关部门请来唇语专家解读片中人的谈话，绝大多数的谈话都是无关痛痒的，最有意思的一段是这个镜头，当时希特勒和艾娃在人群的另一边进行生动的对话。她背对着摄影机，但是显然她刚才对希特勒说，她找不到出席晚宴要穿的衣服了。希特勒相当恼怒地对她说：“我正担心自己的一个集团军可能被包围了，你却跟我抱怨什么衣服！”

观看这些影片，令我们惊奇无比。片中的这个人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人了，那人夸夸其谈，胡言乱语，对着他的听众指手画脚，声音尖利刺耳，使群众疯狂。相反，在这些影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年男子，穿着笔挺的大衣，打着领带，戴着一顶帽子，就像亨弗莱·鲍嘉，从过去的迷雾中又活灵活现地面世了。他突然摘掉帽子，从阴影中露出标志性的小而黑的唇须，那张脸变得清晰可见了——原来是魔鬼的化身。他张牙舞爪，单足旋转，样子骇人，举起的不是手，而是一只鹰爪，然后他转过身，又转个不停，掀起夹克后摆，露出尾巴，那尾巴是如此强壮，通体浑黑，骨节粗大，证明自己是魔怪鲁西佛之后，便一扭身拐着一双裂足闪入未来世界之中。

在伏尔加格勒遭到惨败，他的战地将军们丢脸地投降之后，希特勒就变得离群索居了。他在一个偏远的指挥所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在那里，他住在圆木掩体或水泥地洞中，吃着可怜的素食者才吃的食物。他坚持要给他严格按照战地德军的配餐做饭。他不喝酒，也不吸烟。谁要是在他面前点上一支雪茄，就要招来他凶狠的瞪眼。

虽然他残忍地处决了数百万人，并冷酷地让自己的军队作出了牺牲，但是，他对身边人的福祉和感受却极为关心。1944年6月20日在会议室里发生了爆炸，那是一次针对他的暗杀，只不过炸弹没有炸到他。希特勒被爆炸



中的死亡深深打动，跟那些个死者的家人一起哭。他的秘书也是他的伙伴，是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对希特勒她们可以讲不与他人讲的真心话。据秘书写的日记说，他与她们分享自己远大的抱负，谈论艺术，甚至偷议他的将军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过肉体亲密关系。基根说他的“性生活一直是一个谜……在他与异性的关系中，有一个狂热倾向——那是一种半肉体的性感，与其说是情人与情妇间的情感，不如说是一种年轻男人与年老妇人间的感情”。

很难想象这个人——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凶残的恶魔，在自己艰苦的地下室吃完那顿土豆、蔬菜做成的粗饭之后，会放松地跟他的女秘书和助手们喝茶，吃着变质饼干，嘻嘻哈哈地闲聊，然而，显然事实就是如此。艾娃·布劳恩一直等到最后时刻，才得以去那偏远的指挥所跟他相会，虽然，她那活泼轻浮的性格事实上倒很像希特勒的那些女秘书。她当然不是南希·里根，不可能成为幕后耍阴谋、使诡计谋取权力的女人。

## 向残暴统治开战

但是，让我们再回来谈一谈丘吉尔吧。当他执政时，新闻界的反应是带有批判性的。还要提到一件事：1940年5月13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被丘吉尔取代之后首次进入下议院时，他受到了热烈的起立欢迎，人们热情高呼，特别是来自保守党阵营的呼声更高。与此形成对照，当丘吉尔入场时，全场静寂无声，特别是他自己所属党派也无人表示欢迎。但是丘吉尔并没有感到沮丧。他后来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国难之间，正是他准备了一生的伟大时刻。

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1940年5月10日，全世界仍然认为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它的马其诺防线是不可攻破的，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是世界上罕有其敌的军事强国。两国成为同盟国，最终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星期以后，法国就被打败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不过是一个笑话。英国军队则在敦刻尔克为活命而血战。那是历史上最为惊人的



命运大逆转之一，同时，世界各地的股市都对战事的结果作出反应，一片震荡。1940年5月13日星期一，丘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英国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对他的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大声发出了那一段著名的宣言：“我所能奉献的只有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他接着说道：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吗？我要说：“那就是战斗，从海上，从陆上，从空中，用上帝给我们的全部勇气和力量进行战斗，消灭那个魔鬼般的暴政，它比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罪恶还要残忍凶暴。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你：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惧任何恐怖的胜利，不管时间多久、道路多难都一定要取得的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再也没有我们的生存机会。”

他得到了他所需求的信任票，接下来，在余下的战争时期，大约有5年的时间，温斯顿·丘吉尔虽然有时生病有时健康，却不仅一直担任着首相，还兼任国防大臣。在所有那些岁月里，他通过自己雄辩有力、激情洋溢、语气坚定的广播演说，把英语本身也动员起来，让它成为强有力的武器投入战斗，激励、鼓舞他的人民，事实上也包括了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

但是，1940年的那个春天，战争局势相当严峻。德国在西欧于5月14日发动闪电战，全世界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战争。它运用了新战术、新科技，还有超级战略与训练。然而，它本来不会产生那么惊人的突袭效果，因为德国人早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了。早在1937年，海茵茨·古德里安就出了一本书，名为《前进，豹式坦克》。在书中，古德里安就提出一种新战术，即把坦克、机械化步兵与空中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一股“先锋力量”，直刺而入，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一个缺口。在西线的进攻严格按照他所提出的这个模式进行。第一波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法军阵地进行纵深轰炸。工兵随后跟进，一路搭起浮桥，让轰隆隆的坦克师呼啸通过，每个坦克师都配有自行火炮和机械化步兵旅。特种部队乘滑翔机于黎明时分悄然在敌后降落，夺取



荷兰军队的前沿阵地，在荷兰哨兵惊骇地发现德军，要引爆炸药去炸桥时，桥梁和运河已经落入德军之手。

## 夺取荷兰

荷兰人一直宣称他们的水库大坝是极为有效的，如果德军入侵，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闸门眨眼之间就能打开，把德军淹死在一沟大水之中。“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丘吉尔曾这样评论。在这次袭击中，他们的防洪堤和国境线警卫不是叛变，就是被杀，只用了一天，荷兰人依为天险的防线就被突破了。例如，在马厄斯河上的根奈普桥，三个身穿荷军军服的人，其中两个是荷兰纳粹，一个是德国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夺取了边境哨，杀死了哨兵。坐在一辆无标志救护车里的11名德军突击队员立刻跳出，加入他们，守住了大桥，让一列藏有德军步兵团的货车轰隆隆地从桥上驶过。

随着列车驶入荷兰境内，它时不时地在路过的城镇停下，每次从车上都要跳出10~20个人，化装成教士、商人、农夫或普通平民。这些突击队员利用自己的伪装，枪杀警察、攻击军事哨所。还有的地方，德军使用了伞兵、滑翔机，甚至还有水上飞机（在运河上降落）。叛变的可怕流言，还有到处是德国伞兵的传言，闹得荷兰各地一片恐慌，混乱不堪。在鹿特丹遭到狂轰滥炸之后，荷兰人的抵抗就土崩瓦解了。坚强的荷兰在5天之后就投降了。

## 比利时的陷落

比利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进入比利时的那条宽敞的通衢大道由一系列超现代化的堡垒守卫着，同时，比利时还有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军队，兵力达700 000人。1939~1940年的冬季，德军精心仿制了比利时的桥梁和埃本·埃马耳碉堡，用来进行军演和训练。那些桥梁与碉堡守卫着进入比利时的山谷。1939~1940年的冬天里，德军都在进行艰苦演习，而比利时军队则在放假过节。埃本·埃马耳碉堡坐落在坚石之巅，布有深藏在巨石中的炮阵，所以比利时人坚信它是坚不可摧、无法攻陷的。碉堡中驻有1 500名比利时军队的精锐兵力，他们居高临下，以强大的炮火控制着下面的桥梁。希特勒本人对这次行动深感兴趣，提议用一种巨型中空炸药包，投入炮台内引爆，



杀死比利时军队的炮兵，使整个地下掩体都充满令人窒息的浓烟毒雾。

在最后的突袭中，80名德国突击队员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乘着滑翔机在碉堡上头降落。他们杀死了碉堡顶端的哨兵，然后就开始朝大炮台孔洞中塞炸药，把催泪气体喷入通风口之内。他们将希特勒的巨型中空炸药包一个个地投入大炮炮垒之中。毒气喷到了下面的掩体，他们还用火焰喷射器对付其他炮阵和观察哨。伞兵增援部队上来了，经过地下坑道中一番惨烈的肉搏战，比利时人在中午举旗投降，1000名惊魂未定的守军排队举手而出。占据山顶炮阵之后，德国军队以强大火力逼使守桥的比利时军队不得不撤退出桥头阵地。

在战争前期，荷兰和比利时都曾不遗余力地保持自己的中立，妄想着只要安抚好希特勒，他就不再注意它们了。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它们是在痴心妄想：“只要它们喂好老虎，老虎就会最后才吃到它们。”两国都遭到了长期而野蛮的占领。在战争发生的两周前，一贯行事缜密的德国人曾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当时，有两名德国军官喝醉了，在驾机返国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在荷兰的领土上。其中一人是个信使，身上带着进攻两国的详尽计划。荷兰和比利时的高层指挥官都不相信这两个德国人的招供，觉得他们举止反常，怪里怪气，根本不可信。

希特勒还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创意，而且后来证明这一创意相当有效，就是在德国俯冲轰炸机上装配扩音器。斯图卡是一种令人生畏的轰炸机。那样式骇人、欧式机翼的容克87俯冲轰炸机，以双翼在450米空中飞行会突然依序脱落，在半旋时左翼急垂，在空中转到一半，便如箭一般脱空而下，直扑向目标，几乎是在垂直俯冲下来。但是，令守军在防空阵地上一下子骇僵、让他们陷入呆若木鸡的状态，让他们事后都觉得精神崩溃、不能控制的并非那排巨型炸弹，而是斯图卡那刺耳欲穿、撕心裂胆的死亡尖叫，那正是斯图卡的扩音器在俯冲时所发出的动静。到1940年6月，当斯图卡轰炸时，法国步兵只要一听到尖叫，就会抱头鼠窜，不顾一切地跑到最近的地沟里躲藏。

## 法国的撤退

在闪电战开始的数周之内，法国的大门完全被打开，那条一直宣称不可



攻破的马其诺防线不是被撕开，就是被绕过了。拥有200万人的法军在世人眼中军纪严整、训练有素，这时却被打得丢盔卸甲，全面溃败。年老体衰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充满失败情绪，绝望不已，这时已无心苦战。曾几何时，法国军队领导人享有“世界上最老谋深算军事思想家”的美名，法军指挥官们都饱读兵书，深谙战法。他们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迎战德军，最终以战平收场。

然而，严酷的战斗一打响，法国最高统帅部的僵硬战法，如死守防御炮阵、倚赖骑兵，还有它对坦克及机械化装甲车的厌恶，没能准备战略后备队，最后都造成了灾难性的惨败。在开阔的战场上，刺耳尖叫的斯图卡进行着俯冲轰炸，横扫一切，吓坏了法国步兵，然后豹式坦克又冲了过来，将他们辗为肉饼。撤退演变成了大灾难。法军坦克速度较慢，行程更短，还没有无线通讯设备。不过，一部分法军还是进行了殊死抵抗，苦苦对抗那排山倒海攻来的德军战车和飞机，最终还是被打败了。

### 敦刻尔克大撤退

现在说一说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此时，他们正受到德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已身处绝境。派到法国的英国皇家空军共有474架战机，此时已经损失了268架，因而无力为远征军提供保护。丘吉尔刚任首相还不到6周，现在要面对着一个空前的大灾难。英国现在已是孤军奋战，其大部分军事装备都丢弃在了法国，空军也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却面临着敌人的海空入侵。丘吉尔立刻认识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英国远征军的400 000名将士也必须撤退回来，因为他们是英国军队的精英，没有他们，保卫英国本土的机会就可能万劫不复地失去了。

远征军开始杀开一条血路，奔向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在法国最北端），后面有大批德军在追杀紧逼。沿路都是逃难的难民，还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士兵，那真是混乱的局面。部队完全被打散，军纪也不复存在。法军和英军的散兵游勇进行了多次抢劫。当他们接近海边，接近那可能撤退的港口敦刻尔克时，这群士兵已经有一部分被德国装甲兵的5个师包围，指挥德军的正是海茵茨·古德里安将军，德军就要将英国远征军分割围歼了。



在1940年5月24日黄昏时分，希特勒乘坐一辆大型黑色奔驰车，车篷打开。他身穿一件棕色夹克，下身是一条马裤。事先没有宣布，他突然抵达了B集团军司令哥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将军的指挥部。古德里安正是伦德施泰特的部下。希特勒进来之后，直奔地图室。指挥部里慌成了一团，因为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们在地图室里又是吸烟又是喝酒，而希特勒对这两者都不能容忍，尤其是前者。窗户被急忙打开了，但是元首看来正处于兴奋状态，心情极佳，可以原谅这些小事。一大堆军事顾问紧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地图室。

会议的备忘录提到，行事谨慎的伦德施泰特及其参谋们认为豹式坦克军团的补给线拉得过长，坦克在经过如此之长、如此之难的奔袭之后也急需保养。他们说眼下的地形有太多沼泽，很难通行。巴黎才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敦刻尔克。此外，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保证说，帝国空军可以在英军返国的途中，将他们绝大部分都歼灭。相比之下，古德里安一再坚决要求进行攻击。他说，这是一个一举消灭英军有生力量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再行进一天，他的坦克就可以将英军完全包围了。现在消灭他们很容易，放虎归山之后再打就很难了。

希特勒亲自作出了决定：停止进攻，不要缩紧包围圈，但是要继续用大炮对英军进行轰击，从空中进行轰炸，以达到骚扰英军撤退行动的目的。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出于政治考虑。有些历史学家相信，他可能是不想给他的普鲁士将军们获此奇功的机会，因为他与那些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还有人认为，是戈林说服了他，使他相信帝国空军从空中打击，可以更省钱、省力地消灭英国远征军。不管怎样，这个决定毫无疑问地成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策之一。如果远征军在法国被消灭，那么英伦岛国几乎就成了不设防之地，因为已经没有前线部队了。

350 000名英军和法军士兵挤在敦刻尔克港区，那地盘的周长还不到7英里。皇家海军只有41艘驱逐舰，于是求救信号发出了。英国人是一个靠海吃海的民族，于是，拉网渔船、火轮船、货物拖船、驳船、汽船，以及成千上万的游艇和摩托艇很快都驶来了。敦刻尔克港水位太浅，不能停靠大型运兵船，因而吃水浅的船就成了急需品。临时拼凑起来的船队就包括了这样一些



怪异的船只，如：长江炮船“蚊子”号、泰晤士河驳船“西班牙帆船”号、海峡渡船“坎特伯雷”号、岛间渡船“格蕾茜·菲尔兹”号、大汽艇“吸血鬼公爵”号，还有曾挑战美洲杯的帆船“奋进”号。甚至那100岁的敞口帆船“水果布丁”号都运了好几趟兵员。那些民船的船长都是业余划艇爱好者，有些年事已高。据统计，共有900艘各类船只参与了这场大撤退运兵行动，其中，有243只船被击沉，或被摧毁了。

英国远征军抵达敦刻尔克时，全城已是一片火海，而随着远征军接近城市，空中的俯冲轰炸机不停地对他们进行狂轰滥炸。城市上空盖着厚厚的烟云，海滩本身也满是烧毁的车辆，还有尸体，一片狼藉。今天，我们再看当时的照片时，可以看到无数筋疲力尽的人排成长蛇般的大队——一直从遥远的码头排到海滩——等着被救走。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显示着战士们涉入齐胸高的水中奔向船只，而那些船早已人满为患。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出一个港口，水面泊着各式各样的船，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四烟囱驱逐舰，还有古董式的水轮驱动船“印度女皇”号。

到了第二天和第三天，载人的船只有许多被击沉，它们堵住了港口。水轮驱动船“鹰冠”号被斯图卡击中，着了火，船上的600人差不多全死了，待船烧毁后，那只船的残片才漂到了海滩上。驱逐舰“手榴弹”号载满部队，也被斯图卡炸坏，把港口堵了好长时间。一艘救生船，尽管上面飘着红十字旗帜，也被斯图卡俯冲轰炸了，就在港口外爆炸沉底。死者和伤者都顺水漂流，冲到了滩上。英国皇家空军这时实力大损，面对情势却无能为力，所以，帝国空军几乎掌握了全部的制空权。英国远征军一回到祖国，就拼命咒骂英国皇家空军。

穿越英吉利海峡之旅并非郊游一般轻松。德国人有长射程大炮，一旦把港口清空，就开始炮击英国舰船了。空中袭击也在继续着。由于害怕英国皇家海军，德国人没有派出战舰，可是，如果他们知道英国的驱逐舰都装满了士兵，根本不可能转运火炮进行攻击，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黑夜、浓雾和还算恶劣的天气都帮助了英军渡海逃生，最后，有338 226名战斗人员从敦刻尔克获救，其中有123 000名战斗人员是法国人。



## “我们要血战到底”

但是，正如丘吉尔在1940年告诉英国国会的那样：“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要把这次行动（指敦刻尔克）理解为一次胜利。战争是不能靠撤退来取胜的。”接着，他就发表了自己最伟大的战争演说之一：

虽然欧洲大部分地区，还有一些古老而著名的国家已经陷落，或行将落入统治阶层以及所有纳粹统治的可憎魔掌中，我们还是不能举旗认输，不能失败。

我们将血战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作战，我们将以与日俱增的信心、与日俱增的空中力量作战，我们将保卫自己的海岛，不管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要在海滩作战，我们要在登陆地作战，我们要在田野和街道作战，我们要在山中作战，我们永远也不会投降。

虽然我一秒钟也不相信，但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个岛国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将被征服，人民被饿死，我们的帝国还有海外领地，在不列颠舰队的武装护卫下，还将继续进行战斗，直到当上帝大开金眼之时，新世界会以全部神力轰然出现，救我们于水火之中，解放整个旧世界。

当他演讲结束时，下议院的全体议员听得激情勃发，热血沸腾，全体起立，给予他疯狂地鼓掌欢呼。他那伊丽莎白式的修辞，那雄辩有力的动静，穿越时空，至今仍在人们的耳畔回响。然而，几周之后法国就投降了。18个月之后，也就是到1942年春天的时候，他所钟爱无比的大英帝国也快要灭亡了。

## 轻而易举的占领

德国人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战略战术，就是以豹式坦克进行冲锋，以机

械化部队保护侧翼。还从未有人见识过这样的战术。大撤退变成了一场大逃难。法国老百姓赶着马车，推着人力车，成群结队地逃离战火、屠杀，沿路哭声直冲云霄。与此同时，德国装甲师团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开阔的乡间地区，直逼巴黎，鲜有抵抗。一批批的法军战俘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列队而行，这些战俘个个面目沉郁，然而又不得不服从听命，许多人扛着长枪，那都是德军在战场上拾到的，都已经被坦克碾断了。

美国和英国的使馆官员都相信，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法国领导人产生了有害影响的是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情妇德·波尔蒂伯爵夫人。那个女人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像200年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巴度夫人那样从自己的闺房里发号施令，统治法国。有一个时期，看上去她果然已经在统治法国了。美国驻法国使馆的H·弗里曼·马修斯后来对作者说，在那段最为性命攸关的日子里，有一天他去拜访法国总理，结果发现那位总理在别的房间里“休息着呢”，而伯爵夫人正坐在总理的办公桌后，身边“围着一大群将军和官员，她在那里不停地说话，吩咐人们做这做那”。她本人崇拜希特勒，相信德国会统治欧洲和法国达几个世纪之久。她赞成立即投降，认为接下来雷诺会被德国人任命为殖民地的总理，而她则是雷诺的总理。

丘吉尔虽然对伯爵夫人不置一词，但是，在他所写的《他们最好的时光》一书中，专写一章“关于法兰西之战”，在那里特意以极轻薄的语气评价了法国领导人。他对法国领导人的消极心态与失败主义情绪感到极为惊愕。连德国最高统帅部都不敢相信他们的胜利来得如此容易，但是，他们毫不容情，抓紧时机进行残杀，在这块法国人让出的长达60英里的防线缺口处投入了所有可投入的战车，10天之内就推进到了法国腹地，推进的距离之远，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皇帝用四年时间才达到的距离。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报告说，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希特勒简直“欣喜若狂”。这当然毫不奇怪，正是他那大胆的战略计划粉碎了盟军的有生力量，消灭了法国的百万大军。

## 伦敦股市大崩盘

此时，伦敦股市正跌到1932年以来的熊市最低点。要了解伦敦股市及其



跌幅有多大，我们必须对1940年夏天那绝望无比的情境有所认识。德国军队随时都可能在下一个无月之夜，从海上或空中发起渡海入侵，英国人民虽然坚强不屈，但他们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纳粹征服了欧洲感到惊骇无比。他们观看新闻纪录片，看到众多坦克、机动炮、卡车，还有神气十足的德军突击队迈着正步，走过巴黎的大街，而他们的头顶上还有巨大的黑色轰炸机、运输机震耳欲聋地飞来，轰炸机的机身涂着德意志的万字符。然后，他们又看到这样的画面，里面有一群群的难民盯着自己家园的残垣败瓦。悲观主义者预测说，英国很快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1940年6月初，股市创低之所以令人骇然，是因为它是在悲观主义在英国已处上风的时候到来的。尽管是丘吉尔，这时候也有点儿悲情难抑了。虽然他顽强不屈、目标坚定，但是他演说的语气变得务实了，有时还有一点悲观的味道。丘吉尔对下议院发出警告，声称德军可能用伞兵登陆，又说“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严格的措施”来防范外国人、“面目可疑者”，甚至是英国公民。6月1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时，丘吉尔警告“从法国来的消息相当糟糕”，并谈到了“最近两周以来所发生的军事惨败”。第二天，他在下议院描述了在法国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军事变动”。7月4日，他向下议院通报了法国舰队的毁灭，并警告说，任何军官或政府官员“只要被发现有意扰乱军心，或造成负面影响，只要引发恐慌和绝望情绪”，就要被清查出来，立即解职。这些演说尽管富有戏剧性和煽动性，却无力使股市得到反弹。

### 柏林股市一路攀升

整个5月，随着德国军队横扫欧洲，柏林股票市场一路上行。接下来，到了5月末，也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日子里，股市有一个短暂而强劲的调整。1940年5月30日，《纽约时报》刊出了占到三栏的大字标题：

盟军放弃佛兰德斯、泄洪耶希尔地区；敦刻尔克展开舰船大营救；里尔失陷，一支部队被隔离在海上。



在这行大标题下是字号稍小的一行标题，这样写道：柏林交易所陷入低迷，因为乐观情绪正在冷却。那篇报道声称：“由于一直有人在警告，不要因为德国在西方的胜利而过于乐观，市场显然对此作出了反应，柏林股票指数今天突然急转直下。莱茵地区的运输与冶金企业股价成为当日最大输家，跌幅达5%。”这种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不管怎么看，敦刻尔克都是德国对英作战的最大胜算。

人们一直是这样进行推断的：希特勒没有派自己的装甲兵团去对付已处于困境的英国远征军，是他所犯下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然而，还有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希特勒之所以没有赶尽杀绝，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必须消灭，因此希望能与英国单独讲和，并结为联盟。如果那真能成真，德国就只需单线作战，到1941年就可以摧毁苏联了。那时，富饶的东欧“黑色绶带”，乌克兰和苏联西部地区就会成为“德国的印度”加以占领，以帝国方式对其进行剥削。无可争辩，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史就会完全改写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英国会保护自己的帝国。

## 不列颠战役

再看一看伦敦的情况。丘吉尔对法国那种全国性的消极心态和不抵抗行为感到震惊。他对英国人民的坚强不屈和爱国情怀则深信不疑。为了驾驭这种精神，他还呼吁人们成为志愿者，加入新创的自卫军，名为“国家警卫队”，征兵广告看上去就很吓人：“干掉一个就够本了！”50多万名老迈不堪、体能很差的人立刻应声而出，加入了进来，一开始，他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短枪、手枪、猎枪，还有长矛和棒子”。家庭主妇们也把干草叉子放到手边，随时就可抄起。最终，国家警卫队达到了150万人，每人都发了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美制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人们跑到海滩去修碉堡，挖反坦克地沟。在丘吉尔激情演说的鼓舞下，英国人民空前地团结，决心战斗到底。

纳粹党旗飘扬在埃菲尔铁塔顶端，欧洲已经基本拿下，现在，希特勒开始考虑与英国联合，但条件是英国得承认德国对欧洲的统治，还有，英属的



一些海外领土也需划归德国所有。他赞赏不列颠民族，明白如果进行入侵的话，要旷日持久，血流成河，因此用他的话来说“互相理解一下”，如果这样，德国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其他国家”。现在回顾那段历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时希特勒相信（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人也相信）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他希望英国成为自己的同盟，至少是保持中立。就在那个时候，他否决了约德尔对伦敦进行恐怖轰炸的提议，而戈培尔在与希特勒会见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是元首不想毁掉那个帝国。”6月中旬，他授权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去跟英国人接触。

在战时五人内阁的绝密会议上，得到张伯伦支持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认为，英国应该考虑一下这个提议。眼下，政府中有许多人已经厌倦了丘吉尔的激情洋溢、浪漫感言和恫吓之论，他们争辩说（至少张伯伦是这样说的）应该考虑一下那些条款，虽然那些条款“是令人沮丧的，但是却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独立”。实际上，那就是一种投降。约翰·卢卡克斯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

丘吉尔气得暴跳如雷。“任何民族，只要它坚持战斗，即使失败了，早晚有一天也会重新站起来。而那些乖乖投降的民族就彻底完了。”英国宁可战败，也绝不会与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进行谈判。会议之后，他立即对全体25名内阁成员发表讲话，显得斗志激昂，怒火中烧。所有成员都集合在他的麾下。不会有谈判，不会有投降。所有这些谈话都是绝密的，但是，英国股市却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一次爆发了狂跌，跌到了历史的最低值。

英国的冰冷反应，使希特勒发令马上制订海狮作战计划，就是要进行两栖和伞兵作战，对英国大举入侵。由于天气原因，这一计划必须在9月15日之前施行。纽伦堡档案记录有希特勒所发布的指令：“由于英国不顾其军队的绝望情势，一直拒不进行任何妥协，因此我决定马上准备，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执行入侵计划。”他继续说：这一入侵战役会极为艰险，因为“一个作好防御、万众一心的敌人正在那里等着痛击我们，他们控制着那片我们不得不利用的大海”。希特勒至少在1940年的“对决阶段”，还是相当务实的。

不过，德国人的趾高气扬达到了顶峰。6月21日是一个怡人夏日，阳光普照，贡比涅森林的优雅榆树、橡树和松树婆娑轻摆，投下片片树荫。就是



在这片树林里，德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签署投降书。今天，全体德国领导层都到齐了，挂满奖章，全副绶带，穿着华丽庄重的制服。现在，他们踏上一节古老的火车车厢。希特勒坐在一把椅子上，当年，费尔南德·费希元帅曾在这里羞辱德国皇帝的将军们。希特勒接受了法国的投降，兴奋不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人在德国后背上捅的那一刀，多少年来一直让他衔恨不已，现在，大仇终于得报了。投降书的条款相当严酷。别的不说，单一条就可以了：任何法国人只要为任何别国打仗，就被视为叛国，立刻就地枪决。

现在，德国人的头脑已发烧过热，狂想不已，对他们来说，天下已经无事不能办成了。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都已表示要永远对德国效忠。埃及的阿加汗和克迪夫都表示要到温莎堡去跟希特勒共饮香槟，庆祝胜利。后者还提议自己担任印度的统治者。然而，希特勒认识到，必须认真地对付英国了，于是开始对入侵计划进行全盘考虑。他的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野心勃勃，一直在追求获得更大的权势，这时对希特勒保证说，他可以消灭英国皇家空军，建立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德国人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登陆舰编队，开始演练进行广阔战线的两栖登陆战。第一波共有9万人冲锋，第二天，就会有260 000人登上英伦海滩。

然而，从一开始德国海军就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害怕英国舰队的数量优势，还有英国人的舰炮火力。除非可以得到保证，在“白天得到绝对的制空权”，否则他们不敢承担这样的任务。希特勒深知，没有制空权，渡海作战的舰队不堪一击。戈林保证说他会及时消灭英国皇家海军的，如果真是如此，在9月之前就可以进行入侵了。好像没人注意他先前吹嘘的话：他的帝国空军飞机可以阻止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逃生。普鲁士总参谋部对两栖作战行动感到不太对劲儿，但是，希特勒已经证明过他们曾一错再错，所以这一次他们只好乖乖地闭嘴了。

这样，“不列颠战役”就开始了。德国人的空中战役代号为“雄鹰突击”，计划在1940年7月10日发起攻击，首先要对舰船进行密集轰炸，同时要集中轰炸南部港口城市，削弱其防御能力，因为那里是入侵的第一批目标，按此方法，将皇家空军引诱出来，投入战斗。然后，从8月24日~9月27日要



扩大进攻的规模，对伦敦进行大规模密集轰炸，为入侵本身作准备。经过11周的空战，皇家空军就被消灭了，从而建立起绝对的帝国空中优势。这一计算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在1940年7月，德国人可以投入大约2 000架飞机，而英国人能投入的只有700~800架飞机。

结果是，后来有一段时间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有那么几天，上千架德国飞机投入战斗，三四百架轰炸机进行轰炸，还有更多的攻击机狂扫猛射，它们同时出现在英国上空！8月15日，一场空中大战在面积不足500英里的地区上空开始了。许多驾驶烈火式和旋风式战机的英国飞行员在那一天里飞了三个班次。德军飞机被击落76架，英国损失了34架烈火式战机。但是，德国拥有强大的空军飞行员后备队，而英国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飞行员来补充损失。

从另一个方面看，与在自家空中作战的皇家空军相比，帝国空军有几个致命弱点。德国战斗机所携燃油只够它飞90分钟，其中70分钟是来回飞行所需的。那就是说，在英国空中过了20分钟以后，它们必须撤出战斗，否则就要油料耗尽，在返回途中坠入英吉利海峡了。由于这种半径限制，德国飞机最远只能飞到英国南翼和伦敦地区。英国的其他地区相对安全，因为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随时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如果一架德国飞机被击落或击伤，飞行员只能在英国上空跳机逃生，因而最终都要被捕获。一架烈火式飞机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则飞行员第二天仍能升空战斗。如果他驾着受伤飞机迫降，飞机最终也能得救。

到了9月中旬，皇家空军已经损失了1/4的飞行员和飞机，地面机场和后勤保障设施则受到了更大的损失。5座机场完全被摧毁，而全部空中指挥网络也陷于崩溃边缘。在8月23日到9月6日至为关键的两周里，皇家空军的伤亡是466架战机被击落或受伤，德国的损失是385架，其中138架是轰炸机。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缺员如此严重，后来连从未参战的飞行员也给征来了，他们从空军训练学校直接调来，训练课程还没有结束，就被直接塞进了驾驶舱。丘吉尔在自己的笔记中承认，这样的情况再继续几星期的话，皇家空军就彻底失败了。到9月底时，一位不知姓名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把W·H·叶芝的一首诗带进了备战室，那诗的题目是《爱尔兰飞人可以先见死神》，“它就在



云层的某一个地方”，在我们搏杀的上空一个所在，我们在跟自己不恨的人拼命，为了自己不爱的人舍生。

那两个星期之所以如此至关重要，就是因为双方都知道9月8日~9月10日，英国东南沿海的月光和潮汐对两栖登陆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丘吉尔在9月6号对全体英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告诉他们：“我们必须把下周或其后的某一时间，看做英国历史上最生死攸关的时刻，其重要性可以跟历史上的这样几个时刻相比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却刚打完他的滚木游戏；或者拿破仑在布洛涅的百万大军战败之时。”希特勒在9月14日的广播讲话中回答道：“如果在英国的人们问：‘为什么他还不来呀？’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再费神了。他来了。”

事情的真相是，德国军事参谋知道，他们还没有建立起空中优势，也知道只要没有这种优势，他们就不会过来。那个不可捉摸的戈林在9月10日突然改变战术，开始对伦敦进行夜间轰炸。整整10个夜晚，帝国空军对伦敦的船坞和火车站，炸死许多平民。皇家空军没有准备好夜战，所以德国轰炸机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而，德军的这一行动反而给皇家空军一个它最需要的喘息之机，在德军空军耀武扬威的同时，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可以好好休息，飞机可以保养一下了。有些专家带着“事后诸葛亮”的大智慧分析道：由于戈林放弃了战略进攻的第一准则，没有充分发挥昼夜空战的优势，因而再没有机会取得白昼空中优势，而没有这种优势，德军就再也没有侵占英国的大好机会。

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当时，也就是在9月10日，戈林和希特勒都已经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发动一次成功的入侵，于是，他们只好改变策略。也许，那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德国特种兵顶得上两三个英国或法国士兵。日耳曼人是天生的武士，德国士兵平均来说更有素质，更擅长打仗，而且身体体能也比其他民族都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士气无比高昂。但是在英国的土地上，入侵部队要遭到奋勇当先的广大英国人民的反抗，要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血海之中。

我们研究一番第三帝国空军的档案就会发现，英国皇家空军当时给德国空军造成的损失极为巨大，所以，即使德军白天也连续轰炸，可能仍不能建



立起自己的空国优势来。7月10日~10月31日，也就是不列颠战役期间，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915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是1733架。

## 伦敦大轰炸

1940年9月末，希特勒决定把入侵计划推迟到1941年春天。现在，德国人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伦敦轰炸上，想以此摧毁伦敦人的精神，至少要把那里变成一座空城。从那时起，一直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轰炸机攻击伦敦。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在夜间用战斗机去拦截敌军轰炸机，所以，英国皇家空军几乎是束手无策，而英国防空炮火只是朝天上乱开炮，声音很响，效果很差。例如，在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中，437架德国亨克111型轰炸机投下了45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但是，只有一架飞机被打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英国的防空技术与夜战战术得到发展，而在当初，伦敦简直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受到了重创。

人们失去了家园，工厂倒闭，后来这些都引出了巨额赔偿的问题。儿童无家可归，被送出城市，到较为安全的乡村去生活。与此同时，城市复杂的下水系统被摧毁了，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晤士河，极大地威胁了饮水卫生。伦敦居民几乎每晚都要挤在阴冷潮湿的地铁通道里，几乎无法睡觉，更容易感染瘟疫。1940年10月，有人进行过调查，发现只有15%的伦敦人每晚的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22%的人的睡眠时间为4~6个小时，32%的人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而高达31%的人则基本上完全不能睡觉。

在地铁通道里，生活条件是那样可怕，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为什么每天晚上只有不到1/2的伦敦人会钻进地下。地铁站的卫生间本来是为少数人设计的，很快就问题百出，臭气熏天了。通道里蚊子成堆，老鼠成群。不管怎样，黄昏一到，空袭警报一响，人们还是带着吃的、喝的，夹着毯子和婴儿，蜂拥而下，来到了站台上。地铁列车仍然在行驶，一直行驶到半夜，所以，旅客不得不在睡得横七竖八的避难者身体上跨过。有一个叫罗丝玛丽·布拉克的女人，在一个晚上乘地铁旅行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看到地铁里的情形，我简直被吓坏了。无论是地铁还是通道站台，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角落，都挤着一堆堆佝偻着身子睡觉的人们，我真是惊讶莫名，难以表达。那些饱受苦难的人们睡觉时显现出的那种惨状，就好像他们是一堆装在罐头盒里的蚯蚓一样，热腾腾，臭烘烘，脏兮兮，受伤的婴儿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哭，还有一脸菜色的女人紧搂着自己的孩子在喂奶，那些睡着的孩子们在梦中四肢抽动，嚶嚶泣诉……我的天啊，如果我要折磨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想不出比这里更可怕的地狱了。

可是，地铁通道这样的地方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1940年10月14日，一颗炸弹紧挨着巴尔海姆地铁站爆炸了，炸毁了站台上方的管道系统。就在那个地铁站里，有600人正在躲避空袭。结果电灯灭了，自来水、污水，还有煤气都一拥而入。人们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虽然有350人逃了出去，还是有250人被淹死在那汹涌澎湃的污水中。另外一次夜袭时，一位老妇人失足在台阶上跌倒，结果后面的人都倒在了她的身上，再后面的人就从他们身上踩过。那一夜，共有250人丧命，有的被踩死了，有的被闷死了。

然而，随着1940年过去，1941年到来，空袭在继续，伦敦人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有些家庭在地铁站里有了固定的角落，邻里关系也发展起来了。地铁音乐会开起来了，说唱团也开始演出了。人们都熟络起来，还一起吃吃喝喝。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发展起来了。在阿尔德维治，有时候明星们完成夜场演出后，也要赶到地铁演出中心凑热闹，客串一下。说起来很难相信，当伦敦轰炸结束后，还有许多人因为怀念那些地铁站狂欢会，继续睡在地铁站台上。

不管怎样，大轰炸破坏了这个城市的正常生活。在空袭时去上班，那简直是一场绝望的磨难。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的人们还能正常工作吗？在这年的年末，德国空军引进了一种更可怕的新式武器，那就是降落伞地雷。它装满高爆炸药，有2.4米长，0.6米宽，重达2.5吨。有些地雷还要延迟爆炸，所以必须先把它找到，认出，再挖走，而那一块土地再不能住人了。有些地雷完全就是饵雷，要拆除它们危险性就更大了。有一个还未爆炸的降落



伞雷就挂在树上，降落伞随着微风舞动，而这个可怕的地雷距离一座最大的燃气库几乎近在咫尺。还有一颗雷落了下来，挂在了亨格福特大桥上，那桥横跨泰晤士河。随后还要投下大量的燃烧弹，造成更大的恐慌。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讲的那句话：“我们伦敦受得了。”

不幸的是，大轰炸还有一些令人发指的副作用，就是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城市里。受到轰炸的房屋遭到了洗劫，盗窃案明显增多，小偷小摸更是到处都是，1939~1942年期间，仅在伦敦和威尔士地区，凶杀案发生的比例就增加了22%。战争解开了城市的法律之锁，富人们损失惨重，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家里，贵重物品经常不翼而飞。有钱人要么就得死死地用手抓牢自己的东西，要么就得把细软之物藏到小偷不可能偷走的地方。显然，珠宝和银器比古董家具更易隐藏。小偷们对名画和雕塑不太感兴趣，因为运输太难，但是在另一个方面，那些东西也容易在轰炸中损毁。有一位年高财广的老太太对我说过，她“在4年里一直跟自己的珠宝睡觉，而不是丈夫。英国大不如前了。”

大轰炸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大批妇孺被转移到乡下，结果，中年男女的离婚率一时间激增。

此外，大批美军于1942年来到英国，带来了雪茄烟和尼龙袜，结果刺激了黑市的大发展，让一批人因而致富——一批不该致富的人。这样一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流行于欧洲的两种模式，就是在英国开了先河。珠宝最易携带，广为流通，是最好保护财产的一种形式，而在战争期间致富的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黑市发生某种联系。

## 一片生机的伦敦股市

到1940年年底，伦敦已经四面楚歌，然而，伦敦股市却呈现一片生机。正如第三章中我们在图3-3所显示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看上去多少得到了些许恢复，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路飙升，到了1936年年底，已经比其1932年的低值下跌了三倍。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超过1929年最高值的股市。请注意那一组双高线。接下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它



又开始走低，到了1940年1月，竟比1937年高值跌损了40%。1940年上半年的走势是一路狂跌，直到1932年的低点。最低值出现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不列颠战役也随即展开，伦敦上空响彻敌机的刺耳之声。在其后的不列颠战役和伦敦大轰炸的声浪中，股价开始反弹了。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当时在8月份倍感忧虑，然而股市的探底却要早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因为一个大熊市要探底，就必须有一个“最大的熊市低点”。最新消息没必要是好消息，只要不比以前的消息更糟就可以了。在1940年5~6月，伦敦的大多数股票都打了2~4折抛售，而有些神经崩溃的悲观主义者已经是给钱就卖了。事实上，这时买股票已经被看做一个标尺，看看对英国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整个国家已经投入战争，正如丘吉尔在那本《危难时刻》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英国人民的精神已经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在《战地记事宝库》一书中，有5位记者，即罗伯特·本奈尔、海伦·柯克帕特里克、爱德华·R·莫罗、罗伯特·凯西，以及S·N·伯尔曼，都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在伦敦和整个英国所充溢的那种气氛。那是一个饱受阶级斗争之苦的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敌人轰炸和大举入侵的危险，使人民义愤填膺，忘记了阶级斗争和自家的不幸。他们这时不再管什么苦难，每个人都渴望投入战斗。共同的敌人是德国人，无论男女，都想为保卫祖国而献身。那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在《他们最好的时光》一书中，丘吉尔有一次去多佛附近的防御工事视察时的见闻。战地指挥官告诉他，他只有3门反坦克炮，却要守护长达4英里的海滩以防敌登陆。而且，每门炮的炮弹只有6枚。他问丘吉尔能否同意让他手下的人各打一枚试一试，这样他们至少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武器。丘吉尔告诉他，他们“没有多余的炮弹来练习，手中的炮火也要引而不发，只等到最后关头，在敌人迫逼到眼皮底下再开火”。英国人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祖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现在只能关心一件事：为了保卫这个岛国不惜一切代价。国民警卫队还研发出了一种炸弹，可以粘到德国坦克上。当初设计时，他们设想的是自己可以跑到敌人坦克前把炸弹投出，让它粘到坦克车上，哪怕因为距离太近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怕。



## 大西洋战役

1940年7月~1941年7月，另一场生死存亡之战，即大西洋战役展开了。英国人明白，如果他们的补给线被切断，那这个岛国再也无法打赢这场消耗战。丘吉尔后来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最让我感到寝食难安的就是德国U型潜艇的可怕。我们的生命线，不论是在广阔的大洋里，还是在我们的家门口，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德国人动用了U型号潜艇、水面攻击舰和亨克尔111轰炸机，全面袭击运输船。在1940年9月22日前的那一周时间里，共有27艘运输船被击沉，载重量共达160 000吨。数周之后，一群U型潜艇对运输船队展开大屠杀，两天之内，34艘船的运输队损失惨重，共有20艘船葬身海底。尼古拉斯·蒙赛拉蒂的小说《沧海无情》，对英国与U型潜艇的苦战作了精彩的描写，让我们能感到北海的寒水大浪，仿佛置身于血腥的海战之中。在冬季的北大西洋，一个人如果掉进海里，两分钟就会被冻僵。

1940年10月，6艘德国军舰分赴北大西洋，开始对运输补给船队发起进攻。英国的护卫舰由普通驱逐舰和运输船改装的炮舰组成，那种改装船上配有6英寸口径炮，还有皇家海军官兵。但是，那样的船只无法与德国巡洋舰的强大火力相匹敌。在一次戏剧性的战斗中，德国小型战舰“夏伊勒”号向37艘船组成的运输大队发起攻击，当时护航的是武装商船“耶尔维斯海湾”号。“耶尔维斯海湾”号的船长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无法跟敌人强大的火力相比拼，但是他转念决定，必须拼命出击，攻击敌舰，能打多久就打多久，这样才可以让运输船队在渐渐来临的夜色中分散开来。他高高地举起宣战旗，全速向强大的敌舰冲去。“夏伊勒”号在1 800码之外就开了火，用它14英寸的大炮猛轰不止，而这时那艘装备了6英寸小炮的“耶尔维斯海湾”号根本没进入射程。

“耶尔维斯海湾”号“气喘吁吁”，全力攻杀还真起了一些作用。在这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战斗中，那庞大的“夏伊勒”号不得不扭转船身，好几次闪避冲过来的鱼雷。在这个间隙，那些运输船朝四面八方奔逃而去。夜幕降临之后，“耶尔维斯海湾”号全身着火，完全失控，可是它还坚持战斗，不停地开炮，直到晚上8点，它终于沉入海底，船上的那面战旗一直在飘扬。

200多名官兵，包括船长本人（他后来被迫授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都随着这艘船葬身大海。现在，“夏伊勒”号转而攻击那些商船了，好多船只已经在大风之夜逃出老远。“夏伊勒”号追了上去，击沉了4艘船。后来它是担心自己的位置暴露，于是撤出了战斗，逃往南大西洋。

## 英国的使命感

战后人们发现了一些文件，在文件中，德国人曾制订了占领英国的一系列计划。1940年9月9号，德军总参谋长签署了一条指令，指令中说：“英国身心健全、年龄在17~45岁的男子都要……被拘押起来，送到欧洲大陆。”在英国投降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如果有任何人还未缴出武器和收音机，都要像对待反抗者一样，立即枪决。要扣押一大批人当人质。统治政府由党卫军和国家秘密警察来组成。那将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占领。在那种情况下，英国的财富，多少代人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将要被没收或完全毁掉。对证券资产，待遇也不会怎么好。

空袭也好，U型潜艇战也好，都没有摧毁英国人民的意志。丘吉尔记述过一个小插曲，可以生动地表现出英国人民的那种意志坚定、决心如铁，同时又极富使命感的心情。一名少尉对忧心忡忡的上司说：“长官，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一场决赛啊，而且，是在咱们的主场开战。”

然而，正如下一章要描述的那样，在好些年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要忍受，还有更多的牺牲要承担，同时也有极为激动人心的故事，极为感人至深的情节将要发生。







## 第五章 英国的黑暗岁月

1941年，对于英国来说又是一个危难重重的年头。它能否存活下来，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新年来临之际，股市在前一年所产生的升值又破灭了。1941年的冬天十分难熬，伦敦人正在德军空袭和U潜艇封锁中痛苦挣扎。除此之外，这一年的1月和2月格外阴冷潮湿，在一个缺煤少食的国度里，许许多多房屋被炸毁，现在上天在痛苦的伤口上又狠狠地洒了一把盐。

有时这让人难以理解：当自己的本土面临着毁家亡国的决定性时刻，英国还能派军队去非洲，这就等于英国是在两条战线作战。1月时，英国士气大涨，因为他们听到了对意大利作战获胜的消息，英军在巴尔迪亚和图卜鲁格的沙漠中大胜意军，擒敌70 000人。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对意大利的作战又频传捷报，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把意大利军队打得望风而逃。



这时的英军和印度军人表现得相当勇敢，而他们的对手又不堪一击。到了4月，超过220 000人的意大利士兵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这样一来，墨索里尼（他本人曾发表过一句名言，说他“要创造历史，而不是接受历史”）想学他的古罗马帝国祖先那样，通过征服和殖民来建立非洲大帝国的梦想就灰飞烟灭了。顺理成章地，阿比尼西亚（即后来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又恢复了皇位。

丘吉尔对这些胜利并没有大喜过望，因为他本来对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就不屑一顾。早在一年前，当他听说意大利人加入德国一方投入战争时，就这样说：“是吗？那也公平，上回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不过，现在他开始担心德国人会拉墨索里尼一把，把他从非洲的失败中解救出来。“墨索里尼这条丧家犬，为了讨好他的主子，保住自己的命，正把整个意大利变成希特勒帝国的附属国，现在绕着德国老虎的屁股欢蹦乱跳，汪汪乱叫，不光是为了讨一点零食吃——那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为了做出一点成绩来。”

在此期间，英国情报部门相信，希特勒正在计划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他会不会不避过海上的风险，强渡海峡入侵英国呢？或者选择一些防御性不是那么好的地方进行征服，朝东或南方扩张，指向希腊、巴尔干甚至是北非呢？在那时，英国情报部门完全没有想到德国人可能会对苏联发动进攻。

到1月末，温代尔·维尔基——这个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现在来英国面见丘吉尔。他带来了一封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在信中，罗斯福总统引用了朗费罗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英国首相：

亲爱的丘吉尔，

温代尔·维尔基会把这个带给你。他是真心帮忙，让我们干些实事儿的。我想这对你的人民适用，就像对我的人民适用一样：

啊，扬帆直航吧，祖国之舟，

啊，扬帆怒航吧，联盟之舫！

多么伟大，多么辉煌，

你乘风破浪，开场拓疆，

令人民狂欢，敌人胆丧！  
看美好时光就要来到，  
看壮丽梦想正在路上！

## 德国U型潜艇对阵英国皇家海军

这时候，为保卫英国生命补给线，大西洋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皇家海军奋战U型潜艇，损失也日益惨重。德国人有小型战列舰，也有重型驱逐舰，而老旧残破的皇家海军无论在哪方面都无法与德国人抗衡。然而，皇家海军却有大型战列舰，远胜德军，因而德国人一直不敢与皇家海军进行决战。于是，他们用自己速度极快、火力超强的军舰组成水面攻击阵列，迫使皇家海军投入极大精力为运输船队护航。

在这一阶段，U型潜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为皇家海军的潜艇无论战术还是声呐系统都处于陈旧不堪的状态。德国潜艇由一群海军精英操控，他们每次航行归来，都要给自己放个长假，到旅游胜地去彻底放松，大喝美酒，欢歌笑语，到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德军的士气无比高涨。不仅如此，U型潜艇这时开始运用“狼群战术”，那是U型潜艇部队的总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所发明的战术，他本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指挥官。这一战术后来经过U-47潜艇的船长龚特尔·普里安发扬光大，终于成为一种具有威力的战术。

那个普里安船长生性残忍，精明过人，鼓励其他潜艇船长都跟着他学，在夜里浮出水面，跟踪商船运输队，然而抓住机会从各个角度展开攻击。普里安和另外好多潜艇船长都获得了无坚不摧的美名，他们的潜艇也得到了“幸运船”的称号。然而在3月底，普里安的潜艇被击沉了，同时葬身海底的还有他的所有船员。一星期之后，U-99和U-100两艘潜艇——曾几何时，他们的船长也都像普里安一样赫赫有名——怎么也没想到会在水面上突然遭到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的攻击，一阵重炮之下，便都折戟沉沙，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那以后，U型潜艇的指挥官们再不敢那么狂傲了，而随着有经验的潜艇指挥官人数的日益减少，德军潜艇战人员的素质一天比一天下降了。



## 轰炸下的伦敦

接下来，随着春天的到来，对伦敦的空袭又开始了。1~2月，德国空军被糟糕的冬日天气弄得焦头烂额，但是随着能见度的提高，他们不但加强了对伦敦的轰炸，而且把轰炸目标推到了英国全境。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损失，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生活，破坏了备战计划，同时也毁掉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德国人把工厂作为主要轰炸目标，因此许多家族企业被破坏，他们于是不得不关闭企业，即使不关，工厂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从长远观点看，企业的损失最终会得到政府赔偿，然而那些补偿根本不足以使企业恢复到原先的生产水平。企业主们抱恨不已，说德国人毁了他们的生意，而生意即使在大萧条时代也没有被毁掉。事实上，人们的财富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德国人完全不能理解，当他们把战火烧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时，那里的人们却空前团结起来，决心抗战到底，保卫家园。丘吉尔不停地到战火燃烧的城市去视察，有一次，他到刚刚遭受猛烈轰炸的城市布里斯托尔视察时，对那里的情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一处避难所，有几个老太太坐在那里，她们的房子刚刚被炸毁，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状态，看着她们的样子，那是何等伤心欲绝的情景啊。当我走进去时，她们却擦干了脸上的泪水，狂热地为王室与祖国而欢呼。”

1941年5月10日，伦敦遭到了一场激烈轰炸，燃烧弹把整个城市投入火海中。这是德国人第一次用燃烧弹进行轰炸，第一次用这样的恐怖方式对付一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这也让两个本来是人类最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们现在投入了殊死搏斗之中。那次轰炸引发了2 000场大火，5座造船厂以及许多工厂被夷为平地。具有历史价值的下议院被炸毁了。伦敦供水系统也被摧毁了，所以，当大火烧起时，人们找不到水去灭火，人员伤亡极为惨重。这是对伦敦最激烈的一次轰炸，也是1941年的最后一次大空袭。

## 狂热的疯子

1941年5月10日，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第三帝国的副元首纳



粹党领袖鲁道夫·海斯偷偷行动了，以自己异想天开的方式乘飞机前往英国，跳伞降到了自己的一个老熟人汉密尔顿公爵的庄园里。海斯在飞走之前，给希特勒留下了一封信，要呈给元首，在信中他说自己要前往英国，会商和平。然后，他亲自驾驶一架偷来的ME188战斗机，飞越英吉利海峡，飞到了苏格兰，被一个苏格兰农夫给抓住了。当希特勒收到那封信时，不禁勃然大怒，立刻把替海斯送信的副官逮捕，很快就判他犯了叛国罪。海斯的占星家和算命师都遭逮捕。由于英国人没有公布海斯抵英的信息，德国人就宣布副元首私自驾机出游，已经失踪，可定为死亡。

这样一来，德国人可就丢了大脸，因为英国人不久就宣布海斯已经向英国政府投降。英国人把他送进了伦敦塔，在那里，精神病专家不停地检查，看他是不是精神失常，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也不停地对他进行询问。最后，专家们认定他精神完全正常，只是处于心理狂热的状态。在德国时，他已经多次向占星家和算命师（这两拨人此时都受到国家秘密警察的悉心关照）请教过，他们都一致认定，只有海斯能够阻止德国人和英国人进行无谓的流血牺牲。

鲁道夫·海斯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时年40岁，对希特勒崇拜有加，有一段时间曾一直是希特勒的密友。在早期纳粹党的集会上，他曾充当令人生畏的打手，专门对付干扰希特勒讲话的异己分子。后来，海斯和希特勒被关进兰德堡要塞监狱，成了囚友，而且，希特勒把《我的奋斗》一书题词献给了海斯。1939年，希特勒指定海斯作为他的第二个继承人，仅排在戈林之后。在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的早期岁月里，他们每周要有两三次共同进餐的时间，在餐间进行私密交谈。海斯告诉英国人，没人比他更能了解希特勒心中的秘密了。同时，他又是多么盼望修复两国的历史关系和两个王室的联姻之谊。

据海斯说，希特勒坚信“英国人民的脑筋完全是被英国的一小群战争贩子给毒化了”，那群人的头儿就是“野心勃勃、心地阴险的丘吉尔”。希特勒本人显然对丘吉尔的态度极为愤恨，因为丘吉尔对他颇为不敬，总是嘲讽他为“上等兵希特勒”，什么“嗜血的饿鬼”，还有什么“邪灵的化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斯变得越来越古怪了。他开始让希特勒心烦意乱，再加上希特勒这时已经结交了新的密友，跟党内的同志们共进晚餐更有一番



乐趣了。虽然海斯还是副元首，但是他的权力日益变小，自己也感到对帝国的贡献微不足道了。他开始相信，自己对元首最大的贡献就是应该想办法与英国国王取得联系，让国王明白希特勒的真情实感。海斯相信，英国现在别无选择，因为它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两国人民还要作出无谓的牺牲。

海斯动情地解释说，他本人早就被伦敦大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吓坏了，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伤亡深感痛心。这疯狂的杀戮一定要停止。希特勒永远不会跟丘吉尔进行和谈，但是，如果英国王室把现任政府解散，那么很快就可以达成和平协议，英国可以保留自己的殖民帝国，欧洲大陆地区则要留给德国。他强调，自己所提的所有这些建议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信仰，并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更没有咨询过希特勒。他说：“要是英国明白希特勒的心地有多么善良，那它就会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了。”

这一事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丘吉尔后来写道，他认为海斯的用意确实是真诚的，他确实是想结束战争。他把海斯形容为“一个狂热的疯子”。结果是，海斯得到了粗暴的对待。他一直没有获准与丘吉尔或英国王室见面的机会，在伦敦塔里被关到1945年年末，他又被移送到了纽伦堡，在那里与其他纳粹党魁一起接受了战争罪的审判。在审讯期间，海斯以若明若暗的疯狂举动作证，一直对希特勒表示着忠诚，说希特勒“是德国一个伟大的儿子，德国1000年之内才生出这么一个优秀子孙。如果让我再一次回到当初，我还是会做自己已经做过的所有事情，哪怕自己知道最后要被送到烤架上烧成灰烬”。法庭没有把他烤死，而是判处他无期徒刑。1987年，他在狱中自杀，时年93岁。

## “鬼影子”隆美尔

1941年，轴心国军队不停地向东推进，深入到了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和希腊。在克里特岛，在爱琴海，双方还在海空多方面展开激战。在利比亚，希特勒投入了自己精锐的非洲军团去帮助陷入困境的意大利人，隆美尔将军接过指挥棒，很快就转入了战略反攻。在整个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德国军队都横扫千军，攻城略地。丘吉尔恼怒地说，当双方进行决战时，只要人数相当，德国人总能取胜。

爱德温·隆美尔将军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名职业军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他是天性勇敢，极富创意的军事指挥家，在指挥装甲部队方面显示了卓越的天才。他的军官与士兵们对他极为信服，一次又一次，他打败了显占优势的盟军。在1940年的法兰西会战中，他指挥着先锋部队第七装甲师，获得了一个“鬼影子”的绰号，因为他们总是在对手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纵横在整个米卢斯前线上。丘吉尔有一次在下议院谈到了隆美尔：“我们遇到了一个胆大包天、精明强悍的对手，而且我得这么说，通过这场战争的漫天烽火，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将军。”

隆美尔后来对希特勒深感不满，痛恨他通过党卫军和国家秘密警察对德国干下的那些事。1944年，他参与了那场试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计划，并因此很快被秘密处决了。由于他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位英雄人物，所以，希特勒为他举行了国葬，使他身后哀荣有加。德斯芒·杨写了一本传记，题为《隆美尔：沙漠之狐》。杰克·希金斯写过一本小说《雄鹰落地》，生动地描写了德国陆军的精英们对党卫军的暴行是多么深恶痛绝。

## 股市的前瞻性

在1941年1月初，《金融时报》表示股价开始走高了，那是因为英军在图卜鲁格和阿比西尼亚打败了意大利军。然而，1941年的冬天，股价又一次下跌，与此同时前方传来了不利的战场消息，同时原料短缺以及运输船队的损失也阻碍了工业发展。夏天里，遍及英国的爱国狂热已经消退。到了1941年4月，希腊投降了。伦敦的报刊专栏作家们批评政府对战争处置失当，英国人民虽然意志坚决，誓死抗敌，已经有了过上更苦的日子心理准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心情去买股票了。

这时候，坏消息接踵而来，伦敦空袭警报不断，谁也没想到伦敦股市在此时会开始反弹。难道是它预感到了巴巴罗萨计划，知道德国就要进攻苏联了吗？一旦苏联卷入了战争，那英国就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德军入侵英国的



可能性也降到了最低。在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低迷之后，伦敦股市在1941年的后半段持续走高。从4月份的低位反弹，股指一路持续上涨至12月中旬，升幅达到了24%。我们可以颇有兴趣地看到，股市在10月中旬之后表现得相当不错，虽然更大一波战事不利的消息又传来了。

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美英两国日益成盟大局的影响，同时，它也意识到了美国正日甚一日地被卷入这场战争。这，正是股市智慧的一个明证。

## 谁来影响股市？

在这期间，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指挥的英国与澳大利亚联军却在非洲节节败退。这样一来，在澳大利亚政府与丘吉尔之间又出现了一些争吵，结果，澳大利亚军队从图卜鲁格撤走，这使英军陷入极大的被动状态。接下来，还有克里特岛与德国空降兵大战的失败、希腊的陷落、德军占领叙利亚，以及伊拉克亲德势力的兴起，所有这些都是负面消息，令人心灰意冷。前方传来的战报都是负面的，可是股市却不管那一套，仍然在持续走高。

但是，到了1941年6月份，英国海军追踪上了德国战舰“俾斯麦”号，与它展开激战，最终击沉了这艘战舰。这个消息一下子提振了英国人的精神。那可是德国的一艘伟大战舰，排水量达45 000吨，它有着复杂精妙的防水舱系统，是海军造船与设计的大师级创作。毫无疑问，它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速度最快、防御能力最强的战舰。“俾斯麦”号比英国海军所拥有的任何战舰的规模都要大25%，同时，伦敦和斯卡柏湾的任何英国决策者或海军专家都清楚，那艘战舰上德军官兵的素质、船上的大炮精准度，以及火力控制能力都是无与伦比的。希特勒在5月初视察该舰时，这样说道：“你们是海军的骄傲。”

5月23日，“俾斯麦”号偕同新下水的重型巡洋舰“尤金王子”号，在六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离开挪威港，准备寻找并摧毁一艘英国运兵船，那艘船上载有20 000名英军前往中东。英国皇家海军里没有一艘船可以跟“俾斯麦”号相匹敌，因而攻下一艘运兵船对德国人来说是小菜一碟。英国人立刻派出了“胡德”号，那是英国皇家海军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主力舰，配上了最



新型的战列舰“威尔士王子”号，以及两艘巡洋舰“曼彻斯特”号和“伯明翰”号，目标就是截击德国舰队。

双方的初次交锋发生在丹麦海峡，那是一个阴暗的结冰水道，水雾漫天，遮蔽着格陵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海面。双方在相距25 000码时开始交火。“俾斯麦”号的火力系统十分精准，第一波炮弹就击中了“胡德”号，引起了大火。“胡德”号的装甲十分坚固，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软肋，那就是在“胡德”号的两只烟囱之间的一块区域，那上面的装甲保护远远不够。英国皇家海军知道这一情况，想在它的装甲上有所改进，可是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任务。而且，敌人的炮弹直接击中这一小块地方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谁曾想到，在第二轮炮击时，“俾斯麦”号的重炮直接击中了这一软肋，重型炮弹一连穿透了六层甲板，在“胡德”号的弹药舱里爆炸了，那里装有整整300吨的高爆弹药。突然之间，一条高达千尺的烟柱从军舰正中轰然炸开，直冲云霄。那条烟柱在空中闪烁了几秒钟，接着，那艘战舰就被浓浓烟雾包围了。当烟雾消散时，目瞪口呆的旁观者看到“胡德”号已经被那一声巨响炸为两截。整个船头被高高掀起，接着船尾也高高昂起，一前一后沉入了黑色的大海之中。“胡德”号真真切切地裂开了，带着船上的1 419名官兵沉入大海，其中有些人当场就被炸飞了，或者被闷在了钢制防水舱底深处，无法脱身，有的人落入大海之后虽然还活着，但是1.5分钟之后就在冰冷的、充溢着燃油的大海中冻死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人。

皇家海军眼看自己最强大、最精美的战舰眨眼之间就毁于大海，给海军官兵的震动可想而知。“威尔士王子”号是一艘刚服役的战舰，一周之前，它刚结束试航，此时也遭到了好几发炮弹的直接打击，其中一发炮弹炸毁了它的舰桥，它开始漏水了。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在激烈的炮战中，“俾斯麦”号也在吃水线以下挨了一炮，结果开始漏油了。到了傍晚5点56分，遭到重创的“威尔士王子”号朝东南方向撤退，其他两艘较小的英国巡洋舰也明智地后撤。这一场海战持续了17分钟。

回顾这段战事，人们认为德国指挥官、海军上将冯·克鲁格知道自己的船受损，并且已经暴露了行踪，这时本应该撤出战斗，朝布雷斯特后退。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可能是因为看到敌人遭受重创而欣喜若狂吧，他直接挥师



扑向了英国运输船队。英国皇家海军早就在北海布下了自己的所有主力舰，目的就是对付德国人，保护自己的运输船。数小时之后，“俾斯麦”号认识到自己遭遇到了麻烦，开始调头往布雷斯特的基地行驶。英国人的问题是，他们的两艘军舰，甚至是三艘军舰加起来，也不是这艘德国超级战舰及其护卫舰的对手。这时候，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冰冷的风狂吹，大片的雪骤降，一艘艘大军舰困难地在怒海中劈波斩浪，顶着北来的狂涛航行着。闪着寒光的冰层挂在了舵楼前风挡上，也挂在了桅灯索具上。看上去虽美，但是实际上却相当危险，因为这些冰会使大船头重脚轻，在大海中划着长长弧线转个不停。

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英国舰队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行踪，但是他们后来得到了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的支援，到了5月26日的下午，航空母舰上飞出了15架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在寒雾之中，他们先是错把英国巡洋舰“舍菲尔德”号当成敌人进行攻击，那艘巡洋舰一直尾随在德国人的后面，距敌不到40英里。“舍菲尔德”号躲开了这场误攻，结果，丢人现眼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又返回到了航空母舰上。突然间，乌云散去，雪住天晴，最后一团黑云也朝南飘走了。

剑鱼式鱼雷轰炸机立刻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找到了苦寻的那艘船。在26日那天的黄昏，在北极地的日落光照下，他们勇敢地贴海3米低空飞行。至少有两枚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但是，那家伙如此强壮，本来被两枚鱼雷击中可以满不在乎。但是，有一枚鱼雷碰巧击中了它的舰舵，把那舰舵炸成了两段，结果，它就开始在大海中高速转圈了。整个晚上，4艘英国驱逐舰把“俾斯麦”号包围起来，不停地朝这艘挣扎的大船进行着轰击，此时的“俾斯麦”号已经被火舌吞没，包在北极光的光环之中，同时还有更多的鱼雷朝它飞来。

到了27日早晨，天气突然又变坏了。“俾斯麦”号虽然已经不能正常行驶，甚至无法使自己保持直线行驶，可是它的强大火力却毫发无损，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德国人已经下决心保住它，于是派出了轰炸机和U型潜水艇来驱走在那里折磨这艘大军舰的英国人。此外，皇家海军的那些参战舰只耗尽了燃料，于是他们向伦敦的海军大臣报告，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放弃这次猎杀



行动。丘吉尔进行了干预，他愤怒地命令他们不要管什么燃料短缺的问题，要向敌舰逼近，把它击沉，哪怕事后把他们拖回英国都可以。“尤金”号被派了出来，要拯救“俾斯麦”号了，它争分夺秒地朝布雷斯特驶来。海军上将冯·克鲁格向柏林发报：“我舰已无法操控。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息。元首万岁！”

皇家海军的“罗尼”号与“乔治五世”号两艘战列舰这时也驶了过来，逼近敌舰，朝那艘受伤不轻的超级大船开炮。不知多少战舰在狂涛怒浪中驶来，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波底，几乎看不到远方。“俾斯麦”号遭受着惩罚，同时也在反击，一开始还击得很是精准，让敌人远远地躲开一段距离。然而，它的炮手们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之后，早已精疲力竭，在寒风刺骨的炮台上再也撑不住了，已经困得睡着了。结果它的排炮就越来越不准了，于是，“罗尼”号竟在它的正前方穿了过去，在它的鼻子底下，也就是炮弹死盲点的位置朝它排炮齐发，轰个正着。

坚不可摧的“俾斯麦”号这时仍然坚持战斗，直到它被打成了一团火球。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永不会沉没似的。最后，“曼彻斯特”号巡洋舰驶到了它的跟前，朝它发射了三枚鱼雷，直到上午10点40分，“俾斯麦”号朝一侧偏过了船身，在那个位置停顿了一会儿，有无数的官兵爬到了船帮上，从那里纵身跃入冰冷的大海之中。然后，它就倾覆了过来，带走了2 000名官兵的灵魂。英国人后来只救上来了110名疲惫不堪、沮丧欲死的水兵。当一切都结束时，大海仍然波浪起伏着——辽阔无边，生生不息，淡然无情。从那以后，英国的运输船就再也没有受到大型水面攻击舰的威胁，英国皇家海军的北海舰队再也不用躲在斯卡帕湾了。在那多灾多难、困苦不堪的一年里，这场胜利对英国人来说相当重要。

## 美英结盟激起新希望

不过，1941年的两件大事是德国进攻苏联，以及英国与美国日益亲密的结盟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伦敦股票市场令人惊奇地预感到了这件大事的发生。虽然当时纳粹军队取得节节胜利，他们攫取了苏联的大片国土，然而，当时



的情报已经显示出英国投资者相信苏联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盟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现在希特勒要入侵英国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正在东线与可怕对手进行殊死血战。事实上，在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希特勒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们就一再警告他，如果入侵苏联，英国的抵抗意志会更加坚定，他们的士气会极度高涨。可是，希特勒却对这些充耳不闻，因为他的判断在以往的日子里从未失算，而且，他现在根本听不进任何异议，因此，几乎没有人敢于坚持己见，再进忠言。

说到与美国的结盟，要知道丘吉尔与罗斯福可是多年至交，这些年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个人都是20世纪的名门望族之后，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都喜欢跟对方在一块谈天说地。二人也都很善谈，乐于交友，而且罗斯福与丘吉尔一样，喜欢边喝鸡尾酒边闲聊。（当然，丘吉尔饮用鸡尾酒时间从午餐一直到睡觉时间。）从1940年开始，大批武器和驱逐舰便源源不断地“借给”英国，到了1941年，美国海军更是多次参与保护商船的行动，有好几次还向德国U型潜艇投射深水炸弹用于驱逐敌船。这时，美国商船被德国人击沉，美国人被淹死在大海，因而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一点点地增加了。

这种合作最后达到了高潮，就在8月份的那一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乘坐军舰，来到了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举行了三天的会谈。两位领袖及其助手们相谈甚欢，友情倍增。有一幅照片最能说明问题，那是星期日礼拜会，500名英国和美国水兵聚集在“威尔士王子”号的后甲板上，同声高唱《上帝作我们代代帮助》。通过这幅照片，可以看到罗斯福嘴巴大张，纵情歌唱，而丘吉尔这个一直讨厌唱歌，认为唱歌是浪费时间的人，此时则从眼镜框上方瞪眼四瞧，看一看还有谁在放声高唱。双方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同一种声音表达出了对希特勒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份共同声明的第六款是怎么说的：“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之后，双方希望建立起和平世界……”这哪里还是什么公允、中立的语言？完全是一种结盟用语。一种伟大的联盟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1940年，人们最怕在美国全面参战之前，德国已经入侵并征服了英国，同时日本也夺取了英国在远东的地盘。丘吉尔和许多人都担心这样的可怕情



况很可能会发生，有证据表明，罗斯福的担心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小。然而，我们前面也指出，在美国，孤立主义和亲德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对此罗斯福也心里相当有数。在美国，有“美国母亲反《租借法案》联盟”，它不停地进行游说活动，反对《租借法案》，认为那是美国全面参战的前奏。要记住，在1941年春天，众议院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了延长义务征兵法案。另一个有名的孤立主义者是柯林神父，他是一个狂暴的天主教传道士，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对着4 000万听众大放狂言，进行反犹的宣传。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总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三连任，同时他也在孤立主义者和“美国母亲反《租借法案》联盟”的压力下保证说，他不会让美国卷入战争，除非美国受到了攻击。

## 战争对股市的影响

随着1941年下半年的事态发展，德国的敌视行动和美国海军的反应越来越多，美国直接参战的一系列事件也层出不穷，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真要卷入这场战争。《租借法案》已经在向英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弹药和装备。正如前面所述，伦敦股市在是年之春似乎捕捉到了这一情况，因此不管前方战报有多么糟糕，到12月份还是将大盘点位提升了25%，股价刚好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达到顶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表现刚好相反，随着美国直接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一步步地增加，它的股价也随之下降。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那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反应。美国参战对英国来说可是天赐良机。而对美国的企业和投资人来讲，却意味着工资和物价的控制，还有高税收和利润余额的进一步征税。谁也不知道战争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怎样的结果。

在12月份的后三个星期，伦敦股市急剧下挫，反映了美国 and 英国在太平洋战事中的失利，也反映了对德军推进到莫斯科市郊的担心。英国股市数月以来一直期待着美国参战，而当珍珠港与菲律宾的惨败战报传来时，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报上的新闻也点出了这样的情况：股市每日的升降是与英国在亚洲及地中海地区的确切损失数字相联系的。



## 英国海军损失惨重

1941年最可怕的灾难，莫过于这年的12月中旬，日本海军战机攻击英国海军主力舰“驱逐舰”号和“威尔士王子”号，并将它们击沉于新加坡附近的深海。这不仅使英国损失了自己最现代化、最先进的两艘主力舰，而且更重要的是，船上的2 000名饱受战争磨炼的官兵也几乎命丧大海。他们的牺牲引起了这样的疑问：我们还能不能保住新加坡？英国海军是不是太过陈旧，太缺乏战斗力，根本无法对付日本的空中力量？那两艘主力军舰在没有空中力量保护的情况下，跑到那里瞎转悠什么？事实上，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场比珍珠港事件更为辉煌的胜利，因为珍珠港中被击沉的军舰都躺在浅水中，还可以被修好，而这两艘英国海军主力舰却沉入了深海，永远不能重见天日。

英国还蒙受了一项更大的损失：以往人们都认为英国是海上霸主，现在却失去了这种地位。1941年12月初，德国U型潜艇在地中海击沉了四艘英国主力舰，造成了人员的重大损失。接下来，在12月18日的那个月黑风高之夜，6名意大利蛙人驾驶三艘鱼雷艇偷偷潜入英国在亚力山大的海军基地，趁着吊门开启放入一艘英国军舰进入的机会，潜了进来。他们把两颗定时炸弹粘在了两艘英国重舰“勇士”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趁着黑夜又悄悄溜走了。那是一次大胆的行动，真是让丘吉尔恼羞成怒，因为首相本人一直认为意大利人胆小如鼠。他对下议院悲伤地报告：“在短短几周之内，我们就损失了7艘主力舰，它们要么被击沉，要么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重返战场，我们还损失了1/3的战列舰和驱逐舰。”

更多的灾难接踵而来。就在同一天，另一支英国海军编队驶出了马耳他港，其中包括了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他们要去攻击朝着的黎波里行进的一支意大利运输船。将要进入的黎波里时，英国舰队误入了地雷阵，结果三艘巡洋舰受伤，其中一艘巡洋舰，也就是“海王星”号，带着它的700名官兵葬身海底，还有一艘驱逐舰也给炸沉了。这些损失暂时令英国失去了地中海的控制权，自开战以来，希特勒第一次可以通过海路向他的非洲军队提供供给。接下来，也就是1942年2月，两艘德国巡洋舰成功地从布雷斯特突围逃走，让英国皇家海军丢尽了脸。

即使英国进行反击，它也是一再遭到厄运的戏弄。1941年11月23日，身陷重围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图卜鲁格外围的沙漠中进行反攻，同时，他们还精心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要绕过德军前方阵线，去刺杀德军卓越的统帅隆美尔，摧毁德军指挥部和弹药库。50名苏格兰特种兵，在罗伯特·莱科克上校的率领之下，乘坐潜水艇沿岸而下，要在德军后方的一处海滩登陆。

没想到那天大海怒涛汹涌，只有30名特种兵上了岸。不过，他们还是成功地对德军指挥部发动了突然袭击，攻进了隆美尔本该在此休息的屋子。不幸的是，英国的情报部门搞错了，隆美尔和他的参谋们此时身在柏林。不管怎样，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而且差不多都是肉搏战。20名德军被杀，特种兵牺牲了8名战士。剩下的特种兵被逼回海滩岸边，要在那里登上自己的登陆艇回到潜艇，谁知大海这时变得更加汹涌澎湃了，海浪把橡皮船抛到远处，他们无法登上船去。莱科克上校命令大家分散行动，到乡间去避难。战士们两人一组开始行动，后面有德军追赶不止。最后，只有莱科克上校和一名上士在敌后迂回了36天之后重返盟军前线。

总而言之，1941年是英国人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他们总算熬出了头。不幸的是，1942年的上半年，情况还会变得更加糟糕。







## 第六章 巴巴罗萨行动

**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一直被描述为世纪之战，而围绕伏尔加格勒的战役也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最最为壮怀激烈的战斗。巴巴罗萨行动是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那真是希特勒这个头号战争贩子神秘莫测、狂躁个性的典型反映。应该说，是希特勒独自一人策划了巴巴罗萨行动。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清楚地表明苏联是自己的最大敌人。从战略方面来讲，在东方“扩大空间”可以保证“千年帝国”的经济需要，同时也可以排除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希特勒告诉那些心存疑虑的将军们：“当我一脚把门踹开，那栋烂房子就会应声倒下。”这正是巴巴罗萨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那是一个胆大包天、异想天开的计划，设计得天衣无缝，执行得尽善尽美。



## 推翻希特勒

德军总参谋部现在仍然是按普鲁士军人俱乐部的风格行事，对元首曾发出警告，声明在英国未被征服之前，对苏联发动进攻是危险的。他们引经据典，论述了种种理由，比如苏联的庞大军队人数、辽阔无比的地域、拉得过长的供给线、苏联过冷而持续时间又长的冬天，还有苏联道路过于崎岖，不利于德国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希特勒与他那些固执己见的普鲁士将军们一直关系紧张。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们，而且，他这样做也颇有自己的道理。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际，那些将军们的平均服役年限已经是36年，所有人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部分人都指挥过1940年欧洲战役的师团。他们都来自普鲁士贵族，或中产阶级的传统军人世家。

军队的资深军官团对神圣、传统的信条坚守不移，那就是：军人远离政治，但要绝对忠于国家统治者，不管那位统治者是皇帝还是元首。然而，他们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他们要对统治者直抒己见，不管那位统治者是否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希特勒感到了他们对他的军事战略计划心存轻蔑，尽管他们从希特勒的档案中了解到这位元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表现得相当勇敢。不管怎样，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仅可以称为一个业余的军事爱好者，他只是一个上士，连一般的军官都算不上。在他的背后，将军们嘲笑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小发明、小创造，什么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上装汽笛啦，什么把坦克上的大炮的炮管拉长啦。他们显然不相信拿破仑的那句经典的论断：在战争中，就像是在卖淫业一样，业余爱好者经常要胜过专业人士。

但是，希特勒不相信自己的将军们，这其中还有他更深刻的原因。1938年9月，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认为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大胆计划简直是在开玩笑，会惹来滔天大祸。他要求面见元首，一见面他就指出捷克人在德国的东线部署了大约30~40个师，法军的总兵力远远超出德军人数，兵力部署大约是8:1。苏联人很可能会发动攻击，而英国海军已经全体出动。捷克人很可能坚持至少3个月以上，这样就给了英国人和法国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挥师东进，横加干涉。

不仅如此，德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很虚弱。贝克估计，要提高战斗力，至



少要再增加48 000名军官和100 000名资深参谋人员。最后，他显然还告诉希特勒，只有不到1/5的帝国军官相信德军会取得胜利。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讲话，简直就是发疯。希特勒静静地听着，他那仿佛穿透一切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贝克，一直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当贝克结束讲话之后，希特勒告诉他下面这样的意思：我本人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的普鲁士传统，而且据我所知，德国军队不过是国家的机器，而我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因而，我要求你遵从我的命令。贝克当场就辞了职。

贝克在军队中的威望很高，马上就有10名将军，包括主管柏林警务的柏林城防司令格拉夫·冯·赫尔多夫集合到一起，要策划一场政变推翻希特勒。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也参与了这个政变计划。他们进行了十分周密的安排，有一个豹式坦克师，由政变者之一指挥，已经向柏林推进。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领袖有可能被逮捕，移送法办，以谋杀罪接受审判。他们要发表一份和平声明，军队要撤离捷克边境地区，一个军人过渡政府将建立起来，直到举行全国大选。整个计划的关键是希特勒来到柏林，这样就可以对他实施逮捕了。

1938年9月14日清晨，希特勒从贝希特斯加登来到了柏林。政变策划者马上开会，决定当晚8点整实施计划。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已经到位，没想到这时候，柏林警察总司令格拉夫·冯·赫尔多夫得到通知，说英国首相张伯伦忽然朝贝希特斯加登飞来，欲与元首会面，元首的车队已经离开了柏林，去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张伯伦。政变计划只能取消。机会就这样失去了。第二天，那个豹式坦克师就被派到了前线。

希特勒这时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面对着德国人民的不同意见，还有他的将军们的严肃警告，他的军队不但没有准备好，而且风险确实极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难道还要坚持进攻吗？如果进攻失败，他肯定会被迫下台。他对自己本人判断力的信心是超乎想象的。

余下的就是历史了。张伯伦上了希特勒的钩，而希特勒不顾所有顾问和专家的意见，纵身跃入万丈深渊，在数周之内而不是数月之内，便取得了惊天动地的军事胜利。在德国人的心里，希特勒的伟大形象建立起来，不可动摇。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有人想发动政变推翻他，但是我们不得不猜想，



如果当初那场政变真的成功了的话，未来7年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景象。

## 计划进攻苏联

到了1941年年中，不仅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所有元首先前的军事判断都被证明是无比正确的，于是，希特勒不再理会参谋部的保留意见，决意进攻苏联了。为了第一轮进攻，他调集了154个德国步兵师，总计达3 050 000人，此外还有140 000人的外籍军团，包括14个罗马尼亚师、18个师的坚忍不拔、饱受战火考验的芬兰人，以及一个由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杂牌军，他们自古以来便与苏联人仇怨深重。进攻部队共有3 350辆坦克、7 000门大炮、2 000门高射炮。虽然已经到了20世纪，可是德国军队还要依赖600 000匹马来拉运大炮、坦克，甚至用来运兵。在苏联泥泞的道路上，马还真的是最管用的。另外，双方还大量使用了骑兵，因为骑兵在丛林袭击战中、在放火攻击敌军营地时是最有效的。

进攻时间本来是定在1941年5月下旬开始，那样的话，入侵者就有足够的时间，赶在12月之前抵达彼得格勒、莫斯科、库尔斯克和卡尔罗夫，那时还没有进入严冬，苏联的气候仍然适宜军事行动。过了12月，苏联的冬天就会变得相当可怕了。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德国人不想运送大批的冬装和除冰设备，而且，希特勒也想让他的将军们争分夺秒。但是，那个春天，希特勒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救陷在希腊的墨索里尼，而且，边境一带的多雨泥泞也把巴巴罗萨行动延迟了3~4个星期。

6月17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前线部队里的德军军士长打了一位军官，在那个晚上就叛逃过境。到了苏联境内，为了保命，他主动向一名苏联上校坦白了一切，当时，那名上校亲自审问了他。德国人向上校交代了进攻的确切日期和时间。上校马上逐级向上汇报，可是这个情况很快就被当做胡思乱想丢到了一边。图6-1展示了这次进攻的计划。

在边境，德军的主要装甲力量，即10个豹式装甲师，每个师有200辆坦克，同时得到机械化步兵的支援，此时已经在三个独立的区域进行集结。北方集团军的目标是彼得格勒；中央集团军的任务是横扫苏联心脏地带，直扑



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的行程更长，任务更重，他们要夺取高加索油田，一路奔行直攻伏尔加格勒。在攻击的首日，即1941年6月21日，德军以真正的突然袭击和压倒性的人数、机动性及火力优势，扑向了苏联，这批先锋部队的后面还有成队的机械化步兵师、更多的坦克、成团的大炮以及更多步兵，他们把苏联的防御阵地撕开，突进了20英里，用装甲车将苏联大部队分割开来，孤立起来，团团包围，使苏联军队的后方也要面对着敌人了。

另外，德国空军与坦克部队的空地配合也令人惊叹，豹式坦克上都安装了对讲系统。这种致命的地面炮火与空中攻击炮火的奇妙结合，使它们面前散布的那些装备落后的军队惊恐万状，陷入了瘫痪。这一轮进攻的主要目标，无论是空中力量还是地面力量，都要进行猛烈打击，防止敌人的有生力量逃回苏联腹地。德国装甲先锋部队的高速穿插，使他们在进攻的头一周里就夺取了250英里领土，击毙、俘虏了200万苏联士兵，令人惊骇不已。仅是进攻的第一天，曼施泰因的第56装甲旅在日落之前推进了50英里。五天之内，他的坦克旅就渡过了德维纳河，再走一半就到彼得格勒了。

## “没有苏联战俘”

在先前欧洲的各大战役中，因德国闪电战而被困的各国军队，应对困境的基本反应就是想方设法逃离险境，然后举旗投降。事实上，在法国有那么多被解除武装的军队投降，最后都成了德国人的沉重负担。与此不同的是，被困的苏联军队却在拼命冲杀，想要拼出一条血路突围。苏联指挥官一般把士兵胡乱地集合在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然后，他们的队伍很快被豹式坦克分割歼灭，或者被空中的机关炮炸飞。一些孤立的作战小组尽管身处绝境，也鲜有投降者，这使得德国人不得不耗费很多的火力来清除他们，把他们一一杀死。

尽管苏联士兵表现勇敢，意志如铁，然而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主要精神力量实际上来源于这样的情况：在战争爆发之际，斯大林就立刻号召，任何人不要投降。他在1941年6月25日的一项号召中，是这样宣布的：“没有苏联战俘这一说。”



到12月5号，德军战线已经达到了1 600公里宽，纵深则达到了1 000公里。到了那个地步，希特勒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征服者。请想象一下那种复杂的情况吧，有那么多多的伤员需要救治，那么多多的给养需要补充，而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铁路，几乎所有的铁路都要经过充满悲情，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区域。要知道，这时候离东边的伏尔加格勒还有400公里呢。

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1941年有320万苏联人被俘，而到了1942年夏，竟然有280万战俘已经死亡了。希特勒命令，把所有被俘的政治委员和军官立刻枪决。所有的军队都苦于思考如何对待战俘，而这一次，战俘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努力保存多少活口，也许最人道的方法就是杀掉他们。那些被俘的士兵被驱赶着进入了一块铁丝网围起的空地，四周建有炮台，上面有党卫军手持重机枪在那里看守。所有的战俘没有任何衣物，唯有自己身上穿的脏兮兮的军大衣，而且，几乎得不到任何吃的或者喝的东西。当严冬来临时，他们就在自己所待的地方冻饿而死。有人估计在以后的战事中，又有250万苏联人被俘，但是只有100万人是死在战俘营里。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人越来越明白，要利用战俘干活，而不是把他们枪毙。

## 血战到底

到了进攻的第二天，苏联中部所有飞机都集中到了机场，排成密集的、完全过时的阵形。用一句德国飞行员的话来说，那简直是“屠杀婴儿”。在战争的前两天，苏联军队损失了2 000架飞机，在数量上可称是世界第一的空军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在战争的前三个星期里，苏联军队损失了200万人、3 500辆坦克，还有6 000架飞机。

失去空中掩护对前线的苏联士兵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惨败相继在斯摩棱斯克、基辅、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市发生，而整个乌克兰完全落入了敌手。到12月，苏联已经损失了大约500万人、14 000架飞机、40 000辆坦克以及大炮等重型装备。在乌克兰爆发的那场世纪血战中，双方苦战了一个星期，苏军有100万人阵亡，600 000名士兵当了俘虏。到了最后，



苏联步兵把自己的手绑到了德国坦克上，与其同归于尽。他们在高音喇叭广播着斯大林的讲话，在号召他们为祖国血战到底的叫喊声中，拼光最后一颗子弹。有一位目击者这样描写这个战场，说它完全成了一块布满弹片与骨灰的焦土地带，“放眼一望，那些人头就像一颗颗的刚从地里翻出来的土豆。”

到战争结束时，约有3 000万苏联人参与了战斗。他们中间，有800万人阵亡，相比之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加起来才阵亡了25万人。苏联军官死于战场的比例为35%。一名士兵在前线平均战斗3个星期就会丧命或者身负重伤。

苏联人甚至把狗利用起来，让它们充当自杀爆破手。那些狗被训练一番，它们跑到大型汽车下面去寻找食物。它们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高爆炸药，还立着一根导火线，这样，当它们跑到德国军事下方时，就有人会引爆它们身上的炸药。

## 战争仍将继续

在德国进攻的前一个月里，被攻陷而占领苏联西部各省的居民对入侵者并无敌意。但是，希特勒要乌克兰提供“生存空间”。乌克兰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然而，他要乌克兰将广阔的农场和一望无际的田野提供给雅利亚移民。结果就发生了三件事。第一，希特勒在占领区展开了大清洗运动，要进行“种族清洁”与种族灭绝。要完成这一任务，他在所占领土上安插了党卫军作为占领政府的助手。党卫军一般都是偏激者、虐待狂和变态的家伙，他们的统治手法令人发指。皮鞭和野蛮的多伯尔曼·杜宾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甚至对儿童施以这些酷刑。有时候，在漫漫夏夜要打发时间，党卫军会组织一种体育活动，也就是“猎人游戏”，喝得醉醺醺的党卫军带着残忍的心态举起枪来杀人，谁打死的人多谁就获胜，而且，一定要瞄准被猎者的胸腹之间射击，尽可能地造成最大的痛苦，让他们在百倍痛苦中慢慢死去。

第二件事就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人认识到他们需要许多劳力去干活，生产出军队急需的军用物资。被征服的国度里有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必须进行剥削利用。家庭骨肉被迫分离，村庄被烧成平地，女人被当成性奴隶，男人被抓到德国当苦力。这些男人被塞进闷罐车里，没有水，没有卫生



设备，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就待在那样的火车车厢里，一待就是几天时间，一列列的运“奴”车日夜不停地将他们运到德国。这些苦力在这样的旅途中，经常有1/3的人死在路上。这种残虐的措施达到了清洗的目的，不过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仇恨和激烈反抗。

第三件事是，当闪电战朝前推进时，大批苏联士兵和开小差的人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落在了敌后。当地的官员已经积累起了一些钱财，生活也十分腐化，因而成了他们容易下手的犯罪对象。他们带着轻型武器，对强大的德国人并不十分感兴趣。一开始，当地人并不特别支持他们，但是，随着当地人民遭受越来越多的虐待，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之火越烧越旺了。有一段时间里，这些游击小分队成了当地主要的、不可替代的武装力量，袭击德军运输车、炸毁铁路、攻打德军哨所。到1942年年末，据估计约有30 000名游击战士活跃在德军的后方。到1943年12月，那一数字达到了150 000，苏联军队也通过空投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武器。

希特勒相信苏联西部各省，不仅仅是乌克兰人，都会揭竿而起。事实上，他看错了苏联人那极为深刻的爱国之心，他们对祖国母亲的无比忠诚，经受住了种种迫害和苦难。那些游击队以前是散兵游勇，现在则成了民族英雄和报仇雪恨的利器。不久，一支地下运动力量发展了起来，有力地破坏了德国的后方。那是一场残酷无情、不讲任何章法的游击战，可以对德军救护列车进行袭击，宰杀那些担架上的德国伤兵。

在东欧森林中的生活跟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那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大相径庭，不可能是一群身材壮硕的游击战士，一边喝着葡萄酒，嚼着热狗，一边跟英格丽·褒曼那样的美女一起钻进睡袋。那些游击区是大片的松林和桦林，里面不时有急流奔出，还有大片的沼泽。坦克车是进不去的。在那里活动着苏联游击队、犹太战斗团、波兰丛林兵，还有普通的土匪。

1942年，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德国人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只要再无人进攻和防守了，战争也就结束了。可是战争仍在继续……当我们在煮土豆时，它在继续。当我们在睡觉时，它在继续。一个士兵必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随身带着枪。”



## 夺取莫斯科

10月中旬，德国人对莫斯科展开了激烈无比的进攻，分三路兵临城下。现在，在苏联中部前线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同时，秋季的泥泞日子开始了。在14日，第一装甲兵团到达了加尔明，夺取了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桥梁，切断了莫斯科到彼得格勒的铁路交通线。与此同时，第十装甲兵团进入了距莫斯科仅70英里的地方，驻兵于博罗迪诺那片麦浪起伏的广阔农田里，拿破仑当年正是在这里打了那一场伟大的战役。到10月中旬，莫斯科已经挤满了难民和逃兵，骚乱和抢劫随时发生。10月16日，斯大林命令重要的政府机关撤离莫斯科，市民们也开始逃离首都。那天，苏联秘密警察开始焚烧文件，黑黑的浓烟从卢比扬卡大街的总部烟囱里呼呼直冒。斯大林本人考虑着要不要迁到600英里以外的库尔拜谢夫去，一列专用火车以及一架私人道格拉斯DC-3型飞机已经在那里待命，准备随时出发了。

但是斯大林没有走，尽管他来到了火车站，在自己那列专车的旁边来来回回地走了很久。不过，他镇定了下来，发誓要待在莫斯科。10月19日，他颁布了军管法，秘密警察得到了授权，可以就地枪决任何抢劫犯和逃兵。在随后发生的动乱中，有大量的平民被杀，但是秩序恢复了，城市没有被放弃。如果莫斯科，这个苏联的精神首都被放弃，让它落入德国人之手，那么，接下来德国人就会度过一个舒服的冬天，战争的进程也就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然而，随着天气转坏，德国的攻击失去了动力，他们的战略也出现了问题。战地上所有的将军都要求集中兵力，全攻莫斯科，争辩说那是苏联通讯的中心，也是军队后勤保障工业的集中地，夺取了莫斯科，就会打垮苏联人的士气。希特勒却对高加索的油田情有独钟，决心投入军力为这一目标而战，哪怕这意味着在圣诞节以前不可能拿下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说，普鲁士的传统是在作出一项重大决定之时，国王必须倾听贵族的声音，要向他们进行咨询。

希特勒的普鲁士将军们选中了海茵茨·古德里安做说客，因为他一直是元首的爱将。他赶赴希特勒的战时指挥部，面见希特勒，他们在一间简朴的



房间见了面，里面的陈设很有斯巴达风格，只有一张橡木桌子，几把直背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是和蔼可亲的，表现得很开明，认真地听取了他所进行的陈述。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用他那大嗓门、诚挚地向他解释德国如何急需高加索的石油，经济方面的考虑必须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到了此时，古德里安可能想到了贝克的先例，也想到了自己在波兰置得的那份产业，因此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古德里安后来跟希特勒讲了正要到来的严冬是多么厉害，德军急需棉衣来保证战斗力。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希特勒还拒不考虑为部队提供冬装，也许是他设想如果德军没有过冬之所，他们就会拼命打仗去夺取保暖的地方。同样重要的是，机械化装备的大炮也没有防冻设施，防冻液奇缺。这一情况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如果巴巴罗萨计划提早在5月中旬发动，即像当初计划的那样，而不是在6个星期之后进行的话，那么，德军早在12月就抵达越冬之所了。希特勒说他会关注这件事，只是现在供给线太长，弹药的运输要比防冻液更重要。他告诉古德里安继续进攻。

结果就是，战场上的部队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没有靴子，没有手套，没有大衣，饱受严寒之苦，而到了11月份，道路的泥泞，极度的疲惫，军需的奇缺，已经把德军的闪电进攻变成了蜗牛爬行。那些坦克、机动大炮和卡车在苏联荒原上的烂泥、融雪中苦苦挣扎，急迫地需要进行保养。战场上的地形是矮松和桦木的混合体，极不利于坦克行动。前线部队中，有1/3的人得了冻疮，其中50 000人被冻得极为严重，最后不得不截肢。希特勒始终没有搞懂，在苏联那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与他所对付的那些欧洲小国不一样），后勤保障是一个决定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战地元帅冯·伦施泰特有一次写信给自己的妻子，当时他的部队在1941年秋还高歌猛进，他就这样对太太说：“苏联的广袤简直把我们吞没了。”他是指那辽远的路程、糟糕的路况和极端的气候，指出了这样的综合因素最终会消耗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到1941年12月初，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市郊，那是苏联的两个历史名城。12月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5天前，第258师的一个侦察营穿插到了莫斯科的郊外，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顶



部正反映着落日余晖。那天晚上，气温降到了零下31摄氏度。那个侦察营因为1/2的坦克冻坏了，也因为苏联人的反击，不得不在第二天下午撤回来。几天以前，第41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先头小部队看到了彼得格勒（现在是圣彼得堡），情形大同小异。德国远征军再没有机会重见这两座城市了，虽然他们包围彼得格勒达900天之久。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对那两座名城看上那么两眼，已经是巴巴罗萨计划的巅峰时刻，尽管后来在1942年的夏天里，德国人还打了不少胜仗，然而，他们的进攻已经被中止了。第二年，在伏尔加格勒，形势发生了逆转。

## 苏联的冬天

但是在1941年12月初，希特勒盯着地图，看到的只是他的军队推进了500英里，只胜下20英里，就可以一举拿下最终的猎物莫斯科了。他对约德尔将军说：“只要最后进行一个冲刺，我们就大获全胜了。”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斯大林这时已经不顾一切，决心死守莫斯科。在12月初，苏联人已经开始动用他们的战略后备力量了，把他们最精锐的西伯利亚师团从远东调到了前线。这些精力充沛的部队身穿加厚白棉衣，戴着皮帽子，开着有防冻被的坦克奔来眼底。斯大林深谙表演示威的重要性，于是，他在红场的列宁墓上检阅这些精锐部队列阵通过，向城里仅存的人口展示着军威，然后让那些接受检阅的部队直接开赴战场。在12月4日和5日，在莫斯科前沿100英里的战线上，苏联军队展开的密集大反攻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克拉克后来写道：“苏联人在1941年所展示的恢复战力和冬季反攻，已经成了战争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赞美的成功战例之一。”与此同时，游击队也在德军后方不停地破坏，中断他们的后勤运输。

更为严重的是，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现在也被粉碎了。突然之间，这些冻得要死、饿得要命、惊恐万状的人想起了拿破仑和他的百万大军在1812年所遭受到的情景，同时，他们也恶狠狠地咒骂柏林的军需官员，骂他们没有送来过冬的衣物。戈培尔组织了一场富有煽情性的圣诞节募捐运动，结果到了2月，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士兵们，就在寒风中颤抖着，身穿着女人的大



衣、背心，还有内衣，围坐在荒凉苦寒的苏联大草原上，在若有若无的冬日下烤着火。

苏联军队穿得很暖，一路把入侵者驱逐后退100英里。这时候，希特勒戏剧性地进行干预，也许正是他的这一干预救了德军的命。他坚决制止德军的进一步后退。他回答那些请求后撤的将军们，用的是这样一个讽刺性的反问：“后退50英里就不冷了吗？”君特尔·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希特勒从无好感，可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希特勒要部队在那种不可能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住所有阵地，他这种疯狂的命令无疑是正确的。希特勒本能地认识到，穿过冰雪的大撤退必然会在数日之内造成前线的崩溃，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当年拿破仑大军所发生的一切，就会在德国军队的身上重演……撤退只能在开阔地进行，因为道路已经完全被大雪封死了。只要经过几夜的行军，军队就再也受不住了，他们只能躺在地上等死了。后方没有他们的休整之所，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卫的任何防线。

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后撤的将军都被取消军衔，就地免了职，再不许穿军装。其中一例是，汉斯·孔特·冯·斯蓬耐克将军，那位曾率部在海格成功滑翔夺取要塞的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不得不撤出克里米亚，结果，他被逮捕，遭到军法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在另外一个案件中，据说希特勒这样对一个撤退将军说，他“没脸再穿军装”，于是把他就地免职，让他脱下这身军装。最后，希特勒把普鲁士军官们的意志与精神完全摧垮了，结果在战争的余下日子里，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光杆总司令。

## 苟延残喘的德国军队

但是，疯狂的、严厉的措施最终起了作用。德军的撤退没有演变成大崩溃，他们没有遭到拿破仑大军当年的厄运。相反，他们就地驻扎下来，在覆盖着厚雪的开阔地上挖出了战壕死守在那里。军人们学会了如何挖出雪洞，



藏身于苏联的广袤地带，打退了精锐的西伯利亚军团的进攻。在他们背后，仍然有大量的早期攻下的城市，可以保证他们的军需供应。空军也来投送军用物资和武器，运走伤兵了。士气开始得到提升。现在，他们建立起了一种所谓“刺猬”的系统，把那些重兵把守的城镇和农场联系起来。战线得到了巩固。

到了1942年2月，西伯利亚战士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冬季攻势之后，也感到疲惫不堪，开始减缓进攻了。苏联人的反攻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在无尽的严寒中开始了胶着战争。双方都经常处决俘虏，而且，德国人为了生存，把大量的平民当成游击队击毙，扒下他们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有一个德国兵这样在日记中写道：“这简直是生活在13世纪的恐怖中。我们在冻死的马身上割下一块块的肉来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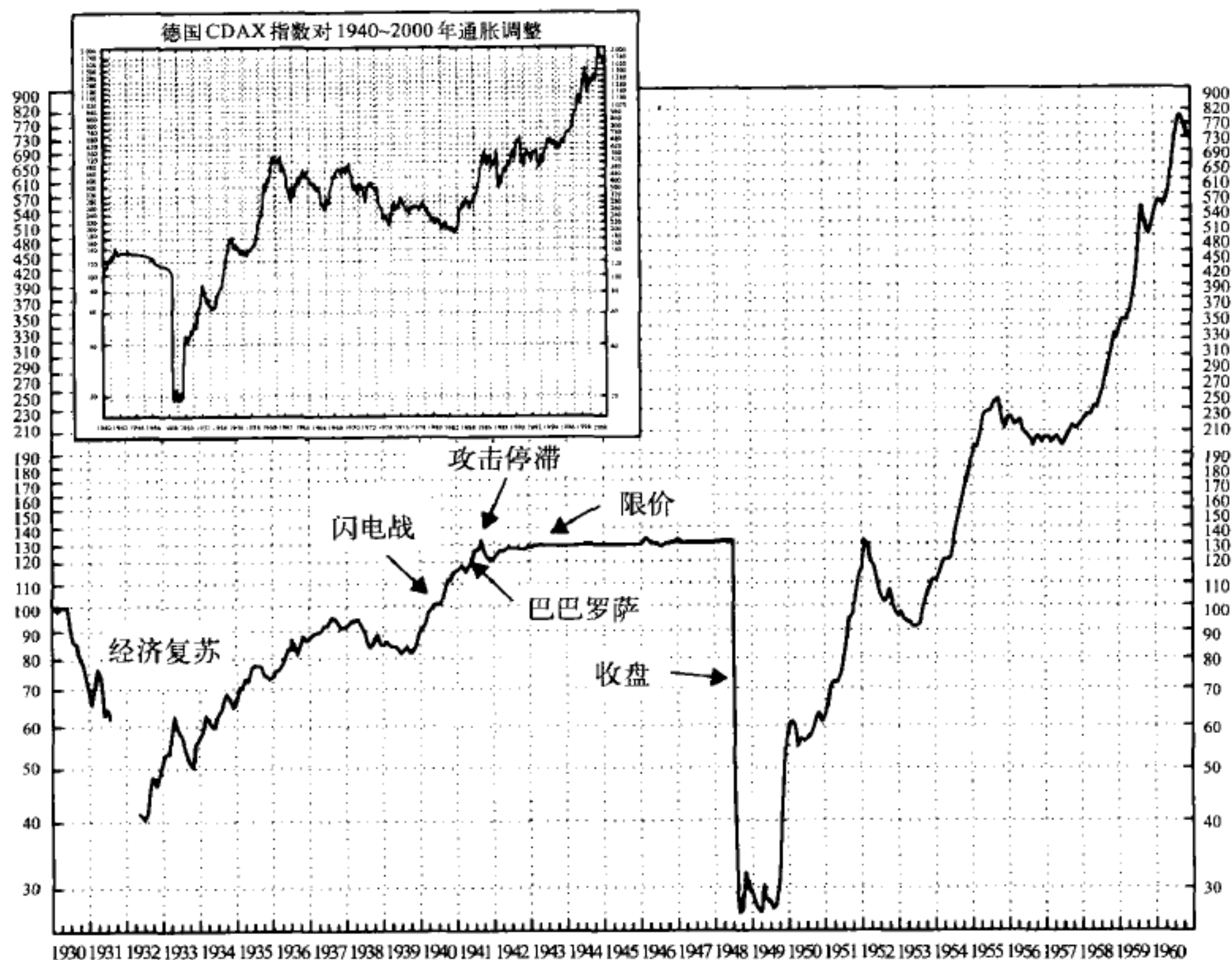
## 柏林股市的感知

图6-1显示了柏林CDAX指数对1930~1950年期间通胀的调整情况。从1932年的探底，到1937~1938年的冲高，德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股市，因为国内经济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大恐慌中得到了强劲恢复。不容置疑的是，希特勒的强势领导和个人魅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接下来，从1938年的春末一直到1939年的年末，德国投资者与普鲁士的将军们一样，对希特勒在欧洲的冒险持一种怀疑态度。事实上，德国人民对战争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热情，与1914年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们对当年第一次大战时和战争之后的苦难记忆犹新，对纳粹穷兵黩武和迫害犹太人也忧心忡忡。关于政变和集中营的谣言四处传播着。

然而，到了1939年下半年，远在闪电战开始之前，德国股市就预感到了1940年那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到来。到了1940年，还有整个1941年，德国经济由于军工企业的发展而腾飞。食物充足，因为德国大量掠夺被占领国家的粮食，失业也几乎不存在了，企业利润高到不敢想象的程度，因为他们使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也就是从法国、波兰和荷兰运来的劳工。

股价一直攀升，直到1941年1月份，股市才稍微休整了一下，然后在巴





资料来源：全球金融数据

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前，又一路直升。股市的表现令人惊讶，因为它带有一种不一般的远见，就是在1941年晚秋，德国股市已经多少感知了希特勒的幸运，他那永远正确的本领正在走下坡，也感到了德国军队的辉煌已经到达顶峰。德国国防军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了。要知道苏联人的反攻，德军撤退，还有1941~1942年的大困缺这时还没有发生呢。

进攻中止、苏联地域太大太难征服的消息，是如何传到德国的呢？前线部队是可以写信回家的，但是他们的信要经过严格审查。事实上，一直到1942年春季和夏季，根本没有部队休整换防，撤回国内，同时报纸和广播里的新闻也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官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也从来没提过苏联前线的进攻停顿了下来，没提到冬装短缺，也没提到在苦寒之中所受到的苦难，更没提到那10月和11月就冷得要命的天气给德军和装备带来了多大的困难。

刚好相反，媒体天天描写德军如何表现英勇，战斗如何接连取胜，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沙漠地区的军事行动，情况都是如此。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一片欢乐，多姿多彩。德国人有的是钱和食品，他们绞尽脑汁地找好词儿赞美自己的英勇战士，纪念他们的无畏精神。除了股市，还有谁知道形势已经逆转了呢？连将军们都所知甚少。我们将要分章讨论，一年以后，柏林处于一片饥荒之时，国家控制了股票市场。

整个1940年和1941年，有些非犹太德国富豪被形势发展吓坏了，开始把钱汇出德国。那是一件费脑筋的事，把金条或珠宝首饰弄到瑞士并不难，但是要把大笔资金汇出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首先，德国有外币兑换控制机制和税法。另外，如果往国外大量汇钱，要被政府认定为不爱国，甚至要定性为叛国罪。尽管中央银行和德国财政部有许多腐败行为，但你要进行这样的交易，简直是冒险。不过，瑞士的银行家说，确实有大笔钱汇到了苏黎世、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和圣迭戈的利息很高的账户上，在那里，那些钱一直待到了战争结束之后。战后的记录表明，到了1943年，确实有一些纳粹党人“为了以防万一”，偷偷地把钱汇到了南美洲。

当1942年温暖的春风吹来时，德国军队又可以组织进攻了，装甲军团又可以在飞机的掩护下攻入苏联大草原了。但是，对德国股市来说极为珍贵的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1941~1942年的寒冬里彻底破灭，再也没有出现。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与日本的战争正要展开，那场战争是从一次最具戏剧性、最胆大包天的偷袭开始的。







## 第七章 珊瑚海与中途岛的奇迹

在世界的另一边，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战事的发展。这个国家一直感觉自己不够强大，原因就在于自己没有建立起一个殖民帝国，同时也缺少生产基地。它对列强霸占亚洲殖民地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恨得要命，一直相信它的使命就是要在远东地区成为霸主。现在，欧洲列强已经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美国显然想置身事外，它相信好机会终于到来了，终于可以夺取自己所需的领土和资源了。

1941年的日本，首相是近卫公爵，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丘吉尔把他描写成“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曾在世界各地周游，而且，他也相信日本与美国交战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天皇与皇室成员都不想跟西方国家开战。他们对英国王室极为崇拜，怀有深切的好感，一直模仿英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帝国海军军舰上要吃西式午餐，就餐时有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端菜送



酒，乐队在一边奏乐。此外，日本与摩根银行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日本的贵族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在关东大地震的困难时期，摩根银行曾向日本投放了大笔贷款。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是一个手握重兵、影响力极大的思想家，他很了解美国，与美国打仗使他心存疑虑。他承认日本已经设计并建立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海军，它的陆军也身经百战，素质精良，但是山本五十六争论说，作为一个工业强国，日本根本无法与美国一较高下。在某些方面，日本的经济还处于中世纪的水平。例如，日本生产的新型航空精品，即零式战斗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不过它却是用牛车拉出工厂的。

日本海军的传统制度，甚至它的海军学院的训练模式，都是照搬英国皇家海军的方式建立的。军事学院的管理制度，学院所培养的军官的品性，都在埃文·托马斯所著的《霹雳之海》一书中得到了生动描写。海军学员要由英国教员来教授就餐礼仪，要跟英国人学怎样敬酒。他们学到了这样的信条，就是自己要永远乘坐头等舱旅行，绝不能让人看见自己搬着行李。海军学院和舰船规章都是极为严格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对天皇绝对效忠，要服从上级，随时准备在战场上牺牲。

不过，军校学员也惨遭虐待。即使对规章有轻微的违反，也要受到毒打，要受到加班站岗的处罚。每个星期天，一年级学员都要在院子里立正站上4个小时，要挨高年级学员的耳光，被痛打一顿。体能训练课的强度非常大，简直是不近人情。观察训练的英国军官曾提出疑问：这样的训练会不会培养出一大群机器人？因为伞兵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已经在痛打中丧失。不管它的斯巴达式折磨有多么吓人，这所学院还是有许多人去报名，通常一个招生名额都会有30个人来申请。

一旦毕业，军官们都要遵守严格的纪律，要麻木不仁、听从指挥，不能越级行事。可是，一旦放假，他们就会纵情狂欢，整晚在酒吧里胡闹，喝得烂醉，有时还会互相坐在同伴的腿上呜呜痛哭。

事实上，纵观整个帝国海军，体罚只是为了强化军纪，让官兵们盲目地服从。尽管日本海军作出周密计划，从事最为专业的行动，而且，相比陆军它更缺少民族偏激思想，更有世界大同思想，然而，它所推崇的还是古老的



传统。就像古代的武士可以把任何挡路的普通人一刀杀死一样，在1941年，日本海军军官也要执行这样的命令：如果任何士兵没有向他们敬礼，或者没有听从上级的命令，那么，他们就要用拳头痛击那个士兵5次。日本军舰上一般都有一些吹毛求疵的军官，他们手持细而重的棍子，即所谓“教导棍”，如果哪个士兵没有及时听从他们的命令，那么，棍子就要朝他们打过去。这种治军之法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仇恨情绪。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绝大多数的日本军队和工业的精英们都认为，美国已经是一个腐烂变质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大熟瓜，就等着伸手去摘了。但是，在1941年的一次战略计划会议上，一位后勤工作专家岩畔豪雄上校，向与会的那些军队领导人传送出了警告信息，那些领导人此时正跃跃欲试，要向美国“纸老虎”发出挑战。他指出，在1940年，日本只生产出了48 000辆汽车，而美国已经生产出了450万辆车。日本1/2的人口还在种地，它急需训练有素的生产线工人和机师。日本的军火生产能力只是美国的1/10，而它的煤炭和钢产量只及美国的1/13。日本在1940年只生产了产量很小的飞机，相当于美国的20%；造船能力只有美国的1/2；工业生产力只有美国的1/10。在敌对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加速生产舰船和飞机，要远远超过日本。岩畔豪雄上校这时很想知道，要攻击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否是明智之举。

## 日本侵略史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都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复合体，它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冲动感情结合到了一起，认为日本就是所谓的高级种族，它在过去2 600年的历史中从未打过败仗。在日本公共生活中，荣誉与勇气是主导力量，尤其是那群将军们，对和平主义者传达的信息深恶痛绝。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为躲避暗杀，不得不接受一个海军舰长的职位。岩畔豪雄上校则不得不打点行装，去柬埔寨上任。

日本政治具有一种黑暗而暴虐的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有一位首相和一位天皇顾问遭到暗杀。在1932年，对首相、财务大臣和重量级企业家的暗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1933年12月，天皇本人差一点被人谋害。3年



以后，最严重的军事政变发生了，一帮极右翼军官手持长剑和机关枪，在黎明时分冲进了政府要员的家中。四位重要内阁成员被他们杀害，就像举行一种仪式一样。首相冈田刚刚从日本议院议政回来，就碰上了凶手他家，是他勇敢的妻子救了他一命，那女人把他锁在了壁橱里，然后跑出去对着那些暗杀者大骂不止，结果杀手把首相的兄弟杀掉了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各个政府部门中，陆军对现代化战争的准备反而是最差劲的。它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及后来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之后，那些将军们由此深信日本的战士天生优秀，因为他们是优等种族，同时也训练有素。他们相信精神的力量更重要，比如要忠贞不渝，相信必胜。他们认为战争的精神要比人数和武器强得多。军官们在训练时，强调的是侵略性和进攻性。在日本陆军手册中，没有讲述如何撤退的章节。

1931~1934年，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防卫大臣荒木贞夫将军，对这位将军，伟大的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有过这样的描写：“那是一个穷凶极恶、混蛋透顶的意识形态狂，他发起了一种希特勒式的青年运动，是新专制武士政治的最重要的倡导者。”

## 避免与美国开战

在与苏联人的战争中，日本海军表现得极为优秀。但是，海军军官们对与美国打仗却不抱什么幻想。特别是那位山本五十六大将，为人严肃认真，极为讲究实际。在日俄战争中，他曾在对马海峡作战身负重伤。是山本五十六倡导了海军航空兵的建立。他相信，航空母舰将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他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日德兰半岛发生的那种大场面军舰对军舰对射开炮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他反对建造大型战列舰，认为那种东西的用处就跟一把武士剑的用处一样。正如前面所说，他了解美国，在全美各地都旅行过。他争辩说，日本没有自然资源，还没有建立起工业经济，因而无法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现代战争。他跟自己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不喝酒，只喜欢跟自己最爱的艺伎待在一起，纵情欢乐。



正如丘吉尔回忆的那样，山本五十六对近卫公爵说过这样的心里话：“如果让我不计后果，只是冲上去战斗，那我可以狠打猛拼持续6个月，甚至一年，但是我对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战斗却绝对没有信心。”然而，大财阀和强大的军部将军们却坚决主张利用欧洲的混乱局面，夺取东南亚地位的丰富自然资源，因为那些殖民地的宗主国正在互相残杀。他们强调说，作为一个工业国家，那些自然资源是至关重要的。1941年7月，美国、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封锁，切断了日本的石油供应线。那些了解日本的人发出警告，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一直反对战争的日本海军是要靠油来生存的。

由于外交关系日益恶化，深知日本军部好战性质的近卫，这时拼命寻找一条避免战争的出路。在1941年秋，他通过外交渠道，想到檀香山会见罗斯福，商讨某种临时解决方案。他提议把自己的那群军事官员都带去，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在达成的任何协议上签字，从而约束他们。罗斯福根本不同意近卫公爵的建议方案，并且拒绝与他会面。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要这样做，除非他早就明白美国最终会与英国结盟，因而想挑起战争，从而把自己的国家从孤立主义的倾向中扭转过来。1941年10月，近卫公爵被华盛顿的拒绝弄得心灰意冷，颜面扫地，愤而辞职，于是，战争的计划开始加紧进行了。

## 东南亚战略

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正是日本要控制东南亚这一复杂战略的标志性举措。在日本海军学院期间，山本五十六练习过空手道（面对危险敌人时以极有力的一招制服敌手），现在，他要用这一方式发动战争了。日本的战术构想是，美国的舰队会在珍珠港停泊状态下被摧毁，在其重建的时间内，日本已经夺取了东南亚。这一计划由心不甘情不愿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勾画出来，后来这一计划于1941年在日本海军学院得到完善。对珍珠港发动的袭击太过冒险了。它要求行动必须极为隐秘，通讯信号不能被发现，大批航空母舰驶越数千英里海域，无线电却要保持在绝对静寂



的状态中。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新的鱼雷技术、最好的情报收集技术、最有效的海上加油技术都必须发展起来。它还要求完美的协调，战术上的突然性，还要做到绝对保密，虽然可能有上千名日本人了解这一计划。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计划执行得完美无缺，你一眼看上去，那简直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功。然而，这一袭击所达到的战略影响并没有日本人设想得那么大，却产生了极糟糕的负面社会心理效应。首先，它把美国人民唤醒了，并使他们团结了起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12月7日发表讲话，把这一天定性为“邪恶之日”，把这次偷袭描写为胆小鬼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事实上的确如此）。其次，尽管美国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但大多数军舰都沉在浅水区，几乎所有的军舰都被打捞出来，在几个月之内就得到了修复，而不是几年时间。日本的海上优势在半年之内就终结了。另外，有经验的水手并没有太大的伤亡，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当时在远海执行任务，并没有受到损伤。这次行动对珍珠港的储油库和潜艇基地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然而，当时这些负面的效果并不明显，直到很晚的时候人们才感受到。在1942年，日本不停地对东南亚进行武力侵略，为了那里丰富的粮食、自然资源和石油。日本成功地从荷兰人那里接过了印度群岛的控制权，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好几个国家的老百姓还以为日本人是解放者，竟举旗欢迎这些征服者，以为日本人把他们从欧洲殖民者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经典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著作《鹰击落日》中，罗纳德·斯佩克特讲述了日本人如何解释他们的侵略，他们总是说自己的“圣战是要把亚洲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坚称自己不是从菲律宾人手中夺取菲律宾，而是从美国人手中夺取它；不是从马来人和海外华人手中夺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是从英国人手中夺取那两个国家；不是从印尼人手中夺取波尔尼奥、爪哇和苏门答腊，而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它们。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从殖民者手中解放这片土地，建立一个东亚共荣圈，摧毁的是欧洲人共荣圈。所有这些荒诞的宣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的那样，在整个亚洲激起了人们感激涕零的热烈反响。

不久，就传来了英国的两艘最新型战列舰“驱逐舰”号和“威尔士王子”



号被日军飞机击沉的消息。那两艘大军舰一直努力寻找日本运输船队，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在毫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在马来亚近海被日本飞机咬住，很快就被炸沉了，船上的绝大多数身经百战的水兵同时遇难。丘吉尔后来承认，这一噩耗可以说是整个战争期间，他所遭受的最痛心的打击。

接下来，马来亚也陷落了，日本军队现在已向世人表明，自己是熟练的丛林战士，把正规军战法与丛林迂回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穿过了一片又一片不可穿越的丛林地带。在马来亚半岛一路向新加坡挺进的路上，英国与殖民地军在数量上要多于日军，达到了2：1的比例，然而，他们总是不断地被甩掉、被伏击，最后在夜间偷袭中被歼灭。多年以来，每个日本年轻人都要受到两年的强制性军训。日本的军规可能是世界上最严酷的军规，每天要进行16个小时、每周要进行6天的军事训练。日本兵可以一连几周，每天行军25英里，背着步枪和达到自身体重2/3的行装。军事行动经常要在夜间进行。军人手册上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学会如何睡觉，他们还要训练自己学会如何保持清醒。”日本士兵必须学习“武士道”精神。小组作战要强调其攻击性，而最重要的是，绝不允许向敌人投降。

正如斯佩克特简明扼要地记述下来，日本海军在1942年以别出心裁的航母攻击战斗群，已经证明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海军武装力量”。多年以来，日本海军一直在练习夜战，练习航母战，而英美海军则仍然重复着日德兰式夜间炮舰对炮舰的老一套战法。日本航空母舰飞行员的训练时间是700个小时，而美国航母飞行员的训练时间是325个小时。事实上，在珍珠港偷袭行动中，所有那些鱼雷攻击机的飞行员都是老资格的战斗机驾驶员。

另外，日本的飞机也是超级优秀的。零式战斗机的装甲并不坚固，但是它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操纵最灵活的战斗机，同时，日本鱼雷轰炸机的速度更快，性能更优。日本的鱼雷行速更快，识别能力更强，它们触到敌舰就爆炸，而美国的鱼雷则不行，它们一般要潜水很深，很容易失去目标。日本要让它的最优秀、最有经验的战机驾驶员一直战斗，直到被敌人击落。美国则要对自己的飞行员进行轮换，担任一段时间前线战斗任务之后，就要换下来进行培训。结果就是，到了战争后期，日本的飞行员完全比不了美国的飞行员了，可是，在1942年，美国那些呆头呆脑的新手们要面对着日本那些



技术高超、开着最棒飞机的驾驶员。在1942年，日本的战争机器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

## 日本军事胜利对股市的影响

1942年新年伊始就看到纽约和伦敦的股市一片萧条，这当然毫不奇怪。美国刚刚看到自己绝大多数的战列舰在珍珠港折戟沉沙。也许，更令人惊恐万状的是菲律宾的陷落、科雷吉多要塞的投降，还有那接下来的死亡行军。4月9日，有76 000名美军和菲律宾部队在巴丹向日本人投降，一个月以后，科雷吉多要塞那13 000多名守军成了俘虏。巴丹的死亡行军就要开始了。身处困境的美国海军，连同英国与荷兰亚洲舰队的残余力量，这时与日本海军在菲律宾海域相遇，结果是屡战屡败。

相比之下，在东京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到1938年年初，日本已经转到了战时经济，实行严格的配给制。自然资源的贫乏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的国内生产力。市场上缺牙膏、巧克力、口香糖、高尔夫球，以及任何铁器。事实上，一队队的木匠被征调出来，到居民区去看一看谁家的房子上有多余的钉子，如果发现就要把钉子掘出来。不过，日本的股价却在整个1939年一路攀升，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是如此，因为投资者感到了日本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强国。在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股市表现得有些低迷，因为投资者担心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及后来对东南亚的征服之后，股市又一次大涨。

## 美国反击

在1942年4月中旬，美国开始反击了，至少是在象征的意义上。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的指挥下，搭载着航空母舰“大黄蜂”号来了。这一个小型航母战斗群悄悄地驶到了离日本不到650英里的地方，在这里，雷达探到了日本海岸警戒队的小舰艇。这个距离比计划的要远出150英里，这就意味着飞行结束时，美国飞机要一头栽进大海。不管怎样，杜立特



还是决定进行攻击，准备碰一下运气。从来没有人曾在航空母舰上驾驶B-25轰炸机起飞，但是所有的飞机最后还是愤然升空了。

那些轰炸机飞到了东京市中心的上空，躲避了雷达的监测，它们进行了超低空飞行，几乎刮上了树梢，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杜立特本人飞到了一座坐满观众的棒球场，把那里的人吓坏了。轰炸开始了，然而物质损毁并不严重。大约有50个人被炸死。美国人沿着逃跑路线飞向了日本，在那里，他们的燃油耗尽了，有的紧急迫降在日本，有的掉进了大海。杜立特后来荣获了“荣誉勋章”。

这场轰炸的心理效果是巨大无比的。美国的报刊和公众欢欣鼓舞，日本人则被惊得目瞪口呆。这80个飞行员中，有8个人被俘，日本公众要求向这些“战争罪犯”复仇。他们立刻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有3个人被处决了，其余5个人被残忍地监禁起来，后来有一个死于营养不良。据斯佩克特说，山本五十六大将把这一次袭击看成是“一次令人丢脸的失败”，海军没有尽到保卫天皇和祖国的神圣职责。

## 控制太平洋

负责作战的海军总参谋部立刻直接向天皇汇报，要求进行报复，于是日本作出了计划，要征服太平洋中部的重要岛屿中途岛。（中途岛是一个环状珊瑚岛，从格林尼治子午线/国际日期变更线算起，几乎就在绕地一周的中途上：它在旧金山以西2 800英里，日本以东2 200英里，坐落在夏威夷最东北角的环礁海附近。）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舰队将要担任主攻，进攻的最高潮将是两栖登陆。

在此期间，4月下旬，日本发动了一次长期策划的进攻，意在扩大它们在亚洲的影响范围，从而为入侵澳大利亚作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夺取莫斯比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坐落于南部海岸，与澳大利亚最北端隔着珊瑚海相望），把它当做进攻澳大利亚的空军基地，从而夺取正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图拉吉（两者都是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也在珊瑚海上，即在北澳大利亚的东面），这个岛以后会成为一场长期血战的主战场。澳大利亚已经



派出自己仅有的四个训练有素的师以及所有的军官在中东作战，现在国防空虚，准备从海岸进行紧急撤退，从内陆反击侵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热衷于党派争斗，现在则开始让丘吉尔的日子无比难过，因为他们天天抱怨自己遭到了遗弃。这样一来，盟国就感到对日本的进攻必须进行反击了，于是，一支临时组建的美国部队建立，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海军上将法兰克·杰克·弗莱彻。

## 珊瑚海战役

从1942年5月4日到5月6日，这支美国舰队截击了日本入侵部队，与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逐战。那支日本舰队由三艘航空母舰、大批精锐飞机和众多的巡洋舰组成，当时它正要驶往图拉吉和莫斯比港。后来这一战役被称为珊瑚海战役。当时的天气变幻莫测，大雾弥漫，不时有闪电霹雳划过长空，随后下起倾盆大雨，这样的天气当然影响到了空中行动和攻击的结果。在那一次次小规模冲突中，运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次，命运对着美国人微笑了。虽然在这时，两支舰队的距离只有60英里，它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对方，也没有进行直接交锋。

日本舰队无论是航空母舰还是重型巡洋舰，都比美军的数量多，而且配有大量经验老到的飞行员。然而，从一开始弗莱彻上将就是一个进攻者。在第一轮的交战中，他就对日本入侵图拉吉的舰队发起了三次空中打击，击沉了一艘驱逐舰、两艘巡逻船、一艘运兵船，并重创了另一艘运兵船。日本舰队在开阔的海域遭遇美国舰队，没有空中掩护，因为主力舰队这时在数百英里之外，由于要在深海地区加油而耽搁了行程。日本舰队的损失是如此之大，入侵图拉吉的行动不得不停下来，直到第二天才能重新组织起来。

到第二天早晨，透过一片裂开的乌云，一架美国侦察机发现了正要去入侵莫斯比港的日本舰队，它已经与日本主力舰队分离开来。弗莱彻立刻动用了他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去攻击这支日本舰队。他的飞机击沉了“祥凤”号，那是一艘要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航空母舰，结果造成了入侵行动的拖延。弗莱彻的飞机返回了航空母舰，但是，正当它们加油之时，从日本主力



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出现了。对于美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这时一大片乌云凭空飞来，盖住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使日本飞机再也看不见它们了。弗莱彻得以休整，让他的飞机又加满了油。这时的天气是如此恶劣，那一大群日本飞机竟然迷失了航向，把美国航母当成了自己的航母，还想在上面降落，结果都被一一击落。还有一些飞机掉进了大海。那27架飞机中，只有不到12架飞机安全地返回到了自己的航母上。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另一艘日本大型航空母舰遭到了重创，结果它失去了续航能力。第二天，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遭到了70架日本轰炸机和鱼雷机的密集攻击。航空母舰上的护航战斗机表现得极差，让日本轰炸机得以接近轰炸。那艘最大的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损伤极为严重，最后终于沉没了。可是日本人直到中途岛战役结束才了解了这一点。另一艘航母“约克城”号也遭到打击，伤得不轻，最后不得不送回珍珠港去大修。美国还损失了一艘舰队加油船和一艘驱逐舰。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国鱼雷轰炸机的表现极差，简直就是一些无用的死亡陷阱。它们发出的鱼雷行进得太慢了，日本军舰都可以加速把它们甩到后面。有时它们也能击中敌舰，却又没有爆炸。相比之下，日本的鱼雷却是又快又准，很少出现失误。

在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日本人感到没有空中支援，不得不延迟（结果却是永远地被延迟了）对莫斯比港的入侵。珊瑚海战役是历史上第一次特殊的海战，两支舰队完全没有打过照面，没有直接进行水面交火。它是一次纯粹的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海战。美国损失了33架飞机，日本损失了43架，还有他们的优秀飞行员。日本人认为他们赢了这场战斗，但是从战略上看，美国第一次阻止了日本的扩张行动，同时，美国海军也证明，它可以以劣势装备打一场以航母为主的海战，消灭穷凶极恶、杀人如麻、装备精良的敌人。

## 中途岛的奇迹

在这期间，对东京的袭击把日本人气得发疯，他们加紧了入侵中途岛的计划。他们总是用桌上兵推的游戏来练兵，用掷骰子的方法来推算那不



可预见的情况，作好应对措施。中途岛的人侵计划进行得不顺，因为那只骰子显示出有可能被发现，而且有可能落入美国舰队的埋伏。然而，山本五十六的参谋总长辩解了骰子作出的不利判决，认为美国人“已经受到了极大损失，再没有与日本对决的雄心壮志了”。日本海军军官们对自己的海军优势有着极大的信心，相信他们在中途岛一定会大获全胜，所以，这次他们把自己心爱的个人用品都带到了船上，而上一次偷袭珍珠港时则没敢那样做。

由于备战的进程加快了，日本的通讯联系更易遭到破译。美国破译员们已经在5月中旬破解了天皇密码，一点点摸清了日本人要进攻中途岛的意图。一开始，华盛顿认为这一情报并不准确，不相信日本会派出主力舰队，去进攻一个遥不可及的珊瑚礁组成的小岛。他们不明白日本为荣誉而战的心理因素。最后，美国情报人员所搜集到的情报终于说服了他们。美国开始向中途岛紧急增兵，一个庞大的、临时拼凑的舰队在珍珠港集合了。5月22日，在珊瑚海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约克顿”号歪歪扭扭地驶进了珍珠港。一开始技师估计要用三个月才能把它修好。可是，上级只给修理工们三天的时间。到了第四天，它就带着那些修理工们一起起航出战了。

美国的舰队拼凑得太过匆忙了，它的火力远远不如日本的无敌舰队。在美国舰队中，有8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还有3艘航空母舰。美国海军的战列舰还在船坞中大修着，无法下水参战。舰队中最大的航空母舰“约克顿”号根本不适合再度出海，舰上的飞行员也都没有作战经验，对自己的飞机也不熟悉，许多人不过是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鱼雷攻击机及其所带的鱼雷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日本人这次派出了两个舰队。那支入侵舰队包括两艘战列舰，其中一艘是“YAMATO”号，它是山本五十六的旗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此外，还有四艘重型驱逐舰、两艘重型航母、两艘轻型航母。舰上的飞行员都身经百战，参加过珍珠港事件。

美国的作战计划是：让舰队悄悄进入中途岛东南的海域战位，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日本航空母舰施加打击，因为这时日本航母上的战机都要飞到中途岛去轰炸，以便为登陆作准备。美国舰队在火力上处于绝对劣势，根本没有设想要与日本军舰进行海面舰炮的对决。这个计划要成功，最重要



的是要做到隐秘藏身和突然出动。如果这一计划失败，日本就会控制太平洋、澳大利亚和夏威夷了，而美国的西海岸也要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事情发展的结果表明，运气和勇气成了这场海战的主要因素。

### 日本军舰驶入伏击圈

当日本舰队一路驶向中途岛时，他们严守电报静默的规定，相信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作战目标，没想到，这时他们探听到了在珍珠港那里有大量的电报信号在活动。结果，山本五十六命令对珍珠港进行空中侦察，由两架远程水上飞机来执行，看一看美国的舰队是否还在那里。那两架水上飞机要在半途加油，以便续航，于是他们降落在法属护卫舰浅滩的泊位地，那是一片辽远而无人居住的环礁岛。在那里，有两艘潜艇会集汇，给它们进行加油。当那两艘潜艇到达时，碰巧有一艘美国驱逐舰也泊在了那里。日本人足足等了三天，可是，那艘美国军舰就是不走，因此，飞机侦察的行动不得不取消。结果，山本五十六永远也没能探知美国舰队早就离开了珍珠港。

这时候，另一艘日本潜艇侦察了中途岛。艇长让自己的潜艇在晚上浮出水面，看到了一片繁忙景象，有大量的飞机不停地降落。看上去，中途岛似乎知道自己就要遭受入侵了。他把这一情报发给了东京，但是，山本五十六或者南云大将都没有得到这一情报，南云是这次行动的总司令，此时的舰队眼下执行着绝对静默的命令。结果，日本海上指挥部一直不知道他们要去进攻中途岛的意图已被识破。更为严重的是，山本五十六还不知道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跟踪他，等他发现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他简直是毫无察觉地驶进了埋伏圈中。

一天早上，日本航空母舰还指望着发动偷袭，让第一波上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升空，去中途岛轰炸扫射，为入侵行动扫清道路。这些飞机由日本的最优秀飞行员驾驶。对日本来说不幸的是，在半路上，他们被一架偶然路过的侦察机发现了，于是，中途岛收到了警报，所有的高射炮都开始瞄准戒备，所有能飞的东西都飞上了天，等着日本人的到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驾驶的是过时的飞机，还有差劲儿的飞机，但是他们打下了令人吃惊的足足38架日本飞机，还有另外的30架飞机受到了重创，再不能飞起来



了。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优秀飞行员也跟着丧命了。海军陆战队的25架飞机，只损失了15架，那是他们在整个战争中最高的伤亡数字，但是，他们给日本海军航空兵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整个空战只进行了20分钟便宣告结束了。

中途岛对入侵舰队进行了反击，出动了6架鱼雷机和4架B-26陆军轰炸机。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机在奔向战场的半路上就被击成了碎片，B-26轰炸机什么都没有攻击到。共有7架攻击机被打了下来。接下来，有16架海军俯冲轰炸机开始进攻了。俯冲轰炸机是刚刚出厂的，大多数飞行员还从未摸过这类飞机。在其中一架飞机上，尾炮手是一个机械师，从来也没有开过什么机关炮。有一半的飞机被击落了，同样它们也是一无所获。

南云大将现在允许他的飞机降落到航母上了，那些飞机刚刚从中途岛归来，还有他担任掩护的零式战斗机也要降落。他深信自己可以处理任何情况，不管中途岛给他制造太大的麻烦，他开始给飞机加油，挂弹，准备对中途岛进行新一轮的进攻。突然，他收到了一个来自巡逻飞机的报告，说美国舰队出现了。这报告来得太迟了。他立刻作出决定，不管什么炸弹了，只把飞机挂上鱼雷，去攻击美国舰队。一般来说，这一过程要进行半个小时，但是他的行动指挥官源田实允许从中途岛返回、燃油告急的飞机首先降落。这个时间安排后来证明是最为致命的。源田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战后当上了日本防卫厅长官，对自己在中途岛战役中的决定痛悔莫及，怨恨自己当时没有命令从中途岛回来的战机在空中绕个圈子，直接去攻击美国舰队。他知道它们没有返航的燃料了，而且，他与空中的许多飞行员都是密友。后来他承认，正是那种友情影响了他的决定，为此他痛悔不已。

## 成功的转机

这时候，美国鱼雷轰炸机从“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此时的作战协调根本没有建立，它们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这些陈旧飞机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80千米，在日本舰队离它们足有45千米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袭击的突然性。不一会儿，零式战斗机就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它们的勇敢甚至让日本人感到惊讶。山本五十六评论说：



“他们才是真正的武士啊。”第八鱼雷机中队的15架飞机都被击落了，30名飞行员中，只有一名飞行员活了下来。那个飞行员是海军少尉乔治·盖，他的飞机直接冲到了大洋中，正掉在日本舰队的中间。他身穿救生衣，差一点被一艘根本没有看见他的驱逐舰压进水底。在整个海战的剩余时间里，他就在战线的最前沿漂浮着，虽说很危险，毕竟被发现了，第二天就被一架美军水上飞机营救了起来。

接下来到达的是从“企业”号上起飞的14架鱼雷轰炸机。现在，零式战斗机又转向了它们。只有4架鱼雷机想方设法地接近了敌舰，并发射了鱼雷，可是，它们的鱼雷要么是坏的，要么扎得太深而错过了目标。然而，这些损失并不是白费的。这两队没有掩护的鱼雷机中队所发动的攻击吸引了零式战斗机的注意力，使它们没有发现这时从高层空间飞来的54架俯冲轰炸机，它们是刚从“约克顿”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整个日本舰队都分列展现在它们的眼底了，可以清楚地看见日本航母的甲板上挤满了加油、装弹的飞机。

俯冲轰炸机逆着阳光飞来，看到大多数零式战斗机正沿着海平面追杀不幸的美国鱼雷轰炸机。在几分钟之内，俯冲轰炸机就炸坏了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它们朝着甲板投下炸弹，炸飞了那些飞机、汽油、飞行员和弹药。舰上起了大火，二次爆炸震得那巨大的航空母舰剧烈颤动，一下子晕头转向，僵在那里。渊田美津雄上尉是一名飞行员，曾率队参与珍珠港偷袭，此时正在“赤城”号上，刚要跨进自己的机舱。突然间，他听到了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然后一声巨大的爆炸，航空母舰猛地摇晃了起来。他一下子被摔到了甲板上，然后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

“环顾四周，我无比惊恐地看到，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所造成的可怕性破坏。甲板的残片散落各处，形状就像一个个鬼面。我们的飞机机尾朝天，喷着火舌，冒着浓烟。眼泪再也止不住，流在我的脸颊上，这时，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四处蔓延。”到了下午，三艘航空母舰都沉入了大洋。其他的军舰也受到轰炸，损伤极重。一名兴高采烈的美国飞行员在把飞机拉起时，发出了这样的无线电信号：“挠了一艘航母”。

回顾那段历史时，你会觉得美国海军简直是犯了战争罪，因为他们派出



了那些速度慢、老掉牙、没希望的鱼雷轰炸机，带着没用的老式鱼雷去攻击日本舰队和零式战斗机。第八中队的15架飞机全被击落，两个飞行中队的29架飞机中，有26架再没有回来。52名海军飞行员中，有51人牺牲了。碰巧击中的那几颗鱼雷，还是坏了的。那些飞行员写给家人的信里，透露出了这样的情况：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冒的风险。这种行为甚至比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式”飞机还要恶劣，因为“神风式”飞机上至少还装有炸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张第八鱼雷机中队的30名年轻飞行员的照片，他们面带笑容，随意地站在“企业”号的甲板上，互相把手搭在同伴的肩膀上。这真像丁尼生在100年前写的诗，他描写了在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的英勇而悲壮的进攻，他用自己的诗篇让那些英雄们名垂千古。诗的题目是《轻骑旅的冲锋》：

“不要总是问为什么吧，  
他们的理由就是去战，去死，  
冲入死神的血盆巨口，  
冲入地狱的阴森之门……”

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年轻人要做这样的事呢？他们都是大学生，在1939年或1940年毕业于像耶鲁大学、莱斯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当时工作很难找，华尔街正在垂死挣扎，年轻人里面全是一些大家族子弟。职业培训计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初来乍到的“顾客代表”如果没有人脉，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当时的大公司根本不会聘请人。海军军官训练计划、飞行学校以及后来的海军金翼组织看上去相当有诱惑力，是不错的选择。那样的培训最终造就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群体忠诚。

那些痛苦万分的日本舰长们，看到自己的军舰在下沉，就用绶带将自己绑在了舰桥上，要与自己的军舰共命运。在“苍龙”号上，军规执行官阿部宽是海军的重量级摔跤冠军，这时被派上前去，要救他们所爱戴的舰长柳本，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当阿部宽走到着火的舰桥上，走到柳本跟前时，他这



样说道：“舰长，我来到这里，是代表您所有的手下，带您去安全的地方。他们都在等着您。”那位舰长冷冷地盯着他，拔出了自己的佩剑，然后，开始唱起了国歌。阿部宽向他敬了一个礼，离开了他。

## 惊人的逆转

现在，只剩下一艘日本航空母舰“飞龙”号了。在上午时分，它派出了两队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去攻打美国舰队。它们集中攻击“约克顿”号，冒着凶猛的战机拦截和防空炮火向航母冲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被击落，但是，那艘航空母舰还是被炸弹击中，接着，当它行动不便时，又遭到了两颗鱼雷的打击。航空母舰燃起了大火，船身偏斜，看上去要翻过来了。指挥官决定要放弃这艘大船了。没想到它还是在海面上漂着，尽管歪得很厉害。

这时候，“飞龙”号遭到了狂轰滥炸。它挨了飞机炸弹，也挨了鱼雷攻击。到黄昏时就开始进水，而且倾斜得厉害了。大火在舰上那座宝塔一样的指挥舱里着了起来。航母舰队司令山口多闻大将来将全体船员集合起来，命令大家都面朝天皇皇宫的方向肃立，带头喊出了三遍天皇万岁。他把自己的黑帽子交给一个副官，作为留给自己夫人的纪念物，然后，命令全体船员弃船。他转向了那艘沉没的航母舰长加来止男，举杯喝了一杯清酒，对他这样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啊。咱们一边赏月，一边随船沉没，好吗？”不一会儿，“飞龙”号就倾斜了过来，战旗还在飘舞着就沉入大洋。

山本五十六尽管身心疲惫，痛彻心肺，却仍怀有一线希望，觉得自己可以逼近美国舰队，展开一场夜间海战。美国的舰长们明智地（因为他们相当清楚自己的火力不如日本人）决定撤退。然而到了日落时分，又一轮空袭摧毁了“飞龙”号，不得不把它也放弃掉了。没有了任何空中掩护，山本五十六明白天一亮，他的航空母舰都没有了，他的舰队就处在可怕的状况中，很容易被空中打击消灭。要继续进行这次入侵计划无异于自杀，于是，到了半夜时分，他命令舰队撤退。在此期间，他的两艘巡洋舰，也是日本海军最大、最快的两艘舰只，在逃避美国潜艇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起。一艘在第二天遭到“大黄蜂”和“企业”号上飞来的战机的打击，葬身大海。另一艘歪歪



歪扭扭地勉强开回了“YOKUSKA”号。

在战争的迷雾中，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中途岛战役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一支毫无经验、胡拼乱凑的、火力弱小的美国舰队，按照敌人的游戏规则，打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夸大其词的战报之后，美国海军终于向世人证明它可以打仗，而且可以取胜了。在中途岛，日本人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另一艘受到了重创，相比之下，美国只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日本飞机也被打下来322架，美国则是150架。但是请记住，所有被击落的美国飞机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本来就不该飞到战场上去。

最为严重的是，日本蒙受了令人气馁的、无可替代的人员损失，那些参加过珍珠港事件和珊瑚海战役的王牌飞行员，跟航空母舰上那些久经沙场、经验老到的船员们一起阵亡，或者在战斗中失踪。日本海军的航空力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倒霉的运气、过度的自信，以及一系列的指挥失当，导致他们的努力前功尽弃。美国飞行员驾着破飞机所展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还有美国能破译天皇密码的能力，也是这一胜仗的重要因素。

那个天高气爽5月的早晨，仅在5分钟之内，整个战役的进程，甚至整个战争的进程，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一下子改变了。在上午10点25分，日本人看上去还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战胜利，一次可以让日本称霸太平洋、统治整个大亚洲的胜利，让它至少可以掌控亚洲达一代人之久。5分钟之后，日本的舰队司令南云大将就遭到了灭顶之灾。日本人不仅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2200名素质精良的军官和水兵，以及250架飞机，还有150名飞行员也阵亡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开着飞机一头扎进大海，因为他们没有航空母舰可以降落了。据伟大历史学家约翰·基根的说法，那些飞行员的损失，跟航空母舰的沉没一样，对日本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运气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并不是美国人精心策划的进攻战略所造成的，而是两个偶然发生事件的结果。美国鱼雷轰炸机出现的时间，出人意料地把日本零式战斗机吸引到了海平面的低空，看似精心布局，其实实属偶然。还



有，日本人在那个倒霉的时间段里，在航空母舰上加油、装弹，也是出乎意料的安排，结果是让空中的俯冲轰炸机逮个正着。第二个事件也是一个机遇的问题。在那个早晨的9点45分，一个美国俯冲轰炸机大队本来是与鱼雷机结伴而行，却不知怎么掉了队，迷失了方向，连日本舰队在哪里也找不到了。就在快到10点的时候，飞在最前面的一个飞行员发现在蓝色的太平洋上，远远地出现了一朵白色浪花，那是一艘日本驱逐舰，正在那里截获声呐，以探知美国潜艇的位置，可是当时它根本不该到那个地域去探截。美国飞行员猜测这艘驱逐舰一定是在赶回舰队的路上，于是，飞行大队就一路跟踪上了它，结果在最为敏感精确的时刻来到了日本航空母舰的上空。

## 战争的疑问

日本参与中途岛战役的三员大将，即山本五十六、南云大将（此人在自己的舰舰下沉之际似乎完全吓破了胆）和浩治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残酷、大胆又老练的行动，在4个月内摧毁了英国、荷兰和美国在远东的舰队，使日本得以控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浩瀚海域。他们的舰长也好，水兵也好，个个都身经百战，以海军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为荣，认为自己是天生优越的种族。中途岛战役让他们的自信全失。在中途岛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原先的精神状态。

在中途岛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日本政府宣布自己在中途岛“赢得了伟大的胜利”，甚至对自己的盟友希特勒也这样说，官方的日记表明希特勒听到此信，欣喜若狂。然而在军官团的圈子里，真相是隐瞒不住的。埃文·托马斯在其辉煌巨著《霹雳之海》中，这样写道：“所有活下来的高级军官都以中途岛战役为耻。”

一块否认失败的遮羞布掩盖了真相。让自己的优越感受伤，让自己感到未能为国尽责，是那些怀有使命感的日本人最受不了的。因此他们只好掩盖真情，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东条首相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没能了解到这场灾难有多么大，而公众则只了解到日本损失了一艘航母，



而美国损失了两艘。从沉船上逃生归来的军官们都被关在基地里，不能自由行动，而水兵们又直接被派到南太平洋去作战，甚至连家人的面都不能见。

山本五十六沮丧至极。然而，他强迫自己在一次海军司令部举行的秘密战略会议上，向自己的同僚和下属们保证战争还有希望。“我们把各舰队的力量加起来，还有8艘航空母舰。我们不能失去信心。在战斗中，就像下棋一样，心急就会冒险出招，走出一步臭棋，如果这样他真是一个大傻瓜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本人终于了解到，他们一直以为会无敌于天下的海军遭到了巨大损失，有些人因此对战争的结果开始怀疑。人们第一次开始心怀不满，有时甚至要搞些破坏，虽然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中途岛战役进行了反思。他对日本领导风格及作战计划的僵化，以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当事情的发展与日本人最初的计划不一样时，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就会作出糟糕的决定。他写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的语言所具有的那种性质，那种语言太笨拙混乱，太不精确了，所以当他们要用信号方式来反映临时出现的情况时，就显得极为困难了”。

日本在中途岛和珊瑚海的两次进攻战略，都遭到反击，损失极为惨重。尽管新加坡落入敌手，但是，在经过两次海战之后，澳大利亚感到现在安全了。山本五十六从一开始就说过，日本必须在开战的第一年击败敌人，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山本五十六在写给自己所爱的一个艺伎的信中，流露出了心灰意冷的情绪。日本人得到的教训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第八鱼雷机中队所表现出的英勇献身精神，彻底地纠正了日本领导层对美国人的偏见，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与一个软弱无能、智力低下的民族作战了。

由于这次失败，日本开始一蹶不振。从1942年7月起，日本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虽说日本仍然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可以挑战甚至打败美国舰队。不过，日本现在却采取了防守战略，结果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消耗战，这正是日本一开始要避免的，因为它打不起一场跟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大国的



持久战争。这时，美国已经在高速建造更为现代化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将近一年之后，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死了，他的飞机飞进了埋伏圈，因为日本的密码被破译，美国事先已经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结果在那里早有战斗机在等着他，他一出现，一架美国战机就将他的飞机打了下来。他的骨灰被送到了东京，在1943年6月，为他举行了国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天正好是中途岛战役一周年。

尽管世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美国股市（在下一章要进行详述）和温斯顿·丘吉尔却十分了解这一胜利的意义。在《伟大的同盟》一书中，丘吉尔这样写道：“这一胜利立刻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信心。只是那么一击，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就被逆转。敌人的惊人攻势曾让我们在远东地区足有6个月的时间里一败涂地。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思想是，要以清醒的自信投入全面的反攻了。”







## 第八章 股市对战争的精确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为自由和民主拼杀的战争，但它同时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幸存，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为股票市场的永续未来而拼杀的一场战争，在股市中美丽与邪恶会同时存在。自由资本市场要发挥资本提供者的作用，就要有独立决定价格的机制。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社会动荡与战局混乱中，全世界的股市有时隐晦、有时惊人地反映出战局的起伏。那只是大众的天然智慧在起作用，因为当时敌我双方都在控制媒体，不让它自由流传到公众那里，都把宣传当成武器。

每逢战争的转折关头，股市就会作出准确的判断。唯一的失误，就是东京股市对1942年5~6月的误判，它没能抓住太平洋那两次海战的深刻含义。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官方战报和日本的新闻界都把珊瑚海战役说成是大获全胜，中途岛战役也被说成是一次胜利，而不是失败，



虽然说过有几架飞机和几艘船遭到了损失。尽管人们知道会有一定伤亡，并为此哀悼，但是日本社会当时是如此万众一心以支持战争政策，对日本军队的战无不胜是如此坚信不疑，那次战败和经济损失简直是无人顾及的。如果因为听到了关于海军损失的传闻，就抛售股票，那就等同于卖国了。

一直到1942年年中，日本国内还是计划经济，对劳力、物价、工资和工业生产决定进行了控制。东条英机首相把中央经济政策交由军需省来制定，而军需省是由副首相来执掌的。虽然重组措施在理论上初见成效，因为它简化了组织机构，但是，它根本没能提高生产力，因为日本的原材料完全依靠进口，而美国的封锁日益显出了效果。从1942年秋一直到战败投降，日本的工业生产就处于持续下降中。美国经济从1940~1944年增长了2/3，而日本只增长了25%。

在日本，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误读了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所传来的信息。食物供应紧张，皇宫周围的铁栅栏被拆掉拿去炼钢了。野村家族以及野村证券在1942年年中就开始怀疑日本最终要失败了。虽然报纸也好，广播也好，都只报道战事进展的好消息，可是，野村家里的人显然是从上流社会的茶话会上收集信息的。许多参加了中途岛与珊瑚海战役的高级军官和飞行员都养有艺伎，当他们不能归国时，流言就开始传开了。野村家族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了，于是，他们就开始一点点地出售手中的股票和证券，甚至开始靠短线获利。后来，他们又买不动产，可能是认为土地和房地产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是最好的保值形式了。这些受到保护的资产使得野村家族在战后得以拥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扩张野村证券研究事务所的业务，最后终于成为日本最为重要的证券交易公司之一。

## 最有效的投资

相比之下，纽约股市几乎立刻就捕捉到了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的重要意义，虽然官方投诉的新闻署一开始还没有说中途岛战役是一个胜利，因为作战部一直广受批评，说他们在战争的前几个月把失败说成胜利。在1942年春，股市还处于低迷之中。在1941年的暴跌之后，股价在1942年前几个月里一



直保持着跌势，因为战报一直没有确定。德国潜艇在东海岸成群结队地出现，几乎随心所欲地猎杀美国商船，美国的运输船队简直是吓坏了。丘吉尔担心英国赖以生存的海上运输线可能要给掐断。在世界的另一端，新加坡沦陷了，爪哇之战是一场灾难，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已被日本人占领，而科雷吉多这个菲律宾最后的堡垒也投降了。美国的战争打得很艰苦，而且正如媒体一再指出的那样，它的军事管理水平也相当成问题。

在1942年，英美两国人民的心情都是坚决作战，同时又倍感绝望，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了信心。马修·阿诺德的著名诗篇《多弗的海滩》广为传诵，诗中表达出了这样的信念：“啊，让我们爱吧，让我们彼此真心相待！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真正的快乐，没有爱情，没有光明，没有确定性，没有和平，也没有疗伤的药膏。现在，我们身处黑暗的原野，到处是令人晕头转向的警报，告诉我们那里还有拼杀，还在轰炸，那里有不知名的军队在夜间混战。”

在战争年代里，当大量的人员在海上、在陆地上以及在空中死难时，在英国军官留言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首短诗：

有一个古老的信念  
相信在遥远的彼岸，  
没有绝望，没有悲伤，  
老朋友会在那里再次相见。

在1942年冬末和春季，日本威胁要入侵澳大利亚，同时，日本在东南亚的攻势一直在陆地与海上展开。纽约和伦敦的股市急剧下跌。一个失败接着另一个失败。日本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投资者也被英国在沙漠战场一再受挫弄得心慌意乱。在杜立特发动突袭之后，道·琼斯指数仅仅上升了一点儿，不管那些人如何鼓吹，到了4月末，道·琼斯指数还是下跌了20%。在整个战争期间，下跌最严重的情况发生于1942年4月30日，那一天竟跌到了92点，与1941年的最高值——132点——相比直跌了31%。

从1942年开始，更多的损失与失败接踵而来。伦敦和纽约的股市萧条一片，跌幅激增。事实上，正如罗伯特·索贝尔（写了一部论点鲜明的关于纽



约股票交易所的史书，题为《大盘》）描写的：1942年2月是交易所自1915年以来，交易活动最为惨淡的一天。在2月14日，只有320 000手进行了交易，1个小时的总成交量为30 000手。交易所的一个账户里，只换手17 000美元，是1897年以来的最低值，比1929年创纪录的高额625 000美元足足低了97%。

股市的不景气影响了房地产业。纽约的一家酒店无人去买，因为它入不敷出。华尔街写字楼的租金低到每0.3平方米需1美元。在詹姆斯·格兰特所撰名著《繁荣的麻烦》一书中，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无动于衷的恐慌”。需知此时股市下滑发生在这样的时期，当时生产蒸蒸日上，巨额赤字已经产生，而企业利润极为可观。

但是，股市却另有所思。美国财政部这时已经提出要把公司的所得税率提到60%，而美国国会成立的谈判委员会也形成巨大压力，它的目标是钳制剩余利润，有了它的存在，就再也不用想什么预期利润和分红了。政府还提出要对50 000美元以上的收入所产生的利润，征收85%的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政府看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利用战争动员时期的特殊情况，对贫富收入进行平衡，这些政策，再加上从战场上传来的败绩，军队的懦弱表现，都进一步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任何一个脑袋没有进水的预言家，都可以看出现在已经是一个熊市了。在1939年，有一位著名的哈佛教授（出于名誉的考虑，在此不提他的名字）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在文中，他说美国经济已经命中注定地进入了大衰退，因为出生率太低，还因为太多的国土无人居住和开发。他还说，我们太缺少新工业和新发明了。即使在撰写文章的时候，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在增长，而战争促使了上千个新型工业与新型技术的产生。

1942年年初的熊市，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不良表现。珍珠港事件，麦克阿瑟的空军在机场被摧毁，还有英美军队在整个亚洲的一系列惨败，所有这些一开始还都被描写成与一个强大无比的敌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当公众们尤其是投资者最后明白，那些唱高调的新闻说得好听点是在误导，说得难听点是故意瞎编，他们对军队和媒体都失去了信心。

在2月初，比尔·哈斯莱上将指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与日军展开突围反击战。在战斗中，海军飞行员宣称自己击沉了16艘日本军舰。哈斯莱的对讲机描述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他在一阵极为忙碌的通话频道里，不停地对自己那些打红了眼的飞行员喊话：“不要碰那艘巡洋舰，杰克，它是我的！”还有：“搞定了！看那个大家伙着火了！”《先驱论坛报》大肆宣扬：“这是公牛的复仇啊！”埃文·托马斯详细地描述了哈斯莱返回珍珠港时的情形，当时他乘坐自己的军舰，即航空母舰“企业”号，舰上巨大的星条旗和海军军旗飘扬，汽笛发出了狂吼，水兵们和机械师们都列队站在甲板上发出胜利的呐喊。后来才知道，哈斯莱的战报基本上是吹牛。他所谓击沉的全部敌舰，不过是一艘运输船和两只小船。

在1942年2月，有一个叫里奥·汉德森的物价局官员作出了乐观的预测，说战争成本将使美国退回到大萧条时期的生活水平。当时主要公司收益为2.75%，股票平均收益则约为8%~9%，大都会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就表示股票在一揽子投资组合中不能算一份，而纽约州保险公司也断定，股票是“一种不合适的投资”，不准把它算入保险公司的投资计划中。这种代价极高的禁令一直有效，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战后的大熊市已经开始了。

但是上天知道，股票是最有效的投资。不但分红收益要比债券高出三倍以上，而且在1942年4月份，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所售出的价格要比1941年打折出售以套现的股价高出近4倍。这些受到追捧的股票都高出发行价4~6倍的价格卖出。W·E·贺顿以高傲的口气评论说，罗斯福总统也许“应该对房不遮雨、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股票市场给予更多的关心”。在600只有代表性的股票中，平均收益率为5.3倍，只有10%的股票的收益率比前一年度高出了10倍。

然而，有一只蓝筹股还是剩下了。拜伦公司的哈利·纳尔逊在4月13日写道：

在1928年年末和1929年年初，有人可以看出前途不妙，但是，市场却不会，也不能崩盘。今天，我们相信是一个买方市场，只是看上去，这个市场永远也不能翻盘了。



## 股市探底

接下来，在1942年5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运气进一步发展，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在胡乱叫卖中、在熊市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美国股市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世界其他地方，坏消息也接踵而至，但是，市场大众感到与日本战争的形势已经逆转了。在5月初的珊瑚海战役，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只是打成平手，但是这是日本第一次没有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想攫取莫斯比港，那是登陆澳大利亚的桥头堡。也是日本在亚洲的侵略第一次被遏止，同时，美国海军显示出自己有足够的能与日本这样的国家相对决。接下来就发生了中途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由于隆美尔夺取了图卜鲁格，市场在6月份还是小幅振荡了一下，但是在4月末至5月初，市场已经探到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初以来大熊市的谷底。

1942年4~5月的谷底是历史性探底，它孕育着一个新的、周期性的牛市，这个牛市持续了4年之久，虽然在期间还有小幅调整，但是在1946年5月29日达到了顶峰。1945年是辉煌的一年，许多大公司的股票都上涨了36.4%，而一些小盘股的股价更是跃升了73.6%，以一种惊人的态势冲出了1942年的谷底。根据伊博森事务所的统计，那些小盘股在1942年涨了44.5%，在1943年涨了88.4%，在1944年涨了53.7%，而在1945年则涨了73.6%。一旦云消雾散，股市就像一股春风劲吹万里，直上九霄。

## 战后美国市场的蓝筹股

事实上，股市第一次真正的下挫发生在1946年2月，道·琼斯指数那时以经典的“警告裂隙”下跌了10%。从2月26日的那个新低反弹，道·琼斯指数在78个交易日里上涨了14.2%（当时的股市每周营业6天），从一个经典的低开高走冲到了5月29日的顶峰，那是自1930年以来的最高值。接着，股指又在低位振荡了两个月，接着在一个月之后又大跌了20%。

美国的股市随后陷入了一次战后的低迷状态，在那个状态中几乎震荡了3年之久。蓝筹股股价下挫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经济还在艰难挣扎，冷战



已经拉开序幕，美国的经济也处在困难的调整期。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国防开支的刺激，美国将要陷入滞胀，失业率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1946年，通货膨胀达到了18%，而在1947年则只有9%，然后，在1949年急剧下降到了1.8%。股市与债券都处在萧条状态，直到战后的世界格局终于在1949年明朗了起来。

## 日本股市

日本的股票市场极具自身特点。在1942年前6个月中，随着日本强大的军事机器吞食了大片的亚洲领土，日本股市一片繁荣。一种大牛市的气氛充斥着东京股票交易所，投资者开始相信，日本现在终于成为一个殖民帝国了，有了广阔的生产原材料基地，并且保证了它最为急需的石油供应。日本的公司不仅要在东亚地区独占鳌头，而且，要在整个亚洲称王称霸。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和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终于浮出了水面。这种全面欣欣向荣的气氛，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出现在日本，从那之后，日本又一次进入了股市的繁荣期。

但是，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942年吧。就在那年的年初，日本的厚生省开始关注如何为战争提供资金，于是一个年轻的副厅长想出了一个计划，他要提高股价来使国家富强起来。厚生省（当时它说的话就相当于今天的法律）鼓励建立起这种大规模的股票交易所，鼓励市场创建公共投资基金。日本人民喜欢“新日本”这个想法，于是股市的投资规模一路狂涨，股市在1942年和1943年这两两年时间里一路走高，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表现的。可以说，投资者还是乐观的，因为他们相信日本至少能保住新创起来的大东亚帝国，但是，正如在德国发生的情况一样，经济的表面繁荣完全是人为的，因为它靠的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提高通胀率取得的。

到了1944年，战事已经变得相当吃紧。学校的孩子们都得去干活，生产气球炸弹，要让它们飘浮5 000英里，横穿太平洋，在美国的西海岸引起大火，烧死美国人。政府规定一个星期要工作7天，妇女要干重体力活，此时的人们开始感到极为不满了。在194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新高，因为政府大



量地印钞票、发行债券，以便为战争筹钱。黑市与非法交易遍及日本。1944年3月，厚生省开始对股价进行控制了，而且不管怎么样，股价都要被冻结，这源于人为控制。但是在实际市场价值上，它们已经在下跌了。交易量急剧下降。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东京和大阪的股市就正式关闭了。

在1945年，随着失败、无条件投降，以及马上到来的军事占领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和股市都垮掉了。1944~1946年，经计算，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46%，当然那是一个极不准确的预测。1940~1949年，日本的股价每年要下跌到令人震惊的25.7%。货币幻象因素可以用这个事实来作最好的诠释：在纸面上，从1930~1949年，股价上涨了3 280%，但是在真正的市值上，它们下跌了75%。政府债券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它们的回报率下降了17.0%。换句话说，在20年的时间里，当日本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军事态势时，它的长线投资纯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是不确切的数字，股票也好，证券也好，都是伦敦商学院的计算结果，而他们使用的是三种不同的指数。然而，从1949年5月以后，数字就比较可靠了，因为那些数据是日经225指数计算得出的，后来在1995年则为TOPIX指数搜集而成。

股票交易在1945年年初又恢复了。由于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大楼被美军作为体育馆征用了，大阪的股票交易所改成了一所医院，非正规的市场就由交易员们在酒店房间开设，那些酒店就在原证交所的附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公平与投机，早已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1945~1949年5月，一个非正规的个股现场交易市场发展起来了，该市场的指数是用日经-道·琼斯平均指数来计算的。

一开始，开盘价从人为控制的价位上猛跌不止，因为那种控制价是厚生省在战时控制股价而人为设定的。股息记录都没有保留下来，但是那些交易数字包括“中断插入”，不管它到底是指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这个非正式市场自我发展了起来，这时的商人和投资者对日本的未来有了信心，交易也日益活跃了起来。有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因为在1948年以前，就有一些有眼光的投机商预感到日本有一天还会复兴，还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于是他们在市场极为萧条的水平上购进了大量股票。

战后，那些老的蓝筹股公司急需资金，以重建千疮百孔的工厂，为了得



到资金，它们就向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任何有资本的人出售新股票。这些股票很难卖给个人投资者，因为他们害怕将来那些公司会再发行股票，从而稀释了自己的股份。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但是那种稀释是有好处的，因为资本的融入最终使这些公司成了世界级的竞争者。第一只发行的股票是1946年4月发行的新日本化工，接下来的一年里，据阿尔伯特·阿里日豪泽在《股市战争》一书中所讲，又有24只股票发行了。

到了1947年，公众又对买股票产生了兴趣。股票经纪公司开始聘请年轻人当推销员（绝大多数的老推销员都在战争中被杀了），而这些年轻一代极善于创造名言佳句，他们的一句经典语句就是“买一只股票吧，少买一盒和平牌。”“和平”是当时一个知名品牌的香烟，售价是每包50日元，生产“和平”牌香烟的烟草公司推销自己的香烟，让战后初期平均每人一天抽1~2包这个品牌的香烟。那些买了股票的人买到财富，而那些买烟的人买下的却是伤害身体的苦果。

## 改革日本经济

日本投降后，事实上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日本总督。关于麦克阿瑟所作出的那些复杂的决定，比如要把谁当成战犯来审判，如何对日本进行改革，如何来统治这个国家，种种细节都在詹姆斯·韦伯的《皇帝的将军》，以及威廉·曼彻斯特那部史诗般的传记《美国的恺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这两本书中有过精彩记述。麦克阿瑟想对日本进行改革，使它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不是因其所作所为来惩罚它。他所作出的一个关键决定是，不把天皇作为战犯来审判，虽然美国和绝大多数盟国都要求这样做。除天皇外，有若干将军和政府高官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死刑。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些人最大的犯罪是仗打得太好，投降的速度太慢。麦克阿瑟要进行的改革是自由的、民主的。日本接下来的经济成绩，以及它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说明了这个民族的明智。然而，改革对现存的财富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麦克阿瑟是名门之后，精英中的精英，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有钱人。他决心摧毁财阀制度，终结封建主义，对代代相传的特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具体方案包括：土地改革、废除贵族、对富人征高额所得税。所有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进行过资助的银行都被吊销营业执照，财产被没收。

关于土地改革，1945年在日本有160 000个富有而不劳作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每人平均拥有36个小农场，控制了日本89%的可耕地。约有1 000万名农民就在一小块一小块分割的土地上劳作着，有的是农奴，有的则是短工。麦克阿瑟宣布，所有不亲自劳作的土地所有者，都要将所拥有的土地卖给政府，售价则按政府给出的价格，简直低得可笑。这些土地随后就以同样的价格分成小块，卖给那些农民，而且是以3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支付的，同时也规定购买者必须自己亲自下田耕作才行。

这是一种社会形式的改革，而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国会批准这些激进的措施。但是，日本国会坚决反对，因为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土地所有者。经过一年的消极抵抗，国会最后对麦克阿瑟作出了让步，《土地改革法案》最终在日本国会不情愿的情况下得到了批准。虽然有少许一些例外，不过到1950年，有500万英亩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这造成了财富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再分配，这一举措永远地改变了日本的财富构成。

然而，这样的改革却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要求购买者必须亲自在土地上耕作的条款很难执行。美国和欧洲的人们如果了解日本的话，会认为这样的土地买卖简直是太便宜了。战后初期的冬天冷得要命，人民在挨饿受冻。投机家们穿着皮衣，戴着钻戒，吃得饱饱的，要什么有什么，现在又朝农场主们伸出了手，结果最后在土地上赚了大钱。地价太便宜了，你简直可以用一杯咖啡的钱买上一英亩土地。在黑市里，有人专门从事建材生意，因为重建废墟般的城市需要大量此类材料，于是，在战后的前几年里靠这个也发了大财。

麦克阿瑟下定了决心，要铲除日本的垄断组织，那正是财阀们的核心架构。最大的垄断集团（其中有80家进行了处理）被分解为小一些的公司，由战前的经理人进行管理。私营家族式的上市公司都被取消了。此外，持有证券资产而最富有的11个家族，被迫以他们手中的股权换取了政府债券，而那种债券在10年之内是不能上市交易的。对收入的征收累进制所得税也立法通过了，对遗产继承的课税大幅增加，最后提高到了75%，那就意味着个人财



富在三代人之内，就要通过税收被扣掉了95%。现在日本的遗产税仍在60%之间。

显然，所有这些措施对上流社会的财富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日本这个主要工业强国，从财富和收入这个意义上说，以前是最不平等的国家，而这一个改革措施却把它改成了最平等的国家。当然，有钱人是极不情愿的，故意设置难题，想法隐匿资产，以各种方式反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成功的，那些财阀们还在控制着自己的公司，只不过他们手中的股权被稀释了。此外，日本商界的Doyens，是世界公认的日本四大天王，多年以来一直控制着日本的政治，甚至控制着首相和厚生省大臣的选举。这样，日本的贵族们就部分地保住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势。

## 创造性破坏的日本

在20世纪40年代的进展中，大脑、创业思维，以及拥有工业开发土地或者拥有一个日后可能做大的小企业都是最好的财富保值方式。美国的轰炸摧毁了工厂，毁掉了生产设备，但是工业用地和连锁店仍然存在，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生机勃勃的新企业。战后的繁荣，商品短缺的结束，都产生了全新的企业、银行和中介事务所。正如在德国发生的那样，失败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即使是垄断巨头，如三菱、东芝和小松公司也都再获新生，朝气蓬勃的新公司生产着新技术产品和消费品，其中，索尼是起死回生、凤凰涅槃的典型代表。

野村证券公司得到了重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战争结束40年之后，它所拥有的市场资本已经超过了通用电气和世界上任何一家大银行的全部市值。日本工业银行实际上是一家商业银行，从战争废墟中重新发展起来了，到了1989年，它的销售额、市场净收益和员工人数，已经相当于摩根士丹利，而它的市场净资本却比摩根士丹利大出了10倍。在日本泡沫经济处于高峰时，关于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和日本工业银行的合并事宜也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个计划最终不得被放弃，因为日本工业银行的资本大得不成比例，如果合并，日本工业银行势必要完全控制这个新公司。日本商



用土地市场的通货膨胀是如此之凶，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天皇居所所在的东京市中心的地价等于加利福尼亚整个州的全部土地。显然，价格受到了投机者的疯炒。

如果没有麦克阿瑟的改革，战后的日本势必仍是一个封建社会，所有上述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另外一方面，巨量的继承财富，不管是面值还是市值在旧日本都累积到相当高的程度，因为这样的措施，这些财富一下子就被摧毁了。当然，还有一些例外。日本当今最富有的家族，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拥有边远地区的煤矿，在战争期间没有受到破坏，也逃过了改革的重拳。这些煤矿的开采方式，比70年以前更先进，更人性化，但这个家族仍然拥有着它们。他们是如何逃过继承税，最终没有被没收的，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 日本的“不可战胜”

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是如何从废墟中崛起的，必须明白日本是如何奠定发展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它远比以前更加繁荣，更为富庶。关键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民和天皇对占领的顺从，是十分惊人的，同时还有占领军那友善无比的反应。当时，是没有人能预期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许是狂妄自大、爱慕虚荣、自以为是的家伙，但是，就许多方面而言，他实在是当代日本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国之父。

甚至到了1945年夏天，日本政府还没有告诉人民战事糟糕到了何种程度，他们遭受了多惨的失败，虽然说，日本人民已经多少感到了损失惨重。但新闻只是报道，在强敌面前，日本军人是多么英勇无畏。日本民族一直是一个骄傲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获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敌于天下，他们自认为是优等人种。他们几乎对武士道精神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失败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前面所述，在日本陆军手册中，是没有如何撤退那一章的。到1945年投降的时候，还有6 983 000名士兵固守在残存的大东亚帝国的各个堡垒中。在日本列岛本土之上，就有2 576 000名战士，分成57个师，14个旅团和45个军。

虽然日本天皇与统治阶层在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已经意识到投降是唯



一合乎理性的出路，但仍有一批日本狂热分子不想投降。为抗议天皇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投降，神风飞行队的精英们在飞行中发动兵变，占领了皇宫草场，杀死了数名皇宫卫兵，向首相官邸开枪，随后就被镇压了。美国方面曾很担心，麦克阿瑟和美国军队空降到日本时，会不会遭到抵抗。

结果是，美国人吃惊地发现，他们受到了日本人民极为顺服的欢迎。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写有一篇日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这篇日记被里克·素奈尔在自己的《纯朴的忠贞精神》一书引用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跟随自己的战友，列队进入了横滨，行进在一条大街上，扛着M-1冲锋枪，并且在枪上插上了刺刀。

那情景真是满目疮痍。有几个当兵的日本平民就站在我们队伍的旁边。他们盯着我们举行的入城仪式，但是没有敌意，也没有表示任何感情。他们的脸色是苍白的，表情是茫然的。当我们经过时，他们俯首鞠躬，这真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是沉默的、顺服的。这难道真是那个邪恶、残忍、疯狂的敌人吗？跟这个凶恶的敌人，我们可是苦战了如此之久啊。这怎么可能呢？

要理解日本人为何对投降和其后的占领如此顺从，关键要明白他们对麦克阿瑟和天皇裕仁都是崇敬有加。麦克阿瑟对天皇裕仁十分尊重，曼彻斯特认为，他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赞赏和感激。詹姆斯·韦伯在其场面宏大辉煌的历史小说《皇帝的将军》一书中，描写了天皇在出席一次会议时，如何号召日本人民“和平地”遵从《波茨坦公告》关于占领的条令，像对方一样认真履行公告中的所有条款。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各地进行重建，才能保持我们民族的基本架构。”在讲话的最后，天皇宣布说：“我为自己的人民，写了一首诗。”日本国会议员们顿时兴奋起来，等着天皇朗诵他的诗作。这是一个风俗，当天皇要表达最真诚的感情时，就会通过这种31个音节的诗来完成：

英勇无畏的青松啊，



即使在严冬来临，大雪压枝时，  
也不会褪去自己的本色。  
真正的日本男儿啊，  
要像青松一样保持名节。

日本议员们不由得发出赞叹，立刻全体起立，向天皇深深地鞠躬致敬。天皇向日本人民传达的真正信息是，日本人就是诗中的松林，而美国占领者则是严冬，他们会带来暂时的寒冷，用冰雪压在松林的枝头。然而，春天终会来到，大雪肯定要消融殆尽。而日本，正像那些松树一样万古长青。那当然正是后来发展所证明的事实。没有人对占领进行过任何抵抗。

## 日本股市的长期繁荣

在日本，从长远来看，证券是财富保值、增值的极佳手段。自从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日本经济也极为波动，周期性地爆发危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1944~1946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跌，而接下来在1950~1990年，它的经济又快速腾飞。自那以后，日本经济又停滞不前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的发展阶段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会超过1.5%，因为它的人口在减少，劳动力奇缺。我们以后会知道这种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论点是否正确。

纵观20世纪，不管战争失败也好，遭到占领也好，遭受三次长期的熊市也好，日本的股票年收益率一直保持在4.6%，这是史密斯公司的统计。而根据伦敦商学院的统计，还有荷兰银行《2006年报告第二卷：101年投资回报统计》一书，当时日本股票的年收益率在5.0%。在20世纪后半叶，股市产生了9.1%的实质年收益率，虽然在20世纪的后10年进入熊市。在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1899~1942年，股票的年实际收益率达到6.5%，但是在1942~1946年，那一数字每年下降了32%。

安德鲁·史密斯在2004年写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一般



都会有较高的实际交易率，那就是萨缪尔森效应。安德鲁·史密斯计算出来，1899~1942年间，一个日本投资者的投资年实际收益率为6.48%，但是对于一个外国投资者，由于日元升值率达到0.90%，所以他的年实际收益率为7.38%。接下来，1942~1946年间，随着经济萎缩和下滑，日元贬值，对本地投资者来说，其实际收益率为-31.81%，而对于国外投资者则为-43.68%。1950~2000年，本地人的实际收益率为9.1%，日元升值后收益率上涨1.10%，因而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年实际收益率应为10.2%。但是不要被这些表面精确的数字给愚弄了。

真正重要的是日本股票在整个世纪里的收益率，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收益率。然而，正如当代德国一样，在日本，1943~1947年间，有4年期的股价控制，然后在占领的头几年里，根本就没有交易市场了。由于1945年起股市关门，造成了一片空白。

在你特别需要现金的时候，如果无法随时出售股票，而且连续好几年的情况都是如此，那么，你还会认为股票是保值的最佳工具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可是别忘了，在那样的年代里，其他工具也达不到这样的需求。当然了，黄金和珠宝是例外的。

在战后严冬里，在那段最困苦的岁月中，你会连黄金也拿出来去换些吃的吗？当时身临其境的人会告诉你这是肯定的，因为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能得到棉衣和食物，真是比什么都重要。人民首先要抗住寒冷和饥饿，然后才有发财致富的欲望。有一个欧洲家庭在战争前后一直生活在日本，他们发现换衣服远比换珠宝贵得多，他们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就是用大量的毛衣和大衣换取食品，才活过来。

在日本，还有另外一种资产可以在战时保持财富价值，在战后还能让财富升值，那就是商业和居住用地。日本是唯一一个工业国家，那里的住宅一直在贬值，而不是升值。平均而言，日本的住房过了30年后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它们主要是用木头盖的，而新房盖得又好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约有20%的人口拥有住房，而保存良好的房子就会不停地买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值，以应对通货膨胀，从而成为保持财富价值的工具。

在战争期间，有那么多的城市毁于战火，在战后，人们对居所的迫切需



求使得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建造房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大量廉价房屋的建造，同时也造成了住宅的供过于求。这样一来，老旧而贬值的房子就没有再出售的可能了。即使在今天，二手房与新房的比例只有0.25:1，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3.8:1，英国则是7.5:1。在日本股市，只有1%的住房股，而其中只有3/5是可交易的。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数字则要高出10倍。这样一来，在日本，非金融资产中住房的净值百分比远低于美国，日本人就要完全依赖养老金和金融资产，以备养老所用。这无疑会增加不安全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都是那么狂热的投机家的原因。

相形之下，战后日本的商用及居住用地却成了极为可靠的投资。1950~1990年，日本人的名义收入提高了50倍，而土地价格却提高了330倍。自1990年后，由于泡沫破灭，地价下降了许多，但是近年来地价又开始上涨。如果你在1940年拥有土地资产，那么你就保住了你的财富，虽然在战时那是不可流通的。然后，在战争结束之际，正如前面所述，如果你有一片耕地，你就要被麦克阿瑟政府强迫着，以极低的价格把地卖给政府，所以说，农业用地不是财富保值的工具。

然而，商业、工业和住宅用地在东京和大阪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你必须守住那块地，哪怕在战火硝烟中地上的房屋已化成灰烬，你还是要相信，日本终有一天还会从废墟中崛起。到了战后，你就不用非把地卖给政府不可，而到了战后繁荣期，你将成为超级富豪，因为地价会涨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事实上，那些以天文数字购买绝版艺术收藏品的家伙，绝大多数都是幸运的地产大鳄。可是，当初有谁想到了农业用地不值一文，而商业用地的地价会狂升到了天上呢。

无论如何，想一想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灾难之中，日本的股市和土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财富得到了保值和升值，当然，那是通过长线来完成的。



## 第九章 命运多舛的财富

**根**据《启示录》，上帝派来的4位骑士分别是“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又一次纵马出现了。他们上一次出现的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造成了上百万人毫无意义地死去，造成了德国经济巨大的通货膨胀，以及后来的仇恨与报复，正是那些恨意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 000年前所写的《启示录》，不可能预见到4位骑士在第二次出现时，世界再一次尝到的苦果，那是一场空前的杀戮，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了更骇人的占领、迫害、饥荒、瘟疫……以及巨大无比的财富毁灭。



## 20世纪的全球股市

要研究财富如何遭到毁灭，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一看世界各国的股市大盘，看一看它们在长线上的表现如何，在整个20世纪里表现得如何。多年以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威廉·戈兹曼和加州大学的菲利普·乔里昂就是这样研究的，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球股市100年”。他们专门研究那些在1921年以后股市有良好表现，同时又有通货膨胀数据可查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瑞典）在85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过交易中断的情况。有9个国家曾经中断交易的时间达6个月以上，7个国家由于战争、入侵，或革命而关闭了股市达数年之久。此外，还有11个国家的股市永远地关闭，正如作者所说的，成了“死市”。他们把“死市”定义为股市关闭，并且再也没有以原来的形式重新开张。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和芬兰都是那样的市场，它们都因为某些原因成为死市（后来又都以其他形式开张）。

即使作为个人财富避难所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曾在1942~1945年间被日本占领）也都经历了“死市”的困扰。阿根廷股市在20世纪的许多年里被投资者视为明星市场，不过却在1965~1975年的10年间关门歇业。西班牙在内战时期关市4年，奥地利关市时间达8年。另外，挪威、丹麦、荷兰、法国、比利时、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证券市场都关了门，因为它们的主国投降了。虽然那些市场后来都被占领政府重新开启，但这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并且已根本没有流动资金了。在上述国家中，股价至少都已经下跌了20%，最少都关张了一年以上才重获开业。

利用《千年统计大全》对1900~2000年间净收益率（扣降通货膨胀因素）的计算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战败或被占领的国家，没有高通胀周期的国家，它们的实际收益率用本国货币结算应是6.5%，用美元结算是6.2%。这些都是全部收益，包括再投资的收益。在这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证券达到了6.9%的实际收益率。以这些数字得到的证实为前提，席勒更新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加上了新的数据，并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进行了历史修正，从而计算出了几乎相同的收益率实值，表明美国在



20 世纪的实际收益率为 7%。就长线来说，一个达到了 7% 的实际收益率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意味着投资于股票的货币实际购买力每 10.5 年就要涨 1 倍，20 年间就要涨 2 倍。简直太厉害了！

然而，安德鲁·史密斯认为，以 1900 年为起始年会造成误导，因为就在 1900 年的前两年，股市还是一片低迷的。1871~1900 年，美国股市的实际收益率仅有每年 3.02%。通货膨胀率在那几年里的数字是 -1.57%，这就意味着证券的票面收益率仅为每年 1.75%。结果正如史密斯所计算的那样，相关的实际收益率为 5，票面价值为 7.81%。还算不错，但是谈不上好极了。不过，我还是很怀疑 19 世纪的那些数据是否准确，你从那里开始计算是否有问题。

表 9-1 显示出，20 世纪里股票实际年收益率，对那些稳定的战胜国而言是 6.5%。可是，“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国家具有蓬勃发展经济的一切周期性波动，但是却没有输掉一场战争，没有被敌人占领过，没有高通货膨胀期，也没有被内战毁得满目疮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尝到了世界范围内大萧条的苦味。

表 9-1 战胜国：20 世纪股票年实际年收益率（%）（1900~2000）

|      | 股票  | 债券  | 票据  | 通货膨胀 | 股票标准偏差 |
|------|-----|-----|-----|------|--------|
| 澳大利亚 | 7.6 | 1.0 | 0.4 | 4.0  | 17.7   |
| 加拿大  | 6.4 | 1.8 | 1.7 | 3.1  | 16.9   |
| 爱尔兰  | 5.5 | 1.6 | 1.3 | 4.5  | 24.3   |
| 瑞士   | 5.0 | 2.8 | 1.1 | 2.2  | 20.4   |
| 瑞典   | 8.2 | 2.3 | 2.0 | 3.7  | 23.4   |
| 英国   | 5.9 | 1.3 | 1.0 | 4.1  | 20.0   |
| 美国   | 6.9 | 1.5 | 1.1 | 3.2  | 20.4   |
| 平均   | 6.5 | 1.8 | 1.2 | 3.5  | 20.4   |

就未来而言，具有这样特点的国家，在 20 世纪发展成了更强大、更成熟的经济体。另外，它们现在都面临着挑战，因为人口在下降，劳动力在减少。现实地说，除非这些国家能消除这些人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只能达到 1.5%，其中有 2%~2.5% 来自工业生产的增长，0.5% 来自发展平均的劳动力市场的增长。这样，从长远上看，公司的利润和



分红每年可以在2%~3%之间上涨，这也就是说，再想看到股市给你7%的年平均实际收益率就很难了。

将来，那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这些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快速增长，生产力也在提高，所以它们具有了成为最佳股市的所有条件。你无法不承认那些国家鲜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无法不承认他们取得了极高的收益率。换句话说，国家强弱的划分，要看那些成功的、稳定的新兴市场的出现，重新划定。但是，并不是说只要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一定能保证你会得到成功而稳定的发展。

21世纪个别国家在股票、债券、票据等方面的全部收益（包括分红与利息），以及100年间的通货膨胀情况，都在表9-1和9-2中展示了出来。这些数据都采自埃罗伊·迪姆森、保罗·马什和麦克·斯汤腾所编的《千年统计大全》第二卷一书，该书由荷兰银行和伦敦商学院合作出版。它是关于20世纪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专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表9-1和表9-2中所显示的数据，都是用当地货币计算得出的，并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它们并没有反映外国积极型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表9-1和表9-2的数据取自《千年统计大全》，但是，图中的集合、计算，以及结论（和错误）都是作者自己得出的。表9-1显示的结果就是那些所谓稳定的战胜国。

表9-2 战败国：20世纪股票实际收益率（%）（1900~2000）

|     | 股票  | 债券   | 票据   | 通货膨胀 | 股票标准偏差 |
|-----|-----|------|------|------|--------|
| 比利时 | 2.7 | -0.5 | -0.4 | 5.6  | 17.7   |
| 丹麦  | 5.1 | 2.8  | 2.9  | 4.0  | 21.4   |
| 法国  | 4.0 | -1.1 | -3.4 | 8.0  | 23.2   |
| 德国  | 3.7 | -2.3 | -0.6 | 5.2  | 32.2   |
| 意大利 | 2.7 | -2.3 | -4.1 | 9.2  | 29.4   |
| 日本  | 5.0 | -1.6 | -2.1 | 7.7  | 30.3   |
| 荷兰  | 5.9 | 1.1  | 0.7  | 3.0  | 21.0   |
| 西班牙 | 4.7 | 1.2  | 0.4  | 6.2  | 21.7   |
| 平均  | 4.2 | -0.3 | -0.8 | 6.1  | 24.6   |

表9-2也反映了那些战败国的情况。那些国家遭到了占领，并经历了一



个又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西班牙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但是它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残酷的内战，那场内战打乱了社会生活，其实，这场内战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日本和德国都在20世纪后半叶成长为经济巨人，20世纪初叶，它们却处于经济萧条、收益惨淡的境况。

表9-1和表9-2清楚地显示出，在20世纪那个长期的过程中，股票就是优于债券和票据。在那些战胜国里（参见表9-1），证券的年收益率除达到650个基点，还要比政府债券高出500个基点。战胜国的证券年收益率要比战败国多230个基点（再参见表9-2），而且，比战败国在收益上的波动性更小。

但是不要搞错了，230个基点是以复利计算的，如果期限达到了一个世纪的话，那可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字啊。输掉战争、被敌人占领，对国内证券投资者的长线投资收益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会把金融市场带入熊市的谷底。正如表中所示，这些国家的市场表现极为疲软，政府债券和票据的收益都呈负数。相反地，战胜国的政府债券和票据在一个世纪的期限里，都呈正实际收益率。这些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从而使这些国家的金融管理更为容易，成本更低。

正如我们所知，战胜国的债券比股票更缺少标准偏差，但是，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其差异同样也带有戏剧性。例如，在澳大利亚，证券的标准偏差是17.7%，债券的标准偏差是13.0%。在英国，两者标准偏差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美国，债券具有完全不同的标准偏差值（9.9：20.4）。

战败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罪恶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们的低收益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生机勃勃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虽然经历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一旦灾难过去，其股票市场就开始了强劲反弹。正如伊拉克所表现的那样，抵抗和内战会延长民族的苦痛。但就一般而言，投资界是商业性的，记性不太好，很快就会宽恕一切。

所有上述数字都显示出了政治稳定带来的好处、打赢战争得到的奖赏，以及没有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恶果。在战败国里，通货膨胀率要比战胜国高出两倍。谁能想到瑞典这个永久中立的国家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最好的证券市场？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中立、避免国家陷入政治动乱，恐怕正是股市繁荣的良方秘籍。



## 至关重要的投资多样化

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设计了多样化的投资方案或多样化的指数基金，同时你又没有进行投机，那么你很可能就保住了一笔财富。不过，你还要保持基本活力，要保持耐心。安布鲁斯·毕尔斯在《魔鬼词典》中，把耐心描写为“绝望的一种温和形式，打扮成一种美德”。当然了，在大萧条的万丈深渊里，对经济损失的绝望是那么强烈，怎么伪装也装不出“耐心”。

请注意，我们前面提到过，如果你进行了指数基金投资，那么你就抓住了证券里本来为有缘人而设的实际收益。对积极管理的回报是显而易见的，其代价也是高昂的，因此一个要花费8~10个基点的指数基金，对每个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专业投资者不在此列。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时时刻刻地在警示我们企业生命中的淘汰法则，警告我们没有任何生意是永存的，也没有任何投资计划是永远多样化的。有许多只股票在20世纪20年代是蓝筹股，可是再也没有从大萧条里缓过来，因为时间和时代的进步已经淘汰了它们的生意模式。指数基金必须不停地进行更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在20世纪50年代是35年，而在今天只有10~15年了。

另一个大灾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金融资产的考验要比大萧条更为严峻。历史记载是相当清楚的。战胜国最终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特别是股票和债券，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令人心焦气急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股市无比精确地判断出，经过长期战争之后那个转折点已经到来。然而，对金融资产是否可担当财富的天然避难所，还需要一个测试，就是要看一看在战败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和被占领的国家（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在这方面，记录得并不是那么清楚。当然也有其他国家，它们在欧洲和亚洲都投降了，但是，关于它们在实际收益率方面的真实数据却找不到。



## 德国的剥削

1940年年末，在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国家之后，希特勒的头脑里一直盘旋着进攻苏联的念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三帝国总理府的大议事厅召开了一次会议。豪华气派的大堂充分展示着国家的权势，那些水晶巨型吊灯闪闪发光，大理石的墙壁上挂着北欧人的艺术品，还有宽阔的红绒窗帘，数英亩大的厚实棕红色玫瑰地毯，所有这些都在炫耀着帝国的财富与实力。庄严守卫在门口的卫兵都身穿黑制服，带有金饰带，穿着白袜子，黑色软底军靴（他们实际上都是党卫队成员），他们看守着大门，带着尊敬又有些威严的态度检视着来宾的证件。200名纳粹领导层的精英胸前挂满了勋章，这时都准时出席了，每人都特意穿上了最有派头的制服。在这里，在这座统治世界的殿堂里，还有谁不相信这座“千年帝国”要万古长存呢？

元首希特勒身穿普通的棕色制服，正因为它太简朴，所以在一大群华丽制服中更显突出。就在所有的人入场就座之后，元首出现了，步入议事大厅。在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会有如此的舞台感，有能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令人不敢仰视的伟大形象。也许，只有罗纳德·里根能做到这一点。希特勒那深蓝色的眼睛能把听众们完全吸引住。一开始，他还语调平缓地说着话，但是很快地，他的手就比划了起来，声音也随之提高8度，激情洋溢地描绘出了未来德国和欧洲的伟大蓝图。大德意志帝国将成为一个欧洲帝国。德国必须拥有生存空间，要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向东扩张，夺取苏联控制着的广阔地域，特别是乌克兰、伏尔加盆地，以及克里米亚，无论是原料、粮食、石油，这里的资源都极为丰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皇帝与自己的人民疏远了，因为他忽略了对士兵家属的抚恤。当时，士兵们在前线拼命，可是他们家属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由于粮食歉收，粮价飞涨，而德国魏玛政府对人民的痛苦熟视无睹，使劳动阶层义愤填膺，激起了社会的一片动乱。希特勒发誓这一切再不会发生了，他要对被占领国进行掠夺，不仅要夺取它们的财富和工业原料，还要夺取它们的粮食。

希特勒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还把整个西方都包括了进去。不知为什么，



他认为挪威人、丹麦人、芬兰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雅利安血统，所以，在种族上他们与德国人颇有关联。他们的语言与德语相近，而他们的相貌与德国人相似。在自己对纳粹党的讲话中，他宣称他发现纳粹思想在这些国家里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些国家的男子自愿当兵，与德军并肩作战，还有，那些国家里的许多城市都起了德国名字。帝国还要鼓励已经移民美洲和澳洲的德国人归国，一起来参加伟大新帝国的盛举。

他说那些被征服的国家要被占领和剥削，但是大家在心里要永远记住，那些国家早晚有一天要变成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帝国要派特派员和执政官的副手，对占领国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而党卫军将管理市政工作，包括警察力量。那些国家的顺从傀儡要被安插到政府中去，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而现在那些国家所实行的秩序要尽量保持原样。

他补充说：对于英国人，由于他们天性桀骜不驯，所以要给予更为严厉的管教。

在这次会议其后的非正式谈话中，希特勒明确地表示第三帝国的“贵族们”可以在被占领国里得到大量地产，那些地产都由奴隶们进行劳作。尽管希特勒对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总是心存猜忌，但是，他还是对自己钟爱的几个将军说，他们可以随便挑选任何一块地作为封赏。希特勒最喜欢的将军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他曾在东线指挥一个军团，又担任过装甲部队的总督察长，后来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被占领国的土地上巡视，想找到一块最爱的领地。这个计划其实有意要收买那些官员和将军们，让他们成为富豪，从而对元首效忠，可是，这一计划同时也是对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直接地产掠夺。

另外，到1941年年初，德国空军的政治与军事领袖戈林一直对帝国空军的战绩大吹大擂，现在又鼓吹要对被占领国进行更残酷的统治。这时候，戈林与希特勒的关系已经亲密无比，成了希特勒最看重的代言人，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因某些问题同元首争论起来。有一次在有关占领特派员的会议上，这位空军元帅身穿精致剪裁、装饰华美的军服来到了台上，胸前别满了花花绿绿的勋章，开门见山，直入正题。他特别指出，他“最看不起‘剥削’这个词”。他说：“以前人家管这叫‘掠夺’，但是今天，可能是因为太讲求人性化了，可是我不管那个，我还是想用‘掠夺’这个词，而且我一定要掠夺得



干净又彻底。”被占领国的人力、私营经济的生产力、巨大的财富、宝贵的收藏，这些都要没收，用来支持帝国的战争机器，同时还要用来满足纳粹党领导层的物质享受，包括在座的各位特派员们的发财致富。

我们后面要论述，在一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金融资产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有许多时候也可以看到，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证券作为财富保值的利器，确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那些小型股市，随着战云压城，股价暴跌，随后就关门大吉，有些甚至彻底蒸发了，有的股市永远不复存在。在那些国家里，证券显然不可能成为保存财富的手段。

## 食品是最好的流通货币

荷兰市场则完全与众不同。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具有悠久的传统，到了1940年，荷兰境内炒股的气氛相当浓厚。经济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年初的熊市中，荷兰股价暴跌不止，不过在那以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告声称50加权收盘价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晚期一路攀升，一直上涨至1940年春天。荷兰人曾以为希特勒会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了德国人的一边，还因为他们的水坝和大闸系统，使荷兰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不过荷兰人真是大错特错了，不过还算幸运，因为在他们投降之后，德国对荷兰发了一些善心，来了一个文官统治，虽然那只不过是暂时的。

希特勒曾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荷兰先是保持中立，后来在战争末期又收养了许多德国儿童，使他们免于饿死。他把荷兰人看成雅利安人种的一个近支，认为可以将他们合并到未来的大帝国里去。而且，在荷兰颇有一批亲德人士。在那些人中，有两个人最为出名，一个是安东·马瑟特，他阴谋把荷兰变成德国的一个大省来统治。另一位叫善门胡德·冯·托尼根，他无耻地与党卫军合作，力争要把荷兰农场主们都移民到乌克兰那丰饶的耕地上去。

马瑟特和托尼根首先想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目的，于是，二人竞相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荷兰贵族，从而没收他们的家产，



特别是把那些犹太贵族的家产攫为己有。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荷兰对犹太人一直崇敬有加，因而，党卫军把犹太人逮捕，关入死亡营的行为，引起了荷兰人的极大反感。最有名的保护犹太人的案例当然就是安妮·弗兰克一家了。然而，据估计在荷兰原来所有的大约120 000名犹太人中，约有100 000人被杀害了，而他们的家产则被德国人和卖国求荣的荷兰人所窃取。

由于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要兼并荷兰这样的小国，最后建成大帝国，所以一开始，他们对荷兰的统治可谓所有被占领国中最为温良有礼的。1940年5月，奥地利人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帝国驻荷最高专员。这个事业有成、经验丰富的官僚此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妻子说：“特鲁黛，元首要我去那里种郁金香了！”这个赛斯·英夸特允许“合理情况下”的政治自由，并且建立了一个平行控制的制度，就是一小群德国行政官与荷兰行政官一同工作，共生共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的抵抗运动开始兴起。1941年2月，一场全荷兰的大罢工开始了，几天之内，荷兰经济陷入瘫痪。德国人出动军队，对罢工进行了残酷镇压。秘密警察在托尼根的协助下，逮捕了领头闹事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刑讯，并将他们送到了波兰的集中营，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那些人就劳作致死。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随着破坏和暗杀事件的增多，赛斯·英夸特开始执行一项规定，那就是，任何一名德国兵被杀，都要杀死100个荷兰人来报复，于是，他成了恶名昭著的“荷兰屠夫”。

1939年，荷兰是全球最大的食物出口国，但是德国攫取了荷兰的庄稼收成，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粮食居然在这个低地国家成为稀缺品。到了1944年，粮食储备完全告罄，而当年的全部收成又都进入德国的粮仓。1944~1945年那个严冷的冬天里，席卷全境的大饥荒来到了。它使多达100 000名荷兰人活活饿死，食物短缺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从1940年5月关门，一直关了4个月，直到当年9月份重新开张。交易量在战争期间颇为有限，账面交易指数一直在底线上徘徊不已，一直持续到1944年交易所关张。不过据荷兰银行的数据统计，荷兰股市的实际收益率在战争期间降低了15%，而这一数字很可能是被低估了。不过，荷兰股价在1944年8月荷兰证券交易所关张时，仍然要比其1929年的



最高值高一些，而且也高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股价。

但是，股票不能当饭吃，食品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股票当然没有什么用。食品是战争末期最为抢手的货币。1946年4月，股市又重新开盘。荷兰政府债券也算比较好的投资。那些债券的收益率很低，经常是负数，但是还是要比其他被占领国家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强得多。

在德国所占领的国家里，如果你拥有一份生意的话，结果可能要好得多。荷兰被占领期间，许多家庭保有了自己的房产、土地，还有小型家族企业，结果在战后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如果你是犹太人，是抵抗运动成员，或者是“国家的敌人”，那么拥有固定资产就麻烦了，纳粹首先要剥夺你的家产。在战后也有可能你会重新获得这些家产，但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或者你根本无法证明你是这些财产的主人。

纳粹占领实在是可怕的经历，它造成的深层结果就是让个人处于极度精神痛苦之中，甚至是财富的摧毁。例如，作者认识一个叫亚恩的荷兰人，他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农机厂。1944年2月，在相邻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名德国兵被杀。第二天清晨，便有一个中士率领一队德国兵突然出现在亚恩的工厂院子。虽然他不知道德国兵被杀的事，但是仍然感到情况不妙。于是他躲到了顶层的一间阁楼里，由他的妻子出面去跟德国人交谈。

“有一名德国士兵被谋害了。我们要抓100个荷兰人当人质。你的丈夫在哪儿？”

“他不在家，”女人对中士说。

“好，不过，我们要搜查您的家，太太。”

长话短说，亚恩的太太请那位中士进屋喝咖啡，并勾引了他。看出了那女人的意思之后，德国中士就命令自己的人到别人家去搜查，于是，在那个滥情的早晨过后，德国人再没有回来。那天下午，100名荷兰人被枪毙了，亚恩却保住了命。可是他知道，事实上他目睹了整个事件，因此，他们一生一世再也无法摆脱这件事，噩梦、负罪感、责任，说不清道不明，永远没有尽头。战争结束后，亚恩开始酗酒，结果他那曾经生意兴隆的厂子也倒闭了。



后来，他把自己关在车子里窒息而死。

## 股市渡过危机

丹麦人认识到抵抗无用之后，就接受了德国人宽容的投降条件。结果，丹麦得到了不算严格的军管统治，政府的头目是一个叫塞西尔·冯·仑特-芬克的职业外交官，他的政府成员只有100人。1940年，该国的股市只停业两个月，正如在荷兰发生的那样，在停业之前曾有一次暴跌，因为投资者害怕即将到来的军事占领。

然而，在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之后，丹麦股价开始上涨，其幅度刚好与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率相同，这样投资者就没有丧失实际购买力，证券也真成了很好的保值工具。事实上，丹麦股价在1950年的实值与其在1930年一样。正如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一样，在战争期间，黑市的交易相当活跃，而且无论怎样，股票都丧失了真正的购买价值，远比不上真正稀缺的生活资源，比如食品和医药。

比利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帝国特派专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男爵对纳粹没有好感，对党卫军及秘密警察更是深恶痛绝。他和自己领导的占领政府对比利时实行一种较为温和、顺其自然的统治方针。不幸的是，他参与了一次对希特勒的政变，很遗憾被告发，最后在集中营了却残生。在占领期间，布鲁塞尔的股市就面值来说还能持平，但是就实值来说则一直在降。在长线上看，比利时证券一直波动得厉害，无缘成为较好的财富保值工具。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法国，那可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了。





## 第十章 衰败的法国经济

**20**世纪40年代，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股市，都显得极无头脑。二者在德国人面前都一败涂地。法国股市与全球其他股市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一路暴跌，但是跟其他国家又不一样，在巴黎股市中看不到后来有明显的失地收复。事实上，巴黎股市一直在看跌，并且随着战争阴云在20世纪30年代末压上了城头，其股价已经跌至20世纪30年代最高位以下，不管是面值还是实值，情况都是如此。这种死气沉沉的表现反映了全法国弥漫的那种心灰意冷、信心全失的情绪，这种心态在法国人心中由来已久，并在最近20年间的政治混乱以及人民的失望中得到加强；而法国人之所以失望，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充分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机遇进行大复兴。

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法国的那个政府，人称“第三共和国政府”，它实

际上是一个沉闷乏味、办事不力的“软弱无能的议会主义制”政府。这个政府被贬为“小心眼儿政权”，它“太没有骨气，太关心狭隘的个人利益”，对影响全法国的那些重大的民族问题充耳不闻，特别是经济增长过慢、失业和低生育率等问题，它连管都不管。法国人仍然记得，在那毫无意义的堑壕战中，有200万名法国士兵牺牲在那里，还有那个农村少年的恐怖事件，当时他们自残身体，然后又被枪杀在两军阵前。战争给法国留下的遗产就是工厂罢工、军人叛乱，以及激进政治。生产力之低下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德国兵后来在1940年发现，法国农场里的耕作方法简直就是50年前的过时玩意儿。

法国股市也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显得死气沉沉。多数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层惊骇地发现巴黎的夜生活有极其可怕，到处都是爵士乐、酗酒、超短裙、滥情、避孕打胎，到处都是道德沦丧。他们鄙视那些新生代知识分子，比如列昂·布兰，他曾嘲弄传统婚姻；再比如让·科克托，他写的那部名为《父母大人》的剧本动摇了父母的权威；还有那个安德烈·纪德，他宣扬一种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观念。著名的记者保罗·瓦雷里曾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那些让法国成为如此快乐、如此富有创意的法兰西的特性，却使这个国家完全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艰难困苦，而同时，它又不得不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求生。

至于法国贵族和天主教会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特别是对苏联怕得要命。他们怀着极大的嫉妒心，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成功，也看到了专治统治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独裁者可能在有些方面太过粗暴，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很强的反犹太思潮一直在涌动。法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像《纽伦堡种族法》这样的法案多少有些合理性，那部法案是在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基本民权。

1940年的大溃败，使人们对法国当前的社会生活十分不满，不管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一下子都凸现了出来。那年夏天，大约有1000多万名法国人——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25%开始在全法国流浪，像乞丐一样地去讨要食物，躲避德国人，小偷小摸。没有了政府，没有了警察，也没有



了对私营财产的尊重。在这些抢匪中，那些解除了武装的散兵游勇是最可怕的。相比之下，德国军队要显得军容整洁、军纪严明，他们的行为总是最为“得体”的。在那样的时候，他们收到最严厉的军令，绝不可抢劫，不管拿什么东西都要用德国马克去买才行。那些德国兵在商店里买东西，愿意出高价钱，结果店主们特别喜欢德国兵的光临。

## 混乱中的法国

大多数的法国人，这时被社会的和经济的动乱完全吓住了。为了理顺自己的生活，免于社会进一步动荡的伤害，他们已经准备接受约束，尽管牺牲自己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但要能使生活恢复正常与安定也可以。他们开始相信，希特勒和德国代表着秩序和稳定，另外，蒸蒸日上的德国也能带来相当可观的生意。总而言之，法军总司令魏刚上将就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后来这句话广为流传：“英国将像一只小鸡那样被扭断脖子。”1941年12月，丘吉尔在加拿大议会上的一次讲演中，引用完这位法国人的评论之后，这样说道：“噢，是有那么一只鸡！”停了一会儿，等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之后，他又说道：“是有那么一根脖子！”全场爆发了震天大笑！

当然了，德国是法国的宿敌，可是现在看来德国显然要长久地统治欧洲了。英国不但不能解放欧洲，连它自己能否存活下来都成了大问题。1940年，法国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你最近看见过英国人吗？”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当然是没有看见，因为英国人已经跑到船上，逃回了那个小岛。这算是什么样的盟国啊！

西蒙·德·波伏娃在其散文中记下了一句俏皮话。她对德国士兵赞不绝口，说他们军服英武漂亮，行军姿势极为动人。她嘲讽英国人，说他们逃得比兔子还快，把一切东西都丢到了身后，包括香烟和汽油桶。所以法国人必然要这样问：与德国人结盟是背信弃义，还是讲究实际接受既成的事实？1940年7月，安德烈·纪德这个曾经尖刻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社会观察者，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如果德国统治能带来繁荣，那么90%的法国人都会接受，其中75%的人还会拍手欢迎呢。



要研讨那场肮脏的停战交易是如何达成，法国维希政府是如何建立的，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要知道这个新政府的头儿就是贝当元帅。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现在已经成了新的独裁者。新的维希时代的设计师，那个奸猾的皮埃尔·拉法叶，当时人称法国的“墨索里尼”。有一次，他在议会发表言论，粗暴地告诉议员们新时代已经来临，警告他们心里要明白，那陈旧的多党民主政体已是明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摧毁旧时代所存留的一切东西。我们要创建全新的世界。你必须接受我们要求的与德国或意大利《宪法》相同的东西，否则，希特勒就会强迫你接受。总而言之，从今以后，法国就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全体法国人的唯一政党。时至今日，我们还对什么民主之类的玩意儿顶礼膜拜，让它束缚我们的身心，与此同时，除了我们之外，全欧洲的国家都在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贝当元帅是法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生都为军队效力。这个“凡尔登英雄”在1917年重整军纪，恢复了法军的士气，而他的招数就是拒不执行上级命令，不让自己的兵冒着敌人的机枪去冲锋，他认为那样的冲锋只不过是为了夺回几百码的沼泽地。最终，他得到了全军的爱戴、人民的崇敬，成了全法国的英雄。但是不管从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笨蛋。他所出版的军事论著都是找下级军官捉刀代笔的。有一个叫查尔斯·戴高乐的上校军官就拒绝了为贝当代笔写书的“荣幸”，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元帅。在1940年，当戴高乐组建自由法国军团时，只有35 000名士兵参加了他的队伍。

这位元帅生性傲慢，目空一切。他的身体总是挺得笔直，留着一抹毛茸茸的白胡子，看人的时候目光中透出的是严父般的威严。虽然到1940年，他已年届九旬，却仍然生机勃勃、举止灵活，而且性欲旺盛。他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只有性欲和美食才是重要的。”贝当也是一个相当狂傲自大的人。他相信只有他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在1940年6月的一次全法国广播讲话中，他自命不凡地对法国人民宣布，他已经送给了法国“一份厚礼，那就是他本



人就要出面，拯救法国于厄运之中”。而法国人民久已受够了那些大腹便便的政客们，现在是多么爱听这样的好消息啊！保罗·约翰逊后来写道：“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继拿破仑之后全法国最受拥戴的领袖。人们简直把他奉为圣君。女人们把孩子抱过去，让老元帅亲一亲。”

根据1940年的停战协定，德国同意给予法国一定的自由来发展经济。法国企业主可以自己开公司，给员工发薪水。利润很高的军工业则由德国政府垄断着。到1941年秋，已经有900 000名法国人在为德国人工作，不是修建大西洋防御系列堡垒，就是在军工厂里打工。还有250 000名法国人在德国工作，象征性地领取工资。一切看上去都像从前一样，只不过要更好一些，至少在占领的前几年是这样的。法国的商人们以为在军政府统治下，只要他们与占领政府合作，自己的生意不但可以继续下去，还有可能得到更大的发展。1941年2月，当巴黎股市重新开门之后，立刻就对这种乐观情绪进行了积极反应。他们相信法国和法国经济会成为德国领导下的新欧洲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当法国与胜利者合作时，不但法国以前的财富能够得以保存，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财富。

在战争的前两年里，法国人的生活，不管是在德国占领区还是维希政府控制区，都显得风平浪静。德国人简直是模范占领军，不过那仅限于刚开始时。1940年夏天，当巴黎的食物供给告急时，占领军还广开粥棚，赈济饥民。德国军队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军纪相当严整，从来不给居民添麻烦。有人开始这样想了：也许被占领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事吧？有一篇报纸社论发表了这样的看法：“维希政府在一年里所做的事，比以前那些管理不善的政府在一个世纪里所做的还要多。”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恶心。有一位作家描写了当德军到来之时，在法国农村以及在市内所看到的情景：

老百姓对胜利者表示了衷心欢迎，你看吧，姑娘们挥舞着手绢儿和头巾，对那些骑着摩托车的英勇的年轻男孩欢叫不止，在她们眼里，那些人简直比希腊战神还要英俊，所以她们都笑开了花。

在巴黎，我感到情况也差不多。法国歌剧院和喜剧院都在倾情演出，



观众就是那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占领军军官。咖啡馆里坐满了人，有剃着光头的占领军，也有乐不思蜀的法国本地人，大家都喝得红光满面。在汽车稀少的大街上，德国兵也好，穿着入时的女人也好，大腹便便的商人也好，都坐着人力车跑来跑去，因为再没有出租车了。我简直不忍再看下去了，看着我的同胞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向入侵者低声下气，虽说这是他们自甘堕落的。

在1941年7月，维希政府向德国提议废除停战协定，签订新的条约，在新条约里要给予法国主权，以及与德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等条款。贝当元帅（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已经被德国人任命为新成立的维希政府的独裁者）及其副手这时都大声欢呼，赞同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而且，一年前英国人在奥兰港摧毁了法国舰队，这一事件令法国人至今仍然怨恨不已。德国高层中，有些人已经把法国看成新的盟友，看成了帝国在“西线的军事长城”。难道英国及其盟友胆敢入侵法国吗？它可是在军事上与德国结盟，而且总共有1 000万人口的国家。难道英国一直是德法两国的宿敌吗？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希特勒却没有动心。也可能是出于种族的考虑吧。法国人不是雅利安人种。他从来也没有提出法国在种族上可以成为大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对法国的提议，德国一直没有正式答复。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正如他粗暴地对待苏联犯下的那个大错一样。假如法国与德国结盟，那么轴心国的力量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 没收法国犹太人的财富

虽说法国人一开始对占领还算满意，然而法国犹太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所有的犹太人资产马上就被没收了。凡是有能力逃亡的犹太人都跑了。那三位罗斯柴尔德兄弟，即老大艾德瓦、老二罗伯特、老三莫里斯，都想方设法地逃到了美国或英国。法国政府禁止任何资金转移，然而，莫里斯还是在飞机上带了一包珠宝，用1940年的币值计算，大概值300 000英镑（现在至少要值400万英镑），到了英国 he 就把珠宝变卖，以维持自己的



生活方式，同时还有了做生意的本钱。另外，两个兄弟只好依赖家族存款，结果没过多久就坐吃山空了。

还有一些犹太人手中有钱，可以买通逃生之路。法国犹太富豪乔治·列文在德国人对犹太教堂的突袭中被抓，被关进一间牢房，里面同时还关进了10名犹太社会主义者。几天以后，秘密警察识别出了他的身份，知道他是法国社会名流，于是就把他移送到了一座条件较好的监狱，伙食也相当不错了。接下来，又一个名叫奥托·韦伯的人来看他，那人说自己是一个名为格里茨巴赫医生的朋友，那个医生是帝国元帅戈林的顾问。奥托告诉列文，说秘密警察知道他在法国银行的瑞士分行里存有一大笔钱，如果他能往德国政府的账户里打入200万美元的话，他们就能放了他。然而，列文说他还可以多打20万美元，作为对戈林费心帮忙的个人补偿。

交易达成了，但是过了一个月还没有任何动静。然后，有一天早上，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来查看列文了。他递给列文一支烟，问他是否对自己的待遇有所不满。希姆莱还对迟迟没有答复表示歉意，说韦伯先生已经被捕了，现在由他来处理这个案子。交易的条款还与原来一样，而且，希姆莱保证可以把转送到西班牙去，在那里他可以随便去英国伦敦或者美国。这一次，钱款转到了指定账户上，列文也被转送到了马德里。列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出在戈林、希姆莱和韦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那显然是纳粹之间的一场内讧。不管怎么说，列文事先在瑞士存了一大笔钱，算是做对了一件事。

自1941年以后，秘密警察和维希政权开始利用法国警察来抓捕犹太人了。在波尔多，当政的是一个名叫莫里斯·帕彭的富有气质高贵、举止优雅、笑容可掬的行政官员。在他的办公室里，桌后墙上挂着三色旗，而他本人就坐在桌前，一丝不苟、雷厉风行地执行着来自柏林和维希政权的指令。1942~1943年期间，他“从法律上剥夺了”600多家企业，悄悄地逮捕了1700多名犹太人，其中包括223名儿童，用闷罐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北部的德兰西中转营。他们从那里再给转到什么地方，就不是他所管的事了。当时与德国人的精诚合作到了极为普遍的程度，远比战后人们所承认的要广泛、深入得多。如果你要逃离法国，那么你所有的家产立刻就要被收归国库，正如在德国一样，选择流放实在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富有而保守的法国人，那么你只能与德国人合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只有那样，才能保住你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不管怎么说，许多人会心里不服气，认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再说，也没有证据证明德国人会虐待他们。在法国警察与德国人合作的历史上，有一个事实最令法国人汗颜，那就是：有4 000名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被他们强行从父母怀中抢走，放到货运列车，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法国宪兵队后来说他们不知道那些孩子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有一个维希政府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在甄别出了数千名犹太人的身份之后，就把他们统统送到了死亡营。

当然了，在另外一方面，许多法国人很勇敢地保护犹太人。大学里的非犹太大学生们佩戴上了表示犹太身份的黄星，好多人为犹太人造假身份证，还有许多人把犹太人藏起来躲避搜捕，许多犹太人被藏在边远村子里，一藏就是好几年。这些英勇行为要冒极大的风险。最后，正如理查德·维南在其所著的《不自由的法国人：占领下的生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有将近80%的法国犹太人在德国占领期间存活了下来。

## 获利的军火协议

1940年秋，法国公司接到了德国一批看上去利润丰厚的订单，德国人所订的货包括机械工具、拖拉机、卡车、研磨器，以及许多资本货物。到了1941年，法国的失业率已经消失，劳动力短缺，法国的生产蒸蒸日上。然而，1940年夏季战争中被俘的200万名法国战俘却没有放归法国，仍然在德国进行劳作，生活条件相当困苦。希特勒和纳粹早就下定决心要掠夺法国，只不过一开始事情做得相当隐蔽。

1941年年初，德国几家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会计来到了法国，这些公司中，有法本工业联合公司、西门子公司，还有克虏伯公司。他们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大企业。专利技术、高精设备，还有技术工人，都“暂时性地”转移到了德国公司。不过，有一些法国公司还是由于为德国生产军火而赚了大钱。雷诺公司转型了，为德国人生产坦克。马里于斯·柏利埃本来是汽车工业的



先锋，现在则接到大批订单，要为德国陆军生产卡车。这些公司的股价一路狂升，虽然人们早就发现受到贿赂的德国军官在股票上市前，就预先购进了大量股票。

急需资金的法国企业想方设法地吸收资本。银行贷款是“不合适的选择”，于是公司转而发行证券来募资。问题是，这些新股必须以折扣价卖给占领政府、德国公司，或者党卫军军官，或者希特勒的亲信们。他们买股票，用的是没收的法郎，有时也用德国马克，只不过那些马克的价值是人为定下来的，有时马克兑法郎之比高得离谱。有几家法国公司，比如生产火车的巴蒂格诺耶公司，生产汽车的标致公司因为业绩极好而避免陷入这种窘境，然而其他公司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它们不得不大量发行证券，使股票价值一再稀释。

法国股民们对这种情况一开始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作为投资者，可以接受纳粹的统治，也许还是一件好事。结果，股市开始攀升，到了1942年年末，股价已经上涨了3倍。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仍然会最终取胜，至少，它会统治欧洲许多年。另外还有传言说，发行股票的公司要把股票当成厚礼送给占领政府的德国军官，其中包括党卫军，这更进一步使投资者感到放心，认为将来必赚无疑。在占领初期，人们炒股的热情极旺，大量关于德国企业利益的小道消息和内部交易都在进行，影响着股市的发展。

## 通货膨胀下的法国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幻象都破灭了。事情很快就被看清楚了，那就是，希特勒和纳粹根本不想跟法国合作，而是要把它洗劫一空。强制劳工法颁布实施了，它事实上是强逼着600 000名法国人到德国工厂劳动，那些工厂的条件恶劣，工资几乎没有。由于这次大流放，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数百万人，结果造成法国中青年男劳动力奇缺，无人去干重体力活，也无人去打理农田。食品极度短缺，通货膨胀开始以天文数字狂升起来。

由于法国的主要人口是女性，再加上德国人控制着食物供给，因此法国妇女就成了德国士兵加以利用的牺牲品。有人统计过，在占领期间，约有



200 000 名法国儿童的父亲是德国人。法国解放后，这些妇女都受到了残酷惩罚，那是维南在其所著《非自由的法国人》一书中所谓的“血色黄昏”时期。那些女人的头发要被剃光，要给人游街，被人唾弃、猥亵，还要遭到虐待。

到了1942年，法国人民都饿得半死了。德国人不停地把粮食弄出法国，运到德国，或送到东部前线，给自己的部队提供给养。维南讲过一件事，说有一回，巴黎居然有两万人排起了长队，为了买到300份兔子肉。在别的城市里，居民们凌晨三点就得起来排队，只是要看一看粮店里有没有粮食出售了。一个法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勒瓦尔农夫，不是为了他的钱，而是为了他的粮食。人们化装成德国兵去抢食物、抢汽油，更多的人要到黑市去冒险。可以理解的是，农民们把自己的余粮卖出了最高价，这样一来，农民就从城里人那里大大地赚了一把钱。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法国，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更想用这些钱去黑市买吃的、买药和香烟，还有酒和衣服。你还可以抛售股票，从银行取出存款，用这些钱来买你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到了1944年以及1945年冬，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就是出再高的价也很难方便地搞到食品、棉衣和一瓶战前好酒了。

股市的实值在1942年达到最高点，其后就一下子跌落下来，因为股民们惊闻德国整整一个集团军在伏尔加格勒战役中投降。这个消息，再加上英国日益强大，美国在太平洋取胜，都使法国股民感到担忧，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站错了队。从那时开始，股市就狂跌不止。我们得承认，巴黎股票交易所真是太没有直觉，太缺少智慧了！

到了1943年，德国占领政府和秘密警察变得更加残暴，法国抵抗运动也风起云涌，最后，德国兵入侵了维希地区。到了1944年，法国大部分地区都成了“警察国家”，秘密警察只要发现稍微有一点儿可疑的迹象就狂抓狂杀，迫害百姓。法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食物紧缺得要命。通货膨胀与黑市榨干了老百姓所有的血汗钱。股市实值还在暴跌，只不过表面上略有回升，起到了粉饰门面的作用。在法国获得自由之后，道·琼斯指数仍然在下降，因为经济一直低迷，通货膨胀率走得更高了。接下来，1944~1945年，开始对保险公司、银行、煤矿、电力和燃气公司实行国有化。就实值来说，股市已经完全崩盘了。



法国自由以后，曾出现了一片混乱，人们开始跟那些通敌的法国叛徒算总账。对某些人来说，解放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维希政权的警察和密探被人狂追，经常遭到酷刑处死。通敌的记者受到审判，处以重刑。但是，与德国人合作的企业主和供应商则没有什么大事。有几个商人倒是身陷囹圄，因为他们被认定为法国叛徒了。伯里埃被判有罪，失去了自己的公司。雷诺死在了狱中。但是，大多数法国生意人都逃过了处罚，后来还恢复了自己的股权。正如罗伯特·帕克斯顿在其名著《维希法国：老警卫与新秩序（1940~1944年）》一书中所引述的那样，当时有人嘲讽地编出了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同样是法国叛徒，如果你去给德国人修西墙，那么你就没事了；如果你写了一篇文章赞美西墙，那你就得坐牢了。

贝当和拉法叶受到了审判，被定为犯下了叛国罪，判处了死刑。拉法叶于1945年10月15日，由行刑队执行了枪决。贝当的刑罚后被临行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减为无期徒刑，监禁在耶乌岛上，在那里他活到96岁，于1951年7月23日死去。戴高乐曾这样评价贝当：“这个人晚节不保。”

## 战后的法国经济

在战后的前几年里，法国临时政府显示出了“左倾”意向。在法国的农业地区，收成平分制（地主与农夫平分庄稼收益）已经实行了多年，而且法国人本来就有强烈的“平等”思想。许多大企业和大银行都被国有化了。到了1950年，股票市场就其实值来说，已经完全是一场灾难了，然而就其面值来看，还有一点点金子闪出了虚幻之光。事实上，在1944年，尽管法国SBF指数在实值上已经崩盘，然而其面值却跃上了一个新高，放量当然不大，接下来，到了1948年，在通货膨胀的狂风暴雨中又跃上了另一个高度。

法国股市中的投资者，难道真的被这种虚假的繁荣给蒙蔽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占领的大部分时间里，可控的通货膨胀率大约在20%左右，而在战后，即20世纪40年代的后半叶里，通货膨胀率猛升到了6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黑市的延迟效应。由于当时的情况一团糟，要精确统计实际购买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确实知道，从1940~1950年那整整10年的时间里，法国证券在面值上是上升的，但是购买力每年要下降7.6%，在实值上要下降约50%。这看上去很糟糕，但是不要忘了，在1982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售价与其1966年的出价相等，就购买力来说足足降了50%。我们还要看到，当时的情况是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毕竟它还没有被占领。然而法国的悲惨数据显示，在1950年证券价格就实值来说，要比50年前低得多。

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法国真的发挥过作用吗？即使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也得承认，在战争岁月里（1940~1948年）、在占领期间（1940~1944年），以及在那混乱无比的解放和国有化时期（1945~1950年），如果没有证券的话，人们的境况可能还要更糟糕。看一看法国当时发生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1938~1945年那段时间里，法国的证券就实值来说是持平的，就面值来说他们还赚了钱。

股票比别的证券都要强。法郎降得更快，而债券也好，票据也好，在10年时间里其实值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下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正是在获得自由以后，法国的金融资产才开始了最严重的贬值折价。就20世纪前半叶来讲，证券确实没有起到财富保值和增值的作用，这一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那真是艰难困苦の50年啊。

法国投资者真有眼光和头脑吗？我们的回答是：在1940年法国陷落以后，他们就没有眼光和头脑了，因为他们对英国再不抱希望，认为德国占领是善意的，是有利的，并且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相信德国人要世代统治欧洲了。在1941年以后的股价大涨，完全是“傻佬反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毕竟还是正确地解读了苏联在伏尔加格勒的胜利。

## 财富保值

1940~1950年在法国，如果你想保持财富不贬值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置地和保存黄金。有些家族在1940年是富人，到了1950年同样是富人，



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农场、地产，于是他们的公司在面值上得到极大提升，其实值比1940年的水平提升了20%。换句话说，不动产是最好的抗通货膨胀的手段，但是，却并不是最快的财富提升手段。

例如，有钱的法国家族世代都存有黄金。瑞士私人银行家说过，在1939年法国大多数家族的家产里，20%以上都是金条，那些金条要么存在瑞士银行，要么埋在自家别墅的后花园里。他们几乎都没有在伦敦或纽约的股市里持有证券。黄金是与美元挂钩的，这样，当通货膨胀开始时，当法郎兑美元一路狂跌时，金价如果以法郎来表达的时候就高出很多。黄金的实价肯定大大提升了，比房产和商业资产都要高，但是具体高出了多少就很难说了。

不过，在那样可怕的岁月里，把黄金作为抗灾手段却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要把手中的金条变卖换钱，你必须找到买家，不管那人是真正的买主，还是黑市的中介人，两者都同样危险，因为在一个到处是密探与叛徒的野蛮社会环境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可能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让人拿刀威胁，或者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了此一生。第二，不管是哪一种买家，你要卖的话就得大打折扣，你又不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无法找到平等交易的市场。第三，如果你生活在被占领的法国，你必须把黄金藏起来。当法国在1940年陷落时，所有的法国银行都得向德国政府汇报银行的保险箱里存有什么东西。占领政府依据这样的信息，就会向你“借”黄金，给你的是一张借据。黄金接下来就被运到了德国。到了战后，那张借据是不可能兑现的了，因为德国政府的档案在柏林战役中完全给毁掉了。当盟军逼近时，任何存留的黄金都被纳粹官员窃为己有了，他们要把黄金当成自己逃生的资费，因为他们明白大难马上就要临头了。不过，埋在后院的黄金则没有那么危险了，当然也比其他替代品，如不动产和公司更不好出手罢了。

在法国，战争期间发了大财的就是黑市交易者了。那是真正能挣钱的地方，这些肮脏的生意人头脑精明得很，最懂得把自己赚得的利润变成不动产了。他们用黑钱买黄金，并把黄金储存起来。他们之所以买黄金，是因为随着战争的进程，德国人的好日子所剩无几，他们开始为自己在战后寻找出路。买家产，在战后炫富，到了法国解放时那都是危险的行为。在占领期间参与



黑市交易的人引发的民愤极大，被视为社会的蛀虫。事实上，当法国解放时，许多有名的黑市投机者都被暴打，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可是，许多黑市投机者把自己的昧心钱变成了黄金，过了几年以后再用那些金子创办正经生意。1945~1950年那段日子里，当通货膨胀率变得极高时，黄金确实成了最好的财富保值的福地。

无独有偶，在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20多个最有钱的大家族，在经历了墨索里尼统治、德国占领和盟国入侵等种种大难之后，仍然通过持有不动产保住了财富。但是，还是那些黑市投机商发了大财，并把黑钱变成了真正的合法生意，结果他们的财富在20世纪50年代狂涨不止，使他们成了富豪。在意大利，做黑市生意是危险的，是一种玩命的游戏，但是，收益也是极为丰厚的。有些欧洲的大公司在20世纪后半叶里，就是通过黑市资金支持才发展起来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欧洲，在所有的保值手段里，黄金是最好的一种资产，因为它最易藏匿，最能保值，而且最能保证某种程度上的流通功能。股票也好，土地也好，房产也好，公司也好，那些资产只有在你放长线时才能起到保值的作用。黑市是利润最丰厚的一种买卖。



## 第十一章 如何保住财富



温故而知新。

孔子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意大利在1930~1945年的历史都是一段悲惨的历史。不管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意大利人都因为让墨索里尼当权而受到了天谴。墨索里尼梦想着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结果造成了一系列军事冒险的惨败，同时，由于他与希特勒结盟，激怒了同盟国，最终导致了同盟国对意大利的入侵。到了1944年，整个社会都是一片动乱，基本上已经陷入了内战的状态。

在整个20世纪，意大利的证券收益率都是最低的。即使在战后，意大利的股市收益也起伏不定，比欧洲任何国家的收益都要低，因而举国一片萧条。



意大利人是一个伟大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民族，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没能将人民的能力充分调动起来。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意大利的证券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无能又专治的政权统治之下，备受困苦。如果你看一眼意大利股市指数，表面上一切都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把通货膨胀的泡沫一下子抹去，那么露出来的真相足以把你吓坏。

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出生率很高，贫困化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整个国家都处于低沉情绪之中，统治者治理无方，腐败无能。贝尼托·墨索里尼通过暴力、口才和欺骗爬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新的恺撒，而事实上，如果你从右面看他的侧脸的话，还真能看出典型的罗马人的味道。他对自己的信徒们这样说过：“如果我前进，你们要跟着我；如果我撤退，你们要干掉我；如果我死了，要为我报仇。”

墨索里尼是一个健身迷。他肌肉发达，孔武有力，有一段时间还不刮胡子，认为这样他才显得像个男人，显得威风八面。他有许多情妇，其中一个送给他一把金剃刀，还有一个小盒子，他就拿出来到处夸耀。他像希特勒一样，不抽烟，只喝一点酒，最恨那些烟酒过度的人。他爱慕虚荣，野心勃勃，没完没了地玩弄女性。

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墨索里尼把自己放在罗马的一座宫阙里，房子举架极高，要进去必须先走过长长的走廊，最后才来到几扇镶金的橡木大门之前。领袖在一张16世纪的巨型饰金嵌银的大桌子后面正襟危坐，可是那桌子原本是一位教皇的财产。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领袖在办公室那些古董木桌上堆满了地图，四面墙上都有高达天花板的大书架，里面摆放着古书，书上雕刻着塞万提斯、普鲁塔克和但丁的鼎鼎大名。

他是一个激情洋溢、浪漫夸张的大演讲家，能把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有时候，他甚至能让官僚机构中的那些俗官腐吏激情澎湃。希特勒从1936年起就开始接近他了，而我们这位领袖虽然一开始还有点心存疑虑，但很快就被希特勒的阿谀奉承弄昏了头，转而相信德国人可以成为未来的大强国。到1936年，墨索里尼患上了狂妄症。著名的J·P·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到罗马去拜会他，两人对一笔大额国际债务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



还是摩根公司对那笔债务进行了联署担保。1939年，在仪式中，墨索里尼与德国签订了《钢铁协定》，规定双方要对另一方全力支持。

## 墨索里尼“左右”意大利股市

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证券（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一路暴跌，但是后来在墨索里尼巩固了权力之后又回升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开始对墨索里尼创建“新罗马帝国”的宏图大略产生了怀疑。通过向阿比尼西亚村落喷射芥子气，墨索里尼好歹算是征服了非洲，可是投资者却不怎么买他的账。尽管意大利股票就账面上看，1939~1947年一直飞涨，可是通货膨胀也是飞快地往上升，使实际购买力还处在原来的水平。意大利政府一如既往地腐败，军队建设完全靠多印钞票来支撑。无论是对非洲的征服，还是表面上的股市繁荣，都是墨索里尼在夸大其辞。事实也确实如此。

意大利的股市的确曾经在1940年走高过一段，当时墨索里尼虚张声势，做足了戏之后，才大声念出了那份姗姗来迟的对法宣战书。他经常发表愤世嫉俗的评论，有一次他说他需要向希特勒展示几千具意大利军人的尸体，只有这样，德国才能相信他对法属里维埃拉享有主权。当他的军队一遇到法军反击便溃不成军时，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指责军队的将领无能，说“哪怕是米开朗琪罗也需要大理石才能做出雕像啊”。

意大利股市在1941年夏得到了复苏，因为这时的意大利已经全面投入战争，而看上去它似乎也选对了盟友。意大利媒体受到严格控管，官方的宣传主调就是：在未来对新欧洲统治的千年帝国中，意大利要成为德国的好伙伴。在1941年夏秋两季，德国的装甲车隆隆碾过北非大地之时，意大利的股市不管是账面，还是实值上都一路狂升起来了。

不过到了1942年夏天，不安的因素开始出现了。意大利对希腊的进攻遭到惨败，而意大利人民也对德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当四个意大利师在苏联配合德军作战，结果伤亡惨重之际，在意大利国内就出现了激烈而公开的不满言行。反对党开始宣称：意大利作为德国的盟友参战是一个坏主意，而墨索里尼完全是站错了队。在伏尔加格勒，有10万意大利士兵向苏联人投降，大



多数人再没有生还，还有10万人在非洲沙漠被英军俘虏了。在埃及阿拉曼，意大利俘虏的照片传回了国内，他们那悲怆可怜相深深地震撼了意大利人民。

经过1942年及1943年半年的困苦挣扎，意大利股市终于在1943年崩盘了，那时，盟军已经攻入了西西里岛，显然下一个目标就是意大利本土了。1943年7月25日，反墨索里尼的政治人物召开了大协商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协商会议决定对墨索里尼施行逮捕并进行监禁。1943年9月1日，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了。

虽说意大利已正式对德国开战了，但是希特勒却不想对墨索里尼弃之不顾，他命令德国特种部队去把领袖从山顶木屋监狱里解救出来。希特勒有许多令人难解的神秘性格，其中之一就是对墨索里尼的忠贞不移，而墨索里尼则是一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朋友。早在1941年希特勒就曾分派出本要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部队，把墨索里尼从希腊的水火之中解救出来，而且他从那以后不停地费力去解救墨索里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不管怎样，德国特种部队把墨索里尼救了出来，让他与希特勒来了一个热烈的重逢，然后希特勒就把他安排到意大利北部，在那里重掌大权。然而，墨索里尼的神授权威已经破灭了，不论是他，还是意大利股市，都没有因为德国人扶植他当上了傀儡独裁者而获得什么实际好处。墨索里尼已经精神崩溃，心灰意冷，绝望到了极点，最后也残酷到了极点。他重掌大权之后，马上就把那些在协商会议上投票反对他的人都处决了，其中包括他的女婿，那个世界级名人格利佐·齐亚诺伯爵，要知道此人可是他的外交部长，而且还娶了他的女儿。

一点儿也不奇怪，随着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时日无多，股价也就持续保持着暴跌之势。在北方，实际上已经处于内战状态，人们在大算陈年旧账，同时也对法西斯党徒进行总清算。1944~1945年，意大利已经没有法律秩序，也没有对私营财产的尊重了。散兵游勇们在乡间横行，搜寻食物，大抢狂掠。在果莫湖地区，有钱的大家族都团结起来，把值钱的东西都转移到山间易于防守的别墅中，持枪抡刀，要为保卫家产及生命血战到底。那些土匪本是一些乌合之众，一看到人们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心想为了几件珠宝犯不上去惹这些红了眼睛的家族，因而也就放过了他们一马。



意大利的抵抗运动这时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起来。在意大利北部，他们成了德军后方的一支重要破坏力量。正是一支这样的游击队最终抓住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齐，那是在米兰郊外。游击队于1945年3月15日将他们处决，然后把他们双双吊在了一起，那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二人大头朝下吊在了那里，只不过贝塔齐的袜子紧紧地包在腿上，避免了身后的蒙羞受辱。

丘吉尔一直鄙视墨索里尼。丘吉尔的女儿萨拉嫁给了一个小剧院喜剧演员维克·奥里弗，这让丘吉尔极为不快。他是实在不喜欢这个奥里弗。那个穷侃乱逗的奥利弗总是管丘吉尔叫“老爷子”，这更令丘吉尔对他望而生厌了。有一回，那是在战后的一次查特维尔聚餐会上，丘吉尔又受到了周期性抑郁症的困扰，火气正旺，而奥里弗这时纯粹是没话找话，想让这位伟人打起精神来，于是他问：

“老爷子，你所认识的最伟大的政治家是哪一个？”

“贝尼托·墨索里尼，”丘吉尔出人意料地这样回道。

“什么？为什么是他呢，老爷子？”吃惊不小的奥里弗问道。

“墨索里尼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政治家，”丘吉尔瞪着这位姑爷，沉声说道，“他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女婿一枪给崩了。”

在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股票一路走跌，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每年要大跌11.5%。通货膨胀吃掉了所有的收益，而且远不止这些。政府债券表现就更差劲了，根据荷兰银行的统计，在那10年中，几乎每年下跌27%，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字，而政府票据年损失率也狂跌到了30%。换句话说，在意大利，金融资产作为财富保值工具已经完全崩塌了，在战火硝烟中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然而在股票市场的股价公示牌上，这场大灾难完全被掩盖了起来。

不过在1945年以后，人们对战后经济发展普遍怀有乐观情绪，同时也认为证券价值实际上一直被人为压低了，因此股市重新又大涨了起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股市以每年11.8%的复率增长着，不过那是账面价值，



而在实值上可以说50年之内根本毫无增长。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股市在20世纪40年代从未关闭过，虽然1943~1945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易。

债券和银行票据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在20世纪的前半叶，债券和银行票据的实际收益率平均每年要下跌6.2%，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每年的跌幅达到了惊人的27.6%。在20世纪40年代，你在意大利根本找不到金融资产的安身之所，股票也好，债券也好，票据也好，里拉也好，统统都是一堆废纸。所有那些有点儿价值的房屋建筑大多被毁掉了，或者被洗劫一空，或者按战时法律被征用。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时，土地原封未动。至于说到挣钱，还得选择到黑市做生意。在意大利，只有从事黑市生意或拥有土地的人才算真正有钱，他们在1940年赚大钱，到了1945年还是富得流油。

对意大利和墨索里尼时代而言，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意外情况就是：战争救了意大利黑手党。墨索里尼对黑手党一直进行着残酷镇压。法西斯政权虽然极端腐败，但是他们只想自己独吞意大利，而不许其他组织插手。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黑手党实际上已经彻底被消灭。盟军入主意大利，使墨索里尼政府无法再对黑手党进行清剿，同时也给黑手党带来了翻身的机会。黑手党的大腕们记住了意籍美国军官的名字，迅速行动，不断地奉承那些天真好欺的美国人。到了1945年，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黑市交易和地方政府，再次成为意大利社会的一股强势力量。说起来，那真是美军不光彩的一页。

## 德国的财富保值之道

1914~1950年间，德国那个地方简直无法保存财富，更谈不上让财富升值了。在那段时间里，这个国家输掉了两场大战，被敌人占领，以至于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饱受通货膨胀之苦，最终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亲手把国家大权交给了一个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独裁者。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一个有钱人处在全德国性的大灾难之中，如何才能保住他的财富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很可能还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正遭受史无前例的大迫害！

如果你是一个德国犹太人，那么对不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预知将有一



场种族大清洗，马上带着一切能带的钱财逃之夭夭。如果你是一名非犹太裔德国人，在1944年你又能做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生活在德国东部，正面临着成百上千万杀红了眼的敌人的占领，而那些敌人的家园曾被你的同胞残暴地践踏过，而你本人又与那些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现在，你该怎么办？数千年来，这样的问题曾把众多有钱人折磨得发疯，一开始，地中海地区的富商就面对过这样的问题，接着，在欧洲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在内战时期的美国，有钱人也要直面同样的难题。每隔一代，总要产生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会摧毁人们积累起来的财富。有几个国家一直很幸运，没有受到这样的摧残，比如美国、瑞典和澳大利亚——至少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这样。但是在欧洲，这样重大的灾难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定期出现，每隔一代就会发生一次。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拥有不动产（房屋、农田，林场）是大灾难时期最好的财富避难所。记得在小说《飘》中，郝思佳的老父亲在临终之前，耳听北军进攻的杀声，眼看南方乡村燃起熊熊大火，用垂死之音对女儿这样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塔拉的田产，“那是土地，是土地，只有土地才真正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基本上证明了这个老人理论的正确性，只有日本的农用地是一个例外。房产和建筑在战争期间被征用、被改建、一再贬值，或遭到毁坏。而在战争结束以后，你很难找到相关政府讨一个说法。

另外一方面，房产下面的土地却总是待在那里，即使地方的财产证明文件被战火毁掉，当地人也知道那块地产的主人是谁。当然，有的时候，特别是如果那块地产的原主人是犹太人或别的什么讨厌鬼时，当地人会不约而同地忘掉了那块地的主人到底是谁。不管怎样，土地，无论是农场、林场，还是城市用地，都会一直保有自己的价值。到了1947年，当德国开始恢复重建时，地价就一路上扬。当然，土地无法满足套现的标准要求。1945~1946年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里，当你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饿死，地产富翁实际上已经跟乞丐没有分别。

说到德国的战后境遇（包括日本），事实证明盟军的占领是仁慈的、鼓舞人心的，除非你是在东德地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占领和改革措施是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可以参见第七章的详细描写。）至于德国，由



于占领者为美国、法国和英国，所以财产权利得到了尊重，最终在后来建立的西德，所有的财产权利都得到了恢复。当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产权也得到了恢复。在那些遭受轰炸的城市，所有的房屋所有人没有得到相关的赔偿，而土地的所有人最终却领到了土地证。

## 德国战前经济史

要理解德国富人在20世纪初叶所遭受的巨大创痛，我们必须回溯到1914年。造成财富损失最严重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一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经济大病魔总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此时，一个国家印刷大量钞票，造成了通货膨胀，而这个国家的政府由于缺乏政治勇气，只好继续印制更多的钞票，结果越印越多，越印越快，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一般而言，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都有极为复杂的原因，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主要缘于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1914年，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基本上是等值的，对美元的兑换价值总是在4:1~5:1的水平浮动。自从19世纪奥托·冯·俾斯麦执政以来，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军费开支主要靠大量举债，而还债的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战争进行掠夺，用割地赔款获得的利润来还钱。1914年的德国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它的陆军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此外，德国皇帝威廉还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强大海军。皇帝和德国财政部部长都颇有信心会很快赢得这场“伟大的战争”（当时的人如此称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信以往的以军费开销还债的方式仍然会继续。唯有股市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随着战败阴影的降临，股价一路下降。从1914年1月至12月，柏林股市的实值狂跌了41%，到了年终不得不关市大吉。

然而，到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败了的德国再没有赔款获地的利润可言。到了战争结束时，德国政府已是债台高筑，因为它向德国的老百姓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现在不得不发行更多的货币，因此造成了流通货币的极度疲软。这样一来，德国经济早在第一批战争赔款到期之前，就已经开始恶性通货膨胀了。停战以后，远在开始偿还战争赔款之前，柏林股市



重新开业，先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紧接着就是一个大崩盘。到了1921年5月，德国必须偿付的战争赔款数额确定了下来：它要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0%、外贸出口的80%用来还债，需要分几次偿清。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连J·P·摩根和其他许多专家都认为德国根本无力承担。

德国经济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到了1923年年末，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彻底失控的地步。德国马克与美元之比已经到了1万亿马克兑换1美元的水平。银行存款每天要收35%的手续费，家庭主妇们要推着成车的钞票去购物，那一车的钱只能买回少得可怜的食品。购买政府公债而支持战争的人、在银行存款的人，这时都血本无归了。沃尔特·雷维是一个生于德国的石油顾问，在纽约工作。他对亚当·斯密讲述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准备过退休生活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购买了一份保险，在其后的20年里，每个月都准时无误地到保险公司交钱。20年之后，当保险到期时，他到那家公司取出了自己20年的保险单，领到了现金，用那笔钱他只买到了一个面包。”

也有一些人从恶性通货膨胀中获益，那就是一些早在1918年以前就将马克利率锁定的投资商、早已付清按揭的地产业主、还清了商业贷款从而成为解除了地产抵押的商人。保罗·詹森在其名著《摩登时代》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有史以来财富转手的最重要时期。”希特勒和德国大众则把这时的苦难归罪于《凡尔赛条约》和犹太投机商。

简直无法用图表来显示真正恶性通货膨胀的一路狂升。我们用数字来表述的话，效果可能要更好一些。1919~1921年，通货膨胀率是缓慢上升的，甚至到了每年上升2%的水平。到了1922年6月，通货膨胀的年上升率达到了4%；到了9月则为22%；到了12月已经是68%了。接下来，通货膨胀的速度就像火箭起飞：到了1933年3月，达到了285%，接下来在6月份达到了765%，而到9月份则达到了1 500 000%，最后在12月份突破了152 221 670 000%。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空白，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判断那时的股市在恶性通货膨胀时的反应。1917~1923年间，人们用金马克而非纸马克的股指来进行衡量。从灾难性的萧条水平起，股指按实际购买力而言飙升了4倍之多，一路闯进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虎口，然后一路狂跌，在其后的10年中一直无所作



为。问题是在1942年年初，引进了一种新的更广泛的主要股票的指数，这样一来，两种相连的指数无法进行直接比对。粗看过去，股票似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最后，也是最可怕的阶段成为一个很好的避难所，那不过是因为股值已经跌到了可观的程度，经济危机在这里已经变得不那么骇人了。然而，一般而言，德国的证券反应得相当机敏的，证券商们早在1914年就预测到了德国要输掉那场战争。接下来，在1918年，他们预感到战胜国会强迫德国支付赔款，从而使这个国家破产。最后，在1921年，他们又预先看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来临。

对财富保值来说，这样的预感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恶性通货膨胀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发生，它基本上算是早晚要来的“世界末日四骑士”中的一位。要在经济困难时期生存下来，有钱人必须用贷款购得房产、地产或公司。然后，你用已经贬值的钱来付清贷款，结果直接拥有了真正的财产。当然了，如果你这一把赌错了，碰上了通货紧缩，那这笔债务就会要了你的命，最后是放贷人成了赢家。

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极度的社会动乱，人们的幻想破灭，从而使希特勒走上了历史舞台。德国仍然是一个富国，只不过人们要用手推车来运钱购物，牛奶和食品的价格一天上调两次，满大街都是小偷，人们明白这个国家真的不太对劲儿了。农民们不肯卖粮食和蔬菜，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一钱不值的废纸。工人们一领到工资，立刻就跑到最近的商店去抢购。人们开始疯狂地抢夺食品。德国中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珠宝、家具、名画或任何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变卖或典当，以换取食物。公司也好，医院也好，大学也好，这时都关张了。1922年6月，温文尔雅、众望所归、能力超强的德国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诺被极右翼狂徒暗杀了。在一个世人认为一直是安定守法的社会里，如此的政要居然会遭到暗杀，这深深地震惊了德国中产阶级。人们要求社会秩序，要求社会稳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记述希特勒崛起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希特勒正坐在监狱里，口述《我的奋斗》，鲁道夫·海斯进行着笔录。与此同时，雅尔玛·沙赫特博士已经当上了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在此之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经向德国中央银行提出忠告：预算必须平衡，货币供给必



须稳健。一开始，沙赫特博士不听他的忠告，后来又采纳了他的建言（虽然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并把一切功劳都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由黄金支持的新的德国马克发行，货币供给稳定了下来，预算收支初步得到了平衡。这样一来，经济开始稳健发展，通货膨胀有所缓解，社会政治也或多或少地稳定了一些。股票价格又上升了，不过证券很快又跌了下来，准确地说，1929~1932年间共下跌了74%，因为全世界的证券市场都陷于大萧条之中。

随着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社会恢复了表面的秩序，股价又开始一路走高了，当然是从谷底往上爬起来的，因为投资者都在梦想着一个新德意志帝国就要诞生。希特勒本人对经济完全无知，对那些数字烦得不行，但是他明白，经济活动最好要让商人自己进行，于是，他就将经济管理大权交给了天才的沙赫特博士。沙赫特重新找到了信心，开始印发新钞，并巧妙地操控着货币流量。他采取措施、鼓励存款，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来增加政府收入。所有的招数都起了作用。1932~1936年，德国的失业人数从600万人降到了100万人。1932~1937年，工业生产率提高了102%。工资基本被冻结，罢工活动根本不存在，旅游得到了发展，财源滚滚而来。

德国重新武装军队，对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有力推动。但是，德国工业本身的强大与天生的精于管理，也是造成这种发展的一大动因。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即使不算腾飞，至少也比任何主要工业国家强得多。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仅排在美国之后。到了1941年初秋，德国军队在苏联的肥田沃土上隆隆推进，数不尽的财宝从被占领的国家源源不绝地运到德国，柏林股市大涨起来，上涨的幅度最后超过了1910年的最高点。

引人注意的是，德国股市在德军大举进攻苏联之前，或者就在1941年12月的那个午后达到了最高峰值，当时德军推进到莫斯科市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虽说在1942年轴心国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果，可是德国投资者却不再那么热情。是不是他们听到了从东线回来的士兵讲述的悲惨故事，还是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让他们不安，或者是因为握有股票的德国贵族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越来越难以相处？我们现在了解到，早在1941年秋天，德军的高级军官们就再次开始策划行动，要把希特勒赶下台。

最近，对当时的德国经济情况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解释，那是亚当·图泽



在其巨著《毁灭之代价：纳粹党的盛衰史》中提出的。图泽是剑桥大学一名学问精深、受人尊重的经济史学家，对自己的专题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直到1939年，德国仍然没能达到“经济复苏、欣欣向荣、强大无比”的水平。相反，由于几年疯狂备战，德国经济已经疲惫不堪，自然资源极为缺乏，外汇更是少得可怜。还有，德国的经济是畸形的，因为德国农业相当落后，大而无当，依靠人力与马匹来耕作。总而言之，他觉得德国工业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率，富有创新精神。图泽列举的数字说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1938年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等于美国的1/2，还不到英国的2/3。

他的观点可能有点太极端了。1939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战争总是在春天和初夏发生。德国工业以加工精细而著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精良的工业体系，不过说到军备方面，图泽很可能是正确的。早在1941年秋天，德军东线的战地指挥官们就抱怨苏联的坦克要优于德国。自1940年春天以后，法国工业就开始加入德国工业，为德国生产坦克、卡车和弹药了。

据图泽的说法，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尽管纳粹机器仍然处于权力的巅峰，但是德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它缺少钢铁、煤炭、石油，人手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其军事机器的需要，在其后的整个战争期间，“物质短缺管理”已经成了每天的工作。图泽认为，正是这些长期的经济不足才导致了希特勒的政治思考和军事策略。

说到政治问题时，图泽说希特勒对美国的经济实力极为惊叹，对那个国家的辽阔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尤为赞叹。他精心地研究了美国军队、骑兵及开拓团残酷征服印第安人的战略战术。这后来成了他设想对东欧进行殖民的基础，按照他的设计，德国要在东欧建立一个拥有1亿人的国家，主要通过把当地居民饿死、累死的方式来实现，那样的话，一块巨大的空间就被德国人腾了出来。希特勒相信，既然美国人能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那他计划对当地居民进行人种灭绝也就合情合理了。图泽认为，正是这种生存空间的理论才能解释为什么希特勒还没征服英国，就一定坚持要在1941年就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

至于说到军事方面的影响，希特勒深知德国经济基本上是疲软的，缺乏



资源，因此认为德国无力跟人口众多、得天独厚的对手打一场持久消耗战。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采取一种快速打击战略，也就是所谓闪电战来对付欧洲国家和苏联。

## 艺术品价值

现在再谈一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何保护犹太人及德国人的财富问题吧。如果说证券不太可靠的话，那么，艺术品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艺术品可以藏起来，但是也更容易遭到散兵游勇的野蛮抢夺和劫掠。德国军队毫无疑问进行了财产掠夺，尤其是大量劫掠艺术品。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是希特勒帝国博物馆馆长，战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掠夺工作，战后被判侵夺敌方财产罪。说到艺术品（许多专著对此都有大量记述），我们发现德国军队对许多博物馆和富豪的私人收藏进行了洗劫，把那些宝藏运回了德国。希特勒虽然在当政之前自认为是艺术家，可是他对艺术几乎一无所知，对收藏更是不感兴趣。纳粹文化部鼓励人们珍藏和创作纯日耳曼的原始画作，在画中要展现面容英俊、体格健美、赤身裸体的雅利安种族的男女。

在如日中天的荣耀时刻，希特勒想在自己的出生地——奥地利林茨——建造一座庞大无比的元首博物馆，馆藏的质量要远远超过巴黎卢浮宫、伦敦泰特画廊，以及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他吩咐罗森伯格要在全欧境内搜寻最好的画作和雕塑，来完成这一个宏伟的计划。另一个艺术品收藏大家是空军元帅戈林，与希特勒相比，他自认为是艺术品的鉴赏大师，专业更深，品位更高。他对17世纪荷兰艺术大师的作品情有独钟，但是对其他学派的优秀作品一律兼收并蓄。他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权力，对下级官员进行威胁，用自己手中差劲的藏品来换取人家手中的名作。

罗森伯格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来满足这两个大客户的不同要求。同时，他还要满足来自将军和政府高官们的收藏要求，那些人的品位不同，要求各异。戈林是目前所知的德军当中最热衷此道，也最为贪婪的收藏家。他不时赶到巴黎，直接参与竞取某一幅画作、雕塑、壁毯和陶瓷制品，把那些艺术品弄回德国，充实他那庞大的私人藏库。就这样，1940~1944年



夏这段时间里，有数百件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珍藏艺术品被弄到了德国，送给了希特勒和戈林。那些收藏品都得到了精心保存，并被拍成了照片，战争结束后都被送归原来的主人处。还有成千上万件艺术品，即所谓不那么著名的“艺术藏品”，是纳粹占领军直接偷窃走的，其中有许多永远不可能找回来了。

纳粹在其征服并占领的地区对艺术品大肆掠夺，经过曲折，情节离奇。黑克多·费里卡诺在其所著的《丢失的博物馆》一书中描述了追回那些名画的磨难与痛苦。有一对伯恩海姆兄弟在巴黎圣·奥诺雷街开有一座艺术画廊，收藏许多名作精品，德国人一来，他们就将自己所藏的雕塑，还有莫奈、雷诺阿、皮萨罗、西斯利、赛尚和马蒂斯的画作分成了两份收藏。其中一个兄弟把自己的那一份运到了摩纳哥保存，一直到战后它们都完好无损。另一个兄弟误判了占领区的形势，把他那份艺术品转移到了自己在巴黎的家中。当德国军官被派住到他家里时，这位仁兄的收藏就被发现，并被没收了，换句话说，这些收藏品全被偷走了。

不过，这对兄弟所藏的名画中最佳画作已经被拆下画框，卷起来装进牛皮纸袋，送到了一位朋友的城堡里收藏起来，那座城堡在边远崎岖的多尔丹地区，位于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自由区内。那两个兄弟认为德国人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城堡是在1811年建造的，模仿了美国的白宫模式。那些画作就藏在了城堡的屋檐下。不幸的是，1943年德国人占领了自由区，也许是看到城堡与白宫相仿而心中有气，他们洗劫了这座建筑，把所有的家具、弗来米挂毯、古波斯地毯和丝织品用车运走了，并故意纵火，将城堡烧成了一片平地。那些藏在屋檐下的价值连城的名画就这样给毁掉了，正因如此，费里卡诺才起了那样一个书名。

由此看来，在被占领的国家，艺术品也不是保存财富的最佳避难所。1940年，当德国大军逼近巴黎时，许多富有的艺术品收藏者都害怕占领军会没收他们的收藏。另外，他们也怀疑在普通百姓饿得半死的时候，这些艺术品或古董行家是否可以将艺术品拿出来换取食物。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只有他们的珠宝起到了财富保值的作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可以用珠宝换取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药品，这是相当容易的，因为日本军官很愿意做这



样的交易，把换来的珠宝拿去取悦自己的女友。在欧洲被占领的国家，到现在还在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占领时期，价值不菲的珠宝被送到黑市，在那里换成生活必需品，当然珠宝的价值被大大地压低了。

当德国入侵波兰时，著名的查尔托斯基珍藏品，包括5 000件绘画、古董、瓷器及珠宝都被转移到了波兰南部谢尼亚瓦一座乡间住宅。不过，其他有钱人却不想那么麻烦，例如德鲁齐-鲁贝齐公爵将自己的银器埋到了地下室，波多基伯爵则将自己收藏的珍品打包藏到了好几个地方，其余的则保留在原处不再管它们。不幸的是，所有这三大家族都被告密者出卖了，他们的藏品被德国人查收了。当德军逼到乡间时，那些富豪别墅都被洗劫一空。

玛格札塔·罗茨维尔伯爵夫人在穷困潦倒之时，就打发她的儿媳离开比亚里斯托克附近的乡间别墅，赶奔华沙，到银行里把保管箱中的珠宝取出来。那个女人到达银行时，看到德国军官正逐一查看所有的保管箱。当她站在一边呆看时，银行经理已将罗茨维尔家那一箱珍宝摆到了德国军官的面前。“真可惜，”他对德国人说，“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件是真品。”德国人哪能分得出真假，就摆手让他把箱子送回去。经理小声地对他的客户说：“我们保住了伯爵夫人的珠宝！”之后，伯爵夫人和儿媳带着那些珠宝逃到了科拉科夫，在那里住了两年，靠出售一件又一件珠宝来度日。

但是，要想保住你的财富该是多么不易啊。不幸的是，这个故事后来的结局很悲惨。有一个自称荷兰外交官的男子劝说伯爵夫人，要做她的代理人，把大部分珠宝带到西欧，送到伯爵夫人的表兄那里收藏，然后伯爵夫人想办法赶到那里，取回珠宝，再逃离波兰。后来，那个所谓的外交官把珠宝都给卖掉了，而伯爵夫人被困在波兰无法脱身。这个情节说明：在战争期间，那些胆战心惊的有钱人是多么容易受艺术骗子的愚弄。

不过，还是有一些艺术品逃过了纳粹的魔掌。在巴黎，德莫里尼大街23号原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豪宅，现在则被征用为德国空军司令部。戈林到巴黎收取艺术品时，肯定经常在那里出入，然而他哪里知道，就在那座大宅装饰优雅的书房里，在那一排大书架的背后，还藏有一间密室，在那密室里封存着罗斯柴尔德一批最著名的艺术收藏。另一个法国家族收藏着赫拉，即天神宙斯妻子的雕像。那是目前人类所藏的最珍贵的古代雕塑之一，当时那



家人把布娃娃的衣服套在雕像身上，结果成功地骗过了德国鹰犬的眼睛。

其他巴黎人则另有打算，当德国装甲车逼近巴黎时，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收藏品拿出去卖掉了。艺术品店里堆满了一流画作。那真是一个买家的黄金时代。1940年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巴黎出差，在隆隆的榴弹炮声中，买到了两幅塞尚和两幅德拉克洛瓦的画作，如果他还健在的话，那么40年后这四幅画作要增值40倍了。

## 一个家族财富的丧失

让我们再看看德国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接着就是世界大战，德国投降，最后是德国被占领。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财富都丧失了。德国富豪失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中弗里茨·蒂森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作为德国的钢铁大王，蒂森是当时德国最有钱的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花了大量金钱支持希特勒，跟纳粹党的高层过从甚密。他以为自己已经缴足了贡金，家族的财产肯定会受到感恩的元首的大力保护。不过没想到，希特勒的下属在1938年就以紧急状态法为名，把他的公司收归国有了，并且将管理层全都换了人。蒂森简直气坏了，不过也无能为力，自己的资产大大缩水，当然还不至于沦落为穷人。

然而，在无意之间，他却报了这一箭之仇。蒂森是好几家跨国公司董事会成员，因而时不时要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公司会议。由于心怀怨怼，他总是公开地讲希特勒的坏话。1938年，他见到了一位名叫威廉·斯蒂芬森的英国商人，那人实际上是一名间谍。蒂森提起了在自己柏林工厂里，正在制造好几百台极为先进的名为“恩尼格玛”的手提密码机，可是柏林政府却没有付给他应得的工钱。

蒂森吹嘘说，那种恩尼格玛密码机是德国一种高科技机型。它有一个打字机式的键盘，与一个转子系统相连接。转子间的关联可以随时转换，方式多变。发电报的人可以正常打字写信，而机器会把每一个字母转换为不同的字母，这样，截获电报的人看到的就是一大堆乱码。而用来接收电报的恩尼



格玛机则会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再把那些乱码转换为原来有意义的电文。那个转子系统会不停地变化。这种密码被称为ULTRA，德国人相信它是不可破译的。

斯蒂芬森立刻认识到，在行将打响的世界大战中，谁掌握了新型密码机，也就是一种简单、安全、易操作的密码机，谁就有了有极大的优势。闪电战的战略思想正是依赖于突然性、快速行动，以及灵活而秘密的通讯联络才能实现。

由于事先得到了警报，斯蒂芬森就组建了一个专家小组，其中有机械师和密码破译专家。他们在布莱切利园一座隐蔽房子里工作，任务就是破译ULTRA密码。那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个专家小组最后终于成功地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系统。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破译德国人的密码帮了盟军天大的忙。

## 犹太人的财富厄运

听欧洲成功的老者谈起他们悉心理财的经历，总是令人对他们的智慧感到惊讶。如果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这种讶然就变得更甚。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难民思维”，那是一种心底深处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感觉令他们高枕无忧，永远保持着忧患意识。那些处于上流阶层的欧洲贵族如此敏感自有其道理。特别是欧洲的犹太人，更有理由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20世纪里，他们经历了两次战争，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种族大屠杀和经济大萧条。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相比，美国人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在美国，只有市场才会令我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最令人心碎的故事，莫过于德国犹太人所遭到的苦难。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上台之前，犹太人已经完全融合为德国社会与德国经济的一部分了。许多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可以查出自己的家谱，从中世纪开始，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了。他们在日耳曼帝国的地位受到了尊重，我们知道，俾斯麦最亲密的人就是他的财政顾问阿诺德·布莱克罗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犹太人都到西线作战，其中有些人，比如奥托·弗兰克（安妮·弗兰克的父亲）



曾因作战勇敢被授勋，并提拔为军官。而奥托的父亲是一个忠心爱国的德国人，在1916年为了支持当时的战争而购买国债，事实上，整个家族的财产都随着恶性通货膨胀而化为泡影，恶性通货膨胀也使得政府公债成了一堆废纸。话说回来，由于嫉恨，由于代代相传的偏见，在德国多年来一直有一股反犹暗流在涌动着。纳粹利用了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股仇恨上火上浇油，声嘶力竭地叫嚷是“犹太鬼”制造了这次通货膨胀，并直接从人民的苦难中大捞钱财，闭眼不管这样的事实：犹太人作为放债人，才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

德国的上层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们自认为是天生的德国人，感到很安全。他们知道在德国有一股反犹情绪，不过他们相信在过去的50年里，自己在德国社会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个文化高度发达、教育如此深厚、产生了那么多伟大音乐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国度，会把权力授给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人，那人整天在鼓吹进行种族清洗。许多德国上层人士同意他们的看法。

那些人士指出，汉堡的沃尔伯格公司，还有柏林的蒙德森公司，虽说是犹太人控制的企业，却也同时是给德国一些大公司服务的银行家，1930年，那些公司的合伙人都加入了上百个大企业的董事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犹太人都曾在皇家陆军和海军中服役。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产阶层的犹太人，也就是在中小城市开商店、办小公司的犹太人，开始感受到了日益增大的压力和偏见。1933年3月30日，在法兰克福，也就是那个犹太人当市长的城市，发表了一份政府公告。公告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致社团成员：

没有任何人能斩断我们与德意志祖国的千年传统联系，没有任何困难或危险可以破坏我们传自父辈的赤胆忠心。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坚强不屈、谨言慎行、保持尊严。

如果无人为我们说话，那就让这座城市的石头为我们申辩吧：这座城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犹太人的发展而得到的；这座城市的建设，也沾满了我们犹太人的汗水。犹太与非犹太市民一直和睦相处，



关系密切。

不要丧失信心！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真正高贵的犹太人是不会弃甲而逃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保存祖先的传统而努力。

法兰克福犹太社团执行委员会

这个执行委员会显然不主张离开家园，出国避难。与此同时，纳粹分子正在指责犹太银行家们“掠夺国民”，不过政府有意对这些受控的犹太人网开一面，因为现在纳粹政权还需要这些银行的钱来扩大出口。没有出口，希特勒就无法兑现自己要扩大就业的许诺，同时他也需要外汇来购买原料和弹药，用以武装他那支迅速发展的大军。到了1933年，犹太人在大街上就开始遭到纳粹流氓的百般侮辱了，经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有时在被捕之后就永远地从人间蒸发了。经济上的迫害，在此时也日益加紧。在大城市外围的小型犹太银行遭到同行排斥，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德国人开的银行。一个有钱的犹太人拥有一座公寓楼，可是，现在政府却对他说雅利安人不能在犹太人拥有的公寓里当房客，结果逼迫犹太人以半价将房子卖掉。外汇控制也加紧了，犹太人要换汇必须缴纳全额汇率78%的税金，除非他现在去巴勒斯坦才能免此重税。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那你走在大街上，可能随时都要遭到一帮流氓的暴打，挨打的原因，你却永远不得而知。如果你做生意，随时都可能听到一条法律刚刚颁布，让你一夜之间就彻底破产。一个犹太人在一座小镇开店，而且是祖传老店，这时却突然发现有人砸破了他家的玻璃窗，还有人在他的店前拉起了隔离绳，不让客人进来购物，标语上写着口号，要求人们不要再到这里来买“犹太吸血鬼”的东西。这些小镇里的商人都是圈子里的高贵人物，受人尊重，没想到现在他们的邻居和朋友都不想继续与他们做生意，也不想跟他们继续打交道了。

这些中产阶层的犹太人与富豪相比，没有那么多财产，损失还不算太大，因此更想顺势移民出走。许多人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定，以一个受迫



害的少数种族身份，将家产便宜变卖，凑到一笔钱匆匆忙忙地背井离乡。当然了，在他们变卖店铺或住房时就会发现，现在是买方市场，他们得到的钱还不到真正价值的1/2。不管怎么说，他们拿到那笔小钱，逃出了德国，事实上已经身无分文了，不过他们还是带走了自己的无价之宝，那就是自己的大脑。

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案》取消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禁止他们从事公职。犹太人还不得与雅利安人发生性关系，不能与雅利安人结婚。正如荣·切尔诺在《华宝家族》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一下子，这些法律就将犹太人变回了奴隶，把整个民族送回了中世纪。”人们惶恐不安地听到了传言，说集中营里发生了种种可怕的事。对犹太人的威胁已经变成了法律。紧接着，就在1938年11月9日发生了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即所谓的“水晶之夜”。

到了1945年年末，有100 000名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是还有450 000名犹太人仍然没有下定决心背井离乡。例如，麦克斯·沃尔伯格这位最有重量级的犹太投资银行家就待在了德国，继续做生意，1936~1938年，沃尔伯格家族银行一直忙着赚钱，为流亡的犹太人提供便利，为德国工商业客户服务。富裕的犹太家族仍然生活得相当不错，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仆人保护着主人免受外界骚扰。不过，他们的社交生活还是极大地封闭了起来。他们还在思量着自己的境况，盼望着最坏的日子很快过去。这时候，离国逃难的费用已经很高了。

这些上层犹太人家财万贯，现在却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要么移民他国，把家财丢到脑后；要么苦熬苦等，也许好日子还能回来。比如麦克斯·沃尔伯格，就声言纳粹主义不过是一时的疾病，现在逃离他们世代居住的祖国，把自己的家产低价甩卖，把祖祖辈辈创下的事业拱手让人，那完全是胆小鬼的过火反应，这样的反应会让犹太家庭彻底破产。他宣称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此外，看来纳粹也需要他们。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沃尔伯格家族银行的合伙人还在一些德国大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继续为那些大公司进行银行交易。1935~1938年，沃尔伯格家族银行每年的账面利润都达到了100万德国马克。



## 希特勒的经济学家

雅尔玛·沙赫特这位希特勒的“经济沙皇”与犹太上层一直过从甚密，相交甚欢。他对犹太人总是积极帮忙，深表同情。他喜欢与犹太人打交道，经常出席犹太家庭的盛宴晚会。犹太商人也会投桃报李，送给他一些热门股票，同时，按当时的社交时尚，把一些内部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了他。沙赫特一直对希特勒说，迫害犹太人只能坏他的大事，犹太人可以帮他弄到工业原料和外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不停地对犹太人保证，说希特勒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凶狠吓人，一旦他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就不会再迫害犹太人了。

沙赫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采纳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建议，成功地解决了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问题。1935年，他担任过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是希特勒的首席经济设计师。沙赫特是经济学家，但是他从来不拘泥于经济学的条条框框。一般来说，他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然后依直觉来作出决断。德国是所有工业大国中第一个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对此沙赫特可以说居功甚伟。他监督建设了德国的高速公路，主持了纳粹时代的一系列公共工程，从而刺激了经济复苏。他是一个老派的、贵族式的银行家，总是衣着入时，戴一副无边眼镜，一头银发从中分开，总是穿着吊带西裤、条纹西装。他在元首面前也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烟，别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那么做的。

沙赫特与世界上的金融大鳄们都过从甚密。英国那位优秀的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对他的评价相当高。他与J·P·摩根集团的老总们也私交甚好。显然，希特勒和戈林对他是又敬又惧。他从未参加纳粹党，却得到了希特勒的全面授权来管理中央银行。沙赫特后来这样写道：“他（希特勒）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只要我保持预算平衡，给他提供充足的外汇，他就不在乎我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的。”

沙赫特自视甚高，桀骜不驯。正如荣·切尔诺所描写的那样，沙赫特“对希特勒简直太无礼了，如果别人那样做肯定要丢脑袋的”。沙赫特可以放开胆子跟元首争论，有一回，希特勒送给他一幅画，声称这是给他的礼物，但是沙赫特把画还回去，表示感谢并声称这不过是一幅伪作。他像高超的指挥



家那样操控着德国的信誉，使这个国家可以大量举债。他利用犹太银行家为战争经济输血集资。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一些像沃尔伯格那样的家族银行没有迁出德国，不停地对那些犹太人说希特勒的本意还是好的。当时他对希特勒了解得很深。切尔诺声称，他在哄住犹太银行家的同时，还对希特勒吹嘘自己已经封住了犹太人的账户，使他们无法把钱汇出德国，只能用来资助德国重振军备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沙赫特与希特勒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了。沙赫特认为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到备战上，民用生产和消费也要得到发展。他警告希特勒，把经济完全建立在扩军备战上太危险了，那样会使国内消费陷入完全的疲惫状态。希特勒在公开演讲中许诺，他要摧毁犹太人拥有的大百货商店，而沙赫特说把那些百货店摧毁，就会损失90 000个工作岗位，伤害到国民经济。希特勒听完了他的忠告之后，在演讲中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不过，那些百货店后来还是被纳粹暴徒给冲击了，店主们最终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把商店处理掉。

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沙赫特与希特勒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次争论记入史册，成为经典。很快，他就被解除了财政部部长之职，由戈林取而代之。不过，他还是保留了中央银行行长一职。就在那一年，他参与了柏林军官发动的政变，第五章对此有专门论述。1939年12月，在中央银行的圣诞晚会上，也许是喝了太多酒的缘故，他激烈地指责了“水晶之夜”的过度暴力行为，正是在那一晚，许多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被烧毁了。他还提出了一个让50 000名犹太人移民的方案。几周以后，当希特勒听说了他在晚会上说的那番话之后，就免去了他的职务。十分罕见的是，希特勒并没有把他投入监狱，换做别人早就被判处死刑了。沙赫特在这场浩劫中竟然存活了下来。

## 犹太公司的接管

1937年，最流行的口号是“雅利安化”，意思是纳粹政府要求德国人掌控所有的企业和生意。这项政策鼓励日耳曼人以他们所能出的最低价格收购犹太公司，如果价格无法压得太低，那么纳粹政府就会出面进行赤裸裸的威



胁，那个倔强的店主如果表示不听话，那就要送他去集中营待上漫长的时间。如果一个犹太商人能把公司以半价出售，就算是谢天谢地了。如果他想离开这个国家，需要出售住房，不过此时已是买方市场，他只能以极大的折扣卖掉那所房子。一个中产阶层犹太家庭出国前要付出一笔骇人听闻的外汇税，缴纳完税金之后，他们一家离开德国时已经身无分文。

当然，所有这些过程的受益者都是日耳曼买主，他们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公司和不动产。大宗、小宗的交易就这样进行着。柏林和汉堡的百货商店只能卖出地产，而且是市值的一小部分。弗里德里希·弗里克买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家著名珠宝店，即鲁贝克·布拉斯特饰品公司，价格只及正常市值的50%。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犹太人，他被迫把自己的公司出售，对方却不给他钱，只给了他1万只金丝雀。他把5 000只金丝雀运到了纽约，卖给了宠物店，然后回到德国，把剩下的5 000只又运到纽约，卖给了同一家店。后来他就待在了纽约，开办了一家大公司，专门从事宠物生意。

随着时间推移，犹太人出售自己的企业，最低折扣给出7折。而这个犹太人若是想离开这个国家，要把打完折的钱再掏出一大笔，至少要缴纳75%的外汇税。当沃尔伯格家族最后不得不在1938年年末出售自己的银行时，拿到手的现金是340万德国马克，仅仅是其账面所值——1 160万马克——的一小部分。然后，还要缴纳一笔“帝国资金转移税”，共计850 000马克，然后还要缴纳100万马克的印花税，才能最终得到雅利安化委员会的批准。最后到手的钱不过155万马克。不过这还没完，沃尔伯格家族还得缴纳90%的外汇税，这样当他们离开德国时，手里只剩下155 000马克了。这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啊！

同样的命运，也降到了布雷克劳德家族的头上。布雷克劳德曾是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财政顾问、投资经理和亲密朋友。犹太人和容克地主建立了日耳曼帝国，而成立于1803年的布雷克劳德企业，虽然有争议，却是世纪之交的德国最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布雷克劳德的继承人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德国社会，于是在1936年，当这个家族中的一员想娶一个出身普鲁士名门的佳丽时，就向政府提出了申请。《纽伦堡法案》明文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这位年轻人想得到政府的法律宽容。但是政府立刻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个年



轻的求婚者很快就病倒了，因伤心欲绝而最终死去。1938年，布雷克劳德公司倒闭了，家族的部分成员逃到了瑞士，从那里转道去了纽约。有几个家族成员就在那里开办了新的公司，取得了成功。新公司的名字是阿诺德·S·布雷克劳德公司。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是逃出了德国。1939年5月，有一艘德国客轮“圣路易斯”号搭载了一船富裕但并非超级富豪的犹太人，那艘船被困在了古巴，等着得到进入美国的许可。许多人的行李中都藏有珠宝和卷起的名画。不幸的是，古巴拒不兑现自己收容难民的承诺，而美国也拒不允许那些人进入美国。后来，事情一直闹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还是没有用。直到今天，我们还搞不懂那是为什么。那艘船不得不返回欧洲。只有一小部分人得到许可，到英国避难，而大多数人不得不回到德国，被送进集中营，最后终于在大屠杀中丧生。

德国犹太人的财富，还有被占领国家里富人的钱财都被剥夺了，其中的大部分都落到了纳粹领导层的手中。希特勒本人对这一生财之道并不感兴趣，但他也没有反对自己的亲信大肆敛财，因为那样的话，钱财毕竟还算是留在了纳粹党党内。大多数纳粹成员喜欢乡间地产，也有许多人喜欢艺术品。富有经济眼光的人则希望得到某些德国和法国公司的股份，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公司因做军火生意而大发横财。领导层内腐败不堪，矛盾激化。据保罗·约翰逊所说，希特勒有意挑起内部纷争。这位元首曾这样说过：“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摩擦，因为摩擦产生热量，而热量产生能量。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达尔文主义。”

德国在1945年投降以后，关于赔款的谈判折腾了好几年也没达成最终协议。那些没收的或压价转让的资产，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实在难以确定。所有的赔款数额都不大。例如沃尔伯格家族，他们原有的家族银行现在仍然运作，因此得到了25%的股份，再加上一笔现金。他们还得到了5年优先增股权，到时可以将自己的股份增至50%的控股权。可是当时间到时，他们却无法拿出那么多的钱来兑现这个优先权。

就在最近，也就是2007年3月，另外一场诉讼达成了协议。君特·维尔海姆曾经拥有柏林那家零售企业维尔海姆公司，它就坐落在库达姆大街，那



是一条高档商业购物街。1939年，他的那个位于波茨坦广场边上的商店，还有一块5英亩的商业用地都被征用了，他和全家人逃到了美国新泽西，在那里，这个昔日的富豪现在不得不以养鸡为生。战争结束后，那5英亩的商业用地被划入东柏林，而且由于城市的分割再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可言。一个骗子说服了维尔海姆，让他把商店和那块地都卖给那个人，那人转手就将地产卖给了一家德国大公司，即嘉士达·客万乐公司。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那5英亩的商地一下子身价百倍。现在，就在那块地上建起了豪华公寓楼、写字楼，还有一座丽思卡尔顿酒店。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嘉士达·客万乐公司最终同意付给君特·维尔海姆的子女（现均在七旬以上了）1170万美元，大体上相当于那块地当前价值的1/3。虽然不是全数赔偿，但总比分文不给要好得多了。

## 保存财富的最好出路

对于那些有钱人，世代生活在某个国家却一直被视为少数民族，而且是生意兴旺发达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我们该提什么样的建议呢？德国犹太人提出的建议是“什泰特勒”，那是一种种族隔离区所特有的紧张心态：坏事随时发生，永远保持警觉。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富裕华人总是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置办一份产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居住国的商业帝国随时都可能被没收，或被摧毁。我们对那些刚挣了大钱，或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的人也提出一句忠告：不要炫豪夸富，不管你感到多安全、多可靠，你还是千万要记住：永远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永远要在国外存一笔活命钱。一定要搞明白，你存放在海外财产的产权是绝对清楚的，无可争议的。

同时不要忘了，让我们对柏林股市的大智慧顶礼膜拜吧。







## 第十二章 世纪之役



你们不要亲手复仇，要像书上所写的那样把仇怨交给我，主说：复仇在我，我必报应。

《罗马书》第12页第19行

从战争打响那天起，盟军一直节节败退，不过到了1942年下半年，他们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也得到了一定的喘息之机。本章将描述一下伏尔加格勒战役，也就是在“世纪之战”的大标题下重点叙述一下这场“世纪之役”。苏联在伏尔加格勒的最后胜利扭转了财富毁灭的进程，并把这个进程逆转到了德国人身上。纳粹帝国的垮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2年3月，苏联前线拉开了1500英里宽，从莫斯科西部地区的南面，彼得格勒外围的芬兰湾，一直朝南伸到乌克兰的黑海。3月初，在希特勒位



于东普鲁士的指挥部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总参谋部强调补给线过于漫长了，建议采取一种保守战略，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私底下，将军们悄声谈论着是否该进行停战谈判了。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希特勒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病态，越来越偏执多疑了。当时，总参谋长弗朗兹·哈瓦德将军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情景：

有一次，他（希特勒）听取一份相当客观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在1942年斯大林仍然有能力向伏尔加格勒以北的地区调集100万~125万名生力军，另外还能调集50万军队到高加索，报告还说苏联人每月的坦克生产量最少是1200辆，希特勒突然冲读报告的人发起火来，朝他挥舞拳头，嘴角吐着白沫子，让那人快快闭嘴，不要再往下读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了。

也许，哈瓦德应该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他后来终于被关进了集中营。

希特勒不但没有采取守势，反而调集大军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他非要拿下伏尔加格勒不可，因为那是苏联军工生产的中心。他要占领高加索的油田，要让苏军尝到一场大败，从而一劳永逸地把他们消灭。这场战役的代号是“蓝色密码”。

## 再次投入战斗

截至1942年春，德国坦克师的规模已经从19个发展到了25个，不过，他们的坦克还都是1941年的型号，仍然比不上苏联的T38坦克。德国陆军又增加了三个匈牙利旅、12个罗马尼亚旅、三个意大利旅、两个芬兰旅，以及三个斯洛伐克旅，只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更喜欢互相叫劲，而不是对苏联人叫板。

然而，德军精锐陆军的士气已经低落下来了，战地指挥官们的信心已经打了折扣，就地提升的军官们也不再斗志昂扬了，因为他们都对1941年的战役感到失望，更害怕苏联那令人恐惧的冬天。眼下已经有200万德国士兵在



苏联作战，他们写回国内的家书反映出了沮丧与绝望之情。有一个德国国防军军官给家人写信时，这样说道：“如果那个苏联兵伊凡炸飞了一条腿，或者肚子上插进了一把刺刀，你可别以为他已经死了。只要他还剩下一条胳膊，能够着一支枪，只要你一走过去，他就会翻过身来，开枪打中你的后背。”在德国国内，人们开始认识到了，把你送往东部前线，几乎就等于判了你的死刑。

不管怎样，1942年春，德国国防军还是壮起胆子，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投入了战斗。它仍然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而且，在那个夏天仍然取得了辉煌战果，一路向南杀去，坦克指挥车上，三角旗猎猎飘扬，从顿河、伏尔加河一路指向格罗慈尼指向高加索的油田，最主要的是，指向了伏尔加格勒。

没想到，1942年6月9日，发生了一件离奇事故，德国装甲师的一名作战部军官陆军少校雷谢尔所驾驶的一架斯托克轻型飞机，在两军交接地带被击落。此人违犯了所有的行动规定，随身携带着基本作战计划，还有整个南线进攻的命令。这两份材料都指出德军攻势的目标是伏尔加格勒。

雷谢尔当时没有摔死，眼看苏联巡洋兵已经包围上来了，竟想用随身携带的那支鲁戈尔小手枪把他们击退，结果失去了仅存的机会销毁那些计划书。少校被击毙了，巡逻队得到了他那只烧得发黑的公文包。打开公文包，看到里面是完整的作战计划，他们立刻将这一计划直呈给斯大林。听到了这一泄密事件，希特勒气得暴跳如雷，命令立刻把雷谢尔的上级指挥官移送军事法庭审判。

## 凶猛的抵抗

随着德军逼近伏尔加格勒，苏联军队的抵抗也越来越凶猛了。德国报纸和广播开始报道令人震撼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敌人情愿用七八条命来换取德国士兵的一条命。在那些报道中，不时地出现这样的字眼儿：“疯狂的坚守”、“狂野的困兽”、“一群野蛮人”，后来还有更不祥的说法了：“每一个德国兵都将自己视为遭到天谴的人”。

与此同时，希特勒对战场上的态势越来越感到不对劲儿了。他一直与将



军不和，现在变得更加独断专行，残暴无情了。战地指挥官威廉·格罗纳将军在1942年8月30日，写了一篇日记，其中这样说道：

今天元首主持的军事会议，又成了一场对军队最高指挥的无端指斥。他指控他们误国，脑袋不好使，完全抓不住事物的本质。

## 争夺伏尔加格勒

到了1942年8月末，德国人已经逼到伏尔加格勒的郊区，最后的决战打响了。8月23日，德国汉高轰炸机对市中心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将贮油库炸毁，大火冲天而起，造成了巨大的火灾。整个伏尔加河沿岸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是石油流到那里在燃烧。当德军想乘坐橡皮艇过河时，大火使他们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噩梦，那惨景当时就上了新闻纪录片，后来又在电影中得到了重现。在接下来的数日之内，德国炮兵把这座城市炸成了一片瓦砾。到了10月中旬，德国人几乎已经控制了全城，苏联阵地仅剩下了伏尔加河右岸上的几座钢筋水泥建筑了。

但是德国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了。他们的补给线拉到了500英里之长，坦克车也开始出毛病，然而却没有修理所需的零部件。双方陷入了一种“老鼠战”的状态，狙击手对狙击手打冷枪，小分队在胡同里进行巷战，或者在城市的瓦砾上进行肉搏。这样的战斗根本无法发挥德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火力的优势。一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伏尔加格勒不再是一座城市了。白天，它是一大片战火腥云，而到了晚上……野狗都跳进了伏尔加河，不顾命地朝对岸游去……动物都要逃离这座城市……只有人还在坚持着。”

双方在废墟上僵持着，场面惨烈，战斗不息。狙击手给双方造成了重大伤亡，阻碍了双方的进攻态势。这是苏联人更擅长的一种游戏，最后，德国人把他们的狙击手训练学校的校长、党卫军海茵茨·托瓦尔德派到了伏尔加格勒。苏联人派出了二人狙击小组来杀害他。他们互相追踪，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各自的坚固阵地上见到对方了。其中一个



苏联人名叫尼古莱·库里科夫，朝着德国人开了一枪，然后，把自己的钢盔用棍子支起来，停了那么一小会儿。德国人开了枪，库里科夫尖叫了一声，就像是中了枪似的，于是德国人探出头来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另外一个苏联狙击手开枪射杀了他。

## 缩小包围圈

整个秋天，伏尔加格勒内外都在浴血奋战着。这时候，苏联人渐渐地加强了军力，无论是人员还是坦克的规模都得到了加强。接着在11月中旬，他们就在伏尔加格勒外围进行大包围了，意在将德军困在城内。德国空军也渐渐地丧失了空中优势。这时，苏联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反击，终于完成了伏尔加格勒之围。苏联军团要想会师合围，就要通过宽阔的顿河，通过那座宏伟的卡拉奇大桥。德国人早就在那座桥上布置好了一个工兵队，准备毁掉该桥。他们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苏联坦克要通过这一重要桥梁，就把它炸掉。

1942年11月23日下午4点30分，具体负责执行任务的军官听到了坦克轰隆隆接近的动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苏联人来了。然而，从望远镜里，他认出那是霍尔希运兵车队，后面跟着第21坦克师的一队坦克。他以为那是运送德国后备军到伏尔加格勒前线的，于是就挥手让他们通过了。运兵车停到了桥上，从车里跳出了100名苏联特种兵，手持自动化武器。特种兵把绝大部分的工兵都打死了，保证了大桥再不会被炸掉。苏联的坦克纵队通过了大桥，那天夜里就与苏军第51坦克师会师了。埃伦·克拉克这样写道：“这一微不足道的小小连接，却把一个大套索给接上了，这个套索很快就会把25万名德国士兵给活活勒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终于来到了。”在伏尔加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就掌握了战略主动，虽然德国人在那之后还会时不时地打一些胜仗，不过那都是一些战术上的胜利，没有战略意义了。

12月，希特勒又进行了一次重大努力，要艾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指挥德军，意图冲破苏军的钢铁防线，解救被困在伏尔加格勒、危在旦夕的第5集团军。救援军先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接着就被阻截住，在距城50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不久以后，增援部队自己就溃不成军，仓皇撤退了，因



为它现在也已经被包围了。由于营养不良和斑疹伤寒，第5集团军已经衰弱不堪，无力进行突围了。用飞机空投给养的努力也失败了。1943年1月8日，德军拒绝了要其投降的最后通牒，于是苏联人开始了大规模进攻。德国人一如既往，进行了抵抗，但是他们渐渐地被逼得后退，每天后退一英里。1月22日，苏军离城中心仅有10英里的距离了，他们展开了最后的冲锋。经过激烈异常的巷战之后，德国人被赶到了一个只有4英里宽、8英里长的矩阵地带，在那里，他们遭到了炮兵无情的狂轰滥炸。

在围困的最后日子里，曾几何时，那些骄横的德军曾无敌于天下，现在却饥寒交迫，百病缠身，被恐惧吓倒，一想到自己会成为苏联人的俘虏就吓得屁滚尿流了。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雇佣军都不顾严酷镇压，开始叛乱了，阵地上处于极混乱的状态。苏军对这块德国阵地的包围圈在一点一点缩小着。希特勒对自己的战地指挥官暴跳如雷，逼着他们战斗到底。他把高级将领提拔为战地元帅，对那些活着的高级军官一律官升三级。可是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了。1月30日晚上7点45分，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话务员自行发出了最后一条电文：“苏联人已经冲到了我们掩体的门口了。我们正在毁掉设备。”最后，加上了两个字母：“CX”，那是国际通用电报码，意为：“本台将不再发报。”战役结束了。

虽然一直到最后，希特勒都不准投降，强令德军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然而，困在伏尔加格勒弹丸之地的第5集团军的残部，还是在1943年1月30日宣布投降了，到2月2日，所有的抵抗都停了下来。当时，共有91 000名德国人，包括23名将军，像猪一样被驱赶着，走在天寒地冻的冬雪里，一直走进了露天监禁营，他们什么也没有，只穿着一件军大衣来避寒。吃的就是面包和一碗稀汤，厕所就是冻土上挖出的一个坑。到了1943年春，伤寒、冻疮和饥饿夺去了45 000人的生命，残留下来的人也在后来的劳改生活中日夜做苦工，大多都累死了。91 000名士兵中，只有5 000人最终回到了德国，这就是当年那横扫天下、不可一世的第5集团军的仅存骨血了，想一想二个月以前，当时这个集团军共有22个旅，共有285 000名战士！

在伏尔加格勒的投降震撼着德国全境，同时也在被占领国家造成了强烈反响。在德国和欧洲，新闻管制是严格的，但是不可能瞒住这场失败的严重



程度了。苏联人公布了许多被俘德国将军的照片，上面显示着那些将军们身体健康，吃得很好，相比之下，被俘的士兵却弄得衣衫褴褛，人不如其，排成长长的俘虏大队踉跄而行。德国人民第一次意识到了他们的军队有可能在苏联被击溃，他们的祖国也可能输掉这场战争。街道上的涂鸦开始出现酸味十足的讥讽口号：“享受战争吧，因为和平更糟糕。”富有煽动性的笑话在军官团中流行开来，以至于有人不再行纳粹礼了。此时，又有人开始策划暗杀希特勒，然后与盟军单独谈判讲和了。柏林从来都是一个谣言四起的城市，丰富有趣、尖酸恶毒的流言蜚语总是大行其道。约翰·托兰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引述说，1943年年初，在柏林的一个晚会上，帝国国会议员瓦尔特·芬克和威廉·弗里克的夫人公开低语说希特勒精神失常了。

## 德国败退

看来，希特勒完全是被这场灾难搞垮了。他退居到自己在劳施腾堡那间阴暗的地下指挥所里，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终日冥思苦想，越来越离群索居。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深受胀气、头痛和失眠之苦。他明显地衰老了，头发都白了。医生给他注射肾上腺素和抗抑郁药物。他长时间地盯着地图进行研究，不停地发布命令，指挥小部队去达到小目标。希特勒从来没有按规律安排作息时间，他经常熬夜。在这方面，他与丘吉尔倒很相像。在自己的辉煌日子里，他曾巡游全德国，视察工厂和学校，如同中世纪的君主一般。现在他则变得行为乖戾，喜怒无常了。

希特勒发起火来就像是一个狂魔。他的将军们都是“胆小如鼠的蠢货”。他再不去高级军官食堂用晚餐了，天黑之前几乎从不离开自己的私密房间。所有的会议都在晚上举行，有时要延长到天亮，把与会的人困得半死。现在有些史学家认为，他的某个医生在无意之间给他服用了一些水银，使他中了毒，造成了他的左手麻痹。

他对军队的控制是建立在自己神机妙算的胜利中，不过那是以前，现在这种神话般的胜利已经破灭了。他越来越疑神疑鬼，担心有人要对他不利（而这绝非杞人忧天）。史陶芬伯格暗杀计划没有成功，随后查出来有许多高级



军官参与其中，有些军官一直是希特勒所深为敬重的，所有这些，都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傲气，沉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古德里安将军仍是他的宠将，这时也以如下笔触描写了希特勒的转变：“他的左手不停地颤抖，他的后背弯得厉害，他的目光凝思不动，他的眼睛朝你瞪着，却再无往昔的神采，他的脸上已布满了红斑。”

空军元帅戈林，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机驾驶员，曾获铁十字勋章，也曾是希特勒的副手和密友，现在却失去了元首的欢心。他曾许诺帝国空军要把伏尔加格勒的德军救出来，还保证盟军轰炸机绝不可能到达鲁尔地区。1943年8月，随着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越来越多，他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遭到了人们的炮轰，有人大声问他：“你不是告诉我们，你会保护我们不受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空袭什么时候能停止？”戈林在1943年年底退休了，住在位于加林霍尔地区的乡间别墅里，靠打猎、吸吗啡、欣赏自己世界级的艺术收藏来打发日子，他那批收藏都是从法国博物馆和犹太籍富人那里掠夺来的。

伏尔加格勒会战之后，德军在整个东欧前线都缓缓后退了。莫斯科再不会受到威胁了。对彼得格勒的封锁也解除了。对于德军在苏联的困境，有一位将军是这样形容的：“我们在那里的处境，就像是一个抓住了狼耳朵的人，必须紧紧地揪住，不敢松手。”丘吉尔在自己所著的《命运之门》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伏尔加格勒之战的意义，他说：“这场摧毁性的大灾难终结了希特勒那骇人听闻的计划，他本来想通过武力征服苏联。”纳粹征服的浪潮，在其顶峰时期，曾包括了几乎整个欧洲，抵达了亚洲前沿和伏尔加河，几乎到了非洲的尼罗河，而现在却开始后退，再也不会卷土重来了。

而在美国，美军正在太平洋血战，因此对伏尔加格勒之战的重要性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很晚才明白它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在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股市先是跃升了一段时间，现已转入滞胀期，对苏联传来的消息也有些漠不关心。然而，正如安东尼·毕沃在其历史巨著《伏尔加格勒》所指出的那样，此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被占领的欧洲，抵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因为人们感到了潮流的逆转。苏联的军队英勇无畏，被俘德军排成长长的队列，凄惨万状，在欧洲大草原上啼饥号寒，所有这些都



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德军在伏尔加格勒的投降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共产主义是朝气蓬勃的世界动力，对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 伏尔加格勒战役 Vs. 德国经济

伏尔加格勒战败的消息刚一传来，纳粹政府生怕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会消退，立刻对股价进行控制，这一控制举措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由于控制严格，股市受到的重创一下子还真看不出来。一个德国人要想合法地出售股票，就必须首先向中央银行出价，中央银行就会以1941年12月的价格来收购，但是不会给你现金，而是要给你一堆政府债券，那些债券还要一直保存在中央银行。这种收购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债券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德国人的财富不但被盟军的大规模轰炸给毁了，还被政府的法令给败光了。民间传说自从伏尔加格勒大败，股市开始管制之后，老百姓之间时不时会进行不申报的股票交易，价格都压得非常低。还有证据表明，此时的纳粹领导层，还有一些将军，也都开始为保住自己的财富而奔忙了。乌克兰和波兰的乡间别墅忽然之间就靠不住了，他们开始把外汇和黄金走私出境，运到苏黎世、马德里，藏到阿根廷和智利。

如果我们审看德国CDAX指数大盘，就会发现，最有意思的不是它在1939年年末至1941年秋那段时间里的快速攀升，而是指数走到涨停板的时间来得太早了点。难道说，早在德军刚抵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大门口的时候，德国的投资者就明白希特勒对苏联进攻是走得太远了吗？巴巴罗萨计划（详见第六章）直到1941年12月才显出失败的端倪，不过在10月份，苏联的恶劣天气显现，这让德国大军感到手足无措。也正是在那时，将军们才感到不安，才开始与希特勒争论战略上是否出了问题。也正是到了那时，冯·伦司德元帅才偷偷地对妻子说：“苏联的广袤吞噬了我们。”

显然，投资者肯定是了解到了战略上的缺失，并表示了关切之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德军在1942年夏秋两季都取得了辉煌胜利。本书也好，其他专业史学家也好，都认为一年以后的伏尔加格勒之战才是真正的拐点。显而易见，这确实是重大的转折点。当时所有的人都感到了这一失败的重大影响。



巴巴罗萨计划所消耗掉的德国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微妙的标志。大盘图中，峰值产生的时间也表明，即使是在一个警察国家，股市也会作出与政府之音不协调的判断。当然，股票价格在1914~1943年间浮动得很厉害，但是仍然有极佳的入市机会，然而问题是德国股票并非财富的保值工具。我们要记住，1943~1946年，股票价格完全冻结了。德国股市一直富有先见之明，它预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失败，预知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战争赔款将是一个大灾难，还预知恶性通货膨胀即将来临，它将要摧毁德国的证券市场。大众是多么聪明啊！

约瑟夫·戈培尔在1943年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消除德国人民心中的忧虑意识和失败情绪。他认为德国经济现在仍然是一种和平时期的经济，因为有600万人在生产消费品，150万名妇女在从事国内民生生产，有10多万家餐馆还在营业。德国人民必须全力投入“全民战争”。由于希特勒一直离群索居，戈培尔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在讲话中他放言：我们当然会输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不想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只有付出最大努力的人，才会赢得战争。全民战争就是最短的战争。

可是再鼓吹英雄主义也没用了。血染沙场的年轻战士真是数不胜数。死于轰炸的平民，也不计其数。德国人民再不会被愚弄了。不过有人说，直到1944年，仍然有许多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的能力，相信千年帝国的美梦会实现。伟大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自传中提到，当史陶芬伯格在7月图谋暗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他也跟自己的邻居一道，同声谴责那些阴谋暗杀者为“一小撮叛国通敌的贵族”。

不管怎么样，到1944年，希特勒已经明白自己被打败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样子完全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老头，再无活力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越来越离群索居了，绝少在公众面前或自己的军队中露面了。当他隐居在德国的时候，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的专列里。阿尔伯特·施佩尔描写了一件逸事，有一天夜晚，他在希特勒那间“镶有高级黄檀木板，装饰豪华的车厢里”共进晚餐，结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餐桌豪华讲究，上面摆着银器、玻璃杯、瓷器，还有一些鲜花。当我们开始用餐时，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列货车在毗邻的车道停了下来。可以看到，在运牲口的车厢里，坐着那些从东线回国的士兵，他们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身上都有伤，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吃晚餐的我们。希特勒看到了这情景，因为那些伤兵离他还不到二码，因而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朝那边打招呼，只是命令仆人把窗帘放下来。这种做法，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希特勒对待普通的前线士兵的典型做法，而他自己以前就是那样的一名普通士兵。

我认为，1941年12月的那个午后，当德国先行部队透过迷雾和大雪，看到了莫斯科的屋顶时，德国军队一直保持着百战百胜的纪录，那正是德国处于巅峰的一个标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伏尔加格勒之战，不管是不是真正的世纪之战，却以德军在1943年年初的投降而告结束。这一场战役正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两年以后，苏联人以牙还牙，对柏林进行狂轰滥炸，把柏林炸成一地瓦砾。在战争结束前，苏联地区就有900万人丧生，1800万人受伤，还有450万人被俘，其中仅有180万人生还。据估计，约有1800万苏联平民在战争中被杀。

正如前面所述，希特勒一直梦想着建立起一个大日耳曼帝国，帝国共有两亿人，从德国一直延展到莫斯科。在发动巴巴罗萨战役的前夕，他召开了最后一次关于此战的会议，在会上他对自己的将军们说毁灭苏联才是“真正的”战争，是他一直准备要狠狠去打的一场战争。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他入侵苏联的决定，也决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大败。他犯了三方面的错误。

第一，他过低地估计了苏联人的战斗精神，低估了他们为保卫苏联母亲而牺牲的忠心。他主要出于种族原因，而对当地人太过傲慢，就是因为他从心里蔑视这些人。

第二，由于他决定要去解救陷在希腊的墨索里尼，结果，本来计划要在5月中旬发动的巴巴罗萨计划，不得不推迟到了6月的第三周才进行。这6个星期的延误造成了德军无法及时赶到冬季大本营，没能拿下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从而没能像计划的那样，及时地在可怕的苏联冬天来临之前结束这场战



役。按照他们的正常进攻速度，德军本来可以在10月份到达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在苏联的首都和神经中枢的总司令部里，把脚架到火炉上舒舒服服地取暖的。现在回顾起来，便可以看出，整个战役的进程都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了。

第三，希特勒在夺取了苏联西部各省之后，把管理权交给了臭名昭著、杀人如麻的武装党卫军，那是一帮罪犯组成的集团。这样一来，希特勒就彻底寒了西部各省苏联人民的心，失去了争取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机会。相反，他这样做之后，激起了当地人的激烈抵抗，正是那些抵抗运动消耗了德军的资源和人力，威胁到了德军的补给线。所以说，希特勒的这个决定是一个愚蠢而致命的错误。

如果苏联的首都和指挥中心陷落，不得不投降与德国单独讲和，天知道这场大战的结果会如何，天知道这场战役最后会打到什么时候。

## 经济的毁灭

德国20世纪的经济史实在引人入胜，又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这个国家经历了最严重的政治瘟疫，经受了最可怕的战争霍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德国的情况甚至比日本还要差。希特勒相信在最后关头，西方盟军会救德国一命。因此，他命令国防军，不管这支军队还剩下多少人，都要在东线拼命抵抗。到了1945年1月，苏联进攻部队共有300万人，防守的德军共有450 000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年龄最大的有60岁。德国人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但是他们还是拼死战斗，表现英勇，殊死抵抗，使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双方在柏林城里逐街展开争夺战。

在这样的大动乱中，要保存财富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在德国投降之后，绝大多数地区都停止了烧杀抢掠。然而，食物这时变得极为短缺了。德国的老百姓开始返乡，看到的是家园被毁，但是至少农田还在。在占领德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直被纳粹控制的股价放开了，就连私下交易市场都崩盘了。在其后那凄惨的5年里，在德国市场上人们主要是用荷西巧克力、糖块和煤油灯来进行交换，换取食物。



在1956年创建商业银行指数之前，德国股票市场的相关数据是一片空白。在那之前，有一些粗糙的指数统计方法，由格伦公司、统计局和帝国财政部早先提供的计算资料，不过是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级量指南：

- 在20世纪的前10年里，德国股票是强劲的，达到了1912年的高位。
- 然而，欧洲的政治动乱，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股市的一路直跌。战争旷日持久，股价受影响严重。
- 1913年，1马克可兑换2.38美元。
- 1918年德国投降之后，1马克跌到了只换7美分的水平。
- 1922年，1美分可换100马克。

后来有一些专家认为，是因为盟国对德国强索巨额战争赔款才造成德国股市暴跌、物价飞涨。但是事实上，德国货币的崩溃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与战争赔款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在第三个10年里，德国股票一开始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处于滞胀状态，但是很快就得到了复苏，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处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里。在希特勒执政，经济得到恢复之后，股票价格一路走高，并在整个10年期里创下了年均6.5%的实值收益率。在当时前景不妙的世界格局里，那是最好的收益表现了。在取得了1940年和1941年的胜利，令举国欢声鼓舞之后，德军现在已经陷入莫斯科郊外的大雪，德国股市在其后的岁月里饱受创痛。在20世纪40年代，股价每年要在账面上下跌6.4%，并要减去每年10.3%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949年，股价已经丧失掉了1940年购买力的2/3。这些数字均为伦敦商学院的迪姆森、马尔什和斯图顿所计算出来的结果，然而我怀疑他们那些数字的准确性，我想他们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

德国政府债券的表现更加糟糕，其购买力以每年20.8%的速率遭到侵蚀，换句话说，在那10年的进程中，它们丧失了1940年购买力的90%。政府票据的表现稍好一些，每年只跌了2.4%，不过，德国票据的持有人却在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丧失了一切。

如果一个德国投资人在1950年回顾这半个世纪，看到战争、货币贬值、



恶性通货膨胀、全线大败、遭到占领等一系列灾难，那么，他就得将自己的证券投资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一番，得到的结果是：自1900年以来，其购买力每年要下降1.8%，即100马克现在变成了40马克。政府债券处在通货膨胀和因战争而凋敝的经济形势下，每年债券价值下降了7.8%，累积起来，从1900年起到这时的总降幅为90%。对这些损失进行复利计算，那么马克兑美元下降了96%，兑英镑则下降了86%。金融资产拥有者为其领导人所犯的罪行确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世纪中期处于战争动乱与毁灭之中，人们根本无法保存任何财富。显而易见，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都失去了保值能力，更不用说提高拥有者的资产净值。1948年夏末，当股市重新开张时，第一批交易的股票价格均比1941年秋的高位低出90%。虽然股指到1949年年末增长了一倍，但仍然未能挽回前期的损失。

但是，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苦难之后，经历了骇人听闻的大萧条之后，德国股市在1950年开始强劲反弹，其实值在10年之内增长了10倍有余，按复利计算，竟达到了年均24.6%的实值收益率。最终，到了1960年，德国投资者自20世纪之初以来，第一次得到了2.4%的实值正收益。令人惊异的是，有一大批德国传统的大公司扛过了战争，存活了下来，其中就有西门子和拜耳这样的公司，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大批新的企业创立，他们都具有德国本土企业的特色，中等规模、家族式企业，正是这些财富生长机器恢复了德国经济的活力，并使一大批德国人富了起来。

1950~2000年，德国证券取得了年实值收益率9.1%的佳绩。债券的收益率为3.7%，马克兑美元之比上升了50%。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起死回生啊！显而易见，要想保持强势，我们必须忠贞不渝，才有生路。



## 第十三章 变幻莫测的股市



随着1942年的来临，丘吉尔已经相当自信，觉得此时美国和苏联都卷入战争，最后的胜利已经有把握了，除非他所谓的“伟大联盟”承受不住压力而解体，或者德国人掌握了某种全新的武器装备。然而这一年的头几个月里，战事却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日本人已经投入全部力量，对英国和美国展开攻势。人们对英国领导的战术越来越不信任，批评不断，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伦敦，和澳大利亚的声音。在澳大利亚（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五章都有叙述），那位总理约翰·科廷总是跟丘吉尔作对。长久以来，大家都以为新加坡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正是靠它保卫着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疆土，所以，新加坡的陷落把澳大利亚吓坏了。

英国军队一路败退，退入了马来亚半岛，兵败如山倒，惨烈之相令人动容。皇家空军的老式飞机从新加坡飞出，却根本无法与日本那又快又强的



零式战斗机相抗衡。从英国倒是运来了新飞机，不过都散装在箱子里，还没来得及组装。皇家空军的第一批机群升空了，与驾驶着世界一流飞机的、最有经验的飞行员进行搏杀。结果，日本人很快在马来亚上空建立了空中优势，不过，由红思华将军指挥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军队总人数有86 895人，相比之下，日本军队只有26 000人。红思华将军长得瘦高，有两颗兔子式向外伸的大门牙，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杀伐决断、有胆有识的领导人。

相比之下，日本的山下奉文将军却是领导有方、强势无比的武士，后来人们把他称为“马来亚之虎”。他总是亲自到达前线，指挥作战，用自己无畏的精神鼓舞士气。英国军队居然没有一辆坦克，因为若干年以前，一个伦敦的军事天才认为坦克在丛林战中无法发挥作用。日本人则拥有大规模坦克，为骑着自行车的士兵开路劈险，这种组合使他们既有强大的火力，又有良好的机动性。印度军队从未见过坦克，当日本战车一出现，他们就被吓倒了，惊呼那是“钢铁魔怪”。澳大利亚的元老级军人——戈登·本奈特少将看到英军“根本没有进攻精神”，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向墨尔本报告时，发出了警报：必须马上派增援部队来，否则我们要面临灭顶之灾。澳大利亚总理科廷则不停地折腾丘吉尔，要他赶紧采取行动，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丘吉尔作出了回应，向战地派来了一个印度旅和一个英国师。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些增援部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帮助。印度士兵太年轻，太缺少训练，根本就没有在丛林作战的经验。英国那个师坐了差不多3个月的船，根本就没有作好准备来应对经验丰富、战斗力超强的日本人。相形之下，日本人在战前就设计了类似地形，进行了艰苦训练。间谍潜入了战区，装备也偷运进来，早就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例如，他们通过走私运进了一大批自行车，分藏到半岛上不同的地点，以便在开战时为日军提供机动性。日本军队发明了一种坦克与自行车协同作战的打法，为闪电进攻提供了保证。丛林地形也好，气候也好，夜幕也好，都对日本人有利。酷热、闷湿、蚊叮、毒蛇，还有痢疾，所有这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但是日本兵已经经受了深入的丛林战与夜战训练。一个日本兵早就学会了在丛林中只靠几个饭团、一点水，就能存活几周时间，还能保持身心健康。这样一来，日本这些适应了丛林战的部队就能展



开有效的小规模进攻，向英军阵地穿插，破坏英军的防线了。最后，英军不得不进行大范围的后退，以图稳定自己的防线。可是事已至此，一切都晚了。当他们一路顺着新加坡堤道回防时，日本人不停地进行穿插打击，把英军包围。他们开始进行小股两栖登陆，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2月初，盟军部队就退到了新加坡本土了，那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基石，是最重要的堡垒。日本兵在皇家近卫军的率领之下苦苦追逐。新加坡守军与进攻敌军的人数之比是2：1，蹲守在固定的守卫堡垒里，按任何军事理论来说，他们也应该守住。就像希特勒对自己的将军们慷慨陈词，怒火喷发一样，丘吉尔对现任司令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大发雷霆了：

我得承认，你的电报让我愤怒……我从没想到……新加坡要塞的水路咽喉，本身带有那么坚固的防壕，达到了半英里宽、一英里长，怎么就不可能成为工事来挡住北方之敌的进攻呢？你要一个岛当堡垒有什么用，既然那个岛根本不可能成为高地城堡？……你们当中，为什么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向我提出要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呢？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守军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日本兵，而那些日本人刚刚渡过海峡，远道而来，只要我们投入一场硬仗，就一定能歼灭他们。此时此刻，不要老想着什么保存部队、珍惜人口的问题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血战到底……司令官也好，指挥员也好，必须与战士同生死，共命运。大英帝国的荣耀，英国陆军的荣耀，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要求你对任何形式的软弱行为都要严加惩处。看一看苏联人打得是多么勇敢，美国人在吕宋岛打得是多么顽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应英勇地战斗。我要求所有参加部队都要敢于杀敌，敢打硬仗，敢于拼杀，直到把敌人消灭掉。

可是，守卫新加坡的部队已经兵败如山倒，被酷热、苦战、疟疾和痢疾折磨得半死不活，再无斗志。在所有10万名守军中，有33 000名士兵是英军，有17 000名士兵是澳大利亚人，其余的就是印度人和马来人组成的部队了，可以想见其战斗力更差。韦维尔在1942年2月11日致电丘吉尔，说他的部队



“总体上技不如人”，而他本人最近滑了一跤，要住院休养几天，还要拄着拐杖熬过好几个星期呢。他的战地指挥官波西瓦尔将军也报告说，他的部队“太疲劳了，无法抵挡住敌人的进攻”，更不用说对敌人进行反攻了。弹药也好，装备也罢，还有供水，都快要用完了。丘吉尔对他的将军们已经厌烦透顶，这时再次命令胆小如鼠的波西瓦尔“死守住堡垒”。

## 新加坡陷落

日军继续步步紧逼，灵活机动地突破了守军的防线。面对大海的重炮是固定在炮位上的，现在不过是一堆废铁。1942年2月13日，对盟军来说极为重要的3 000名专家被安置在小船上，疏散出了新加坡。不幸的是，在海上，他们还是被日本海军巡洋舰发现了，结果大部分专家被杀，剩下的也被抓起来了。盟军又一次损失了关键的技术人员。第二天，守军就败退得更远了，城里的情况也更加不妙，秩序无存，食物和饮用水也短缺起来。日本特种兵已经开始向城中渗透，不过就围城的一般情况而言，那里还不能说已经乱成了一团。

可是几天以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1942年2月15日，盟军向日本军队投降了，当时的人数之比还是2:1。丘吉尔把这称为“英国军队历史上最失败的战役。”股票市场受到了震动。在伦敦，股价本来就持续走低，这时更是一落千丈，不过要比1940年的谷底好一些。澳大利亚的股市也是一片抛售之声。

几天以后，十多万名俘虏（也有记载说超过了13万人）在波西瓦尔将军的带领下，穿过大街，一直走向了昌吉监狱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再走出来。日本人控制了庞大的海军基地，基地中最主要的船坞设备还完好无损。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山下智久将军承认，当时他的军队也同样缺水，弹尽粮绝，他的进攻不过是虚张声势。他的补给线拉得太长了，如果盟军再坚守一个星期的话，他说他当时不得不撤退。这位令人生畏、百折不挠的将军最后钻进了菲律宾的深山老林中英勇战斗，直到最后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才向盟军投降。麦克阿瑟对他恨之入骨，坚持要把他作为战犯来



审判，以平民愤，于是，山下智久在1946年被处以绞刑，终此一生。

新加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投降，使同盟国深受震动，一片惊慌。日本的军事力量看来与纳粹的战争机器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它在亚洲的攻势，不管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看来都是不可阻挡的。在此次战役中，英国及其盟国共有138 703人伤亡，而日军伤亡人数只有9 824个人。澳大利亚人立刻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澳大利亚总理科廷认为这是一种“丢人现眼的叛变”。新加坡的陷落不但使澳大利亚陷入四面楚歌之境，而且还牺牲掉了它的四个精锐步兵师。为什么20多年来，守卫新加坡的工程只重视对付海上来敌，而从来没有考虑到敌人会从陆路进攻呢？谁该为这个愚蠢的设计负责？答案是英军总参谋部，他们一直认为，敌人不可能从陆路进攻，因为丛林太密，攻不进来。丘吉尔不该为此负责，因为那时他还没有掌权，然而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墨尔本也好，人们都为他指挥失当而对之大加指责。

后来有一些历史学家还另有说辞呢，如保罗·詹森在其鸿篇巨制《摩登时代》一书中就认为，丘吉尔是在受到罗斯福的怂恿之后，有意无意地造成了新加坡的失守。不管怎样，正是由于罗斯福的坚持，丘吉尔不得不屈从了，把本来要送到新加坡的坦克和飞机转向运到了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德国U型潜艇对运输这批军资的船队进行了攻击，船只、人员和武器的损失是巨大的，然而运到苏联的那批坦克和飞机确实在1941年苏联圣诞节发动的反攻中，在后来的伏尔加格勒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詹森写道：“现代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就发生了：丘吉尔这个最后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拯救一个专制帝国，却不得不牺牲了一个自由帝国。”

## 日军对缅甸和印度的威胁

从缅甸接二连三传来了坏消息。在1942年2月末，英国与印度的几个旅在宽阔的锡唐河边被日军追上了。英军被迫撤退，把河上唯一的一座桥给炸毁了，把一个印度旅派往河对面更远的地方。被弃在河那边的印度军并没有为了其他印度人的荣耀而苦战到底。日军行将入侵印度，要与德国会师的可能性现在变得很大。丘吉尔感到事态极为紧迫了，马上想要派两个澳大利亚



师到缅甸去，而那两个师此时正在归国途中。他向澳国总理科廷致电：“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填补那个空缺了。”科廷现在基本上已丧失对英国领导战争的信心，就拒绝调动这两个师。大英帝国内的骨肉现在吵得一塌糊涂了。

在英国国内，丘吉尔遭到了媒体及批评人士的炮轰。阿伦·布鲁克勋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多数毒言恶语都是一些大臣们发表的，他们攻击我军的失败……我看到那些批评时，真是有点怒不可遏。政客们总是想听到胜利消息，却受不了一点战败的消息……在内阁会议上，不快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伦敦股市在新加坡失陷之后作出了反应：股价直跌。在后来股市的跌势就更厉害了，因为英军又遭到了下列失败：

- 1942年3月8日，在荷属印地群岛失败。
- 1942年4月9日，在菲律宾失败。
- 1942年4月29日，在曼德勒败阵。
- 1942年5月6日，在科雷希多岛失守，那是进入马尼拉湾的要塞，也是菲律宾的最后一个要塞。
- 在锡兰失利。
- 还有在邦加尔的溃败。

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怨声一片，又有传闻说印度就要发生叛乱了。那真是一个黑暗的时刻。在1942年3月末，罗斯福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亲切感人、深表同情的信，在信中他历数了一些著名专栏作家对他的恶评，“那些人根本世事不通，属茫然无知之辈”。然而，那些专栏作家的吹毛求疵却在美国营造出了一种负面的、失败主义情绪，正是这种情绪造成了那个春天股市的损失。罗斯福处理这种情况自有一套，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值得每个遇到股市危机的投资经理记在心头：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乐观向上，奋斗不息，同时我也相信你们会听我



的话，把这页纸从我的笔记本中撕下来。每个月我都要到海德公园待4天，在那里，我挖一个洞钻进去，还要把洞口封上。除非发生了极重要的事，否则我不接电话。我希望你们也试一试，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砌上几块砖，或者画一张画来玩一玩。

## 盟军的败局

与此同时，在1942年春季，盟军早先在北非艰苦奋战赢得的胜利，现在又丧失了：奥金莱克将军在沙漠被击败；利比亚的图卜鲁格（在该国东北部，接近埃及边界），守军有25 000人，守卫着要塞，却在一天之内就被攻陷了，意味着利比亚也完蛋了。英国大军在沙漠上一路溃败，已经退到了埃及前线地区。共有50 000人阵亡或被俘，武器装备损失惨重。隆美尔真是一个军事天才。德国人乘坐缴获的英军战车隆隆前进，烧的是缴获的汽油，把缴获的武器弹药付之一炬。盟军退到了两年前他们开始进攻的地方，这时隆美尔却已经大兵压境，逼到了眼前。人们不得不相信，也许下一个牺牲品就是开罗了。事实上，墨索里尼也在半路杀出，要搭这个胜利顺风车了。他准备与隆美尔一道参加征服者进入开罗的阅兵式呢。

不仅如此，“U型潜艇的天堂”（丘吉尔语）还在北大西洋继续存在着，通过北冰洋向苏联运输武器的船队持续遭到U型潜艇、德国驱逐舰和巡洋舰的攻袭，空中打击也没有停过。船队经常要损失1/2的商船和护卫舰，天气条件也异常恶劣，气温低到了零下10~20摄氏度，北冰洋的暴雪冷酷无情到了极点。船员经常患上肺结核，因为天气太恶劣，终日生活在潮湿的条件下，由于要不停地观察和保持战位，船员们都变得呆若木鸡，如僵尸一般。船上的驾驶楼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如果不戴手套，你的手一伸出就跟金属冻在了一起。如果船只遭到鱼雷攻击，那么掉进水中的船员只能在冰水中存活一二分钟。（反映这些可歌可泣的运输船队历史的小说，有两本是辉煌巨著，其一是尼古拉斯·蒙塞拉特的《沧海无情》，其二是阿利斯泰尔·麦克林的《尤里西斯号》）。即使英国作出了如此努力，忍受了巨大牺牲之后，斯大林还是不停地对罗斯福抱怨，说英国没有派出足够多的运输船队。1942年4月末，



罗斯福对丘吉尔进行了一番指责。丘吉尔回应道：

另外还要指出，船队所遭受的困难，不可能只用反潜飞机解决。敌人的重型战舰和驱逐舰随时会发动攻击。眼下的这支运输船队也受到了敌人驱逐舰的攻击，我方舰队击退了它们，自己有一艘军舰受伤。受伤的军舰就是“爱丁堡”号，它是一艘6英寸厚装甲的巡洋舰，被U型潜艇重创了，正被拖到摩尔曼斯克去修理，在那里，“三叉戟”号在上次运输过程中受伤，已经在那里大修呢就在刚才，我得到了报告，说“乔治五世”号与我们的驱逐舰“彭加比”号撞到了一起，结果“彭加比”号沉没了，它所载的弹药爆炸，又炸坏了“乔治五世”号。

## 丧失信心

在那些时日里，丘吉尔虽然不想承认，可是事情已经摆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每天都有新的坏消息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他对自己的将军和军队的能力都丧失了信心，不相信他们还能在对等的条件下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敌人对抗。只有一个每天接到意想不到的坏消息，损失一天比一天惨重的投资经理，才能体会到这位首相当时会是怎样的心情。

但是这是战争，不是投资，受到的伤害也不是钱财方面，而是活生生的人命。所有那些败绩都导致了大量的人员、物资、飞机和舰船的损失。好像每件事都做得不对路了。1942年的冬季和春季，对盟军来说是一个惨祸连连的时期，没有一个地方取得胜利，媒体对战争的指挥方式也炮轰得越来越猛烈了。伦敦和其他遭到轰炸的大城市，生活条件糟糕透顶。比弗布鲁克勋爵（丘吉尔称他为“麦克斯”，是首相的密友和心腹）在1942年2月17日写信给首相说：“人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们转而求助于政府，想让政府帮他们恢复自信心。”

然而投资人也好，伦敦股市也好，从未完全失去信心，也没有像英国其他地方那样，在1942年夏天的那个危险时期陷入完全的绝望之中。老谋深算的股市就像丘吉尔一样，相信有了美国的参战，同盟国早晚会取得最后的胜



利。现在的问题不过是还有忍受多大的痛苦，经历多少的时间，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以及到了胜利来到时，英国会变成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不过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阴云满天的时期。

令我们惊奇不已的是，在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以后，伦敦股市看涨，接着在6月份，股市又走向疲软，因为沙漠的战事不利，丘吉尔的领导能力受到了挑战。读一下当时的报纸，好像投资者也受到了甚嚣尘上的战争批评的影响，人们认为首相领导战争不力，英国国会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努力要求撤换首相。1942年6月初，丘吉尔远赴华盛顿，去跟罗斯福商讨战争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家里却闹起了叛乱。当他返国时，发现自己正面临下议院要对他投以“不信任案”票。5年之后，在《命运之门》一书中，丘吉尔这样写道：

媒体喋喋不休，恶语相加，那些刀笔吏们口诛笔伐，声嘶力竭，现在他们又在国会下议院里找到了同盟军，因为有一些重量级议员也加入了那个阵营中，而在我们多数党这边却情绪低落，垂头丧气。

在中期选举中，参选人要竞逐下议院，共有20 000张选票，亲政府的候选人只得到了6 226张票。这表明，英国大众对政府处置战争不利已是普遍不满了。在英国国会和伦敦的报纸上，人们正在讨论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我们都知道，丘吉尔不但是首相，还是国防大臣，因此人们对这种双重身份颇为诟病。1942年6月25日，一份责难动议提交到了英国国会，该决议包括了下列条款：

本国会对皇家军队在如此极端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和坚忍不拔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对战争的最高指挥机构表示无法信任。

动议的附议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们与丘吉尔相交甚密，有人还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呢。其中一人是罗杰·凯斯勋爵，他之所以心存不满，是因为丘吉尔不顾老朋友的身份，把他撤了职，而且他认为丘吉尔没



有听从他的建议。另外一人是约翰·瓦德罗-麦尔恩勋爵，一个声望极高的政治家。他们都深知，如果此案得到英国国会通过，那丘吉尔就只能走人了。在丘吉尔的民族联合政府中，没有一个大臣支持此案，在内阁中，也没有玩弄任何政治诡计，不过辩论极为激烈，有时还颇有个人感情色彩。

那个总是挑丘吉尔刺的比万说：“首相一说到失败，就用灾难一词，好像那是来自上帝，而一说到胜利，就好像那是来自他自己了。”一个朋友问比万，他为什么要攻击首相。

“如果他下了台，情况会怎么样呢？”

“能怎么样？”比万粗暴地说，“假如他下了台，我们还能做什么？难道给希特勒寄一张明信片说我们要投降吗？”他对丘吉尔没有一点儿好感。还有一回，他评价丘吉尔时这样形容说：他是一个“患有青春期恐惧后遗症的家伙……”

丘吉尔漫长经历中的其他失败经历这时也被捅了出来。比如他担任海军大臣时在加利波利半岛和挪威都遭受挫败。有人指责说，他的政府对战争进程所持的态度过于乐观了。还有人说他对战争上的军事行动干预过多了。瓦德罗-麦尔恩认为丘吉尔把手伸得太长了。丘吉尔再也忍不住了，这样回答道：“我从不奢望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合理讨论之后，就着手从事自己想完成的任务”。

就在这一切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丘吉尔家里又闹出了难堪事，令他大伤心神。他的儿子伦道夫，用威廉·曼彻斯特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无赖”。他总是跟父亲吵闹不休。对自己的母亲更加不孝，坚称母亲一直“恨”他。小伙子长得挺帅，却酗酒成性，吵吵闹闹，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他是一个讨厌鬼。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也得罪了很多。有一家伦敦俱乐部的章程甚至这样改写了：“伦道夫·丘吉尔无资格成为会员。”有一回，他的消化道生了一个肿瘤，医生把它切掉了。据曼彻斯特说，当阿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听说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之后，正好在一家酒吧里，他这样说了一句：“真可惜啊，从伦道夫身上切掉的那个部分不是恶性的。”

据约翰·麦坎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一书中所述，战时当伦道夫驻军于埃及时，他年轻的妻子帕米拉与年岁很大的美国驻英大使阿维里尔·哈里曼



搞出了绯闻。1942年春，当伦道夫听说了此事之后，就认为他的父母早就知晓了这段丑闻，却没有警告他，也没进行干预。事实上，帕米拉与哈里曼那时与首相同在查特韦尔，后来又在珍珠港过夜。一场家庭大战爆发了，这当然深深地伤害了早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的丘吉尔。伟大的人物，就像投资经理一样，有时因为家庭的感情纠纷而大为分心，哪怕他们处理生死存亡危机时会做得更为专业，更为得心应手。

就在家里家外烦事不断之际，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还是一片失利之音。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发动的闪电攻击，把英国将军和英国军队惊得目瞪口呆。到1942年6月中旬，隆美尔已经把战略要塞图卜鲁格团团包围，双方展开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接下来的一周里，战斗更加激烈，德国人突破了印度第11旅的防线，占领了大部分要塞。1942年6月21日，33 000名英国、印度和南非联合部队在利比亚的图卜鲁格缴械投降了。正如新加坡发生的那样，现在，又有一大批人员毫无理由地向敌人投降。许多部队还没有真正投入战斗作进一步抵抗，就缴了枪。当然，英军所处的位置已经完全没有希望。隆美尔此时已经摆出进军埃及，夺取开罗之势。在检查了战利品之后，隆美尔的总参谋长向柏林作了如下的报告：

战利品是极为丰富的。包括可供30 000人在这3个月所用的吃穿之物，还有10 00立方米以上的汽油。如果不是缴获了这些战利品，那么在未来数月之内我军装甲师的军饷和燃料都成了问题，几无生存的可能。

由于这一新的失败令人痛心，温特顿勋爵就率先发难，对丘吉尔进行攻击。他认为首相必须为这一系列的灾难负责，因为他是总指挥。现在，必须把他撤换掉了。他的发言片断在《命运之门》一书中有所记载：

我们都承认，英国首相在1940年曾是我们的勇气与坚韧精神的总舵手。但是时过境迁，情况与1940年已经大不相同。在财政部，就有不止一个人比他更适合担任首相……而这位正义光荣的先生（指丘吉尔）应该在这位新首相的手下担任外交大臣，因为他在处理我国与苏联及美国



的关系方面做得极好。

前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先生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这样说道：

对于这个一错再错的人来说，我们怎么还能信任他的判断力呢？这，正是下议院现在就要决定的问题。想一想我们处在怎样的危难之中吧。在100天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远东的帝国。那么，在下一个100天到来前，我们又会丧失什么呢？

丘吉尔最后发言。他以雄辩的口才，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这场大辩论现在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例证，证明英国国会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信马由缰，自由狂放！为了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为了证明大臣们的无能，从而使他们自己都毫无信心，为了让军队不再信任民众和政府的支持，为了让工人不再相信他们努力制造的兵器，为了表明在首相领导下的政府有多么无能，为了从内心深处打击首相本人，如果可能还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让他颜面扫地，真是什么心机都动过了。所有这些，都通过电报和广播向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发布，令亲者极痛，仇者大快。

接下来，他又慷慨陈词，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进行了辩护。他承担了责任，但是同时也指出所有那些失败都是因为英军的装备太差，军力太弱，那是一些积重难返的老问题，在他上任之前就一直存在着。最后，他坚定地表示要执行自己“最初的计划，不怕流血，不怕劳累，用眼泪和汗水来完成它”。他承认那个计划还有许多“缺点、错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他在演讲结束时，大动感情地呼吁议员们对他表示全面的支持：

每一张选票都至关重要。如果攻击我们的人自甘低下，把这“责难动议”转为对自己动议起草者本人的责难，那就请便吧。英国的每一位



友人都会欢呼，我们事业的每一个忠仆都雀跃，我们拼命要推翻的暴君，一听到这个表决，就会失魂落魄。

1942年7月1日，这一法案以475对25票遭到惨败。对英国首相来说，这是一次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在英国与盟国经受了如此之多的失败之后，才有区区25票反对丘吉尔，这是英国人民精诚团结的一个象征。敌人对此深感不快。罗斯福向丘吉尔致电祝贺：“你真棒。”

伦敦股市6月份的低迷就在那一天结束了，到了1942年11月，强劲反弹了20%。股票市场需要丘吉尔。这一年里，股市的表现一直不错，同时，沙漠中的战争也开始有了逆转之势。墨索里尼由于贪图胜利之誉，这时向沙漠地区派了更多的军队，并再次吹嘘他要与隆美尔一起参加进入开罗时举行的阅兵式。然而在1942年7月末，德国人并未攻破英军的防线，因为有一个新西兰师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在月色之下进行的肉搏战，差一点儿把隆美尔的指挥部完全消灭。德国的补给线拉得太长了，坦克这时也急需大修。德国的进攻停止了，开罗保住了。

1942年8月，有一支5 000人的加拿大与英军特种部队发动了袭击，目标就是法国西北部海岸的迪耶普。这是盟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战，很可惜最后的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偷袭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其他一切都搞砸了。德国守军比预想的要强，悬崖比预想的陡。登陆艇登上了错误的海滩，海军炮击打错了地方。加拿大军共有900人阵亡，近2 000人被俘。如果说这是日后大规模登陆法国的演习，那它演习得也太差劲了。

那个夏天，在英国国会，丘吉尔又面临着另一场恼人的危机。此时的掌玺大臣是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他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当时丘吉尔发现德国人要进攻苏联，于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警告。而克里普斯出于自己的私人原因，没有及时把警报送到斯大林那里。克里普斯是工党领袖、自由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滴酒不沾、憎恨雪茄。下议院有一个滑稽鬼曾这样说：“克里普斯家里一定有许多位洁身自好的老姑娘。”丘吉尔曾对他作出一句有名的评论：“他有所不喜欢的所有美德，而有所爱好的缺点他一样都没有。”



克里普斯相当自信，貌似公正，夸夸其谈：“即使上帝也爱荣耀。”不过，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人才。作为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他有责任向下议院解释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他与首相保持密切的联系相当重要。

9月份，克里普斯感到自己没有受到重视，于是给首相写信大声抱怨。此外，他还说自己不满意对战争的指挥方式。英国人民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他们对于国家的领导无方感到沮丧和不满。他提议进行一个军事指挥上的双人指挥权，那另一个指挥者自然是指他自己。丘吉尔回答说：“我亲爱的克里普斯，接到你的信，我又惊又痛。”接下来，他逐一批驳了克里普斯的论调。现在读起这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真是饶有兴趣。在“我亲爱的首相”那表面客气，优雅礼貌的背后，是两人在心里本质上的互不尊重，当然表面上不可能怒目相向。最后克里普斯辞了职，调到了军需生产部当大臣。

## 战争的转折

1942年8月，丘吉尔对自己沙漠地区的将军们进行了大调动，任命蒙哥马利担任了英国第8集团军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自视甚高，很难相处。但他是一位令人胆寒的将军，善于鼓舞军队的士气。第8集团军进行了重建，配备上了美制格兰特和谢尔曼坦克。

1942年9月末，隆美尔因为过度疲劳而回德国住进了医院，接替他的是格奥尔格·施恩姆将军。10月，激烈的战斗在埃及打响了，当时德国非洲军团距离阿拉曼（在埃及爱琴海北岸，亚历山大以西65英里）不到15英里。就在大战打响之际，施恩姆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于是在希特勒的要求下，隆美尔不得不离开病房，又重新指挥自己的坦克大军发动了进攻，但是这一次他遭到了重大的失败。

英军展开了反攻，得到了极为有效的皇家空军的近空支援，第一天，德军的阵地就被攻破了。到了第三天，血染黄沙的德国师团开始撤退，只留下后卫部队作掩护。此时，意大利军团已经全面溃退，有9个意大利将军当了俘虏。

希特勒命令不准再往后撤了，但是元首的命令再没有什么魔力了，而且



此时再要求坚守阵地也太晚了。蒙哥马利一路紧逼，意图切断德国非洲军团的后路，将它一劳永逸地歼灭掉。但是突然下起了大雨，无法再追杀敌军了。不过，阿拉曼战役还是英军的一场重大胜利：共歼灭了4个德国师，3个意大利师，俘虏了30 000名士兵，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英军损失了13 000名士兵。

“常胜将军”隆美尔第一次被打败。一夜之间，英国也有了一位英雄将军。丘吉尔认为阿拉曼战役是史诗般的胜利，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在阿拉曼战役之后，美英军队在欧洲，即所谓的西线，转入了攻势，而不再处于守势了。在11月，英美联军发动了火力攻势，成功地进入了北非。加上苏联在伏尔加格勒的胜利，美国在太平洋的胜利，都清楚地表明战争的进程已经逆转了。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没打过一次胜仗，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没打过一次败仗。”

到1943年5月，所有沙漠，或者说是整个非洲大陆上的德意军队都全部被歼灭或俘虏了。

## 盟军大进攻

1943年，盟军通过与隆美尔指挥的仍然强悍的德军血战，攻入西西里岛并占领了它。下一步就是意大利本土了。但是对股市而言，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些胜利。

1943年，英国和美国还建立起了海上霸权。到1943年春，与U型潜艇进行的持久战终于到了决定性阶段，到了1944年，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地中海都比较安全了。德国海军的精英在战争期间共有35 000人加入U型潜艇战，其中92%的人都永远葬身大海了。在太平洋，美国海军取得了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没有这种海上霸权，盟军在欧洲的登陆也好，美国在太平洋上施行的跳蛙夺岛之战也好，都不可能真正实行。

盟军日益出色的战绩，显示出了美国直接参战的重要性。美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部队士气高昂，武器精良先进。现在，英国议会里的批评声浪突然消失了，丘吉尔成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受到人们的欢呼。这真像是一



个投资经理，在熊市探底之前将全部的资金都投入股市，因而让人们骂得狗血喷头，但是等牛市到来，一片繁荣之际，他又会享受人们的赞美，得到无上的荣耀。

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出，在成分复杂的盟军之中，有一些像蒙哥马利、戴高乐和乔治·巴顿将军那样脾气暴躁、自视甚高的人登台表演，这肯定会在本应团结一致的友军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为了征服，为了荣耀。巴顿和蒙哥马利都是自大狂，都非常看不起对方。在入侵西西里岛的时候，就是由于他们竞争谁第一个拿下一座叫莫西拿的城市，而让德军的两个师逃到了意大利本土。丘吉尔是这样描写蒙哥马利的：“在战斗时不可战胜，在失败时不可屈服，在胜利时不可忍受。”

巴顿为人讲究奢华炫耀，目空一切，从心里相信自己是古罗马时代一个战将世家的直系后人。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军事天才。然而，他也拒不服从命令，认为服从命令显得过于胆小；他虐待士兵，打他们的耳光，因为他认为他们是胆小鬼。1945年，他在德国因车祸去世。不过，到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已经过去。自由事业的幸存再也不成问题了。但是正如丘吉尔当时所警告的那样，在幸存与胜利之间，还有许多路要走。危险并不是毁灭，而是疲乏，是僵持。要坚忍，更要坚持，这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投资经理在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时所表现的一样。

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的轰炸现在变得更加猛烈了。城市被炸毁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被炸死。一位名叫兰德尔·贾维尔的美军飞行员在自己的诗作《第8飞行中队》中，捕捉到了一些飞行员心中的感叹：

另一方的谋杀犯军队正在那里闲得发慌：

有三个人在投马蹄铁，一人在睡觉，

还有一个人躺在那里数着要执行的任务，一边流汗一边数数，

直到他的心里跳如战鼓：一次，一次，一次。

呵，杀人犯们啊……不过，没办法，还是得把炮弹投到你们头上：

……

人们在血泊中洗手，用心地洗，一定要洗干净。



## 是谁左右伦敦股市？

伦敦和纽约的股市在1942和1943年都高涨了不少，而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市场也在此时被战争消息连在了一起。以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战后经济的大前景对两个证券市场来说更重要了。

在1942年年初新加坡陷落时，伦敦股市大跌，其后在年末及1943年的几乎一整年里，股市都直线上升，虽然在是年年末作了一次调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纽约股市因为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的爆发而走低，但在那年的后半段则一路向好。正如伊博森年报所估，大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0%，而小公司的股价则狂升了44%。不过，1942年的交易量进一步缩小，日均只有455 000股的放量，到了年末，股票的每股收益升高了8.2倍。

虽说开局很慢，但是1943年的整个一年，对股市来说都是一个好年头。不管怎样，当一年终了时，我们发现大公司的股价跃升了26%，而小公司的股价则飙升了惊人的88%。人们之所以对小公司狂热，是因为他们推断这些公司都是被战争部养活，或者由战争部送出订单的，在和平到来时，这些公司的工厂、机器、工具和专利仍有价值。在1933年，纽约股市的日均交易额达到了上百万股。到了该年的年底，每股所产生的利益达到了12.8倍。到1944年6月底，股市强劲攀升，然后在12月又跌了下来，因为布尔奇之役盟军失利，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垂死大反攻。

要充分理解美国股市在1943~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最好我们后退几步，较好地从远处审视一下美国金融资产自1929~1945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这16年涵盖了美国历史上两个极为紧迫萧条的时代，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期间的大萧条和大通缩。它们包括：先是美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熊市，一阵强有力的周期性牛市，然后是一次暴跌，最后是强有力的战后牛市的开始。

股市反反复复的上下波动是惊人的，但是一个证券持有人只要长期守住自己的股票，那么不管股价如何起伏，最终的收益总是可观的。一个特例就是：在1929年，你要入市，所出的价格竟要相当于历史上所有泡沫时期的最高价格。1930~1940年间，在这10年里，处于大熊市黑暗时代的中心，股市



在账面上的收益是负数，而实际收益却是一个正数，每年收益达到1.9%，这是因为通货紧缩造成了影响，因而产生了正收益率。政府债券的表现最好了，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的收益率达到了7.1%。多少投资者的心灵保持着紧张，日日夜夜不得安生。

1929~1945年，政府债券比大宗资本股票的表现要好得多，这也毫不奇怪，因为那是一个充满了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和低通胀的时期。另外还要指出，政府债券比股票更少波动性，在16年里，只有2年的收益率是负数。一般而言，小盘股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标志着这种股票浮动性强，同时也表明它是一种活跃的投资类资产。在中途岛战役后，这些小盘股也疯涨起来，然后1942~1945年就一直保持着投机增长的势头！

截止1949年12月31日，在半个世纪里，美国股票的账面年均收益率为7.4%，债券的收益率为年均3.8%。实际收益率则分别为4.9%和1.4%。在同一时期里，英国股票与债券的账面年均收益率为5.1%和2.9%。实际收益率则为3%和0.9%。

1946~1948年间，通货膨胀疾升，大小公司的股价都受到重挫，债券的收益是小小的正数。投资者相信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通货紧缩还是会回来的，他们对股票的波动性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大众一般会明智地推断：战场的敌意结束之时，就是长期衰退开始之日，因为征兵入伍只能暂时解决失业问题，而失去了军需品的订单，工业生产就会崩溃。大众不明白，大量存款和延迟需求会使整个经济实现转型。结果，他们一直要避开股票，而青睐债券。几乎没有什么投资者勇于入市投机。

盟军入侵欧洲和日本列岛的消息传来，并一再重复着。要攻入侵略者的国家，占领他们的家园，实在是一项骇人听闻的任务。而英、美、苏三国间的协调合作也是令人惊悚的事情，不过那要另当别论了。1944年年末和1945年，证券市场已经开始展望战后世界的发展了，只不过大多数人是心怀恐惧，并非满怀希望。

1945年战争结束后，许多一心向后看的人担心，没有了国防开支的刺激，战后世界经济将会滑入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停滞与通货紧缩阶段。市场的整体投资比例是：约有60%~70%投到了债券上，约有30%~40%投到了股票



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算。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证券开始进入大牛市，一路狂跑，而且它将会持续将近20年。相比之下，债券则几乎陷入了熊市之中。这正是21世纪下半叶之初所作出的资产分配决定，当时几乎所有的庄家投资都走了回头路。









## 第十四章 战乱保住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充满血腥与苦难的年代，不仅对战场上的人是如此，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样。在日本的占领下，亚洲遭到了无尽的掠夺和痛苦。现存的资料奇缺，使我们根本不了解在亚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在战前亚洲积蓄的财富就微乎其微，虽说殖民地大家族的财产早就被瓜分，永不续存了。

在广阔的欧洲大陆，整个20世纪40年代，人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别的，而是如何找到食物生存下去。水资源被污染了，食品供给奇缺，疾疫流行，占领军的残暴和血腥报复则比比皆是。

不多的几个有钱的家族找到了世外桃源。有一些坊间消息说，法国的某些富豪在巴黎的房子于1940年毁于战火，但是他们携带着大多数值钱的东西逃到了极偏远的农庄，在那里一直躲到了战后，由于手中还有钱，还可以



继续过着美满的日子。在当时，不要向德国人或者法国的叛徒露富，也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占领情绪，这是至关重要的。你的房子也好，田地也好，千万不能显得太豪华，太肥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比利时、荷兰、丹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东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物质上的”不动产（房子、大厦，相对于耕地）基本上不太适合保存。正如诺曼·戴维斯在其精彩作品《战时欧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手握实物财产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的财产容易被偷、被炸、被毁，或者被征用。你的财产越是值钱，它就越有可能跟你永别。

## 土地的掠夺

希特勒最了解士兵的心理了，在占领之初就明白军队渴望发战争财。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德军早就明确地宣布，只要在西线取得完全胜利，建立起了大日耳曼帝国，那么给军人的奖赏就是波兰和乌克兰的肥沃的黑土地，波兰的那些土地于1940年夺得，乌克兰的土地于1941年到手。军衔越高的人，得到的土地就越多。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要受到格外的奖赏。波兰贵族的田产被瓜分，奖给了战功卓著的将军和纳粹党的高官。

普鲁士将军对地产特别感兴趣，原因就在于他们虽然都出身名门望族，但是现在却已经败落。其中有些人（比如古德里安）在1940~1941年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从前线休假，就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最中意的地产。还有一些人要使用大量战俘劳工，去整修自己在普鲁士的祖传宅第。那是普鲁士贵族所掠得的最后一批地产。到了战争结束时，所有的房产都灰飞烟灭了。有历史学家进行过统计，在8 800名贵族中，有6 400人死于战场，500人在战后自杀，还有500人死于劳改营。另外，还有200人在自己的庄园里被劳工杀死。

有一些个案极为复杂，难以剖明。比如，我们可以拿一处波兰的有名地产为例。在1941年，德国占领军从一个世代拥有这处地产的波兰大贵族那里，取得了地产的使用权，结果这处地产变成了德国的军医院。占领政府又把贵



族的田地分为几部分，分给了与德军合作的波兰家庭，作为重新安置波兰的计划。

## 在匈牙利掠夺土地

匈牙利约有10%的人口是犹太人，他们拥有加工厂、银行和证券事务所。非犹太匈牙利人所拥有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土地与房产方面。1941年，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匈牙利人加入了德国一方，派出了三个匈牙利师到东线与苏联人作战。1944年，德国人占领了匈牙利，把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犹太人都圈禁起来，剥夺了他们的家产，把他们统统装进闷罐车送往死亡营。

安得拉斯是一位生于1912年的匈牙利贵族，他的经历是匈牙利贵族最典型的经历。他的家族世代在乡间拥有一座豪华庄园大第，有2 000英亩的耕地，还在布达佩斯出租公寓以及一座豪宅。安得拉斯还是一位出色的骑手，1930年从军校毕业之后，就参加了贵族骑兵旅。战争一打响，他别无选择，只好与德军在东线并肩作战。在1942年，骑兵仍然是一种快速打击力量，而且，在泥泞和丛林地带，坦克车无法顺利通行，而战马却可以纵横驰骋。1944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军开始了大撤退。安得拉斯的部队一路撤出了匈牙利，进入奥地利之后，他想办法向美军投降了。安得拉斯在战俘营里待了好几个月，在德国投降之后，他就被释放了。

回到匈牙利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公寓和豪宅毁于战火。他变得一贫如洗了。趁着战后的混乱，他逃到了西方，最后来到了美国。在美国他结婚了，组织了一个家庭。35年里，他一直在长岛的一个骑术学校里教证券经纪人的女儿们学骑术。东欧剧变之后，安得拉斯之子（他本人已经亡故）提出了法律诉讼，要求得到家产赔偿。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与反讼，在故纸堆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新的匈牙利政府终于把那座庄园还给了他（现在已经破烂不堪了），还给了他200英亩的土地。安得拉斯之子估计，他们得到的赔偿还不到1940年家产的5%。至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可能再拿回一分钱。

安得拉斯没有把家产安排得多样化，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不得



不在美国打工为生。正如他所讲的那样，在战后的初期，不论你文化多高，能力多强，只要你在填表时填上你曾在匈牙利军中作战，后来又在美军战俘营里关了一段时间，那么，即使在美国，也会让你到处吃闭门羹。他的故事结局还算不错。安得拉斯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长大，可能是因为基因不错，也可能源于移民的干劲儿，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用功，反正最后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女儿现在在长岛也上骑术课，教她们的是阿根廷人了。也许大脑和技能才是保存财富的最好方式。

## 财产的窃取

假如你的财产是土地和一些值钱的东西，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1939年，罗布科维茨（并非真实姓氏）家族的居所，现在是捷克共和国的领土。正是在那里，他们拥有一块世袭产业，有房地产、艺术品、精美家具、古董银器、价值连城的瓷器、陶器，在布拉格郊外还有一座宫殿。德国人入侵之后，把宫殿强征过来，成为德国国防军的指挥部，为了应付食品短缺，又逼迫劳工在那块田地上种地。

在此期间，罗布科维茨一家已经在1940年逃到了美国，把家安在了波士顿。他们一直持有美国政府债券，靠着这笔钱总算活了下来，但是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富足了。这个家族的家长随身带着家产名目、名细和账本，但是当他去银行，向人家出示这些东西，以期得到抵押贷款时，银行经理却翻起了白眼，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到银行进行抵押的。他的后代是在波士顿上的高中和大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捷克共和国成立时，这个家族的长子正在从事房产经纪的工作。他回到了布拉格，在律师的协助下，把家族的文献资料向有关部门出示，要求政府把这个家族的家产归还给他们。

经过复杂的争斗，捷克政府最后判决下来了，说这个家族应该得到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财产，包括银器和家具，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在1939年曾拥有这些财产。政府还判定他们有权要回房地产、宫殿以及那些地产下面的土地，而相邻的农田则不能再收回了，因为“由于自愿放弃，农田的所有权早已中止”。在其后的6个月里，家族的长子及其弟弟们一起努力，以家族财产



名目为根据，并以大多数家产上都刻有家族徽章为理由，要回了原先存放于宫殿中的大部分银器、艺术品、家具。他们以政府判决书为武器，基本上在一切能发现家产的地方要回了自己的东西，有时是在饭店里发现它们，有时是在别人家里，有时是在博物馆中。

然而，他们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家族的宅第甚至宫殿本身都处于破烂不堪的状态中。那座宫殿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是，要修缮宫殿和田庄大宅，就需要投入一大笔钱。那几个兄弟手中根本没有钱。事实上，他们还欠了律师一大笔律师费呢。此外，财产税也开始累计起来了。因此，他们现在是房产的富翁，缺钱的穷人，为了付账单，他们不得不出售家里的古董，有时还要当导游。正如那位长兄所说的那样：“只能心里盼着最后结局是皆大欢喜，只不过在此期间，我可是错过了波士顿房地产市场的大牛市啊。”

## 财产保值的最佳手段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战乱时期，股票和政府债券更不引人注目，它们到底是不是更好的财富保存与增值手段？我们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持有的时间段怎么样了。在整个20世纪里，在那些赢得战争的幸运、稳定的国家里，股票的年实际收益率为6.5%，政府债券的年实际收益率为1.8%。即使银行票据也取得了正收益率。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在那个世纪里，虽然世界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科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要知道那可是发生了两次血淋淋的大战、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的世纪啊，当时还出现了股票的两次大熊市，严重影响了战胜国和战败国。

至于那些战败国，通盘考量之后，整个世纪里的证券年实际收益率为4.2%，这还是相当可信的数字。不管怎样，在100年间，即使在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股票也提高了资本购买力，要知道，那些国家可是经历了全民族的噩梦。不过，那是指整个世纪而言的。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打败了仗，遭到占领的战败国家，在20世纪的前半叶，证券的账面年收益率是负数，而在20世纪年代的灾难岁月里，实际年收益率是两位的负数。



还要看到这样的事实：在我们所研究的15个国家里，只有4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在20世纪的前半叶里，每20年期的实际年收益率都是正数。在其余的11个国家里，因每20年一直下降而所损失的购买力看上去并不大，但是，如果你恰巧那一年要用钱，问题就严重了。不过，考虑到流通性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股票是保存财富的最好手段。

当我们把那些收益率依复利计算的话，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证券在20世纪前半叶就糟糕透顶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了。那悲惨的10年之间，这4个国家的股票跌得如此厉害，把前40年的收益都一扫而光了。如果你在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法国或者轴心国，10年可是很长的时间啊，当时你的手中握着几张纸，眼看着它们一天比一天不值钱，而且想往外抛也没有人要了。此外还有更烦心的，那就是其他财富形式也在急剧贬值。到了1944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给你缴纳房租、地租了。甚至你需要自己去种地，拿你的金银珠宝去换日用品。

这些数字从学术角度看是准确的，然而它们肯定有一定的误差，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和日本的股市都被政府把守或者关门停业了，在很长时间里，它们都再没有营业。战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在法国达到了30%，在意大利超过了40%，而在日本则达到了50%。尽管德国官方的数字要低一些，但是那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根本无法估算。在丹麦和荷兰这两个被占领的国家里，证券在20世纪40年代升值很快，收益颇高，主要原因就是两国都没有形成战后的高通货膨胀。不管出于哪种情况，我们都看出了，在那些战败国，在战时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证券的实际财富净值损失极大。相比之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球证券从1914~1918年间只丧失了12%的实际购买力，德国股票的价值损失了66%。

## 当心“长期持股”

其次，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即使在战胜国，把财富投到证券时，你也要多样避险。没有什么长线、“持有型”股票，你只要买到手就可以永远放到保险箱里不管了，因为没有任何公司会永远强大，永远具有竞争



优势。连续几届管理者保持优良的业绩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优势可能比别的优势要保持长久一些，但是任何优势都是暂时的。此外，我们还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公司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剧变时期，什么都变得太快了。这正是商业进化论的本质。另外我们还要记住，正如约瑟夫·熊彼得所说，战争乃是“创造性毁灭的大风暴”，战争一结束，就会带来飞速的技术进步。

公司进化的过程包括：公司形成了某种竞争优势，充分发挥了这种优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接下来，它的股票增值了，人们很快会发现这种股票，于是变成了一种长期持有型增长股。随着公司的扩张，它变得越来越大，吸引来了更多的竞争，最后不可避免地变得呆板麻木，缺乏创新精神了。然后，它就变老了，发展的速度慢了下来。组织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在世界经济中每天都有大量的发明创造产生，都是一些新的公司在进行新的创造，而在大型成熟的公司里发明创造就要少得多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阐明这一观点：公司不能进行创新，但是企业家却能进行创新。IBM和英特尔以前曾是创新型的大公司，现在它们成立了公司研发实验室。比尔·盖茨是创新者，而微软公司却不是。

例如，让我们回到变革的步伐慢一些的时代吧，那时有一些股票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埃里克·贝哈克在《财富的起源》一书中讲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在17~18世纪里，同时在4个国家保持垄断地位的，当时它在世界经济的所有方面都有绝对优势，从咖啡、羊毛到鸦片，真是应有尽有。它拥有自己的海军和陆军，事实上，它还得到了英国女王的授权，可以在它认为恰当的时间对外宣战。然而，世界在变化，这个公司却没有变。当新技术、新发明出现之时，它的“无所不能的坚固城墙”就轰然倒塌了。它在1873年宣布了破产。

1917年，《福布斯》公布了美国100个最大公司的名单。在其后的71年里，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蔚为奇观的经济腾飞。当《福布斯》现在再一次审阅当年的那份名单时，发现有61家公司已经不复存在，21家还在经营，却再也进不了前100名了。只有18家还在100名之内，然而，除了通用和柯达公司之外，其余的公司都处



于垃圾股的境况。后来，柯达公司也发生了严重的经营困难，结果只有通用电气一枝独秀，成为仅存的成功者。1997年，福斯特和卡普兰研究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存活纪录，结果发现40年前标准普尔创建时的老公司里，只有74家公司还在前500强企业之列，不过它们的经营业绩也要比标准普尔的平均收益低20%。

沃伦·巴菲特是公认的股神，但是，即使像他那样目光如炬的投资天才，在判断个别公司的股票时也有失算的时候。11年前，我就听说他把可口可乐公司捧上了天，说大型公司的股票你可以放心购买，好好保管起来，可以永远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很快就卖出了好价钱。他误判了该公司所面临的诸多社会、工业，以及公司特有的困难，正是那些因素导致了后来该公司股价大跌。他同样也误判了另外一个公司，那也是他所钟爱的一只股票：华盛顿邮报。

贝哈克还引用了另外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一位是罗伯特·维金斯，另一位就是吉姆·卢夫里。他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专门用来研究战后40个工业领域中6 772个公司的业务表现。他们专门研究那些持续时间达10年以上的优异公司（根据该公司所在行业的具体情况而有所浮动），看该公司的具体表现如何，而不是看股市如何。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安全的行业。高科技类公司的变化频率要远远高出传统公司，不过随时关注进程，几乎所有公司的变化都在加快。他们发现只有5%的公司取得了一段时期的优异表现，并将之持续达10年之久，只有0.5%的公司将优异表现延长到了20年。只有3家公司，即美国家用公司、礼来大药厂和3M公司将这一时段延长到了50年。

我们主张在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框架里，要把你在证券方面的投资多样化，这意思就是说，你要么购进指数基金，要么就得自己去找那些精于投资管理的公司，因为它们富有智慧，眼光独到，可以帮你设计出一个综合多样投资计划，这一计划有望与市场平均收益拉平，最好还要高出这一平均值——当然是在缴纳完各种税费之后。指数基金有两大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税并减少交易费用，因为它转手率低，管理费少。你现在就可以买一只指数基金，照此可以处理几乎所有证券类别。最近有好几项研究发现，一



个美国投资者，不管他（她）买的是个股还是对冲基金，他（她）的收益要比标准普尔指数的收益低得多。把这一条写下来真是痛苦，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即使是一个专业投资者，也无法靠概率在一赌胜败的行业里，比别人算得更准，赚得更多。

历史记录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从长线上看是（用一个俗不可耐的说法）“相当有可能”取得一种高于通货膨胀的回报。如果你居住在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且有把握在指数基金上取得400~700点的实际回报，那你干吗还去折腾别的呢？也许你还是相信童话，你本人又是见识高超的投资商，相信自己可以干得更好。不过，你千万不要太迷信这一点了。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你的鸡蛋只装在区区几只大篮子里。有一句话说的是：“把你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然后一眼不眨地盯着这只篮子。”告诉你，这是股票经纪人的谎言。单一化的投资计划风险之高，骇人听闻。

常识也好，历史经验也好，都证明中值恒律是投资领域压倒一切的万有引力，在证券方面尤其如此。没有什么超级回报投资组合！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一旦某些高回报吸引来了过度的投资资金，那么该投资的规模就大到了一定程度，而规模越大，就越难以有好的表现。我们对任何非上市的避险基金，也不抱有任何幻想了。

## 黄金、艺术品和债券也不值得信任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已经表明，如果以储藏黄金和珠宝来保住一小部分财富的话，一点儿也不成问题。可以把它们看成自己的“一笔救命钱”。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要把黄金和珠宝放在“国内”的保险箱里。占领军一旦要银行交出钥匙，银行就会乖乖从命。把你个人的保险箱藏在家里，或者找一个可靠的避难所。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如果野蛮人入侵，不管是恐怖袭击还是大瘟疫，你都要保证这笔“救命钱”就在手边。

艺术品也不是特别具有优势。它很容易毁于火灾，很容易受损，很容易被抢，却不容易藏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仅华沙就报告说有13 512



件艺术品丢失了。这就表明，有些欧洲人已经成功地将名画从画框中取下，装在行李中偷运出国，将它们藏到了理想之所。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当它们要把这些画作出售时，所得款项要远远低于实际价格。

至少从20世纪的经验可以看出，固定收入根本无法与证券投资相比。即使在战胜国，它们所提供的回报也远远低于股票，虽然它们的浮动性比较低。在情况各异的国家里，债券的回报率都只及股票的1/2，银行票据的浮动率仅有证券的1/4。说到流通性，则固定收入投资是相当不错的。在战争年代，伦敦和纽约的固定资本投资市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流通性。

在战败国，固定收入投资却是严重亏损，虽然政府债券一般来说应该是无风险的，然而德国票据的投资人在1923年赔得血本无归，德国政府债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际收益损失达92%。必须承认，战后的通货膨胀极为惨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固定收入投资当然没有立足之地。战后，战败国处于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局面中，无论怎样你还能卖出一点儿股票，可是却不可能卖出政府债券，更不能把银行票据兑现。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由于通货紧缩的原因，政府债券作为良性资产，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

## 财产保存多样化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的教训：如果你在某一个国家里属于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特别是，如果你在那里还是少数种族，那你就格外小心。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的奢华，你的富有，早晚会引来一片嫉妒的目光，而嫉妒必然会导致仇恨。要把你的重要资产转移到国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果你是欧洲或亚洲某一个战败国的公民，那么，把钱弄到国外实在是救命之举。在第十章里我们举过的乔治·列文的例子，就能生动地说明有备无患的意义，列文是一个犹太富豪，他目光如炬，抢先一步把钱转移出了法国。最难的是把你的财产转移出国，却能避免伤筋动骨。把钱放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对于战后重建你的事业帮助极大。

不过，如果你在战争时期本人陷在了国内，那你放到海外的资产就没有



什么意义了。在战争时期，你要做到“狡兔三窟”。如果你在海外有大量财产，本人却在国内饿得奄奄一息，或者给监禁起来，在集中营里度日如年，那可真是太可悲了。许多法国人，犹太人也罢，非犹太人也罢，都把钱汇到了瑞士，自己则在法国占领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当事人自述，都表明有钱人一旦有了钱，几乎总是要变成沾沾自喜、故步自封、过于自信，口袋里装满了钱的大傻瓜。许多德国犹太人那么优秀，那么有教养，那么宽厚待人，却经常表露得太骄傲自信了。他们在德国待得太久了，创建的事业也太成功，所以根本不相信有人已经制订了一个计划，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毁灭他们。他们太养尊处优，乐不思蜀了。他们认为自己在当地认识权贵阶层，认为自己对德国的经济太重要，以至于德国人不会伤害他们。他们相信纳粹的反犹主义不过是一时的瘟疫，很快就会过去；认为希特勒不过是那种“只吠不咬人的狗”。他们的生意、银行、百货店、商铺都太赚钱了，舍不得折价卖掉，更何况还要他们付一笔骇人听闻的财产税，再把这点钱存到苏黎世那半死不活的银行账户里，他们真是不甘心。

结果，德国犹太人在德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对希特勒掌权的反应也极为迟钝，当然，他们有着正当的理由这样做，但那理由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事态的发展，比他们预期的要快得多。在他们察觉之前，政府和邻居已经变成了一批野蛮人，于是，犹太人的财产、艺术收藏、房地产，以及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失去了。时至今日，还能在一些私人收藏家家中看到他们的艺术品或者古董。最近报纸报道了一件来历不明的艺术品，那是一件2350年前价值连城的阿波罗铜像，它有1.5米高，原先是一个法国收藏家的珍品，于1941年失踪。1944年，一位东德的居民偷偷地把这座铜像卖了，在其后的10年里，它四易其手，最近才被克里夫兰的一座博物馆购得。铜像的原主人正在起诉，不过谁也不承认自己是最初的劫掠者。

为了使财产保存方式多样化，必须把你的一部分钱从国内利润丰厚的投资项目中抽出，转到国外根本无法生利的银行账户里，作这样的决定是痛苦的，代价也极高，但是你要明白这是应对危机的一个保障。不管你所在的国



家看上去有多么安全，多么有保障，哪怕它是美国也不行，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得在国外存上一笔钱。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国家都有要能发生政治激变、恐怖袭击、金融系统崩溃。你的货币也要多样化。要认真研究，看哪一种（或几种）货币最能表达你的财富购买力。

如今有些富人已经在自己祖国以外的相对安全的地方置业了。最近，新西兰就成了忧心忡忡的美国投资者的避险天堂。俄罗斯富豪眼下则在伦敦、纽约及法国南部地区购买多处房产。他们知道出价过高，不过他们本来就不太关心房产增值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把钱从俄罗斯弄出来，将自己的资产多样化。正如一位俄罗斯富翁所说的那样：“我希望自己做了一笔坏买卖。”他的意思是说，这样一来，他就不要花钱买高额保险了。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富豪们则在世界金融中心大开银行与投资账户。在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里，挣了大钱的人们也进行着类似的活动。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城市是（不一定按此顺序）纽约、伦敦、新加坡、苏黎世和日内瓦。迪拜也想加入这个俱乐部，但是它那又穷又嫉妒的邻国很可能会捣乱的，所以，迪拜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空军，而不仅仅是民用航空。

如果你是富人，那么请记住：“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要永远关注市场动向。市场所知道的比其所讲的要多得多。





## 第十五章 战争是财富致命的灾难

**对**于挣了大钱的人来说，要永远牢记在心的是：早晚有一天，天下还会大乱，“瘟疫时代”还会到来，四个骑马先知还要不期而至。也许某一天早上，你醒来时发现野蛮人已经兵临城下了。你的钱财会让别人嫉妒，同时你的财富又会让你自己得意忘形。2 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富人的天性就是富有的傻瓜。”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大创富的时代。当然，财富会引起仇富情绪，财富也会被放荡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浪费掉，或者被信奉平均主义的政客们瓜分掉。但是，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下，灾难性事件是否会毁灭财富，这些事件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已经多次发生。西塞罗说：“历史会照亮现实，激活记忆力，为你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包括那骇人听闻的动乱、对财富的毁灭性破坏，以及股市所显示出的独具慧眼，所有



这些都是让人们辩论不休的题目。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财富是暂时的，多样化是最重要的，而股市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则能显示出惊人的本能反应。正如一句老话所讲的那样：每当大事要发生的时候，它们的影子总是要先投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墙上。

从古至今，有钱人、房产业主、生意老板和金融大腕就一直不停地受到威胁，那些威胁来自仇富者、革命党、入侵者，也来自自然灾害、瘟疫、饥荒、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技术更新与新发明创造当然也是一种威胁和毁灭的力量，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威胁。技术改革会将迟钝不变的企业一举吞噬，同时吞掉它们的财产，但这是一种世界进步的必然进化规律，是创造性的毁灭，只要我们随时警惕，及时改革，采取多样化措施，就能将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对财富最致命的灾难、最带有毁灭性的威胁，就是战争，特别是战败的战争，被敌人占领国家的那种战争。欧洲的历史充满了对财富周期性的大毁灭。如果你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那么你会看到谢尔曼的大军穿过佐治亚时进行的那种财富掠夺。

战争看来是人类的一种病态反应，而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也让人高兴不起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眼泪的劝导下，人类会远离战争了，可是各种各样的冲突还是在不停地发生着。现在所谓的文明世界正面对着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我们要跟恐怖分子作战。100多年前，有一个叫莫尔克的日耳曼军阀曾经总结了战争不可避免，全世界都需要战争，他这样说道：“永久的和平不过是梦想，但那不是一场美梦。战争是上帝安排世界时所设下的一个因素。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迷失于唯物主义之中了。”

这一理论得到了尼采的响应，他写下了这么一段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想让人类忘记如何发动战争，只不过是天真幻想和一相情愿。我们对人类不抱有什么希望。为了打一场伟大的战争，人类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靠军营训练出强健体格，靠仇恨点燃残虐怒火，靠冷血谋杀来抹杀良知，靠消灭敌人来激发民族狂热，对生命的丧失无动于衷，对自



我本身的存在毫不在乎，对同胞的生死更是漠不关心，我们要的只是震天动地的欢腾，是震撼灵魂的冲锋，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活力，就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自救了。

如果战争和毁灭总是循环往复，不可避免，那一个有钱人该当如何应对呢？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内财富来说，土地和房产在你的国家陷入动乱时是最安全的，在世界陷入危机时是最有保障的。一处朴实无华的田产或农场，比一座炫耀夺目的豪宅大院更好，对你保住财富更加有利。砖砌的房子，水泥制成了建筑可能被征用或被炸毁，可是下面的土地是谁也拿不走的。敌人不可能把它抠下来运到别的地方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里，如果你拥有一处农庄，你可以挖一个避难所藏起来，幸运的话，可以一直在那里待着，等到大难结束。在你一个遭受饥荒的国家里，你至少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在法国和意大利，拥有并管理一处葡萄园是财富保值的极佳方式。

20世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确切地说，标志着一个动乱时代的结束。然而，世界历史表明：财富的毁灭，不管是通过战争、瘟疫或者技术，总是在人类中间发生着，不管人类有多么成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宿命会改变。那么，在新的世纪里，对财富的威胁又是什么呢？是恐怖主义、宗教战争，还是贪欲太盛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崩溃？谁能说得清？但是，我们要保持警惕！野蛮人还是会再来的。

恐怖主义当然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自然灾害或技术灾难也会造成类似的大屠戮。我们可以设想一场海啸，它不是来自大洋，而是来自一场生态瘟疫，让人类再无法生存下去；或者来自一次技术性的恐怖袭击，把所有的金融数据材料都毁掉。还可以设想发生了一场因贪欲无度造成的金融海啸，使全球所有数据公司都破产了。2007年夏天发生的次贷危机难道不是一次警告吗？如果一个金融机构破产了，那么，对所有相关联的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多米诺骨效应啊？也许，下一次野蛮人入侵时，他们打扮成了投资银行家、股票交易师、保险基金经理。

讲到财富如何保值或增值，实在没有最好的解决之道，更没有万能良方。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被征服、遭占领的国家里，或者你的国家正遭受一场生态或技术大灾难，那你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了。当然了，如果你能在灾难发生之前就逃到避难之所，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灾难及其影响有大有小，大到狂轰滥炸，小到停电事故，不管怎么样，都会造成法律与秩序的破坏，而那种情况对财富是绝无好处的。等着野蛮人兵临城下，实在非明智之举。你必须早作准备，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野蛮大军会以各种伪装杀来，一直打到你的家门口。对你来说有点难办的是，野蛮人下次杀来的时候，肯定打扮得与以前不一样，行为特征也大不相同。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会同样野蛮，同样掠夺成性。

## 关注“黑天鹅”

风格独到、颇有创意的哲学家塔勒布出版了一本新书《黑天鹅》，在书中，他引进了“黑天鹅”这一概念。黑天鹅是自然界的极端异常产物，在澳大利亚发现之后，人们才相信世界上果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

它生动地说明我们仅靠观察与经验所得的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们的知识又是多么不堪一击。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将人类几千年里经过上百万次观察所得出的天鹅皆白的结论彻底摧毁了。

对塔勒布而言，“黑天鹅”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事件，因为它完全超出常规的预期之外，以往的经验都无法证明其合理性。一只黑天鹅是极为罕见的，它的影响却是极为巨大的。不管怎样，它都具有一种回溯性或然论。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生物，自然就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了。

“黑天鹅”现象是完全无法预期的事件，只需要20种这类的异常现象发生，就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对费迪南德大公的暗杀、希特勒的发迹、珍珠港偷袭、“9·11”恐怖袭击、1987年金融风暴，所有这些都是“黑天鹅”事件。纽约的两座摩天大楼在一个早晨被夷为平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按照股市波动的一般规律，即使美国股市永远地下跌，也不可能一天之内跌幅达



到22%，可是，在1987年，这种事却真的发生了！

中途岛战役对美国而言是好的“黑天鹅”，对日本而言是坏的“黑天鹅”，因为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那场海战无论对战争还是股市，都成了一个转折点。没有人想到股市当时已经探到了底，只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伦周刊》的投稿人，以及股市投资大众对此才有所领悟。只有可怜的、落后的德国股市真正了解到，巴巴罗萨计划和希特勒的帝国之梦早在1942年晚秋，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就达到了顶峰。

塔勒布并没有为投资人提供对付“黑天鹅”事件的可行之道。他正确地指出：当投资者在评估风险时，他们一般不会把“黑天鹅”发生的可能性估算在内。他还说：“我们总是吸取我们不能吸取教训的教训。”他认为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在呼啸而来的火车前面捡硬币的交易员”，也就是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实际上是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他说得很多，也说得很对，只是很遗憾，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黑天鹅”的发生呢？他的观点好像是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在他的书最后，他这样结论：“你在我的思想里找不到对付‘黑天鹅’的解药。有时候我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会显得极为保守，有时候又会显得极为激进。”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就是他的原话。

13D研究咨询公司主席基里尔·索科洛夫在论及塔勒布及黑天鹅时，这样写道：“如果你思维敏捷，能力极强，那么你就一定能预感到大部分即将来临的黑天鹅现象。”他近年来所发生的许多“黑天鹅”事件都被其他人，还有他本人预计到了。也许他说得没错，只不过我还是表示怀疑。在头脑里想象出哪件事似乎就是“黑天鹅”，但是，难就难在你得把“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估计到，比如说，你得预测到一两年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预测得过早，那也算是错了。

当然了，你可以想象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只是要考虑到保险费得花多少。

在1987年春，一个年轻又聪明的专利产品分析交易员在一家大投资银行（不是摩根士丹利）工作。这时他相信（根据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个定量分析模型），美国的股市大繁荣马上就要导致一次股市大崩盘。幅动不是10%，也不是15%，而是极为罕见的25%的标准异动，就是说，是“黑天鹅”式的



20%~25%的跌幅。他还进一步推断出，这一大跌要在数周之内全面爆发，而不是想象中的长期恼人的熊市。他为公司还有他自己（将自己全部收入的70%投入了进去）疯狂地购入了大量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一些低价垃圾股。这样一来，当大崩盘来临时，他就为公司和自己狠赚了一大笔钱，公司同时也奖励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后来怎么样了？现在，当年的那位小伙子已经长了20岁，从那以后，他一直对股市持有熊市的观点。他发明的那个定量分析模型很有名，1988~1998期间，三次预报过“黑天鹅”的来临，不过三次都报错了。1999年，这个模型因为无用最终被放弃了。1988~1995年，另有10~12个聪明的年轻交易员也因为预计到了“黑天鹅”的来临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在类似的交易中挣了大钱。我不能肯定，但是我想他们中间肯定有一大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迷上了“黑天鹅”概念不能自拔，结果被这一概念弄得一败涂地，在2000年因新技术的出现而陷入绝境。

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黑天鹅”的出现时间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千万不要迷上这一理念。尼采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长时间地盯着深渊，最后你就会变成深渊。”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就要拿出你5%的钱放到安全之所。再拿出5%的钱放到农场里。你还应该购买一些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防止通货膨胀的债券。不过，在我看来，你应持有的比例是5%~10%，而不是50%。还是尼采说得好：“闭眼不看过去，那你就等于瞎了一只眼。沉迷于过去，你就等于瞎了两只眼。”

说到把钱存到保险的地方，在写作本书时，我读了大量富翁在战争期间把钱存到瑞士银行的故事。许多时候，家族的父亲在战前就把钱偷偷存入瑞士银行，留给自己的继承人。战后，瑞士银行严格依律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你拿出正式的账户所有人手续时，才会把钱交给你。相反，如果你拿不出来，他们就绝对不会付钱。

例如，埃丝特尔·萨皮尔是波兰华沙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家的女儿，父亲叫约瑟夫·萨皮尔。她家的公寓楼里有许多上等家具、银器和艺术品，还有许多居家仆人。当德国人入侵波兰时，萨皮尔家族逃到了法国。德国人攻入法国之后，把他们都逮捕了。埃丝特尔与父亲隔着监狱铁窗进行最后的谈



话。“别担心钱的事，”父亲这样对她说：“我在瑞士银行给你存了大笔的钱。”他提到了那个开户银行的名字。他把手伸过铁窗，用手指在女儿的手心写，让她记住有关的信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了马德内克死亡营，从那以后，再没有他的音讯了。

战后，埃丝特尔在法国活了下来。1946年，她来到了日内瓦的瑞士信贷银行，要取走自己的钱。银行经理走了进来，带着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约翰·萨皮尔”签名的文件袋。她拿出了自己的护照，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还给经理看了父亲亲笔写的关于账户资料的便条。但是，银行经理却不给她那笔钱，向她索要她父亲的死亡证明。她气得不行，说：“我去跟谁要死亡证明？去向阿道夫·希特勒要吗？”但是，银行经理不吃她那一套。她在1946年又两度去那家银行。1957年又去了一次，1996年再次去找他们。可是都没有结果。后来是美国人进行了干预，结果那家银行在1998年象征性地付给了她500 000美元。可是，她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享年73岁。话说回来，那都是她父亲的错，因为当初是他自己在开户时加了那么一项条款。

许多银行的做法是这样的：如果在过了若干年之后，一直无法与账户所有人取得联系的话，那么储户的钱可以转到银行的保留基金里。这一做法让许多存款人大为愤慨，许多人写文章，著书立说，对此大加抨击。例如，汤姆·布维尔写了一本书，于1997年出版，书名就表达了其内容：《纳粹金条：瑞士银行与纳粹合谋50年全史》。我不相信有什么合谋的事情，银行当然得有银行的规矩。但是，这一个故事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你因为避难要存钱时，一定要跟银行签好协议，以便以后取钱时银行能够通融一些。并且，签订合同前应把银行协议的每项条款都看个仔细。

你如何才能预防未来的动乱而保存财富呢？谁也说不清楚。不确定性的意思就是说，不确定性逼着我们要将财富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分散风险永远是谨慎投资者的第一要义。分散你的财产，把它们分别放在股票、债券、私人证券、零售企业，以及公司经营的股份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奶牛是最安全的保存财富之方式。那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大旱来临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把你的财富分散开来放置，不要存在一个地方。不要把你的证券都存在纽约、伦敦和苏黎世计算机化的大银行、大经纪公司那里，同时也要记住，那些文件都要用你的名字存，不是用街道名。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就像你吸了二手烟一样。吸入之后，很有可能你会得癌症。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

幸存下来的物种并非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适应变化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在不同时期保存财富的人。

永远要关注市场投资大众的集体智慧，因为他们所反映的正是市场真实的声音。他们并非永不出错，但是比起专家和媒体，他们要聪明得多。同时也要明白，他们在抄底时，比在巅峰时更为明智，而且，你也不能指望他们能预知恐怖袭击、瘟疫和金融风暴的来临。

至于说到在历史转折时刻股市本身是多么明智，我想历史记录本身是最有说服力的。

## 伦敦股市

在1940年初夏，敦刻尔克撤退刚结束，不列颠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然而，伦敦股市已经感知德国在攻击英国的战争中已近尾声。我们翻看史料，发现当时没有任何有名望的人相信这一点。战场的情况一塌糊涂，英国正在孤军血战。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丘吉尔当时在公开演讲中也出言谨慎，强调“不列颠战役不过是刚刚开始。”事实上，英国陆军和海军接二连三的失利，已经让他深感失望。

伦敦股市在1940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终于探了底，几乎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末期低值相等。那真是大抢购的绝佳时机，但是只有一批投资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具体来说，那一天就是1940年6月27日。正是在那一天，丘吉尔向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发出警告，声称如果“英国被打败，并有大面积土地被占领，那么很可能在英国就会出现一个亲纳粹政权，英国就有可能



与纳粹单独讲和了……在那种情况下，英国舰队就成了一份给伪政权的一份厚礼，那个政权可以用它来跟领导者讨价还价。”6月27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战争部的联席高参会议上，伟大仁慈的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呈交了一份报告，“根据那份报告，美国再也不要向英国运输任何物资了，因为英国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几乎与此同时，约翰·F·肯尼迪在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狂热进行工作，而德国派往伦敦的一名间谍则不停地在唐宁街10号附近的垃圾箱里不停乱翻，想找到丘吉尔是个大酒鬼的证据，这可是希特勒一直怀疑的。

如前所述，美国股市在1940年同时探底，只不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1942年。唯一不理解形势的股市就是巴黎股市，不过，在伏尔加格勒会战之后，它也明白了：第三帝国不可能维系上千年之久。在1941年，英国投资者正确地预感到了英国的胜利，因而股价开始飘红，虽说在那年的第四季度战场的情况还是糟糕透顶，人们对英军的能力一再失望。伦敦肯定预感到了美国行将参战，甚至它有可能感到（当然不是确切地预知）到了像珍珠港那样的事件行将发生。

## 柏林股市

随着风向转变，日本和德国政府对股价开始进行控制了，规定谁卖股票谁就是“不爱国”。这样一来，我们不会看不出股市对形势反映的聪敏性何在了。然而，德国的股民还是富有预见性的。就在1941年11月，德军困于莫斯科郊外之际，柏林股价达到了顶峰。在一个极权国度里，能有这样的精准预算真是难能可贵，要知道当时所有的消息都是受到控制的。当时，有个别希特勒的将军私下里怀疑说，德军已被“苏联的广袤”给消耗坏了，但是，他们自己对元首还是确信不疑的，所以那些言论又有谁能听进耳朵里呢？

## 日本股市

在日本，情况也大同小异。日本政府对战争消息严格控制，日军损失的情况要么不向公众汇报，要么就是轻描淡写。对日本公众来说，失败是不可



能的事。在整个1942年，日本大众得到的消息都是日军大胜，一个接一个地占领别国。珊瑚海战役、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康纳尔岛战役都被宣传为日本大胜。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珊瑚海和中途岛被击沉的日本军舰上的幸存官兵，虽然回到了日本，仍不许登岸休假。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日本在东南亚就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但是，投资者却看穿了这些宣传的真面目，股价实值到1942年秋就探到了顶点。食物短缺，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拆下来炼钢去了。投资者看到这些，怎么可能还把自己的血汗钱投到武士道的光环里去呢？

## 美国股市

美国的情况同样富有戏剧性。美国证券市场在1942年春末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值，当时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正在进行中。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前几个月里，官方也好，媒体也好，对太平洋战事的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小小的占便宜会给说成大大的胜利。这并不是有意宣传，因为战场上的士兵常常把自己打飞的子弹误判为击中了敌人。华盛顿更愿意相信日本军舰像石头那样一个个沉底。通过潜望镜看时，一颗本来击中小小驱逐舰的鱼雷，却给富有想象力的美国人这样的印象：哇，它击沉了一艘战列舰！举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刚刚击沉了一艘日本巡洋舰，而事实却是，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他把炸弹投向了一艘美国潜水艇。那艘潜艇给炸沉了，而飞行员兴高采烈，对这次战斗来了一个大误报。随着战争的进行，美方也好，敌方也好，都要把飞行员的战绩报告大打折扣，有时要把那个数字除以2，有时还需除以3。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2年中期，怀疑论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战场上的报告，误差那么大，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了。美国媒体对战争指挥狂批痛责，对军队的无能痛心疾首。珍珠港和爪哇岛失败之后，军队的无能特别是海军，成了报纸社论的主题。有人主张（现在还有人这样认为）应该把麦克阿瑟送交军法审判，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居然逃之夭夭，把自己的部队丢给敌人，全数被歼。珊瑚海战役被报纸报为一场失败；而中途岛战役中美国鱼雷艇的损失被多报，“约克顿”号航母的受伤被夸大了。如前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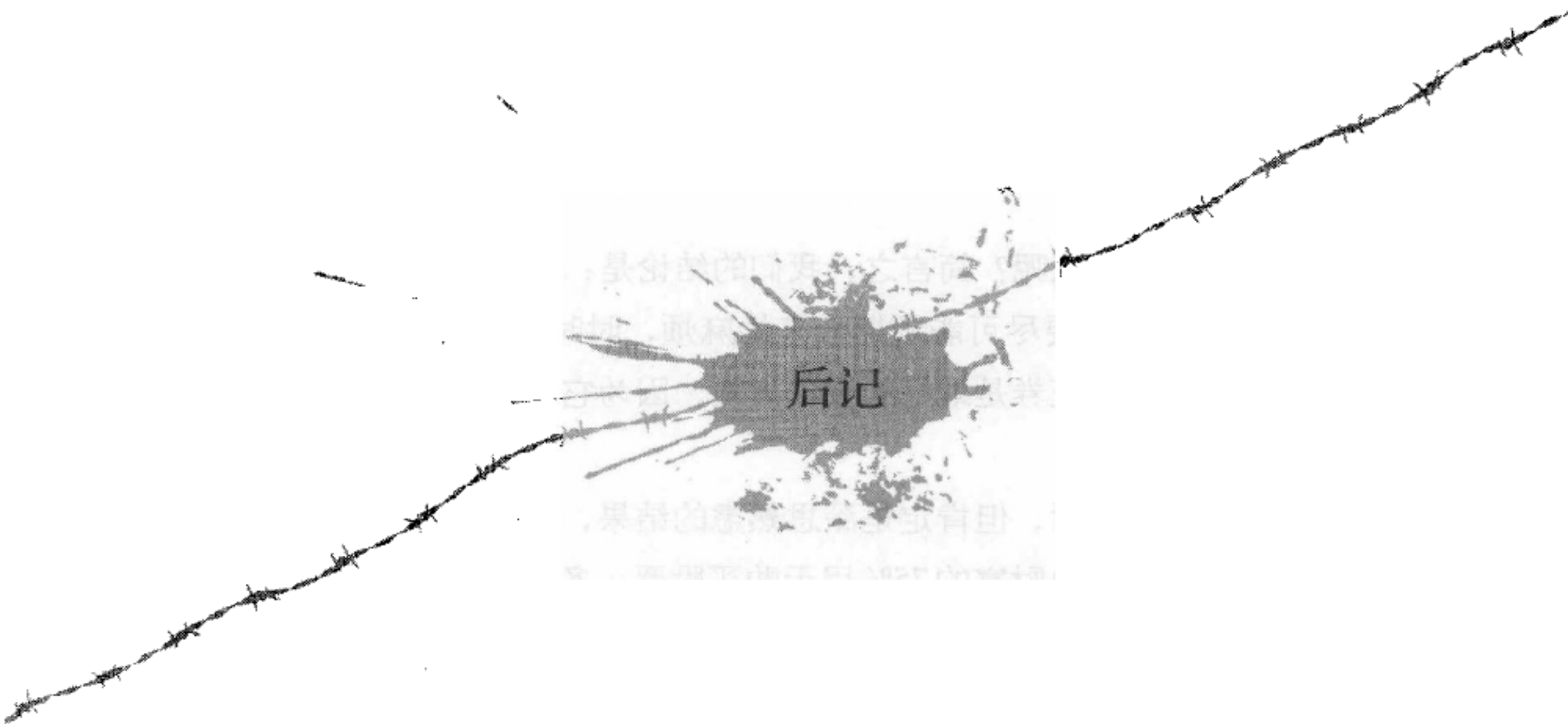


日本官方宣布他们在中途岛取胜，而且，这时隆美尔的装甲军团已经攻取了利比亚的图卜鲁格，距埃及的亚历山大不到65英里了。人们的失望变成了绝望，战场传来的消息坏到了极点。



.





**证**券市场是明智非凡的。投资大众具有伟大的直觉智慧。从长期判断这一角度看，股市乃是一个理智的、不受干扰的、利益直接的群体力量。不管那些所谓的思想家，自封的股市精英，自吹自擂的专家们如何夸夸其谈，故弄玄虚，投资大众对战争、经济、政治，尤其是股市总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们是一艘小舟，可以接纳最聪敏的判断，而且总是围绕着最可能的概率来进行。他们缺少想象力，不去思考预测意外的、10种改变环境的异律事件。历史通常并不是缓慢有序地进行，而是常常无序跳跃、乱中取胜。

有钱人必须明白，早晚总有那么一天，当四骑士临世之时，世界又会发生大灾难，野蛮人会再次兵临城下。准确地说，下一个“黑天鹅”现象将会是文明社会的全面毁灭，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与金融体系彻底崩塌。

问题是，这个“黑天鹅”要打扮成什么样子呢？它要穿什么样的戏服呢？我认为，它很可能会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专制政权进行占领时所造成的影响。引发这种现象产生的机制，会是大规模恐怖核袭击，它会将世界经济中断数月乃至数年之久。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停电达一个月之久，就会让现代经



济瘫痪。也许，它会是一场瘟疫，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或者是一次电子信息的爆炸，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不管怎么样，它极有可能是我们最意想不到：因而最无从准备的某种形式的灾难事件。世人最善于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简言之，我们的结论是：把你的财产多样化，储存之所也要多样化，要尽可能预期未来的麻烦，时时关注市场透露的信息。从长线投资角度看，证券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因为它们已经证明是可靠的财富增值手段。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就是：不管是家庭还是个人，都要把自己总财富的75%用于购买股票。多少年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证券是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保财之道。正如戴维·史文森所说，在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世界里，你应该成为业主，而不是房客。所有这些投入最终会成为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别理会股市短期内的波动。你最需要关注的是购买力是根据股票实际回报率进行复利计算的。收益良好的指数基金当然没问题，即使收益一般的指数基金也可以入围。不要玩高风险的投资产品，总之，不要太过自信，不要被世界上最棒的基金经理算计，不要太迷恋保险基金。去年的明星产品很可能是明年的大输家。

还有一点，当然可以是多样化计划的一小部分，那就是：想办法在远离尘嚣，同时又很快抵达的地区，购置一个农场或牧场。把它看成是一份保单，对有钱人而言，在一个发达经济体里拥有一个农场，应当是相当不错的长线投资。可能它的购买价相当于你净资产的5%。控制住产粮之地，一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地主一直会给人一种心理上满足的感觉。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阳台上看着你的田地和牛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到满足的呢？

我们不知道抵达自己下一个世外桃源具体还需要多久。如果你无法去新西兰，那么在那里拥有的田产就没什么用处了。一般而言，我们会坐越洋飞机去。此外，你也需要把自己的避难所安排在外人无法轻易接近、不易受到干扰破坏的地方。

你得想到，有一天文明社会会完全崩盘。所以，你的世外桃源一定得有



济瘫痪。也许，它会是一场瘟疫，夺去千百万人的生命，或者是一次电子信息的爆炸，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不管怎么样，它极有可能是我们最意想不到：因而最无从准备的某种形式的灾难事件。世人最善于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简言之，我们的结论是：把你的财产多样化，储存之所也要多样化，要尽可能预期未来的麻烦，时时关注市场透露的信息。从长线投资角度看，证券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因为它们已经证明是可靠的财富增值手段。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就是：不管是家庭还是个人，都要把自己总财富的75%用于购买股票。多少年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证券是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保财之道。正如戴维·史文森所说，在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世界里，你应该成为业主，而不是房客。所有这些投入最终会成为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别理会股市短期内的波动。你最需要关注的是购买力是根据股票实际回报率进行复利计算的。收益良好的指数基金当然没问题，即使收益一般的指数基金也可以入围。不要玩高风险的投资产品，总之，不要太过自信，不要被世界上最棒的基金经理算计，不要太迷恋保险基金。去年的明星产品很可能是明年的大输家。

还有一点，当然可以是多样化计划的一小部分，那就是：想办法在远离尘嚣，同时又很快抵达的地区，购置一个农场或牧场。把它看成是一份保单，对有钱人而言，在一个发达经济体里拥有一个农场，应当是相当不错的长线投资。可能它的购买价相当于你净资产的5%。控制住产粮之地，一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地主一直会给人一种心理上满足的感觉。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阳台上看着你的田地和牛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到满足的呢？

我们不知道抵达自己下一个世外桃源具体还需要多久。如果你无法去新西兰，那么在那里拥有的田产就没什么用处了。一般而言，我们会坐越洋飞机去。此外，你也需要把自己的避难所安排在外人无法轻易接近、不易受到干扰破坏的地方。

你得想到，有一天文明社会会完全崩盘。所以，你的世外桃源一定得有



自给自主的能力，可以生产一定食物。在那里，你要备好足够的种子、化肥、罐头、葡萄酒、救急药、衣服等。想一想瑞士人罗宾逊一家吧。即使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都有可能发生暴动和叛乱，那时法律与秩序便荡然无存了。如果有匪众来袭，要对他们进行痛击。只要你打几梭子弹，他们就会知难而退，转而去找那些易于攻击的人家了。散兵游勇一般都是胆小鬼。

我得再说一遍：历史已经证明了，有钱人最容易骄傲自满，以为灾难来临时，自己总有办法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带走自己的全部资产。事实上，这种情况却从来没有那样发生过。灾祸一来，快如闪电，当你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时，野蛮人已经骑到你的脖子上了。按定义而言，黑天鹅从来都是不期而至的。它们总是想毁灭财富，可是当你如梦方醒，要作准备时，通常都为时已晚。当然了，准备过早，代价会极高，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备无患总胜过悔之晚矣。



# WEALTH WAR & WISDOM

动荡年代，如何使资产价值不降反升？  
战争时期，如何读懂政治，看准股市，守好财富？

不列颠战役之前，英国股市跌到了有史以来的低点。

中途岛战役之前，美国股市发生了惊人大逆转。

德国军队横扫欧洲时，德国股市达到市值巅峰。

珍珠港袭击事件前后，日本股市一路飙升。

在这“世纪之战”的转折时刻，股市成为战争成败的伟大预言家。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www.wiley.com](http://www.wiley.com)



上架建议 金融

ISBN 978-7-5086-2731-1



9 787508 627311 >

[www.publish.citic.com](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49.00元